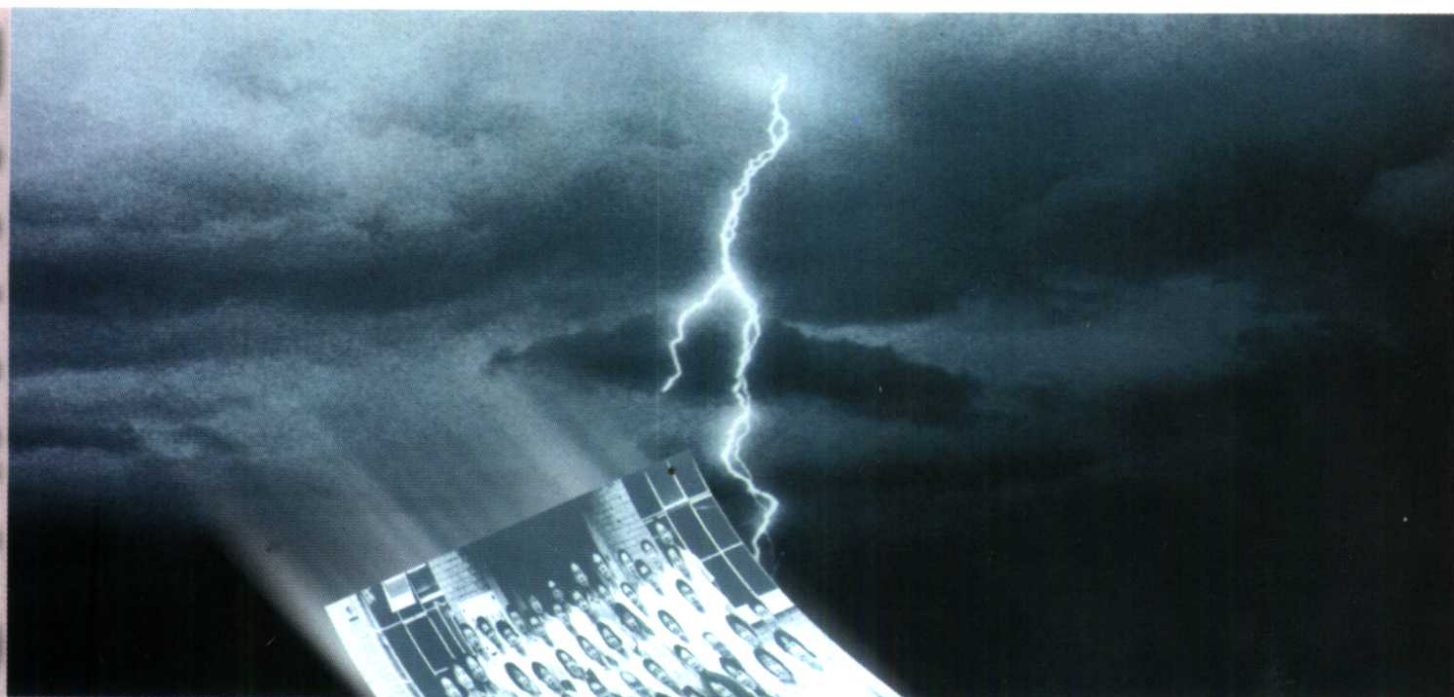


YI DAI ZHONG GUO QING NIAN
DE SI XIANG CHU LIAN 彭波 主编

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

潘晓讨论

PAN XIAO TAO LUN



《中国青年》编辑部 编

有人说它掀开了八十年代中国的扉页，是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象征；还有人干脆说它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真正的思想启蒙……

它曾一度被作为思想教育工作的成功范例广为宣传，也曾险些被当作“精神污染”的糟糕典型进行清算……

它曾让当年的千百万青年为它哭为它笑为它激动为它争辩为它深思；也让千百万今天的中年频频回首没齿不忘……

它是中国期刊史上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个传奇，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阙回声不断的绝唱……

南开大学出版社

南开大学出版社

讨论

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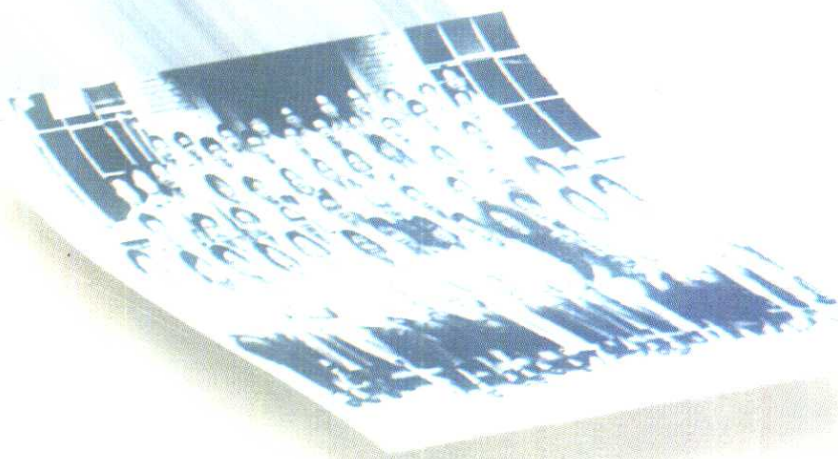
潘晓

《中国青年》编辑部 编

彭波 主编



99083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潘晓讨论：/ 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 / 《中国青年》编辑部编. —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5
ISBN 7-310-01423-5

I. 潘... II. 中... III. 青年-人生观-讨论-中国
IV. D43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4527 号

出版发行 南开大学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电话：(022)23508542

出版人 张世甲

承 印 河北永清第一胶印厂印刷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0.375

插 页 4

字 数 258 千字

印 数 1 — 8000

定 价 22.00 元

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宽(代序)

《中国青年》编辑部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20年前的这一声提问让整个中国为之震动。

20年后，在创业的梦想和享受生活欢乐中的年轻人从键盘上抬起头，迷惑和难以相信的神态证明着一种岁月的隔断：你说什么？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是的，为什么让属于生命的历史惊醒的，让一代人摆脱了噩梦从沉睡中惊起的不是那些惊天动地血与火的变故，而是这一声让今天的人无法理解的，甚至有些幼稚的提问？

20年前：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10年甚至更长的“左”倾思想禁锢封杀了几代人鲜活的生命，“文革”的结束并不是在一天完成的，几代人在心灵上对它封建残暴、窒息人性的清算远比一次次平反来得更为艰难。真正的思想解放应该是从每一个人的内心开始的。

“文革”最大的罪恶，是对一个民族、特别是一代青年人性的极度摧残，当一代人为谈论“自我”而感到是一种“罪恶”时，谁还会相信这个社会具有进步的希望？“文革”结束后，一种春天的感觉回到人们身边，当我们为一个个老干部获得解放、一桩桩历史冤案得到平反而欢呼时，一种生命的欲望在我们身上渐渐苏醒，

一个巨大的问号在我们心中形成：谁是这场灾难的最大受害者？谁为我们在场灾难中变得畸形的青春承担责任？谁能为我们找回失去的青春岁月？在那些“文革”受害者们倾吐着自己的冤屈、为自己重见天日而庆幸的时候，有谁在关心着那些除了有还算年轻的生命，而几乎失去一切的一代青年，特别是他们未来的人生？“我今年 23 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经不复存在，我似乎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这就是那个叫“潘晓”的年轻人代表无数年轻的生命向这个变幻的世界表达的真实感受！新的时代开始了，可是将要肩负未来的青年却在一片浑沌的过去和没有路标的未来中间迷惘了。过去的一切如同一个不守诚信的诺言，如同一场没有人承担责任的欺骗。“像潘晓一样，他们原来也真诚地相信世间一切都是美好的，真诚地愿意为革命、为信仰献身。然而，十年动乱冲毁了这一切：理想与现实竟有着这样惊人的距离，人生的旅程竟是这样的艰辛，人生的目的竟又是这样模糊、把握不住？！他们彷徨、苦闷……”（《中国青年》编者的话）但是他们没有沉默，他们要诘问，要呐喊，才有了潘晓这一声代表了一代人内心焦灼的提问。这一声提问如空谷足音，在迷茫的心灵中引发了巨大的回声，它形成的是一场集体的心灵反叛，是对那个尚未完全逝去的对人的尊严视而不见、无情摧残的时代的彻底反叛！在表面上，人们看到的是一代青年的“彷徨”“苦闷”，而在麻木、僵化、失去人性的历史背景上，它更是一种反抗，一种不甘沉沦的进取，是一种渴望进步、渴望人性生存、渴望社会变革的热情呼唤！

想一想那场浩劫之后，新时期的历史帷幕是怎样在你内心开启的？那真正拨开人的内心早已锈蚀之锁的是什么？不正是来自这对人的尊严的呼唤吗！没有人的解放，没有心灵的解放，社会的变革不就是一句空话吗？20 年的进步证明了一个道理：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充满人性关怀的空间，建立一个尊重人的生

存个性的社会,历史的进步在于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生存的尊严。这一场人生观的讨论无疑成为中国新时期到来的精神准备。“像以往多次发生过的情形一样,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进步的前夕,差不多都发生过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讨论,俄国革命前夕关于人本主义和新人生活的讨论,我国五四时期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等等,都曾经对社会的前进作出过贡献。”(《中国青年》编者的话)《中国青年》的编辑在这场大讨论引发之初的预见无疑已经为中国 20 年的进步所证明:如果说中国在走出“文革”的阴影,步入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中,有一场人们没有充分意识到的“启蒙运动”,那么,我们回过头看看,这场被历史命名为“潘晓讨论”中的精彩文字,正是这场“启蒙运动”最具本质意义,最具代表性的重要文献。

20 年来: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宽

我们体会着改革开放为生活带来的空前繁荣,感激改革的先行者无畏的探索。当我们不再为生活的进一步丰富欣喜若狂的时候,为什么不想一想这一切是来自于什么?

改革的一切都是为了生产力的解放,也就是说,是人的个性的最大解放。中国 20 年的进步,正是从“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疑问和不满走向寻求变革、寻求个性解放、寻求创造的过程。潘晓的所有疑问不仅是对“文革”的反思,更是对一种旧体制的诘问。当让潘晓痛苦万分的生存环境一点点消失之后,我们意识到,那一场人生观大讨论实际上是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进行的一次必然的铺垫。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不是创造的主体,而仅仅是一部机器上的零件。个人的一切都在“计划”之中,个人只有“无私的奉

献”而不允许有超出“计划”的创造,只有服从“计划”的责任而没有追求个性的自由,“螺丝钉”精神被绝对化成了一种僵硬的理念。20年前,有理想、有追求,但没有背景、没有依靠的潘晓在经历了一次次碰壁的痛苦后,悟出了一条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20年前,这是一种近乎大逆不道的声音,它触发了人们对道德伦理的争论。但是20年之后,当我们已经能够平静地面对和接受市场经济竞争的时候,我们还会再为这样的语言感到震惊和不安吗?因为我们已经充分体会到了市场经济带来的无尽活力,享受着它为我们个性发挥所提供的各种机会,我们不再为越走越窄的小路而烦恼,而更多的是体验着站在十字路口、米字路口时的欣喜和躁动。

市场经济的进步一条条回答、拆解着潘晓20年前的那一声疑问。市场经济的发展充分符合着人性的需求,它建立在自由平等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新文化理念,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和创造提供了机会,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本性在平等的合作和竞争中得到了尊重,同时也为社会增加着财富。市场经济为社会带来的进步同时证明着人们追求自利不是社会丑恶事件的源头,相反,正是一部分人因自利而妨碍了别人追求自利,侵害了他人的平等权利而让我们看到了丑恶。社会的进步标志不仅在于物质的丰富,更重要的,是人性的解放,是对一个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

20年来,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潘晓应该从痛苦、迷茫和叹息中解脱出来,事实也正是如此。潘

晓的两位主人公各自经历了人生的沉浮,最终都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在市场经济的潮流中找到了人生的尊严。20 年来的改革使我们一点点摆脱了过去的束缚,我们可以在各种机会面前进行选择,可以自主自己的现在和未来,可以为失败痛苦而不会为无路可走怨天尤人,可以为自己能力的有限遗憾而不再为没有背景感到自卑,我们感到了创造的自由,人生的路真的是越走越宽了!

感谢潘晓,感谢她那让整个社会为之震动的一声提问!

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精彩

社会进步如此之快,当我们还在为回忆昨天“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而叹息的时候,我们已经走进了一个建立在知识经济基础之上的“知本主义时代”。这个新时代的来临让我们有点措手不及,但我们无一例外地为它欢呼雀跃,因为年轻的我们感到了它的节奏与我们的生命如此协调,它的挑战姿态前所未有的证明着我们年轻的优势。一个历史阶段就这样即将属于年轻的生命,没有人可以否认,也没有人可以忽视。

那种依靠经验和资历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就要成为历史,而“知识有可能不再依附于土地或资本而成为独立的现实力量,并将成为权力、市场、资本之外支配社会资源流向和财富分配的‘第四支手’;通过知识的解放,一部分知识分子将以‘知本家’的面貌独立出现在舞台的中央,成为中国知识经济、知识社会的重要代言人……”“作为一种社会形态、一个历史阶段,知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也绝不是少数‘知本家’狂欢的盛宴,而是生逢其时的我们青年一代不得不接受其洗礼的大潮。”(《中国青年》2000 年 1 期《走进知本主义时代》)这不再是预言,一个又一个年轻创业者的故事就在我们身边演绎着现代科技知识的神奇魅力,以 IT

行业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发展方向让整个世界看到了青年所具有的空前优势,知识的积累不再是前辈向后辈单向的传递,创造力无比明确地显示在年轻一代的身上,历史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把一代青年推到了社会发展的前台。这一代青年是幸运的,因为我们身逢知识经济的来临之际;这一代青年也是最优秀的,因为我们的创造和努力正改变着历史的进程。在这个时刻,当我们怀揣着现代科学知识奔波在市场经济的世界里,在我们面前,是一大片等待着我们开垦的土地,是我们将要走出的一条条创造之路,谁还会问“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呢?

但是,20年的人生追问没有失去意义,我们从追问“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到追问“我不停地奋斗为什么成功离我越来越远”,那些不安和疑问终于化作了今天面前的开阔,从对社会的疑惑到对自身的反省,从被动的思考到主动的寻求,一代青年已经不再为自己的命运无法把握而叹息。我们依然不安,因为世界发展太快;我们依然焦虑,因为担心太慢的知识更新;我们依然躁动,因为展现在面前的机会实在太多;我们依然思考,因为渴望更加优秀,更加有力。

今天,不是“人生的路越走越窄”,也不止是“人生的路越走越宽”,而是在这个舞台上,我们怎样表演得更出色,更经典。

(执笔:彭波 王林)

谨以此书

**献给所有不甘于虚度人生而不倦地跋涉
和思索的灵魂……**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潘晓的这声呐喊

如空谷足音

在迷茫的心灵中引发了巨大的回声

它形成的是一场集体的心灵反叛

是对那个尚未完全逝去的

对人的尊严视而不见

无情摧残的时代的彻底反叛

在表面上

人们看到的是一代青年的「彷徨」「苦闷」

而在麻木、僵化失去人性的历史背景上

它更是一种反抗

一种不甘沉沦的进取

是一种渴望进步

渴望人性生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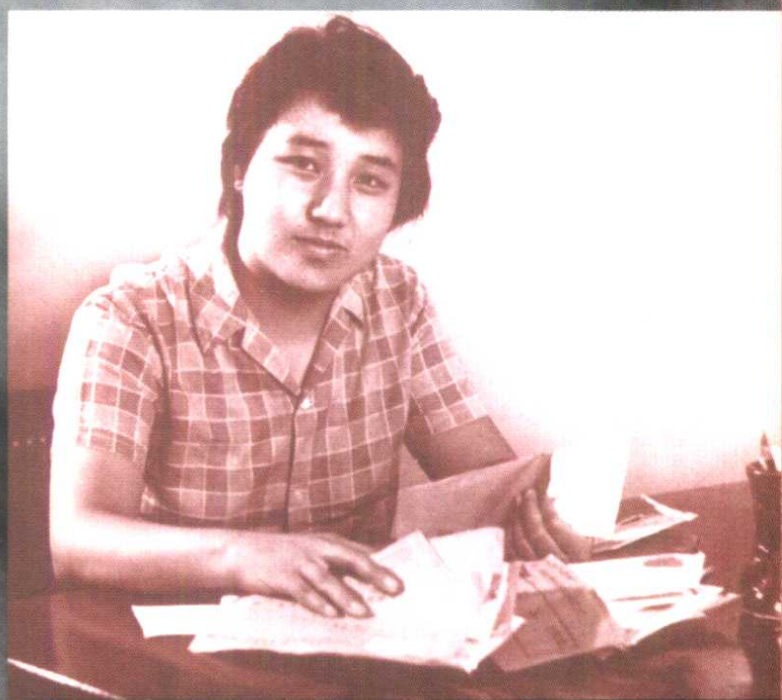
渴望社会变革的热情呼唤



胡乔木同志和中国青年杂志社全体工作人员合影 1980.6.18



潘祎：二十年前的那场人生观讨论，对我的影响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化的标识



黄晓菊：在“潘晓讨论”的日子里，读信常常读得我泪流满面



今日黄晓菊，步入人生新风景



历经 20 年沧桑的潘祎



20 年的忘年交：潘祎和马丽珍在一起

目 录

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宽(代序)……《中国青年》编辑部(1)

解 密

“潘晓来信”是怎样问世的?《中国青年》为什么要发表这样一封石破天惊的来信?几张小小的纸片怎样强烈地搅动了生活?胡乔木亲临《中国青年》编辑部出谋划策;工人日报的内刊《情况参考》登了两封群众来信;《中国青年》给胡耀邦“提一点意见”;中宣部请专家帮助“看”总结;华中工学院党委告状;胡耀邦批示“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六万多封珍贵来信化为纸浆……

“潘晓讨论”始末……………彭明榜(3)

六万颗心的回响……………(30)

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编者的话)……………(38)

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郭楠柠 陈汉涛(40)

命 运

“潘晓讨论”的三个主角黄晓菊、潘祎、赵林 20 年来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坎坷际遇？他们当前的生活境况如何？在历尽沧桑之后他们是否有所怨怼？他们现在的人生观念怎样？三篇酣畅淋漓的长篇自述告诉你……

笑着哭着唱着骂着走过来 …………… 黄晓菊(61)
那场讨论改变了我几乎全部的人生 …………… 潘 祎(75)
我命运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枢纽点…………… 赵 林(101)

声 音

这里是“潘晓讨论”的原声录音，是感动过整整一代人的文字。这些文字带着眼泪浸着心血，推心置腹，披肝沥胆。它们是当年千百万人的心声，是六万多封珍贵来信的精选。它们都是写给那个叫“潘晓”的女孩的，不是情书胜似情书。那是一代中国青年思想的初恋，感天动地，轰轰烈烈……

关于“个人价值”的探讨…………… 夏起光(115)
“窄”是“宽”的前奏
——致潘晓同志…………… 诚 石(120)
我们在关注着讨论的命运…………… 方冀生(123)
“为自我”又岂能“为别人”…………… 侯爵良(125)
来自生活的思考…………… 安 文(127)
从抗争到开拓…………… 韩 方(133)
来信来稿摘登…………… (139)
痛苦与希望…………… 李翠华(154)
有这样一个副团长…………… 李建民(157)

- 一个香港青年的祝愿…………… 文锦韬(160)
- “为自我”并作一定与“为他人”冲突
- 与侯爵良同志商榷…………… 王 韦(162)
- 人生既搏“命”又斗不过“命”…………… 顾礼俭(164)
- 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 赵 林(166)
- 不能搞“公私合营”…………… 李为民(173)
- 可否提倡一种与现阶段相适应的人生观…… 马宁荣(177)
- 弊病安在…………… 胡昆明(179)
- 寻求生活中的真善美…………… 杜一力(185)
- 走出思想的死胡同…………… 鲁 临(189)
- 回顾与“看透”…………… 刘 英(194)
- 为合理的道德观说几句话…………… 雪 华(200)
- 我们社会中的人怎样被“模式化”了…… 旷洋 郑宁(207)
- “大公无私”绝无 “公而忘私”确有…………… 杨茂森(214)
- “看透了”活得更积极…………… 雷祯孝(216)
- 人的动物性与社会性…………… 晓 鹰(223)
- 谢谢你的启示…………… 桂 钢(226)
- “自我解放”并非“个人至上”…………… 朱孝远 蒋雅容(227)
- “自我”离不开社会…………… 刘 英(231)
- 无须如此充“硬汉”
- 答赵林同志…………… 何乐为(235)
- 关于潘晓的两个命题…………… 柳 松(239)
- 让我们用血肉来拥抱世界…………… 周晓东(246)
- 感受到了时代的春风
- 一个团干部的心声…………… 李宝善(252)
- 我认为可以搞“公私合营”…………… 陈百明(255)
- “时势”与“搏命”…………… 郑 明(258)
- 蜡烛和电灯…………… 杜力夫(264)

在利他中利己 在利己中利他·····	常谢枫(269)
谈“透”·····	田 芬(271)
驯服野牛的“哲学”·····	杨文杰(275)
“危机”与“蹲苗”·····	杨 柏(279)

结 案

这些材料是内幕的内幕,对于所有关心“潘晓讨论”这一事件的人们,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也无论是出于好奇还是深入的追溯,它们或许都最具有可读和趣味。在时间面前,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没有秘密可言……

胡乔木接见《中国青年》负责人·····	(285)
潘晓同志的来信·····	(294)
关于工人日报等单位反映“潘晓问题”的调查报告 ·····	(297)
关于“潘晓讨论”问题的检查报告·····	(305)
“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 ·····	(311)

解

密

“潘晓来信”是怎样问世的？《中国青年》为什么要发表这样一封石破天惊的来信？几张小小的纸片怎样强烈地搅动了生活？胡乔木亲临《中国青年》编辑部出谋划策；工人日报的内刊《情况参考》登了两封群众来信；《中国青年》给胡耀邦“提一点意见”；中宣部请专家帮助“看”总结；华中工学院党委告状；胡耀邦批示“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六万多封珍贵来信化为纸浆……

“潘晓讨论”始末

彭明榜

今天仍有上百万的人珍藏着这期杂志！二十年前的五月，人们翻开它，就如翻开了一片电场、一声惊雷、一阵震撼……

我敢断定，今天仍有上百万的人珍藏着这期杂志！因为珍藏它，是珍藏一页最激动自己的青春，是珍藏一份刻骨铭心的共鸣，是珍藏一段惊涛拍岸的心旅。

这期杂志就是《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

我久久地凝视着这期杂志的封面：纯洁的蓝天下一枝白玉兰春意盎然地盛开，一只蜜蜂在花瓣上飞舞，除了刊名和刊期，并没有现今惯于罗列的“要目”和“导读”，看上去特别地干净和素雅……

我翻开了这蓝天下盛开着白玉兰的干净素雅的封面，我知道这封面下是我将要追溯的一部历史的源头。而二十年前的那个五月，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在不经意中翻开这个封面的！翻开这个封面，他们就猝不及防地发现，他们翻开了一片电场、一声惊雷、一阵震撼……

那片电场、那声惊雷、那阵震撼就是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这是一封饱含着人生经历的痛苦和创伤的信，那交织其中的沉重、幽怨、郁闷、诚挚和激愤即使在二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也仍然令人动容——

编辑同志：

我今年二十三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还曾把保尔关于人生意义那段著名的话：“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记本上的第一页。日记本记完了，我又把它抄在第二个本上。这段话曾给我多少鼓励呀。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后来我偶然看到了一本过去出的小册子《为谁活着，怎样做人》。我看了又看，完全被迷住了。我开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对人生的看法：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崇高的信念，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我陶醉在一种献身的激情之中，在日记里大段大段地写着光芒四射的语言，甚至一言一行都模仿着英雄的样子。

可是，我也常隐隐感到一种痛苦，这就是，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尔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

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时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捶胸顿足……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呢？我很矛盾。但当时我还小，我还不能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况且过去的教育赋予了我一种奇怪的能力，这就是学会把眼睛闭上，学会说服自己，学会牢记语录，躲进自己高尚的心灵世界里。可是，后来就不行了，生活的打击向我扑来。那年我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抚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我真是当头挨了一棒，天呵，亲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那么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将会怎样呢？我得了一场重病。病好后，借助几个好同学的力量，给街道办事处写信，得到了同情，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那时候，我仍然存着对真善美的向往，也许家庭的不幸只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我现在已经踏上了生活，生活还是充满诱惑力的，她在向我招手。

但是，我又一次地失望了。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有人

说，女性是把全部的追求都投入爱情，只有在爱情里才能获得生命的支持力。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尽管我在外面受到打击，但我有爱情，爱情给了我安慰和幸福。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我躺倒了，两天两夜不吃不睡。我愤怒，我烦躁，我心里堵塞得像要爆炸一样。人生呵，你真正露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你向我所展示的奥秘难道就是这样？！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摸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流芳百世”“遗臭万年”者并不多；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为了几个工分打破了头，为了一点小事骂碎了街，何能奢谈为人类？如说为吃喝玩乐，可生出来光着身子，死去带着一副皮囊，不过到世上来走一遭，也没什么意思。有许多人劝我何必苦思冥想，说，活着就是为了活着，许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样活得挺好吗？可我不行，人生、意义，这些字眼，不时在我脑海翻腾，仿佛脖子上套着绞索，逼我立刻选择。

我求助于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希望从那里得到安慰和解答。我读了黑格尔、达尔文、欧文的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读了巴尔扎克、雨果、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鲁迅、曹禺、巴金等人的作品。可是，看书并没有使我从苦恼中得到解脱。大师们像刀子一样犀利的笔把人的本性一层层地揭开，让我更深刻地洞见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我惊叹现实中的人与事竟和大师们所写的如此相像，不管我沉陷在书本里还是回到现实中来，看到的都是一个个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想呀，使劲

地想，苦苦地想。慢慢地，我平静了，冷漠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人毕竟都是人哪！谁也逃不脱它本身的规律。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过去那些宣传，要么就是虚伪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实本身。如若不然，请问所有堂皇的圣人、博识的学者、尊贵的教师、可敬的宣传家们，要是他们敢于正视自己，我敢说又有几个能逃脱为私欲而斗争这个规律呢？！过去，我曾那么狂热地相信过“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想起来又是多么可笑！

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现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几乎成了我安慰自己、平复创伤的名言。我也是人。我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我是一个合理的人，就像所有的人都是合理的一样。我也争工资，我也计较奖金，我也学会了奉承，学会了说假话……做着这些时，我内心很痛苦，但一想起黑格尔的话，内心又平静了。

当然，我不甘心浑浑噩噩、吃喝玩乐了此一生。我有我的事业。我从小喜欢文学，尤其在历尽人生艰辛之后，我更想用文学的笔把一切都写出来。可以说，我活着，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它——文学。

然而，似乎没有人能理解我。我在的那个厂的工人大部分是家庭妇女，年轻姑娘除了谈论烫发就是穿戴。我和她们很难有共同语言。她们说我清高，怪癖，问我是不是想独身。我不睬，我嫌她们俗气。与周围人的格格不入，常使我有一种悲凉、孤独的感觉。当我感到孤独得可怕时，我就想马上

加入到人们的谈笑中去；可一接近那些粗俗的谈笑，又觉得还不如躲进自己的孤独中。

我自己知道，我想写东西不是为了什么给人民做贡献，什么为了四化。我是为了自我，为了自我个性的需要。我不甘心社会把我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来表明我的存在。我拼命地抓住这唯一的精神支柱，就像在要把我吞没的大海里死死抓住一叶小舟。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按说，一个人有了事业，就会感到充实、快乐、有力量。可我却不是这样，好象我在受苦，在挣扎，在自己折磨自己。我处处想表现出自己是强者，可自知内里是脆弱的；我工资很低，还要买大量的书和稿纸，这使我不得不几角钱几分钱地去算计……我有时会突然想到，我干嘛非要搞什么事业，苦熬自己呢？我也是一个人，我也应该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小家庭，去做一个贤惠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再说，我真能写出什么来吗？就算是写出来了，几张纸片就能搅动生活，影响社会？我根本不相信。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去死……心里真是乱极了，

矛盾极了。

编辑同志，我在非常苦恼的情况下给你们写了这封信。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也许我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

潘 晓

1980年4月

今天的人们在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或许已不以为奇。毕竟二十年了，人已经是全新的一代人，时代已经是经过改革开放大大前进的时代。信中讲述的经历和创痛已经属于“昨天的故事”，信中关于人生的种种困惑和想法相对于价值多元的现在也已不再振聋发聩，而舆论环境的大为宽松也已使得这封信大胆直言毫无隐讳的表达方式不再显得离经叛道。

但是，时光倒回二十年，在那个炎热的五月里，毫无任何心理准备的人们在不经意地读到这封信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不能不令今天的人们不可思议。“触电”、“感觉有一颗炸弹在心里爆炸”、“浑身颤栗”、“激动得流泪”、“恐惧”……在已经泛黄的杂志和内部材料刊登的一封封来信中，我读到了大量的类似的字眼。当年的读者们就是用这些词汇来描述他们最初读到这封信时的直接感受。

他们不可能不感到触电，不可能不感到有炸弹在心里爆炸，不可能不流泪，甚至不可能不感到恐惧。因为这封信太真实了。在此之前的报刊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真实的东西。它的痛苦、它的对此前说教式的教育的控诉、它的对那些被奉为金科玉律的人生观念的胆大妄为的挑战和颠覆、它的对一直被压抑的自我价值的呼唤和呐喊……都让人们震撼，同时也使人们感到了一

种宣泄的快感。而且，因为这封信，他们心底里的某些东西正轰然崩塌，以前一直蛰伏着的某些东西又被猛烈地震醒……

“这是一颗真实的、不加任何粉饰的信号弹，赤裸裸地打入生活，引起反响。”在所有对这封信的比喻里，太原读者贺海毅的这句话最为独特而贴切。

信号弹既已升空，一场席卷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随之爆发。

潘晓的信真是编辑部“编”的吗？黄晓菊和潘祎两个本来毫不相干的人怎么变成的“潘晓”？《中国青年》为什么要发表这样一封石破天惊的来信？

二十年来，对于“潘晓”这封信的“出世”，一直可谓云遮雾绕。它是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发表的，但它真是一封偶然的读者来信吗？后来又有一种颇为流行的官方说法，说它是《中国青年》编辑部“编”的，它真是编辑部凭空“编”的吗？黄晓菊和潘祎两个本来毫不相干的人怎么变成的“潘晓”？《中国青年》为什么要发表这样一封石破天惊的来信？

二十年后的三月里，我走进了一个个已多年没人打开过的档案袋，走进一个个直接当事人想说不想说的记忆……

还是回到二十年前吧。那年年初，女编辑马丽珍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她刚从群工部调到思想教育部一年，编委会就安排她准备主持一个题为“怎样看待讲实惠？”的讨论。组织讨论是《中国青年》抓重大思潮、让青年自己教育自己的一种有效的传统方式。头一年，《中国青年》刚开展过一场“可不可以在青年中提倡学习陈景润？”的讨论，社会反响不错。所以，讨论一结束，编辑部就立即部署开展下一场讨论。当时，青年中流行着一句很有名的口号“一切向钱看”，“讲实惠”成为一种时尚。有一封读者来信对此问题所阐述的观点有相当深度，而且具有一定代表性，正好可

以作为开展讨论的基础。于是,讨论“讲实惠”被作为一个选题定了下来。但是,在真正着手做准备的过程中,马丽珍越来越感到难度很大,不好引导。那时领导干部的特殊化正是群众议论的一个热点,而讨论“讲实惠”问题很容易就会牵扯到领导干部的特殊化,一旦和领导干部特殊化沾上,就不好收场了。经过一番考虑,她想推翻这个选题。但要推翻这个选题,就必须提出新的选题。一天,她突然想到自己的抽屉里有一摞信,共35封。那是她在一个下午到群工部看信的两小时中挑出来的,说的都是关于人生苦恼、看透了社会、找不到出路等,其中一封讲述自己不断追求并引用了屈原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信尤其给她留下了印象。当时她觉得或许可以提炼出一个选题,就专门收起来放在了抽屉里。这一下,这些信果然派上了用场。

现在中国妇女报社任副社长的马丽珍对她正式向总编辑关志豪提议开展人生观讨论的细节记忆犹新。她告诉我:“那时候我们在三里屯南三十楼一单元办公,老关和我都住三单元。那天下午下班后,我和老关一道回家。就在从一单元到三单元的路上,我向他讲了开展人生观讨论的想法。他让我把那35封信给他看看。我把信给了他。第二天,他就同意了。”

定下了人生观讨论的选题,但怎样破题、如何着手还是未知数。思想教育部主任郭楠柠让马丽珍和另一个编辑马笑冬作进一步的调研。接下来的二三个月时间,“二马”每天都早出晚归,奔走于北京的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召开各种层次的座谈会。通过调研,她们更深地感到,十年动乱给青年造成了深重的心灵创伤,青年旧有的真诚和信仰被雪崩样冲毁了,而新的信仰还在社会生活中艰难孕育,这时候开展人生观讨论,正是青年重建信仰的时代呼唤。

在一次座谈会上,马笑冬认识了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

黄晓菊。通过几次交谈，她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就问她愿不愿意毫无隐瞒地写出来供青年讨论。黄表示同意，马笑冬便向她约稿。

也是在这前后，“二马”到北京经济学院去开一次座谈会。经济学院的团委书记李庆堃向她俩推荐了二年级学生潘祎。李书记说，这个学生很灰，不久前刚自杀过，你们可以和他单独谈谈。“二马”于是分开行动：马笑冬去参加座谈会，马丽珍去和潘祎单独交谈。

或许是因为这次谈话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吧，潘祎对这一天的准确日期记得特别清楚。现已年过不惑、应邀在“中华英才网”上主持“老潘信箱”栏目的他一开口就告诉我：“那天是1980年4月7日！”那天，他和马丽珍从下午两点多谈到六点多。开始的时候，他的情绪很激动，说的话也很极端，把社会说得很阴暗，而且还有一大套自己的“理论”，说话时手都在颤抖。他告诉马丽珍，他的父母在青海支边，他五六岁时就被留在了北京的姨妈家，从小就遭白眼，长大点后他跟姨妈闹翻了，自从考上大学，就再也不回家，过年时也一个人留在学校。在1979年春节，整个学生宿舍只有他的窗口亮着灯光，像是一只鬼眼，而校园外却是爆竹连连，他觉得活着没有意思……马丽珍问他愿不愿意把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写出来供青年讨论，他表示愿意，马丽珍就向他约了稿。由于同情他缺乏家庭温暖，马丽珍邀请他星期天去她家做客。后来他真的去了马丽珍家，受到了热情接待。

不久，黄晓菊、潘祎的稿子分别交到了编辑部。两相比较，潘祎的不能用，但其中一些语言和观点可供参考，而黄晓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分为“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四部分，基本可用。编辑部将这两篇稿子交给了马笑冬，由她执笔作最后的修改。

经过很多周折，我终于和现在复旦大学人口所任教的马笑

冬取得了联系。马笑冬 1988 年出国,1998 年在美国波士顿的东北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1999 年刚回到国内。在电话里,她告诉我,她看了黄晓菊的稿子,就在心里说:“我的天哪,我们怎么讨论呀?”她尤其被“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那一段惊得目瞪口呆。她说她真没想到,黄晓菊能有这样好的感悟力。所以,在编辑这篇稿子的时候,她想的时间要比黄晓菊想的多得多。最后见刊的那封信,从人生经历和主要观点基本都取自于黄晓菊的稿子,很多话甚至是原文,潘祎的一些话也揉了进去,还吸收了一些在座谈会上听来的语言。最后,她从黄晓菊和潘祎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合成了“潘晓”这个笔名。因为觉得念起来挺顺,就这样定了。至于这个名字正好是“盼晓”的谐音,纯粹是一种巧合,当时并没有从这方面想。

对于这封信,马丽珍这样评价:“它实际上是一份思想典型材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青年思潮,而且基本是取材于黄晓菊的来稿,吸收了潘祎的一些语言,还吸收了座谈会听来的东西,说它是‘编’出来的不符合事实。但也不能因此说黄晓菊、潘祎就是‘潘晓’。‘潘晓’是个思想典型人物,不是一个真人,不能个性化。所以我当时就跟潘祎说过,在外面谁也不要说自己是‘潘晓’。”

谁是“潘晓”? 这封信算是读者来信还是算“编”的? 这些问题在当时对于编辑部来说或许压根儿就没被当成问题。然而,正是这两个不被当成问题的问题在后来给讨论带来了厄运。编辑部当时考虑的只是,这封信反映的是不是青年典型的思潮,有没有思想典型的意义,能不能引发读者的参与和思考,能在多大程度上引起社会的反响,等等。

很显然地,以编辑部要引发一场讨论的标准来看,经过马笑冬编辑的这封信是超标准地“合格”。它既体现了一代青年经过

“文革”后痛苦的精神历程和反思的成果，而且其《忏悔录》式的坦诚和直言不讳的表达方式又正好与当时青年的基本情绪和思想合拍。面对这样一封信，编辑部肯定已预料到它的发表将引起不小的轰动。在由马笑冬起草、郭楠柠作了很大修改的《编者的话》里，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了将由此引发一场大讨论的预示。“像以往多次发生过的情形一样，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进步的前夕，差不多都发生过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讨论，俄国革命前夕关于人本主义和新人生活的讨论，我国五四时期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等等，都曾经对社会的前进作出过贡献。”这段话固然可以理解为对80年代初是“一次社会较大进步的前夕”的敏锐感觉，同时更传达出编辑部对将要发起的这场人生观讨论的自信和乐观！

然而，历史总是常常超乎于人们的想像，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潘晓讨论”也是……

潘晓几张纸片猛烈地搅动了生活。胡乔木亲临编辑部帮助出谋划策。“潘晓讨论”正好“热”了一个夏天。

夏天总是很热。和季节的特点出奇地吻合，“潘晓讨论”也是“热”了一个夏天。

刊有“潘晓”的信那期杂志是5月11日发行，14日编辑部就开始收到读者参与讨论的来信，17日上升到100件，27日突破了1000件，之后一直保持在每天1000件左右。据6月9日的统计，不足一个月就收到了两万多件。对于读者来信的涨势，马笑冬在电话里向我介绍得很形象：“开始几天，邮局的人是用背的那种小邮包送信，不久后就改为大邮袋了，再到后来每天都用‘蹦蹦车’。”

“潘晓”的几张纸片就这样似乎是很轻易地却又是猛烈地搅

动了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最初的大量来信在就人生的意义发言的同时，几乎都对这场讨论本身表示了强烈的感激和敬佩——

“全国多少青年和潘晓一样，在希冀着心灵的甘露，在渴望着点燃青春的炬火。”

“真实，有时虽然是丑恶的，但它要比那些粉饰和虚伪的东西有力一百倍！”

“一个诚实人的心声，能唤起一大群诚实人的共鸣！”

“谢谢敢写的人和允许发表的人！”

……

和这些感佩的话语一起从全国四面八方寄来的还有许多钱和包裹，热心的读者们在感动和敬佩之余，没有忘记向“潘晓”这个“弱女子”献上同情和爱心。

除了感佩，许多读者还怀有种种疑惧。他们有的怀疑发表这封信是为了引诱青年谈出真实思想，是个“圈套”，是“引子”；有的替“潘晓”表示担忧；甚至还有为《中国青年》担心的，他们说《中国青年》弄不好要挨批判，这场讨论说不定会被“围剿”……

其实，不能说这些担心只是读者的杞人忧天。社会上对这封信也并非是一片叫好，基层的许多领导对开展这场讨论横加压制，把这一期《中国青年》当成了禁书，有的人甚至写信谩骂编辑部是“纵火犯”，将发表这封信上纲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把社会搅起了这么大的波澜，编辑部也未必没有一些忐忑——6月11日出版的第6期就明显“保守”，所发表的几篇讨论文章四平八稳地照顾各方面的观点，特别是侯爵良的《“为自我”又岂能“为别人”》一文简直是说教。与此同时，编辑部通过政治理论部主任李禹兴将6月15日编印的《〈中国青年〉读者来信摘编》直接送交中宣部长王任重，此举可以理解为寻求中宣部对“潘晓讨论”的关注和支持。李禹兴与王任重有着几十年的编者作者之

谊，他送交的这期《读者来信摘编》题为《〈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在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不到一个月收到来信来稿两万余件》。

不过，就当时的情势而言，所有的担心和忐忑确实显得有些多余，因为在进入6月中旬后，“潘晓讨论”可谓是吉星高照。《人民日报》首先报道了《中国青年》开展人生意义讨论的消息，并在尔后的评论员文章中称赞这一场讨论“把青年思想深处的东西端了出来，进行真正同志式的讨论，是感人至深的”，“为活跃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很可贵的新鲜经验”。新华社在报道这场讨论的盛况时也肯定“只有了解青年，才能帮助青年；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解决问题。”《中国青年报》甚至将“潘晓”的信摘要发表，之后也开展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专栏。6月20日，王任重任在李禹兴上送的《读者来信摘编》上批示，让编辑部“向书记处写一个情况反映”，并表态说“对潘晓的同情、支援表现了我们有许多‘助人为乐’的好青年！可以报道！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好风尚的表现！”

令编辑部感到最鼓舞的是6月18日下午，负责意识形态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在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胡启立的陪同下来到了编辑部。这一天天气很好，胡乔木的情绪也很好。在与编辑部负责人关志豪、郭楠柠等将近3小时的谈话中，他的脸上一直挂着笑。谈话结束后，他还兴致很高地和编辑部全体人员合了影，并对大家说：“同志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

对于这次接见，第8期《中国青年》以《胡乔木同志关心人生意义的讨论》为题作了篇幅为一页的披露，发表了他的几段讲话——

这个讨论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关心和兴趣，我也是这千百万人中的一个。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凡是关心青年

一代的成长的人都应该有兴趣。

青年们都想在一个适当的气氛中把自己的心掏出来，讲讲自己的经历、苦闷、失望和希望，寻求问题的答案。青年们讲讲自己的苦闷和失望没有什么不好，谁没有过苦闷和失望呢？感到苦闷和失望的青年把自己的心情讲出来，这表示他们对社会究竟还是抱着希望和信任，他们究竟还是在寻求答案，尽管许多现有的答案不能使他们满足。青年们伸出了手，难道能够把这伸出的手打回去吗？难道不应该把他们伸出的手紧紧地握住，然后再鼓励他们拿出勇气和信心继续前进吗？

潘晓提出的问题是当前很多青年的共同问题，所以会引起这样广泛这样热烈的讨论。潘晓的问题当然要答复，但是讲干巴巴的道理不行。你要答复她和其他许多青年的问题，首先得要同他们一道思想、感受，理解和同情他们所遭遇的一切，然后再学会说怎样的话才能让他们愿意听和听得进。

我们的社会有弊病，同时存在着同弊病作斗争的力量，而且这个力量已经走向上风……如果人们的处境比较暗淡，我们通常就没有权利叫他们非按照快乐的调子唱歌不可。他们叹息了，或者发些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的所在。这里最需要的是年长一代人的耐心和热情。

这几段话说得真好，入理而且动情，充满着一个革命长者的理解和慈爱！

实际上，那个下午，胡乔木的讲话远不只这些，而且还有许多更精彩的内容。在长长的记录稿中，有许多段落令我在翻阅时

强烈地感到此前没有披露出来真是遗憾。比如，他这样不厌其烦地为编辑部出谋划策——

你们的讨论要搞到年底，但按你们第6期的办法，恐怕不太容易维持。你们的第四篇文章（指《“为自我”岂能“为别人”？》），青年一看要生气的，其他几篇也比较抽象。最后一篇讲的是外国的。写文章的人都没有讲到自己的经历，没有讲到自己的事情。老发表这样的文章就不会引起兴趣，这样下去就等于把火浇灭了。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现在的表现。比如，说现在的人生态度是积极的，可以讲。用自己的经历证明潘晓的观点，现在的人生态度是消极的，也可以发一些。有的遭遇比潘晓还悲惨，有的现状比潘晓还困难得多，有的讲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有的说在现实面前绝不投降。这样错综复杂，讨论才会丰富，这样就搞活了。观点不能搞得太多，现在青年还不是要你说那么多观点，青年都想把自己的心掏出来，讲自己的经历，包括自己的牢骚，他要求讲出来。讲干巴巴的道理不行……潘晓还要让她出场，还要写信，不能一声不响，沉默到年底怎么行呢？人们就会感到怪了，有人就要写侦探小说了。这个人到哪儿去了？不出场，这个戏就演不下去了……讨论要有点波澜，中间要奇峰突起，当然不要脱离总的题目……

又比如，他对潘晓的著名观点“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作了这样的评价——

一个人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在法律上、经济上是允许的。在工厂劳动，劳动得好，得了奖励，受了表扬，他也为社会增加了利益。他可以是一个善良的公民，他客观

上是为了别人的，因为他做的不是坏事，不是损人的……对上述这种人不能耻笑，不能否定。但是，它还没有提到一定的道德水平上。它要主动地为一种好的目标奋斗，就不可能仅仅为自己，它必须自觉地和社会利益协调起来。为多数人还未看到的一种理想去奋斗，去发明，去创造，要求付出一般人不容易付出的努力，这是对共产党员的要求，不能拿来作为所有的人的要求。不能拿对共产党员的要求作为对一般人的道德标准……为个人与为别人的答案允许不同，这样才能让他觉得有希望。都提到一样的水平也是不可能的。通过讨论要使多数人弄懂一个道理，我不去侵犯别人是道德的起码要求。为自己和为别人是可以统一的……为人民的利益也有为自己的一份在内……要使多数人相信我们这个社会是为了各个人的利益的，不然共产党干革命、搞四化为什么？还不是为了各个人的利益？如果成天是为了牺牲个人利益，那最终又是为了什么？共产主义就是要为了所有各个人的利益。“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不违反我们的规范。当然也要提倡遇到别人有困难要去帮助。

在这里，他不仅肯定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个口号具有的合理性，而且还提出了道德是分层次的观点。这在当时说来应该算是很超前的。

出于尊重胡乔木不要急于下结论的意见，《中国青年》没有全文刊登他的这次讲话，但从这一天以后，编辑部可以说是完全按照这个讲话的精神来推动讨论的开展：从第7期开始，将原来每期八页的版面扩大到二十页，而且发了许多讲述自己和潘晓类似或者更悲惨经历的来稿；第8期让潘晓在杂志上出了场，刊登了一封对讨论表示感动和感谢的《潘晓同志的来信》；为了使讨论“有点波澜”，第8期还发表了武汉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

生赵林写的《只有自我是绝对的》一文。这篇文章编辑部本来已收到了一段时间,此前一直压着不敢发。结果发出来后果然起到了“奇峰突起”的效果,赵林也因此几乎取代潘晓成了后期讨论的主角。

一天比一天热地,时间就进入了最热的7、8月份,“潘晓讨论”也在这两个月里“热”到了顶点: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转发了王任重让编辑部写的给中央书记处的情况反映,并印发给了出席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的代表;编辑部的领导被邀请到各种场合去作关于讨论的报告;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国际大通讯社也作了报道;国内的报刊更是报道不断;邮局的“蹦蹦车”每天仍源源不断地运来读者的来信;越来越多的读者或打电话或直接找到编辑部要见潘晓;社会上甚至出现了一些被别人指认为潘晓和自己冒充潘晓的人;许多新闻单位的记者成天堵在编辑部提出直接采访潘晓的要求……

热!太热了!尽管编辑部从一开始就对各新闻单位没有隐瞒过那封信的任何事实,并一直坚持认为潘晓只是个思想典型人物,黄晓菊并不完全就是潘晓,但挡不住那么多人想见潘晓的愿望,或许也想到了胡乔木说过的要让潘晓“出场”的话,编辑部在征得潘祎本人和黄晓菊单位领导的同意后,安排黄晓菊作为潘晓的代表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

8月20日,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播发了采访黄晓菊的专题报道。本来是作为一个思想典型人物的潘晓这一下被具体化了,被具体化为实实在在的黄晓菊了。虽然黄晓菊在亿万观众面前对那封信作了说明,最后的表态很“正面”也很富于哲理,甚至也成为名言被许多人传诵:“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但是,黄小菊的这一次“出场”还是无可挽回地使“潘晓讨论”的命运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潘晓讨论”的夏天结束了……

工人日报的内刊登了两封群众来信。《中国青年》向胡耀邦“提一点意见”。胡乔木“很不愉快”。中宣部组织专家帮助“看”总结

进入秋天的时候，“潘晓讨论”成了一棵风中的树。

9月23日，工人日报社的内刊《情况参考》第212期刊登了两封关于潘晓的群众来信。

第一封信题为《此种做法弊多利少——有感于潘晓上电视》，写信人署名为“山西娘子关电厂宁翠荣”。这封信写道：“各类刊物以大幅大幅的版面对她的这篇‘天才成名之作’大加评论、吹捧，使她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其实，剖析开来，她的这篇文章的价值并无此等昂贵，其实用价值也不过如此而已。因为她所发表的那席‘价值连城’的‘高论’，只不过是绝大多数青少年心目中也同时存在着的想法，她不过是在一个极好的时机用极好的方式表达出来罢了……像目前这样调动所有的舆论工具，报纸、刊物、电视等等将它夸了又夸，吹了又吹，捧了又捧，抬了又抬，是否有些过激了呢？……恳切希望快快刹住这股风，这种做法只不过是弊多利少，得不偿失！”

第二封信题为《邻居眼里的潘晓》，署名为“北京石月”。这封信先说“街坊四邻原来不知潘晓是谁，一看电视才知道潘晓就在自己身边，先知其人，后闻其名，有反胃似的不舒服。”然后列举了黄晓菊的种种缺点，说她“打姥姥”、“不给姥姥饭吃”、“每月只交5元钱的生活费，横吃横喝”、“与三家街坊吵过架”、“‘主观为已’是做到了，‘客观为人’则还差得远”……

刊登这两封信的第212期《情况参考》不过只有薄薄的四页纸，其份量却一点不轻。几天后，中宣部《宣传要闻》第74期转发了这两封信。9月30日，胡耀邦在这一期《宣传要闻》上作了批

示：“请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10月7日，中宣部在有各主要新闻单位参加的例会上传达了胡耀邦的这个批示。于是，“‘潘晓讨论’出事了！”的消息在北京许多单位传开。不几天后，新华社编印的《国内动态清样》第3028期刊登了记者徐光耀写的《北京羊毛衫五厂负责人谈‘潘晓’和她的信的问世的情况》，实际上把潘晓的信说成了“完全出于《中国青年》杂志编辑之手”。

为了对这两封信和徐光耀的文章作一个回答，《中国青年》杂志编委会于10月30日向胡耀邦、王任重、朱穆之及中宣部送交了一份长达六千余字的《关于工人日报等单位反映“潘晓问题”的调查报告》，同时也送给了各家新闻单位。这份《调查报告》主要就“关于潘晓的信问世的情况”、“关于舆论界是不是‘大肆吹捧’潘晓的问题”、“关于潘晓上电视的问题”、“关于‘邻居眼里的潘晓’问题”进行答辩。编辑部在摆事实的基础上坚持认为：（1）刊物上以潘晓名义发表的那封信，主要经历和观点都是黄晓菊的原稿和谈话中有的，编辑部只是作了必要的整理和删节，这是属于编辑的正常工作范围，说这封信是编辑部“编”出来的不符合事实；作为开展问题讨论的要求，应该是思想的典型和真实，而不必要求每一个细节都与黄晓菊的个人经历完全吻合。（2）各新闻单位对人生观讨论的报道都是从肯定鼓励青年人严肃探讨人生、支持宣传工作青年工作进行改革的角度来谈的，没有一篇宣传过潘晓本人，也没有对潘晓的信作过不恰当的评价，舆论界并没有对潘晓“大肆吹捧”。（3）黄晓菊是以一个有苦闷、有弱点而敢于说心里话的问题提出者的身份上电视的，那种认为一上电视就是“树”、就得是先进青年的看法是一种误解。不过，编辑部对让黄晓菊代表潘晓上电视后可能产生的一些问题确实考虑欠周。（4）经过编辑部再次调查，黄晓菊的具体情况与邻居讲的有较大出入。

需要特别提出来一说的是，这个《调查报告》有两个细节在后来对这场讨论起到了颇值得玩味的影晌。第一个细节是，为了着重说明不能挫伤青年向党讲心里话的热情的重耍性，《调查报告》写了这样一段话：“胡乔木同志说：‘青年们伸出了手，难道能够把这伸出的手打回去吗？难道不应该把他们伸出的手紧紧握住，然后再鼓励他们拿出勇气和信心继续前进吗？’我们是这样来做的。”第二个细节是在《调查报告》的最后，总编辑关志豪加了这样几句：“我们对胡耀邦同志提一点意见，希望今后耀邦同志不要轻易地就一些未经核实的材料作带有实质性的批示，以免和实际情况脱节。”

关志豪现已年届七旬，在二十年后我采访他时，他仍然脱口向我背出了这几句话。他说：“后来有人说我不该写这段话，但我无怨无悔。我写的没错，工人日报的《情况参考》封面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是‘内部材料，未经核实’嘛，对未经核实的东西当然不该轻易下结论。”这份《调查报告》送上去的第二天，关志豪打电话给胡耀邦的秘书梁金泉，问耀邦看了没有，什么态度。梁秘书回答：耀邦看了，没说什么，用红铅笔在那段话下面画了曲线。最后，关志豪一再对我说：耀邦是个好人，关键时候他保护了我们！

在我找到的所有资料里，有一份1980年12月21日中国青年杂志编委会写给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高占祥的《关于讨论胡乔木同志讲话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提到，编辑部听了传达胡乔木同志12月13日的讲话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胡乔木的这个讲话我没有找到。但从这份报告看出，胡乔木的讲话有这样一些内容：一是对《中国青年》开展人生意义讨论的过程提出了一些严厉的批评；二是对编辑部在《调查报告》中引用了他有关潘晓的那段话表示不满。他这样批评编辑部：“为了批评耀邦同志，当然不是说总书记不能批评，用了我的话，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我讲的话是对的，他讲的话是不对的，使我很不愉快。”三是批评编

编辑部“对耀邦同志的批评做得过分了”。

在这份报告的最后还透露了这样几条信息：总政治部把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第3028期作为《政治工作参阅件》转发了全军；在11月26日召开的全国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胡耀邦对潘晓问题有此一说——“潘晓不是真潘晓，是塑造的潘晓，是两个人的信合起来的。”一些地方便据此将“潘晓讨论”简单地理解为“《中国青年》制造的一场大骗局”，从而已滋长出全盘否定这场讨论的趋向。《中国青年》杂志编委会提请团中央书记处“能通过适当形式对这场讨论作出全面的估价”，以免“这样下去会将已经取得的好成果也否定掉”。

事实上，在讨论如此被批评的情势下，团中央书记处根本不可能通过什么形式来作全面的估价了，唯一能做的只可能是让编辑部尽快收场，以免遭致更多更严重的批评。12月11日，第12期《中国青年》出版。关于人生观讨论的版面缩减到八页，并且宣布发完本期后，群众性的笔谈讨论结束。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第12期所发的文章再没有一篇是青年的讨论稿，群众性的笔谈实际上在第11期就结束了，或者说戛然而止了。

从第5期到第12期，《中国青年》关于潘晓讨论一共编发了110多位读者的110多篇稿件，约十七八万字；在讨论开展的7个月时间里，编辑部共收到来信来稿六万多件，其中不少信稿是几十、上百青年联名写的；讨论期间，《中国青年》的发行量由325万急剧上涨到397万；关注和受这场讨论思想影响的青年以千百万计……

宣布群众的笔谈讨论结束容易，但要宣布整个讨论结束却很难。这个难就是编辑部如何作总结。对于讨论中提出的诸多问题，无论是回答青年，回答社会，回答生活本身，还是回答种种非议，编辑部不能没有一个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在距宣布群众笔谈讨论结束三个月之后，1981年第6期

《中国青年》才姗姗来迟地发表了编辑部的总结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这篇文章为什么会整整拖了3个月？人们传说它是经过高层把关通过的，具体经过是怎么回事？

已经从《中国妇女》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职位上退休的郭楠柠和她的老伴陈汉涛在家里解答了我的疑问。按照以往开展讨论的做法，编辑部最后总是约请理论界的著名专家来写总结文章，这一次原也这样打算。但是，找去找来，这次没有哪个专家愿意写，都说这场讨论涉及的问题太广泛了，各种思想观点太丰富复杂，没有亲身参加过讨论的全过程，很难写这个总结。找不到专家，编辑部先决定由参与主持潘晓讨论工作的六七个人共同研究，结果人太多，想法差异太大，根本没法统一思路。又指定由几个人分头写，写出来的稿子还是不行。最后社领导决定，给一个月时间，由郭楠柠和当时任文艺部副主任的陈汉涛夫妇俩开一回“夫妻店”。

领受了重任，郭楠柠和陈汉涛重新看了一遍讨论中发表的所有文章和内部资料，又花了很大功夫去读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然后梳理材料，提炼问题，明确观点，真正是废寝忘食地苦干了一个月，终于完成了18000字的初稿。这篇文章分“重新探索人生意义是历史的需要”、“正确认识‘人的价值’”、“科学地看待‘公’与‘私’”、“在振兴祖国的奋斗中开拓人生之路”四部分，其中的第二、三部分是文章的重点，着重回答了讨论中集中争论的两个问题。

关于如何看待“人的价值”。文章充分肯定了青年们在讨论中提出的“社会应重视‘人的价值’，集体应重视‘个人价值’，个人应自觉地按照社会需要提高‘自我价值’”的观点，指出：长期以来惯于把“人道主义”、“人性”、“人的价值”等与“人”沾边的东西都当成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重视“人”和“人的价值”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从根本上说，人

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在客观许可的范围内,努力满足每个人正当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逐步创造使每个人全面发展其品格、才能、体力和多样化个性的条件;而个人实现和提高“自我价值”的关键是要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努力使“自我”与社会达到和谐统一。

关于如何对待“公”与“私”的问题。文章认为,“公”与“私”的基本关系是既统一又对立,首先是统一的,其次才是在一定条件下是分裂的甚至是对立的。因而,在通常情况下,“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是可能的,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只有在“公”与“私”出现分裂、对立时,“主观为自我”才难以同时实现“客观为别人”。“公”与“私”的问题反映在人生观上,大致可分为高、中、低三种层次:第一种是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第二种是奉公守法,勤恳劳动,养家糊口;第三种是目中无公,唯私是图。对这三种人生观的态度是,第一种信奉推广,第二种承认和超越,第三种反对。文章特别指出了要正确对待多数人容易接受的中层次人生观问题,强调不能把“提倡的”当作“必须遵循的”去要求所有的人,当然也不能因为“允许存在”就反对需要“提倡”,从而不努力去“超越”。

总结文章写好后,编辑部考虑到潘晓讨论在社会上的巨大影响,决定送请中宣部长王任重审阅。王任重很快批复说,稿件阅过,基本可以,请中宣部理论局再组织几位专家帮助看看。于是,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理论局局长洪禹邀请了邢贲思、汝信等五位专家与郭楠柠、陈汉涛夫妇一起座谈讨论了三天。几位专家对文稿的基本观点和论述方式没有提出实质性修改意见,只是部分专家提了一些具体表述问题。郭楠柠、陈汉涛又认真修改了一天,删去了一些有争议的语句,然后再次送给王惠德副部长审阅。

应该说,这篇总结文章是得到中宣部首肯的,但其观点和态

度主要代表了编辑部的立场,在当时形势下已算一份难得的对潘晓讨论的公正答卷。这从文章发表后引起读者强烈反响就是证明。《中国青年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总结;《人民日报》也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摘要。至此,搅动了全国青年人心的“潘晓讨论”总算有了一个体面的对得起读者的正式结束。

华中工学院党委告状。胡耀邦批示“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中国青年》“编者按”公开认错。六万多封珍贵来信化为纸浆……

杂志上的“潘晓讨论”结束了,但人们对于“潘晓讨论”的讨论却余波翻腾——

1983年12月,在距“潘晓讨论”结束近三年以后,华中工学院党委分别向胡耀邦等领导人和有关部门送上一份题为《〈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意义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的材料,并在所附的信中称:“在这次清除精神污染中,我院党委宣传部和共青团委组织几个同志查阅了《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报》一九八〇年下半年开展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发表的所有两百多篇文章,发现这场讨论散布了大量的错误观点和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对青年是严重的精神污染。这一讨论在青年中造成的严重的思想混乱,至今未予澄清。因此,建议在这次清理精神污染中,必须对两青年报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这次在青年中影响很大的所谓‘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认真进行清理。”

《中国青年》幸甚!“潘晓讨论”幸甚!幸甚的是胡耀邦施以了援手。关志豪一再告诉我的“耀邦是个好人,关键时候保护了我们”的“关键时候”就是这一次。

胡耀邦于12月12日在华中工学院党委的来信上这样批示:“……青年报刊一些好心肠同志,为了教育青年,喜欢把一些

错误的思想行为汇集起来,并加以系统化,然后加以评论。这种作法,过去就有。结果,反而产生了副作用,欲益反损。但我们一些同志不注意接受历史教训。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批示,虽然也批评《中国青年》不接受教训,但肯定了是“好心肠”,是“欲益”,最重要的是一言九鼎地表示了态“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这就使那些想“大肆翻腾”的人没了脾气。

不过,逃过了被作为“精神污染”典型的“清理”,但在内部“提高认识”的检查却不得不做。此时,原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已调离,新的《中国青年》编委会承担了向团中央书记处写《关于“潘晓讨论”问题的检查报告》的任务。在这份《检查》里,编委会自己给这场讨论扣上了几条“罪状”:一、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化了、条理化了,特别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一提法变成了一部分人的口头禅,造成了极坏影响;二、为个人主义思潮泛滥开了绿灯,冲击了共产主义教育工作,给许多地方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其他实际工作带来了困难;三、使一些意志消沉的青年更加“看透了一切”,以至于失去生活信心,走向虚无主义道路。《检查》对这场讨论中的“平等讨论”、“不板着面孔训人”也作了否定,认为这导致了“从整个讨论看,是正不压邪,反面文章说得‘有理有据’,有文采,打动人心;相反,正面文章发得不够,并且显得干巴巴的,缺少感染力、说服力。”

这份《检查》自然是属于不得不自打耳光一类,而且是关起门来在“自家的大人”面前打,倒也不算太难堪。问题是这种关起门来自打耳光的检讨似乎并不能过关,为了消除“潘晓讨论”的影响,还须到大庭广众中去打给大家看看。1984年第1期《中国青年》发表了《“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的专文。这篇专文的四个小标题分别为:“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实质是个人主义;

划清个人主义与个人利益的界限；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最现实。从这四个小标题就不难看出，那篇经过中宣部把关的总结文章被推翻了。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在这篇专文前，编辑部加了一个“编者按”公开向社会作了检讨——

1980年《中国青年》第五期发表了一篇署名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并以此为发端，在刊物上组织读者开展《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讨论。编辑部开展这次讨论的出发点是好的，广大青年积极参与讨论的热情也应该肯定。但是，由于我们工作失误，这场讨论的社会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要认真吸取教训。现发表《“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这篇文章，作为我们对讨论引导不够的一个弥补。

“社会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个“编者按”就这样对“潘晓讨论”作了最后的类似于盖棺的定性。

和这个定性一样同为历史遗憾的还有，那代表了千百万社会各界人士的六万多封信，堪称为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思想宝库的六万多封信，没有经过任何社会学方法的处理，就被当成“废纸”让造纸厂的汽车拉去化为纸浆了。在中国思想史上，以前没有过、以后恐怕也不会有如此壮观的大规模的全国讨论了，尤其不会有如此丰富如此袒露的思想作为供人们研究的样本了……

六万颗心的回响

“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有多少人被卷入？难以估算。

在“讨论”展开的这七个月里，编辑部收到参加讨论的信稿就达六万件。其中，不少的信稿是几十、上百青年联名写的。从这六万多颗心的回声里，我们高兴地看到，他们用切身的经历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回答了潘晓提出的问题；他们在真诚坦率的思想交流中悟出了人生的真谛；他们在热烈地称颂党对青年一代的关怀。

“讨论”越出了青年的行列，长辈们也举笔畅谈这一代青年大有希望。

“讨论”向空间扩展，牵动了海外赤子之心，增添了他们对祖国的期望。

他们是这样回答潘晓的

“人都是自私的”吗？不少读者在刊物上发表文章，用所见所闻的客观事实和自身的经历有力地证明：“人不都是自私的”，“人，有自私的；人，也有高尚的。”有的情真意切地叙述自己来自生活的体会：

“在我 17 年的蒙冤和申诉的过程中，如果不是素不相识的

人的慷慨帮助，也许我早已饿死在上诉的途中了。我遇到不少官僚主义者和滥用职权的人，但也遇到过《神圣的使命》中王公伯式的干部。这许许多多的‘好人’和‘恩人’，在我心中逐渐凝聚成一个整体，这整体的名字就叫做：‘人民’！这个词，对我来说，是那么亲切，它带给我永恒的光明和温暖。哪怕是处在零下20度的严寒里，我的心也不会结冰。”

忘我高尚的人是客观存在的，很多信稿都谈到了这一点。

“想想我们敬爱的彭老总吧。如果说在战争年代他只是出于自身解放的‘本能’而战，那么革命成功之后，他该享福了吧？可是，他面对虚假，想的是‘我为人民鼓与呼’！在遭到无端的打击、罢官之后，他明知前途会有更大风险，却决不屈服，‘说我人民话，办我人民事’，宁为真理死，也要把真理说！想想吧，一个曾经出生入死的功勋卓著的大元帅，为了说真话而……他图的是什么？岂不是以‘为自我’的‘本能’可以解释得通的么？！”

对潘晓提出的“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人生态度，不少读者作了分析和帮助。

“在现实中，‘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并不是先进的人生态度。”“‘在利己中利他’的公式对于社会主义国度的公民来说，是一种较低的要求。”

“现代生产力正在创造这样一种社会：人不是在实现自己的个体时，客观上实现了整体，而是在实现整体中实现了自己的个体。完全的个人奋斗的时代终将过去，这就是现代价值观念和人本主义的区别。”

在我们的价值观念中，损人利己是卑鄙的，而“利他主义”是崇高的。

“我们还是应该提倡公而忘私，先公后私，助人为乐的优美、崇高的精神。”“不要一谈‘自我解放’，就要喊‘个人主义万岁！’人应该通过认识个人的价值去建立一种富有自我尊严的生活，

去培养一种严肃的独立的生活态度。爱人类，永远不忘记关心帮助别人和对社会正义、社会道德的责任感。”

人生的真谛在于创造

“生活是创造者的艺术”，“人生的真谛在创造者的双手中”，这是许多青年通过讨论悟出的真理。

“看了韩方同志那篇《从抗争到开拓》的文章，我激动了，坐不住，吃不下，睡不着。编辑同志，请你们转告韩方，是他的信又重新点燃起我心中的火。他说得真好：‘人生的真谛：它不是在分享者的私囊里，而是在创造者的双手中。’”

“讨论”象滚雪球似地激励青年们奋起。潘晓的信促使浙江的周晓东给党中央写“自荐信”，周晓东的自荐信又引来了成百青年的呼应。

周晓东在《让我们用血肉来拥抱世界》一文中说：

“潘晓同志的信，促使我下决心给党中央负责同志写了一封‘自荐信’：请求党和人民交给我一个最穷的公社或某个局部地区，我有信心叫它五年改观。我知道，困难重重，风险不小，我也自知没有特殊的本领。可是，我有一颗赤子之心，有十多年深入社会、观察社会所取得的一些实践经验，有旺盛的求知欲，还有充沛的精力。如果我的请求得到批准，我将遵循党的三中全会方针，依靠人民，踏踏实实地干下去。我愿把我的血，洒在这块土地上。”

周晓东的文章发表以后，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作者直接收到各地青年来信 200 多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几乎是这些青年的共同心声。他们说：

“想想彭老总、张志新，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吾辈爱祖国，报之以贱躯！”“我愿用自己的血肉为祖国

的繁荣昌盛铺一条道路!”好多青年表示:“如果你(周晓东)的自荐成功,请允许我们和您一起干吧!最苦最累我不怕。苦在其中,乐也在其中。”

江苏高保平在写给周晓东的信中说:

“我们虽然素不相识,但我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看到你的信后,犹如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一样知音。读着你的信,就象看到你正在思索、奋进、实干一样。我深深地敬佩你在生活的锤炼中迸发出来的生命火花,我衷心希望你的‘大志’能得到批准。”

“晓东同志,俗话说:‘一只筷子易断,十只筷子难折。’我和我的几个战友,都愿做你的助手,和你一道为加速实现四化而努力奋斗!”

青年们说:“尽管我们心灵上还留有创伤,但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

“作为一个创造者,我们应竭尽全力,作为一个开拓者,我们应无所畏惧。即使我们碰得粉身碎骨,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用心血铸成的遗产,一串向前迈进的脚印。”

感谢党对青年一代的关怀

“我们反复读着胡乔木同志的谈话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越读越激动,越读越兴奋,真是百感交集。感谢党对我们的关怀和支持,感谢党对我们的理解、信任和引导。”

这是青年们来信的反映。

我们的党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党的领导是我们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的事业需要人民和党同心同德。由于历史性的灾难,使一部分青年同党的感情有些疏远。在这场讨论中,青年们切身体察到党的实事求是作风的恢复,感受到党的关怀,和党有了更多的暖交流。江苏解放军某部一青年来信说:

“自从《中国青年》发表潘晓来信之后的四个月来，我一直怀着极度兴奋而又惴惴不安的心情在窥视着这场讨论……党的领导对这场讨论如此关心和热情，这使我第一次亲身感受到党的亲切和温暖，党的伟大体魄的存在。站在党的面前，我又自感愧恨不已。我不应该隐匿自己的灵魂，我应该向党坦露自己的真心。”

山东项学明在信中说：“人们互相传阅着潘晓的信，各自倾诉着不同的遭遇，发表着不同的见解。的确，在这十年浩劫的历史大悲剧中，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潘晓的影子。令人欣慰的是，今天党和人民已经伸出温暖的手，亲切拥抱我们这些‘遇难儿’了。我们为亿万个‘潘晓’的得救感到高兴。”

青年们看到党的传统作风的恢复，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云南解放军某部一战士说：

“对于这场讨论，有些同志怀有担心、疑虑的心理。他们认为：青年人是在给党出难题。其实，这种平等的讨论正说明党的传统作风又恢复了。在‘四害’横行的年代里，党的传统作风被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被践踏了。我们这些晚生后辈没有品尝到伟大的母爱。今天，我们这些十年浩劫中挣扎出来的孤儿，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要向母亲诉说委屈，甚至给母亲提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受过寒冬的人，怎不爱三月的阳春，吃过黄连的人怎不想蜂蜜的甜味。各级领导要理解我们的心情。”

“党报关于《人生观讨论值得重视》一文发表后，我们沉闷的心情感到格外的舒畅，好象和妈妈疏远的距离缩短了。我们这一代并不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张铁生，也并不是不懂事的孩子：左手拿着窝窝头，右手又伸向妈妈要白面包。我们一定会体察国家的困难，体谅党的难处。”

加深了长辈们对年轻一代的理解和信任

青年们讨论人生意义,为什么能引起一些前辈长者们的极大兴趣?一位上了年纪的、忍受着病痛折磨坚持阅读讨论文章的副教授作了很好的回答。他说:

“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从这些文章中,我真正地认识了这一代青年,我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希望。”

河北柳亭来信说:

“一场人生意义的热烈讨论把我这个已迈入中年门坎的人也卷进来了。我那颗原已‘古井不波’的心,又掀起了波涛。读着这一封封信稿,心中仿佛注射进一股股新鲜的血液。从这一段段诗一般的语言中,我看到了无数颗水晶一般剔透的心。且不说他们观点的对错,光是那探索的勇气、无讳的直言、深沉的思索、磊落的胸襟,已使我十分佩服了。读了他们的信,我重新看到了祖国的未来,人类的光明。我觉得中国还是有希望的,毕竟有那么多的热血青年在思索、在搏击。深沉缜密的思考,大有作为的搏击啊!”

江西高康俐激动地来信叙述:

“第七期的《中国青年》使我流了泪,我的心又被燃烧起来了。中国青年一代是大有希望、令人感奋的一代啊!编辑同志们,一定也为这一代青年感到自豪吧!他们虽然被十年动乱摧残了美好的理想、抱负,有人失去了前途,有人失去了家庭,有人失去了信仰,有人看透了,但,为了盗来真理之火,还是有普罗米修斯式的青年啊!”

淮北中关野草坦率地谈出了自己对青年一代认识的变化:

“我一直在以偏见的、狭窄的、自私的心理,揣测着我国现阶段的青年,认为他们没有思想、没有理想,他们在沉睡……然而,

《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人生意义讨论的一篇篇震撼人心的文章，给我讥嘲得面红耳赤。”

“青年是有希望的！”

增添了海外赤子对祖国的期望

海外赤子的心与祖国青年的心也是相通的。他们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期待着民族的希望。这次讨论，使他们看到了八十年代中国青年的精神风貌。久居香港的青年读者张惠林来信说：

“我是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自小居于香港。自从1976年打倒‘四人帮’之后，才真正地、细致地关心和了解自己国家，并实实在在地在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我爱我的国家，我爱自己的民族，我深信共产主义必将到来，我明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懂得活着应该为大多数人谋幸福，我要求自己无愧于心，对己、对人、对国家、对民族，我要活得有意义。

“这一次人生意义的探讨，除了探讨人生意义在八十年代的特定内容外，还反映了这一代青年的精神面貌。他们不是苍白的，他们不是消极颓废的，他们在经历了挫折、失败和痛苦之后，更坚强地站起来了。他们将努力肩负起八十年代中国命运和民族希望，他们将带来中国又一次的曙光。”

回国旅游被什么事情吸引住了？刘云月的来信说：“回来参观游玩的心情是何等的急切，但是，当我一踏进祖国大门，就被贵刊这场‘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深深地吸引住了。我含着泪水，把潘晓同志的文章一口气读了三遍，而且还嫌不够。要说的对作者的同情，不如说是为祖国三十年来第一次这样开展探讨人生意义的公开讨论而感到高兴更妥切些。”

“我相信在这次长时间的旅游中可看到各地青年人在实际

行动中回答人生的意义。回港后,我一定要把这场‘人生的讨论’在朋友中传开,让海外赤子的心与祖国青年的心相连。”

一位香港的中年读者林老九来信说:

“相通的,哪里只是青年们的心呢?我这个‘外流’的中年人的心,不是也被祖国青年们的火热的心紧紧牵动着、畅畅地沟通着吗?”

“思想宝库感到有所充实,生命的火花再次熠熠迸发,那是重读到《中国青年》之后……”

“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轰得青年们从‘抗争’转为‘开拓’,轰得青年们要用‘血肉拥抱世界’。同时,也轰得我这个‘逃兵’热血沸腾,抑制不住揭笔而起的满腔激情,投身到这场充满青春活力以及人生哲理的讨论的行列里来。”

人生意义的讨论在我们杂志上是结束了,但生活的列车却刚刚起步。让我们努力扩大希望之光,在探索和创造中奋力开拓人生之路吧!

朋友们,我们还年轻!

(原载《中国青年》1981年第3期)

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编者的话)

我们在研究青年,青年在研究社会、人生。

青年们常有这样的体验:当他认为他所坚信和追求的东西突然失去的时候,当光阴的流逝使他痛感自己碌碌无为的时候,当因某种情景的触发而使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一个严肃的问题就会象逼视着自己的法官那样出现在面前: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这个老问题又被提出来了吗?对,又被提出来了!但它却带有八十年代的特定的内容。

了解这十几年沉浮变迁的人们,都不难理解青年们探索人生所走过的艰难历程。

像潘晓一样,他们原来也真诚地相信世间一切都是美好的,真诚地愿意为革命、为信仰献身。然而,十年动乱冲毁了这一切:理想与现实竟有着这样惊人的距离,人生的旅程竟是这样的艰辛,人生的目的竟又是这样模糊、把握不住?!他们彷徨,苦闷……

但他们不愿意走向虚无,而是在探索,艰苦地探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他们是带着过去的创伤来探索人生的。

他们是带着受到现代科学发展的吸引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人生的。

他们是带着自己对祖国命运和人类前途的关注来思考人生的。

像以往多次发生过的情形一样,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进步的前夕,差不多都发生过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讨论,俄国革命前夕关于人本主义和新人生活的讨论,我国五四时期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等等,都曾经对社会的前进作出过贡献。

今天,在我们的民族经历了如此巨大的灾难之后,在我们的国家急待振兴的重要关头,在科学文明已经如此发展的当代,人生意义的课题,必然地、不可免地在青年当中又重新被提出来了。

应该说,彷徨、苦闷对于麻木、僵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我们无须讳言我们的社会还有弊病。它并不因为一些人的忌讳,或另一些人的愤世厌生就自行消失。但是,在十年动乱的血与火的洗礼中,在经历了种种挫折、危难的锻造之后,我们共和国的年轻一代,没有背弃时代的责任,作为他们的主流是更坚强了。他们背负着民族的希望,脚踏着祖国的大地,高举起新长征的火把,又顽强地挺进了!对于人生意义的思索和寻求,将成为年轻一代在人生旅程中的新起点。

应该怎样看待社会?怎样对待人生?当理想和现实发生矛盾的时候怎样才能生活得有意义?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何在?——让青年们自己来讨论这些严肃的问题吧!

这里,我们把潘晓同志给编辑部的一封坦率、诚恳的来信发表出来。潘晓同志说:“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我们相信,在一场对人生意义的广泛的、平等的、科学的探讨之中,青年们会有所收益。潘晓同志和更多的青年,会在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上,找到指引自己前进的路标!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

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

郭楠柠 陈汉涛

应怎样认识人生？

怎样才能使青春放出光彩？

在建设祖国的伟大征程中，在振兴民族的历史转折关头，当代中国青年在倍加认真地思考着这一重大课题。

八十年代第一个春天，由潘晓的信所引起的“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牵动了千千万万青年的心。他们“抑制不住揭笔而起的满腔激情，投身到这场充满青春活力以及人生哲理的讨论的行列里来”。在短短几个月里，编辑部收到参加讨论的信稿达六万件。投来稿件的，有全国各地工、农、商、学、兵和党、政、工、青、妇等各条战线各个部门的青年、团员和青年工作者以及成老年同志，还有港澳同胞和大洋彼岸的青年朋友。不少的信稿是几十、上百青年联名写来的。一封青年来信竟会引起如此广泛、强烈的回响，这生动地表明，它反映了人们的心声。

参加讨论的青年们，用切身的经历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回答了潘晓提出的问题，向寻求中的青年朋友热情呼唤；他们在真诚坦率的思想交流中，初步领悟了人生的真谛；他们在广泛、平等的讨论中，体察到了党的实事求是作风的恢复和发扬，感受到了党的亲切和温暖。

* 本文原以“本刊编辑部”名义在《中国青年》1981年第6期登载。

六万件信稿里,跳动着青年们渴望为祖国四化大业贡献才智的赤子之心,洋溢着青年们探索真理、追求理想的激情。我们高兴地看到,风华正茂的一代新青年,已经从十年浩劫的创痛中坚强地站立起来,正在新时代的曙光中奋然前行。

本刊的讨论暂告结束了,但生活中的寻求却没有结束,也永远不会结束。对人生意义的探索,将伴随着我们全部人生之路。

我们作为参加讨论的一个探求者,在这里谈谈对于几个问题的粗浅看法,以求教于同志们。

重新探索人生意义是历史的需要

潘晓的信,真实地反映了当前许多青年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早在本刊开展讨论之前,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在青年中就已经开始了对这个问题的重新思索和认真讨论。我们曾经陆续收到全国各地不少青年来信,反映他们对人生意义的种种看法,以及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的彷徨和疑问。本刊的讨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展起来的。

为什么广大青年会如此热切地要求重新探索人生意义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有必要回顾刚刚过去的那段历史,了解这代青年成长的特殊条件,也有必要正视今天的现实,弄清新的时期在这方面向人们提出了什么新的课题。

我们的社会曾经把崇高的革命信念,注入青年们一泓清水般的心田。“在‘史无前例’的时期来临以前,在我们面前仿佛都平铺着一条通往理想境界的道路。”然而,“‘文化大革命,象一个霹雳在我们头上炸开”。在“革命”“造反”这一类华丽辞藻掩盖下,中华大地,到处上演着人间惨剧。许多青年上当受骗,而且比成年人老年人更深些,更重些;许多青年惨遭迫害;还有许多青年则兼有二者。“难道这就是革命?”不少青年产生了幻灭感,他

们说：“没有任何一代人遭受过我们这一代所经历过的精神崩溃和精神折磨。”

青年们和整个民族一样，在经过痛苦的时代反省之后，终于唾弃了现代迷信和它衍生的“最大的‘公’就是‘忠’”一类的人生教义。但是，为了使我们的民族不再重陷深渊，自己不再被人愚弄，青年们深入思考的，就不只是十年浩劫中的哪些东西应该唾弃，而且渴望着弄清楚：它们究竟是怎样发展来的？

历史，有自己的延续性。正如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我们党总结历史教训时，由“十年”追溯到“十七年”一样，青年们对人生意义的探求，也要求有一个同样的历史的追溯和清理。

噩梦初醒的思考，要求在实践中检验的基础上重建人生信念，这是促使青年重新探索人生意義的第一个原因。

1976年10月，是我们民族命运的伟大转折。青年们从十月的胜利中，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但是，十年浩劫的后遗症并没有消除，左倾思潮也没有在庆祝胜利的鞭炮声中就此隐退。困难、麻烦、问题，仍然象大山一样挡在我们前进的路上。由于青年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当代社会的种种矛盾，比较突出地、集中地反映在青年身上。这些矛盾不容易解决。而青年囿于自身的弱点，又往往不善于全面地、辨证地认识这些矛盾。除了少数已经立足在科学人生观的坚实基础上的青年之外，在生活的教训面前，许多青年痛苦地发现：无论是“从书本里树立起来的生活信念”，还是从别人那里“领来的水晶球般的人生观”，都还不足以解答生活中提出来的复杂问题。相反，不正之风，阿谀奉承、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等等，本来应该遭到唾弃的、丑恶的东西，却常常得以顺利通行。

面对现实，不少青年心中充满了光明与黑暗、苦闷与追求、彷徨与抉择的斗争。他们不愿意随波逐流，不甘心就此沉沦，他们渴望在人生的探索中找到实实在在的精神支柱，找到可供遵

循的正确的行为准则。

现实社会的客观矛盾,实际生活中的种种难题,这是促使青年重新探索人生意义的第二个原因。

当前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要求社会道德观念也相应地在科学的基础上重新得到审视和向前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很多方面排除了“左”的思想的羁绊,着眼于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开始纠正忽视个人利益的做法,注意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作出较多贡献的集体和个人给以相应的物质报酬和精神荣誉;鼓励国家计划指导下的竞争;实行技术业务职称、学位制度;等等。这些政策的核心,就是要正确调整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也即公私关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更好地结合起来,从而广泛地鼓励人们积极劳动,努力向上,增长才干,为社会主义多作贡献。这些做法,同多年来流行的把正当的个人利益混同于“个人主义”,把积极的个人进取精神批作“资产阶级思想”的“左”的思想,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这种矛盾冲突,同样向青年提出了一个必须解答的人生课题:是用那种“左”的思想情绪去否定新政策和在新政策下激励起来的人们的进取心?或者用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错误思想来对待新政策?还是面对新政策、新实践,重新审视现存的种种观念,在科学的基础上对它们采取或者肯定、或者否定、或者修改、或者作新的理解的不同态度?

面对变革,怎样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这是促使青年重新探索人生意义的第三个原因。人生意义的讨论是思想解放运动激起的浪花。以真理标准的讨论为起点的思想解放运动,对青年一代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启蒙。它推动着青年一代去寻求人生意义的科学答案。这种探索,虽然是以回顾的形式出现,但却是向前的寻求;回顾,虽然包含着创伤与痛苦,但却是痛

苦中求奋起的呐喊。

青年们热切探求的是“从实际中来的、科学的、制胜的人生观”。他们说：“人生观，作为生活实践在意识上的反映，从来就不应该是干瘪瘪的几句言辞，而应该是深刻的、丰富的生活理论。青年不仅要知道为什么生活，还要知道怎样生活。他们要求在人生的道路上学会怎样涉水，怎样穿越荆棘，怎样攀登，学会驾驭生活的一套本领。只有能在实践中指导我们不畏艰险去掌握这些本领的人，才真正是青年的朋友和导师。”

满足青年们的这种渴望，是一代新人成长的要求，是四化建设的客观需要。而满足的办法，只能是通过疏导，通过平等的、充分的讨论，让青年们从生活中提出的疑问，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认真思考和相互切磋中，得到科学的解答，从而使青年找到怎样在实践中树立革命人生观的正确方向。

这些，就是八十年代初发生这场人生意义大讨论的背景和由来。

正确认识“人的价值”

在这次讨论中，许多青年不约而同地对“人的价值”问题进行了探索。

“社会应重视‘人的价值’，集体应重视‘个人价值’，个人应自觉地按照社会需要提高‘自我价值’。”

这种认识，来自对于现实社会的痛切感受和深刻思考。

新中国的建立和随后进行的土改、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等，使中国人民从阶级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历史上第一次从“非人”变成了“人”。我们党的宗旨，当时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出发点十分明确，是不断地提高人民的政治地位和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是，1957年以后，由

于“左”的思想作祟,对许多事情的出发点、目的性的认识模糊起来了。

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什么?——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是为生产而生产?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是什么?——是更好地保护人民的权益,保卫人民的安全和胜利成果,还是巩固专政本身就是目的?

怎样对待正当的个人利益?——是给以承认和尊重,还是对之冷漠,甚至加以抹杀?

怎样对待青年健康的爱好、志趣和发展自己才能的愿望?——是珍惜、爱护,努力创造条件促其开花结果,还是横加干涉,甚至无情扼杀?

由于“阶级斗争为纲”逐渐取代了“人民的需求高于一切”,人民的权利和利益越来越遭到忽视。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现代迷信的笼罩下,领袖被从人抬高为神;而与此相对的是,亿万人却被从人降低为“工具”,丧失了自己的尊严和意志,在“神”的面前自轻自贱,而且互轻互贱。

林彪、“四人帮”利用“文化大革命”实行残酷的封建法西斯专政,肆意践踏人民的权利,使人不成其为人。用青年们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目睹了人的基本权利丧失殆尽,人的尊严受到粗暴的践踏;目睹了在疯狂煽动下的自相残杀;目睹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告密、提防和自保而极度恶化,在竭力繁殖自卑感和赎罪感……”

青年一代和父辈一起经受了历史的灾难,又面对现实的矛盾,所以,毫不奇怪,“人的价值”问题,成了震撼他们的心灵的问题。

“人的价值”问题的提出,也是对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的结果。

长期以来,我们许多人习惯于把“人道主义”、“人性”和“人的价值”等等与“人”沾边的词,当作资产阶级的或者修正主义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从来是重视“人”和“人的价值”的。马克思在痛斥普鲁士专制制度时曾指出:这种制度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提出,无产阶级必须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神圣家族》)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目标,就是要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使每个人都得到全面的、自由的、和谐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努力满足每个人正当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逐步创造使每个人全面发展其品格、才能、体力和多样化的个性,成为社会真正主人的客观条件。

社会主义社会也有了创造出这些条件的前提,因为社会主义已经消灭了人奴役人的根源——剥削制度。正确的路线、政策,就在于努力把这种可能性逐步变成美好的现实。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所采取的一系列的调整、改革的措施,都是朝着这个方向迈进的。

“人的价值”的实现和提高,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精神发展水平。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极为发达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人将成为社会和自然界“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恩格斯语)。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提供充分的条件。

有的青年提出：“怎样才能实现和提高‘自我价值’？”我们认为，关键是要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努力使“自我”与社会达到和谐统一。

要求社会承认“自我”，要求发展“自我”，这是合理的，积极的。但是，如果认为“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甚至认为“整个社会在觉悟的个人面前显得多么渺小、可怜”，那就走向了另一极端，歪曲了个人同社会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德意志意识形态》）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讲过自己深刻的体会：“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份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

正因为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生存、独立、自由和发展，所以“自我”离不开社会。“自我”就是在社会中形成和发展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和提高，必须从社会获得客观条件，而又以为社会的需要服务为途径。把“自我”绝对化、藐视社会的观点，就是把个人与社会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以至把个人凌驾于社会之上。这也就是把一己的“自我”凌驾于亿万其他人的“自我”之上。这种观点可能导致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历史上的野心家和独裁者，就是在极端个人主义的世界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青年们说得好：我们无疑都是不同的个体，但我们绝不是荒岛上的个体，而是民族中的个体，国家中的个体，人类中的个体。个体只有在为整体的奋斗中，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我”的“价值”，是由“我”对他人和社会的意义而定的。演员的“价值”，往往

在观众兴奋的掌声中反映出来；服务员的“价值”，往往在服务对象的由衷感谢中反映出来。那些为人民作出各种贡献，推动社会加速前进的人，他们的“价值”将会永远铭记在老百姓的心头或载入史册。

青年马克思说过：“应该指导我们如何选择职业的主要引导者，是人类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善。不应该认为这两种利益会成为敌对，会相互争斗，不应该认为这一个应该消灭那一个。人类本性是这样确定的：人只有为自己同时代人的完善、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他才能达到自身的完美。”（《青年对选择职业的考虑》）马克思伟大的一生证明，他青年时代确定的人生目的是科学的、崇高的。

在为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事业的奋斗中，实现和提高“人的价值”——这应该成为科学人生观的出发点。

· 科学地看待“公”与“私”

青年们在讨论中也探索了“为公”与“为私”的关系问题。这确是人生观的一个中心问题。讨论中出现了两种有代表性的不同观点：一种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社会）”；另一种是“‘为自我’又岂能‘为他人’”，完全否定“为自我”。怎样看待这两种观点呢？这就有必要先分析一下“公”与“私”的基本关系。（请注意：本文使用“私”这个词时，是指它的本来含义——“个人的”，而不是它的引伸含义——“个人主义观念”。）

“公”与“私”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中，在不同的条件下，呈现出错综复杂的不同状况。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公”与“私”的关系，是指社会主义社会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公”与“私”的关系，首先是统一的，它们相互依存，相互转化。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

个人造成的……这种对立只是表面的,因为这种对立的一面即所谓‘普遍的’一面总是不断地由另一面即私人利益的一面产生的,它决不是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历史的独立力量而与私人利益相对抗,所以这种对立在实践中总是产生了消灭,消灭了又产生。”(《德意志意识形态》)

这就是说,不应把“公”看成可以脱离“私”而独立存在和发展的东西,“公”和“私”的对立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公”与“私”不断地相互转化:“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公”与“私”就是这样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同志也说过: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

在基本上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公”与“私”的统一不再局限于主要是同一个阶级的范围内,而是扩大到全社会(除少数敌对分子外)。比如:人们需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千百万“个人”的这种“私人利益”,产生出了“国家需要富强”这种“共同利益”。个人为了改善生活而积极劳动,为社会创造了又多又好的产品,也就增进了共同利益。社会财富多了,反过来用以改善社会各个成员的生活,谁劳动得好还可以多得到改善,共同利益就又转化成了个人利益。正由于“公”与“私”在基本方面的统一性,因此,“为私”与“为公”在一定条件下是统一的。

其次,“公”与“私”又存在着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又是分裂的甚至对立的。“公”与“私”的统一性只是在于“公”从根本上和全体上代表了“私”,而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代表着每一个个别的“私”,不能把二者等同起来。比如:某位青年希望解决住房问题,这是合理的“私”。但是,虽然党和政府这几年加快建造住房,由于我国过去在这方面“欠账”较多,而目前财力物力又有限,为了全体人民长远的根本的利益,须要拿出相当的力量用来发展生

产、发展文教卫生事业和加强国防等等,因而短期内不可能解决所有人的住房困难,这位青年的需要也就不一定能得到满足。这是“公”与“私”矛盾的一种表现。这种矛盾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是避免不了的。而路线、政策上可能出现的缺点、错误,制度上某些不合理、不完善之处,领导者的官僚主义、不正之风,以及某些个人错误理解公私关系、要求实现不合理的“私”,等等,都会人为地扩大、加剧“公”与“私”的分裂和对立。正由于“公”与“私”存在着矛盾,因此,“为私”与“为公”在一定条件下是矛盾的。

如果我们承认“为公”与“为私”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那末,“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社会)”和“‘为自我’又岂能‘为他人’”这两种观点,就都只分别反映了一个方面,而与另一个方面发生抵触,所以,它们虽然各有一定的道理,但总起来说,都是不全面的,不科学的,不应作为我们遵循的原则。

有的青年说:我承认“主观为自我”有时候不能够“客观为别人”,可是我把主观“为自我”的行动,限制在客观能“为别人”的范围内,而不做二者不统一的事情,这样,“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这种人生态度是不是就合乎科学了?我们说,它既然作为一种“定律”来说,只反映出“公”与“私”统一的一面,而并没有反映出矛盾的一面,那么,如果把它作为一种人生态度,在实践中就必然会碰到很多行不通的困境:当“公”与“私”发生对立,“主观为自我”不可能“客观为别人”的时候,如果选择把“客观为别人”放在首位,就得放弃“主观为自我”,这实际上已变成了“主观为别人”;如果坚持只顾“主观为自我”,势必放弃“客观为别人”,变成“客观为自己”,这就可能滑向损公肥私、损人利己。

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则,就是把“公”和“私”合理地结合起来,正确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既不应该以“公”抹杀“私”,也不允许以“私”损害“公”。但是,“私”应

当服从“公”，“小公”应当服从“大公”。从长远看，这样做也有利于“私”和“小公”。

根据现实社会中对待“公”与“私”的态度，大致可以把人生观区分为三种层次。

第一种，高层次的。明确地把“公”放在首位，把共产主义事业看成最大的“公”。在处理“公”与“私”的关系时，自觉做到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公而忘私，必要时不惜为“公”牺牲一切，直到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它以保尔的那段名言作为人生信念，以雷锋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作为人生态度。这是革命人生观。

第二种，中层次的。基本上也能把“公”放在首位，但有时对“私”考虑较多。当“公”与“私”发生对立时，可以按照法律、政策或者社会公德的要求牺牲一定的“私”，但有时容易在先公后私和先私后公之间摇摆。它的基本守则是：“奉公守法，勤恳劳动，养家活口”。具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较多。

第三种，低层次的。目中无“公”，唯“私”是图。把“私”理解成自己任性的欲望，不管要求是否合理，手段是否正当，后果是否有害。自私自利，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它的信条是：“对我有利的就是好的”，“不捞白不捞”，“不占便宜等于吃亏”。这是极端利己的人生观。

这三种人生观，只是基本上的划分。在它们之间，还有各种过渡层次。

我们青年应该对上述三种人生观采取不同的态度。

对于极端利己的人生观——唾弃和斗争。它同社会需要和完善“自我”都背道而驰，只会贬低和败坏“人的价值”。它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是腐朽、没落的东西，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一切人类的美德相对立，是败坏社会风气和诱使青年堕落的腐蚀剂，是产生破坏分子、违法乱纪分子和野心家的温床。所有青

年都应该同它划清界限，向它进行斗争。对于受它影响的个别青年，则要耐心教育，把他们拉上正道。

对于中层次的人生观——承认和超越。我们承认它在现阶段社会条件下有存在的合理性，不要完全否定它。否则，就可能挫伤相当数量青年的正当的个人进取心。简单化地对待它，只能产生有害的效果。但是，又要看到它的局限性，看到它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同“公”发生冲突，它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要，也不能更好地实现和提高“人的价值”。目前有一部分青年对“公”不够热心，对“私”比较感兴趣，这跟十年浩劫中假“公”害人有很大关系。林彪、江青之流，把他们的一己私利冒充为“公”，假公济私，坑害青年，败坏了真“公”的声誉，致使有些青年唾弃假“公”，就连真“公”也怀疑起来了。我们可以理解这些青年的心情，但却不能同意他们的看法。不能由于上过江湖骗子的当，就不相信世上有真正的医生。我们唾弃假“公”，是为了维护真“公”，发展真“公”。只有维护、发展真“公”，才能保证合理的“私”的发展。只有维护、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才能保证每个青年的切身利益。关键的问题是，应该认真识别真假。共青团员和一切有上进心的青年，应该超越这种人生观，并且带动别的青年超越它。怎样恰当地对待这种人生观，是思想政治工作和政策的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

对于革命人生观——信奉和推广。它最符合社会的需要，也最能实现和提高“人的价值”。因此，它最高尚，也最能使人感到充实和幸福。革命导师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确立了这样的信念：“历史把那些为了广大的目标而工作，因而使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看作是伟大的人；经验则把使最大多数人幸福的人称赞为最幸福的人。”革命人生观永远是牵引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是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美好社会必不可少的条件。青年一代肩负着改造现实、创造未来的革命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当

代青年的精神面貌,决定着四化的成败,也决定着未来社会的道德风尚。我们青年应该在科学认识和积极实践的基础上,逐步确立革命人生观。并且热情地宣传、推广它,促使更多的青年自觉自愿地选择它,实践它。

在振兴祖国的奋斗中开拓人生之路

革命人生观必须建立在科学地认识社会和能动地改造社会的基础上。

有的青年说:“由于过去的‘全红’教育和‘报喜不报忧’的宣传,使我们习惯于‘一片光明’的幻想。但现实的鞭子把我们从幻想中抽醒了,我们面对真实的社会,跌落到了‘一片黑暗’。”他们相信自己看到了“真实”。

但真实的社会,却远不是“一片光明”或“一片黑暗”这样两个概念就能概括的。它远比这样的逻辑复杂得多,丰富得多。有的青年说得好:“要是现实就象一个穿衣柜,朝门的一面亮,背门的一面暗,黑白分明,又何须我们那样痛苦地探索。”事实如此。完全光明与完全黑暗的社会是没有的,有的只是光明占主流或者黑暗占主流的社会;只讲有鲜花固然是片面,只看到有垃圾也同样并非真实。由于多年来形而上学的灌输,束缚了某些青年的正确思维。从一定意义上讲,今天某些青年的这种“一片黑暗说”,正是昨天的“一片光明论”的“反馈”。科学地认识社会,应该越过这种形而上学的直线式的看问题方法,前进到历史地、唯物地、辩证地思维。这就要求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 worldview 和方法论来观察社会。

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在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期。一方面,科学的、民主的、进步的新事物每日每时都在萌芽、生长;另一方面,愚昧的、专制的、倒退的旧事物又在顽固地企图阻挡历史的

步伐。一方面，充满了生机与希望；另一方面，又面临着矛盾与困难。我们既要看到前进道路上有困难、有风险，须要付出代价；但又必须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正确的路线、方针为我们指明了胜利的方向，时代的主流不可逆转。

中国要富强，民族要兴盛，这是民心所向、党心所向的第一条。清算了十年的混乱和愚昧，总结了三十年的经验和教训，中国人民终于在对“左”的思想的清理中，确定了举国一致的奋斗目标：团结起来干四化，走向祖国的繁荣富强。这个意志，是任何个人、任何势力也阻挡不了的。

实行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这是民心所向、党心所向的第二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沿着这个方向前进，采取了很多重大措施，政治局面有了显著的改观。当前，为了使国民经济摆脱潜在的危险，党中央强调要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经济调整的巨大任务。这是牵动全局的大事。经济调整好了，才能长期稳步发展。改革的步骤须要适应调整的要求。但这决不是改变了实行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基本方针。改革，是客观矛盾提出来的时代需要，只有改革，国家才有出路。这个方针，也是任何个人、任何势力扭转不了的。

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搞好党风，这是民心所向、党心所向的第三条。中国人民从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有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在中国这样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其它任何政党、任何政治力量，都不可能团结全体人民，领导中国走向繁荣富强。我们党过去犯过错误，今天也还会有缺点、犯错误，也还存在党风不正的问题。但是，党的体质中蕴含着清除污垢、纠正错误的强大力量。我们党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都是由党自己纠正过来的。没有其

它任何政党有这样强大的再生能力。人民寄希望于我们的党,相信党能够改善领导,搞好党风,这是完全正确的。任何削弱和摆脱党的领导,都不符合人民的意愿。那种取消和反对党的领导,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是注定要失败的。

这三股潮流,正在汇合成为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要建设一个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新中华。这就是我们民族的希望所在。

经历过祖国沧桑的人,会公正地看到:我们的时代毕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祖国,已经从十年浩劫的巨大创伤中站起来了。我们确信,历史的灾难,必将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

怎样认识今天的社会现实?正确的回答应该是:我们的社会还有弊病,但同时存在着同弊病作斗争的力量,这种力量已经占了上风;我们的社会还有黑暗,但光明毕竟占主导地位,光明面正在扩大。

科学地认识社会,是为了找到前进的路标。对人生意义的真切理解,还须要投身于创造和改革的社会实践。

马克思这样讲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任何人都无法选择自己面前的社会现实,都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它。他可能有什么样的人生理想,什么样的个人抱负,以及怎样得以实现等等,都要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只有正视现实,立足现实,才能找到正确的生活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正确途径。生活的辩证法,不是社会应该如何来适应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应该如何去适应社会并改造社会。彷徨、苦闷对于麻木僵化是一个进步,但还不是真正的觉醒;真正的觉醒,还须要从彷徨和苦闷中走出来,奋起投身到千百万创造者与革新者的行列之中。

对于社会弊病和贫穷落后,我们不应该只是叹息、不满,还要去消除它们。我们要在党的指引下,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卷起袖子实干。正如共青团十届二中全会提出的,搞四化“需要的不是坐而论道的政治空谈,而是脚踏实地的创业精神;需要的不是评头品足、袖手旁观的‘观察员’,而是身体力行、兢兢业业的‘实干家’;需要的不是怨天尤人的情绪,而是勇于献身的气概”。青年们说得好:“我们从各方面都来为发展经济和改革社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那末,不仅有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还可以加深我们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一个人是一盏灯,每盏灯都放出自己的亮光,整个社会就会更加光明。”

人生的价值是锤炼出来的。在人生的道路上必须有韧性战斗的精神。很多青年都谈到:生活中的不可避免的挫折并不只有坏的一面。严酷的生活可以使人消极、颓唐,可以使人绝望、毁灭,但也可以把人锤炼得更成熟、坚强。重要的是,在任何环境中都要自强不息。十年浩劫曾经把一代青年推到十分痛苦和艰难的境地。但正是在这种不幸和艰难中的追索,使许多青年完成了成长过程中的“否定之否定”。

青年一代朝气蓬勃,富于探索和革新的精神。但是,一般说来,由于生活阅历和知识修养不够丰富,因而不那么成熟,还处在成长时期。为了认清历史前进的方向,保持奋发进击的豪气,为了我们青年的健康成长,我们在发扬优点的同时,也要自觉地克服自身的弱点。美好的社会要靠美好的人来创造;也是由美好的人组成的。

知识就是力量。建设和改革的事业,需要无数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我们青年的基本任务是学习、学习、再学习。我们要刻苦学习知识和本领,使自己一天比一天更充实,更聪明能干。

新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这一代青年的素质和面貌。我们要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新一

代。我们也热切地期望和呼吁，整个社会能为青年的成才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八十年代的中国，已经拉开了新时期的帷幕。在这场除旧布新的伟大斗争中，年轻的朋友，急流勇进吧！投身到历史前进的潮流中去，做新时期建设的生力军，改革的促进派，安定团结的模范，振兴民族的中坚。人生的真谛，不在“自我归宿”中；“自我”的实现，应该在振兴祖国的神圣事业里！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是保尔的一段名言，它曾经激励了千千万万人。今天，我们重新把它抄录在这里，赠献给八十年代探求人生意义的青年朋友们。

（原载《中国青年》1981年第6期）

命 运

“潘晓讨论”的三个主角
黄晓菊、潘祎、赵林 20
年来各自经历了怎样的
坎坷际遇？他们当前的生
活境况如何？在历尽沧桑
之后他们是否有所怨怼？
他们现在的人生观念怎
样？三篇酣畅淋漓的长篇
自述告诉你……

哭哭笑笑骂骂走过来

黄晓菊

3月的一天,《中国青年》的编辑找到我家,提起二十年前那场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说还有很多人关心我在“讨论”之后的经历和现状,让我自己写一写……

我问他也问自己:仅仅因为那场讨论二十年了,我就得要再一次站到公众面前,剖白自己的思想和生活吗?这样做于人于己有何意义呢?

我说,我需要想一想!

想一想。记忆的线头就这样被牵开,不由得我不回头看自己二十年来留在身后的脚印……

**我似乎天生就没有大多数人所谓的“正常”。
在“潘晓讨论”的日子里,读信常常读得我泪流满面**

那年,也是在春天,因严重的关节炎,我住在北京的小汤山疗养院。记得是在那里,我接受了马笑冬编辑的约稿:把自己对人生的思考与困惑真实地袒露给青年朋友。那篇近8000字的稿件成了后来“潘晓来信”的主要原型。

历史地看,那场讨论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还是让思想家们去探究吧;而我,说得清楚的只是个人的原因……

也许,我观察社会和生活的角度,跟我特殊的个人经历有

关。50年代初,我母亲响应号召,赴内蒙开发祖国边疆。我是她和当地一名英武的解放军连长的第一个爱情结晶。由于条件恶劣营养不良,我患了小儿佝偻病,被母亲送回京城外祖父家抚养。自此,一岁半的我就再也没感受过母亲温暖的怀抱、父亲宽厚的肩膀、姐妹割舍不下的亲情。什么是血缘?什么是家庭?什么是父爱母爱?年复一年,虽然结婚生子,在形式上我完成了一个女人应有的过程,但感情和心理上我始终没有找到“有家”的感觉。所以,我似乎天生就没有大多数人所谓的“正常”,天生就有无以宣泄、无以倾注的情感缺憾,天生就有一种“叛逆”的性格和无以名状的“愤怒”,还有一颗敏感而近乎神经质的心。

同龄的好朋友对我的痛苦给予过真切的同情,但说不上真正理解;社会的说教空洞而虚伪令人徒生反感;从小学五年级就赶上“文革”爆发,更没机会从知识的海洋中汲取豁达与智慧;严重的关节炎使我步履维艰;低陋的街道小厂里与一群命运对之不公的残疾人作伴……这些就是我当时所处的主客观环境。

我曾一头扎进外国小说以图忘却身边的世界;我也曾啃过叔本华、萨特,寻求拯救的良药;更曾倾情地投入爱情,想被人牵引,让心靠岸。可是,我想寄托却无以寄托,想倾诉却没有听众,想呼喊却听不到回声……

就是在这样一种时候,《中国青年》找到了我,使我有说话的地方,并作为“潘晓”的一员,倾吐了自己长期抑郁的心声。虽然那声音并不和谐悦耳,但人们原谅了它的率真、接受了它的坦诚。命运牵动了命运;青春震撼了青春;心灵唤醒了心灵……一夜之间,我成了公众人物。

回首往事,我想,那场讨论的真正价值或许不在于它得出了什么结论,找到了什么答案,更主要的在于它第一次打破了长期的思想禁锢,引发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自我存在的重新认识,对自身价值的深沉思考,对个体与他人、自己与社会的关系重新

审度。他们不再盲目地轻信灌输,盲目地服从指令,而是醒悟到:自己作为一个人,一个有独立大脑、独立思维的人,凡事有权也应该问一个为什么?

袒露这些,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在 80 年代初却真被一些人看成异端、另类、大逆不道,还真得要有点勇气,有点犯傻,才可能豁得出去。

那场轰轰烈烈的人生观大讨论大约持续了 10 个月,寄给“潘晓”的六万多封信由编辑部统一处理,我本人能看到的只是有限的一小部分和杂志上公开发表的那些。我被深深地触动着,很多时候读信读得我泪流满面。即使是那些指责“潘晓”是利己主义的边防战士的信也让我感动。其实,赞同或反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颗颗心恳切而真诚。我知道,我并不孤独,用青春和生命思考并寻求着的决非少数人。都说知音难觅,而我在“潘晓讨论”这个特殊的机遇里,觅到了那么多、那么多!

我渴望到一个书多、读书人多的地方去工作。

但我的经验却是,想通过跟读书人在一起提升自己的生命品质是一种谬想

我渴望改变环境,改变现状,渴望到一个书多、读书人多的地方去,我想逃离我曾付予八年青春的羊毛衫厂。杂志社了解我的愿望后,帮助我调入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行部。虽然这个部门只属于事业单位中的“三产”,可我已很知足。但不久我就发觉,在这里我并没有被接受和认可,我似乎是作为“有越轨思想”的人被安置在出版社的主流之外而时刻被人“关注”。我没有可以表现或发挥一下自己的可能,甚至没有人可以交流。我不想只求一份工资和一个饭碗,我又开始不安心。

很偶然地,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招聘图书资料员,我去应聘并通过了考试。这样,我从一

个“有学问”人的地方，挪到了另一个有“更大学问”人的地方。

图书阅览室，窗明几净，高雅安宁。在那里，虽说我干的只是为那些“大学问人”查书送报的活，跟他们根本搭不上话，但我还是自得其乐，因为我着实看了不少好东西、新东西。要不是我自己不识时务地毁了那样的好日子，也许我现在还呆在那间阅览室里，一辈子都无怨言。至今我仍认为，那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干活吃饭的地方。

终于好景不长。不久，“潘晓”之事传入了民族所，我感觉领导看我的眼神开始怪怪的。也许领导们认为，出轨的思想和言论会对正常的工作秩序产生威胁吧？而且，我也的确不太听话，喜欢自作主张，按自己认为对的办，不能不折不扣地服从上级。于是，当所里第一次实行人事制度“改革”时，头一个被停聘的便是我。再加上我是招考进来的，没有任何背景，停聘了也不可能翻腾起什么波浪。

我的“罪状”自是有若干，大部分现在都记不得了，但其中一条似乎有“贪污”之嫌，让我觉得挺恶心，所以至今没忘：“外单位订购杂志款 19.80 元，待领导问其索要时才从抽屉里拿出来。”（我想说明的是，拿出来的是汇款单，而不是“款”。）还有一条是“利用工作之便，超范围订阅杂志，私藏好材料，并用公家复印机复印后据为己有。”

我当然不服气。难道那些“搞学问”的整本整本地复印材料就全是为工作需要？而我印几篇文章就错到该逐出所门？况且我刚离婚只身带着一个 3 岁的儿子，没有安身之地，从起码的人道精神来讲也不至于赶净杀绝吧？经过一番上窜下跳的申辩和抗争，我还是失业了。

“饭碗”被打碎了。生活怎么办？儿子怎么办？我无助，我忧虑，半夜时常常从恐惧中惊醒。看着身边安睡的儿子，我知道自己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困境。我对自己说，我必须站起来，为了儿

子！

我把儿子送进了全托幼儿园，然后出走海南去谋一条我们母子的生路。这件事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只有3岁的儿子解释，便采取了一个最蠢的办法：悄悄地开溜。我实在没想到，这一溜竟会给孩子幼小的心灵造成终生难愈的创伤。现在我仍感觉得到，在儿子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掩藏不住的恐惧，他好像时刻在防备着于任何时候被人“抛弃”。

在北京开往广州的火车上，我满脑子都是儿子那双期盼的眼睛和挥动着的小手。至此，我那种跟“学问人”在一起便能提升自己品质的谬想已荡然无存。

我在海口当过拉广告的“记者”，在深圳帮一家日本人搞过家；我永远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我收获了一份被生活证明过的自信

经过一路颠簸，踏上海南岛时，我身上只剩了120元钱。我必须马上给自己找一个管吃管住的工作。

一个床位，一张“记者证”，一本电话簿，我成了《海南特区报》的一个“记者”。没有工资，一个广告提成25%。我背起厚重的电话簿，走进海口多雨的天气，沿着狭窄而泥泞的街道敲开一扇扇并不友好的公司大门。“不搞不搞（指做广告），走，走，走……”我像要饭的一样被人轰出来……

记忆中，我只做成过一次广告，还是熟人施舍的。那个广告总额5000元，按提成比例我应得1250元。但没想到的是，当那个云南小伙子把提成递到我手里时，只剩下了700元。那小伙子告诉我：公司地址是我帮你查到的，给社里的广告申请表是主任教你填写的，难道我们付出的不也是劳动吗？开始我感到愕然，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一个“面包”，别人只说了几句话怎么就要分吃差不多一半儿？！接着我有些恼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

可以这么简单这样现实，一句话一个主意都要明码标价？再后来，当我去过他住的那间不足六平方米的小棚子的“家”，看到他刚从家乡接出来的妻子和两岁大的女儿，我理解了他。面对生存，人人都有不得已，都要进攻或者自卫，没有谁会对你格外客气。

我清醒了，我知道我不是来这个地方寻求同情和友谊的，我是来找生活的，别人也是。似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将自己分成了两个“我”——“生存的我”和“感觉的我”。白天，当我冲进人群，第一个“我”全力以赴地参与竞争，决不退缩，她的秘诀是“闭眼、闭嘴、闭脑”。而到了晚上，第二个“我”走出来将第一个“我”痛责一顿，二者总要经过一番论战和厮杀，之后在精疲力竭中一同睡去。我感到自己像一张画一样，白天被撕开，流着血忍着痛，晚上再拼接、整合，淌着汗淌着泪……

我用自己在海南挣到的第一笔钱也是最后一笔钱买了返程票。这700元钱真不多，但对我却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是我被打碎“铁饭碗”后，为我自己和儿子挣的第一块“自由面包”，也是我开始自己的体制外人生后淘到的“第一桶金”。

在北京下了火车，我连行李都等不及放下就直接冲进了幼儿园。老师告诉我：你儿子不知中了什么邪，公园里拣的小石头、小花小草、乱七八糟的东西全往鞋里头填，填得鞋都穿不上，脚都露在外面半只。没收几次，还是改不了。有一次他把两块糖藏在衣袋里化成了一疙瘩，粘得到处是。问他为什么藏东西，他说他要给妈妈留着……我听得心如刀绞。

我真的不应该再离开孩子。可是，为了我和他的生存，我必须离开。民族所发的“待聘”工资只限时半年，他爸爸每月给的40元抚养费还不够一周的人托费。除了第二次出走，我别无他途去挣钱，去挣够我和他吃穿的钱。

我决定去深圳试试看。这次我没敢开溜，我试着用一个四岁

孩子能够听得懂的话向儿子解释我必须离开他的原因。显然，他听得似是而非。

在深圳求职也并不顺利。起初，我想找个文化单位，但我的学历不够，很难迈进这一行的门槛。退而求其次，我想找个商贸公司。可我从未搞过经营，再加上30多岁的年龄已没有任何优势，所以四处奔波一个多月，鞋都跑烂了两双，我还是一无所获。

怎么办？打道回府吗？我开始有些动摇。“不行，你不能就这样回去！”心里的另一个我阻止道。是的，我不能回去，这次出来，我是在心里向儿子发了誓的：我一定要解决好他和我自己的生活，决不能让儿子像我一样没有保障！

正在这时，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不是你想找工？有个给日本人搞家的活你干不干？”“你是谁呀？”一到深圳就到处找人介绍工作，认识的，不认识的，留的电话多了，真记不清哪个是哪个了。听上去对方是当地人。“干！干！没问题。在什么地方见工？”“明早9点在……”

那天夜里，我几乎整夜未眠：来深圳前，我对自己有过许多设想，甚至连在深圳找个羊毛衫厂重当女工的打算都有过，就是没想到会碰上这么个“搞家”的活儿。我长这么大，没见过一片属于自己的安稳的屋檐，我永远是个寄居者，婚姻也没有给过我一个“家”。我哪里会“搞家”？

说实话，见工的时候我没有多少诚意，我一肚子的不服气。我去“搞家”？我去做日本人的“女佣”？这帮广东佬儿是瞎了眼！

“荷花屯”日本人的“家”，干净得一尘不染的茶几后坐着男主人 TOKOLO SANG 厂长和他的韩国籍太太、29岁的“索荣花”。介绍人在向一个操着明显天津口音的翻译介绍我的情况，我傻站着，既为自己愤愤不平，又被那富丽堂皇的“家”吓得够呛。我记得当时那天津人打量我的眼光比那日本人的还难看。我

虽然不懂日语，但凭直觉我感到他决没有说我的好话，这深深地刺痛了我。我想：你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条走狗吗？你越不想让我得到这份工作，我越要得到它，咱们走着瞧！我开始施展我的伎俩——对那位韩籍太太投去惹人同情的目光。“会做饭吗？”“会！会！”我忙着迎合。我暗想，做不好再说做不好的话，现在我绝不能输给这个天津家伙。索荣花用韩国话对她丈夫说了一会儿什么，然后 TOKOLO SANG 又用日语对翻译说了几句。我终于得到了这份工作。事后我才知道，那个天津翻译想推荐他的一位远房亲戚来打这份工。

一个月零十二天，在我口袋里的钱花到只剩最后 30 元的时候，我在深圳找到了我的“位置”——一份我从没想到过的“工作”。后来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在这个由日本人、韩国人、天津人、北京人、后来还有台湾人组成的“家”里，一呆竟是两个春秋。

在这个“家”里，我恪守规则，每早六点起床，六点半做好“全家人”的早餐。男人们上班后，我陪索荣花去买菜，到各个政府部门办那永远也办不完的手续，洗衣服，打扫房间，操持晚饭……

有一个人，使我在深圳那段似乎有些荒诞的生活，变得美好、珍重而值得怀念。她就是索荣花。她在很重要的意义上改变了我，使原来有些骄矜而浮躁的我，在对自身的认识上获得了一颗难能可贵的平常心。

白天，我们俩个女人，在没有男人的异国他乡的“家里”相助相依。我们不说话，因为谁也听不懂谁，但我们可以“疯”可以“闹”，可以手拉手地上街，可以轮流为对方吹干湿发……我们连比带划一天忙到晚，紧张、快乐而充实。

我了解到，她是 TOKOLO SANG 的第四个“太太”，没有婚约，没有名份。两年前，TOKOLO SANG 在她的家乡工作，把她从她打工的韩国工厂里领出来，给她的妈妈买了大房子，送弟弟

到日本读书,又把她带到了深圳。在她的心目中,他是她的恩人,是她的依托、她的生命。所以,29岁的她真的深深爱着52岁、并有明显的腿部残疾的他。每一个傍晚,当夕阳西下,她不再跟我“逗贫嘴”、做怪样、跳韩式迪斯科,而是静静地站在阳台上,朝着他的汽车驶来的方向久久张望……她看着她的爱情,我看着爱情中的她,我的离乡背井、舍家别子的生活竟因之而变得美好起来。

就这样,在一年多的日子里,我们每天重复着几乎同样的家事。回想起来,那段打工生活给了我很有益的锻炼。我学着索荣花的样,一丝不苟地做好每一件小事,决不讨巧,决不懈怠。在这过程中,我的心变得诚实,情感变得纯朴,情绪变得平和。我本是个不善与人相处的人,但很奇怪我和索荣花相处得却非常融洽。我们用眼神传递心思,用心感受心,用女人特有的方式彼此呵护。

后来,她的离去使我第一次觉得失去一个人会那么难受……

TOKOLO SANG 被他自己的老板炒了鱿鱼,一位台湾人接替了他的位置。这个时候,我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让我至今一想起来就觉得心里特别别扭。台湾来的黄老先生70多岁,硬朗而充满朝气。他一到住所就对我说,我知道你是TOKOLO SANG太太的朋友,我们希望你能继续在这里工作,我保证你现在的待遇不变。我很苦恼,我跟自己斗争了两天。我想我应该辞职,我不能背叛TOKOLO SANG和索荣花。可是,丢了工作,儿子怎么养?生活怎么办?那两天过得很不是滋味,我和索荣花都在回避对方的视线。最后一个早晨,她敲门进来,指指她的头发然后坐到镜前。我拿起吹风机,另一只手托起她的湿发。我的泪水和着她发上的水珠一起流下来。

我知道如果我留下,她不会说什么,因为她明白生活的艰

辛；但她也不会原谅我，因为她是那种诚信不二的人。在生存和友情面前，我选择了前者，背叛了后者。或许，作为一个母亲我情有可原，但作为一个朋友，我错无可恕。我失去了索荣花，永远地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

后来，经人推荐，我在深圳广播电台“月亮湾”热线节目客串过一段主持人。最初，我的自我感觉挺好，听众反应也不错。我想，我的天性极适合干这类工作。我对人的感受力很强，又往往有自己独特的视角，还能迅速地组织语言，确实能够胜任。值得自慰的是，当时我是以我本人的真名参与节目的，而不是以“潘晓”的身份。就这一点而言，我真的为自己自豪。但是，时间长一点后，我自己的心理发生了障碍：拨通热线的听众中女性占多数，她们在各自的生活道路上遇到了种种困惑和麻烦，真心指望能得到帮助；而我除了通过听筒讲些无关痛痒的话以外，并不能真正为她们做些什么，解决些实际问题。渐渐地我感到听筒里我的声音越来越虚泛、空洞、矫情，我从最初的沾沾自喜中跌落到了地下，一贯伶牙俐齿的我开始“口吃”起来。终于有一天，我对自己说：“该闭嘴了！”就在这时，在北京的亲戚写信给我：你的孩子上二年级了，为了他的前途，你还是回来亲自做他的监护人吧。于是，我就有了一个强有力的理由，把自己拉出了那间播音室。

1993年春节我结束了三年的“漂泊”，回到北京。三年“淘金”，摸摸口袋，除了每月给儿子寄回抚养费，我总共只剩3000多元钱。这就是我的所有收获吗？不！我收获了一个宝库，一个无法用钱买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那就是我的自信心，被生活证明过的坚实可靠的自信心。我可以毫无愧色地对自己说：作为一个自然人，我有着良好的竞争力，我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以堂堂正正的方式挣回自己的生活，挣回一个母亲的尊严。在任何时候，我都可以重新来过，从零开始。这一份自信

就是三年“出走”的生活给予我的报酬。

**我搞定了一家店又一家店，在“百盛”“蓝岛”
“SOGO”都有了自己的专柜；我的梦还有很
多……**

这一次，是要在北京、在自己家门口、在儿子身边重新开始了！最初，受一个老熟人之邀，到他的时装公司去搞职业培训。又是一个耍嘴皮的活儿，没意思。我申请去搞业务，被派了个满世界去拉“代销货”的差使。由于公司的销售场地较偏，形不成正常客流，很难有业绩。怎么办？我想，东西不好卖也有花色款式太陈旧的原因，弄点时兴的说不定就好卖了。我就用自己的钱，从商店买来三米五米的花布，回家剪成自己想像中既时髦又简单的小坎肩、一条松紧带做成的最随意的那种裙子，然后用脚踏缝纫机加工，再送到店里试卖。没想到，有几种款式还真受欢迎，小店开始有了点生机。

然而，公司的领导们不认可我这种方式，认为这种挣“小钱儿”的办法有损公司的形象，我的热情被泼了一盆冷水。我于是决定自己干！我对自己说：只要不把自己和儿子赔进去就没什么可怕的！

西单灵镜胡同“女人街”。在那里，我跟我最好的朋友、一个在大学时念“轴承”专业的女孩儿“合资”租下了我们的第一个摊位——38号商铺，自此迈开了我职业生意人的第一步。我俩对事物的看法相知相通，性情却相反相成，这样的搭档简直是“天作之合”，永远不可能再有。然而，我知道，商铺之于我是为了生计，于她只是出于友情。

因为我有八年羊毛衫厂的工作经历，我们就先从羊毛衫开始干。我俩进第一批毛线的钱是从我业大时的一个同学老刘那里借来的。二万元，不多，但那是雪中送炭。记得我去取钱时真

的在下雪。老刘把钱送到我手里时说：“拿着吧，不用打条。要是打条的话我就不借给你了！”他清楚我从没做过生意，而他这两万元钱也是挣之不易。他还说：“回来干就对了，老扛着把锹到外边去挖别人地里的金子不是长事，还是在自己家门口种棵树吧。自家的树，好好浇肥，总会有果子吃。”这许多年来，我始终一字一句地记得这一席话，我认为它是我听到过的最好也最有用的“生意经”。

生活中，好人是有的！一定是有的！

我和我的搭档用这笔钱购进了第一批毛线。我俩白天轮流站柜台卖货，晚上扎进库房分毛线，经常是通宵达旦。我们把这些毛线用自行车驮到加工点，让女工们按照我们的样品进行手工生产，然后又再拿回“女人街”销售。

那些日子真是少有的辛苦，少有的全情投入。记得有一年，北京下了场罕见的大雪。为了省几个车钱，我俩还是骑车运线。寒风裹挟着大雪迎面扑过来，打得人睁不开眼睛，只好下车推着往前走。我们两个“雪人”一路笑着、叫着、骂着向前，路人看我们像两个疯子，她却大声地唱起了“我的未来不是梦……”

一点不说大话，当时的“38号”店铺在“女人街”是好样的，销售额经常名列前茅。但在其他商户的眼里，我俩有点神经兮兮的，有点不务正业。因为我俩经常关了店铺跑到北京电影资料馆去看一场又一场的电影回顾展。

大约不到一年的光景，“女人街”因招商不力，无法继续经营，全场改成了证券公司。但就我俩而言，我们的第一脚踢得不算坏。一年下来，我有了五万元钱的积蓄。这是我的全部家当，原想用它买辆面包车拉货的，可没想到却被我挂靠的公司的一个经理从账上生生地划了去，至今没有音信。我只在自己的呼机上收到过一张“借条”。风里雨里，好不容易挣了这一笔钱，竟被人“黑”了去，我气得要死。可是没有别的办法，还得舔尽伤口重

新再干。

1994年,有家大商厦招商,我和搭当鼓起勇气,带着自己早期的还十分不成熟的产品冲了进去。成功了!先代销,接着再做自己的专柜。

再过一段时间,搭档宣布“独立”,宣称要摆脱我的束缚,证明她自己的能力。她真的租了间小店并且经营得不错。去年,她卖了桑塔纳轿车跑美国念书去了。她真是挺棒的,能放下大学生的包袱和我一起卖羊毛衫,又能扔下大把的钱再回到学校。我真是为她骄傲。假如我还有青春,还有时间,我一定也像她一样。

而眼下的我只能继续养育儿子,一个人在商海中拼搏。所幸的是,命运这几年待我不薄,我搞定了一家店又一家店,在“百盛”、“蓝岛”、“SOGO”等大商场里都有了专柜。“饭碗”问题似乎解决了,我脚下的路似乎也比当年“宽”了许多……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从前,我的搭档一不顺心时就念叨这句口头禅。这是我俩在生意场中学会的第一条规则,往好里说就是各取所需,互惠互利。人生其实也是如此,要想有所获得,就得有所付出。所不同的是,生意场上的钱花出去还可以赚回来,而生命中有些东西,一旦“花”出去,就永远也别想找回来。生命的支付是昂贵的,所以人要学会善待自己、慎重“投资”。

这些年,每当有记者采访,最后总要问我还有什么愿望。其实,我的梦想还有不少:我想把我的服装公司办得更有模有样,我想用最具有特色、最有品味的服装,把市场上那些陈旧的服装统统取代;

我想办一个“单亲母亲协会”,让所有无助的母亲,有一个伸手求助的地方;

我一直欠缺与他人分享生活的能力,常常过于苛求别人和自己,我真诚地希望能有所改变,不再伤害那些本不想伤害的人;

我想有足够的钱，就去当一回诸葛红云那样的制片人，在电影的世界里徜徉；

我还想开一个“雕刻时艺”那样的书吧，请朋友们常来坐坐；

不过眼下最要紧的是尽快帮自己找一个诚实干练的经理人，我想来个“金蝉脱壳”，到美国去找我的搭档疯几天。

生命不断，梦不断。今天的年轻人，比我们当年活得尽兴，爱得尽情，我真羡慕他们，也从心底里祝福他们。

我想，“潘晓”的话题也许可以结束了。但“潘晓”似的思考却永远不会停止。只要有青年，只要有生命，人生的路无论是“宽”是“窄”，都要哭着、笑着、骂着、唱着走下去！

那场讨论改变了我几乎全部的人生

潘 祎

有关二十年前的那场人生观讨论，各种媒体前前后后从不同角度已经说了不少了。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就现在来看，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化的标识。一系列为我所不愿提及、或已经懒得再去认真解释的说词和往事，常常在不同场合被不同的人怀着不同的居心以不同的方式或强迫或带有些乐不可支地抖搂出来，甚至是用那些虽然看上去是关心但我却私下里以为带有某种非人道性质的关怀和好奇，让我感到无地自容或者厌烦至极。

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时，我不得不屈从于某些异常投机而功利的诉求，而不厌其烦地捞起那些陈旧而无聊的点滴来摆弄着。这样做的时候，往往也在所谓的原则与潮流二者里满嘴酒气地目瞪口呆无所适从。

想当年，马丽珍穿着如今根本看不到了的那身洗得发白的苏式女装在北京经济学院团委那间小屋子里与我开始了这20年的交往之最初，给我提的问题就是“你对中国的现实怎么看？”而现在，人们尤其是媒体在和我谈及那场讨论的事时，往往也是以类似“你现在对人生怎么看”“那之后你的主要感想是什么”的问题作为导语。这些恢宏而庞大的问题，总让我觉得实在力不能及满地找不到自己的影子。

过去，那场人生观讨论改变了我的几乎全部的人生；而现

在,对于我来说,那场讨论远非一坛尘封着撩人心魄的内容和清馥飘逸的馨香的陈酿,而带给我更多的是一片历史的无奈与现实的窘迫。

成为“潘晓”

1980年,我在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就读,当时上二年级,专业是计算机程序设计。

此前,上中学时,我的父母都在青海省大通县,我在北京寄居在亲戚家,总体上不舒服,性格也因之而变得孤僻乖张。这也造成了我至今总是以那种叛逆、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对待很多事物的基本性格倾向,甚至有些心理上的不健康成分。我如今更多地关注那些不公平、非人道、不合理的事物,也与这段我个人成长中至关重要的阶段的感受有关。我的抗上和蔑视权威的风格也是这段让我回忆起来就毛骨悚然的经历使然。

1977年恢复高考,我参加考试,成绩超过录取分数线好几十分,可被告之这些年积压了大量人员,我们这些在校生可以再考,于是就改为1978年暑期再进考场。之后,被经济学院录取。

经济学院当时是一所全部是北京生源的学校,能住校不容易。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入校后马上就取得了住校的资格。我从亲戚家把户口迁到学校,彻底离开了亲戚家。

可是,与我想象中迥然不同的是,学校照样是社会的缩影。我所在班,有年龄比我大14岁的人,有从部队、农村、机关等地来的人。而相比起那些生源来自全国的院校来说,经济学院更显示出北京人的冷漠和势利。1979年春节,也是我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春节,除夕之夜,校园墙外的爆竹声响成一片,而墙内漆黑一团,偌大个校园,只有我在的宿舍亮着鬼眼似的灯火。那时,极度的孤独和绝望充斥了我的所有,于是便在雪茄烟和烈性酒里

昏昏沉沉地熬过了那个春节、寒假和灰白的春光——上了大学又怎么样？于如此的环境会有什么前途？这样杳渺昏暗生不如死的未来之路，何去何从是也？……

这样的状态愈演愈烈，直至是年5月，学校里组织第一届“红五月歌咏比赛”，练习声此起彼伏，到处歌舞升平，我却情绪越来越恶化。31日，比赛进行过程中，我在黑暗一片的学校操场喝下了那深棕黄色的浓缩来苏水……

据后来同学们告诉我，系里早就发觉我的情绪不对头，派了人远远地盯着我，看到我倒下，几个人飞奔过来，抬起我就往校门口跑。正好赶上一个校领导从校外开会回来，看到几个学生抬着个人，简单问了情况，马上让司机调头去医院。

那天，也非常凑巧，朝阳医院外科、口腔科、职业病科都是主任值班。回来据那些医生对我说，如果有一个人当晚不在，我也就没了；而且，如果不是一个在当时还较为稀缺的大学生，也可能就不抢救了。

当时，由于药水灼伤喉头阻塞已导致我停止呼吸，医生只得用钳子把气管表皮撕开，切开气管，插管洗胃，之后倒出了几盆有些食物碎片和白花花的稀释的来苏水……

班里的课程被这件事修改了进程，两个班的男生轮流到医院陪床。学校紧急通知在青海的父母；父亲乘飞机赶到北京，在京的伯父、堂兄纷纷到医院探视或陪床；系、院领导前来看望……

如此，在经济学院那个有人开玩笑说稍微坐歪一点屁股可能就出了校墙的面积可怜的校园，我的事成了一个非常的事件。后来，十几年后，其他年级、系的学生在与我谈论起这件事时，说大家的一个比较共同的感觉是耻辱，为我耻辱，为经济学院耻辱，为他们自己耻辱。如此，学校就对我另眼相看。慢慢地，我成了鸡肋。

可校团委书记李庆堃对我还是很照顾,多次找我谈话,对我的处境表示理解和同情,并屡次找我所在班的辅导员程大省,请他对我多加照料。

但团的作用毕竟太小了。我依然脖子上缠着纱布,夜不能寐,头痛失眠,精神恍惚,倘佯在校园的一派歧视和排挤之中……

1980年4月7日午休后,程大省到宿舍找我,说是一个杂志社想了解青年的思想状况,到校召开座谈会,每个班指派一个学生,系里让我去参加,与我为伴的是我系同级另一个班的某个男生。我对他说,到会场找个挨着门口的地方坐,开会后五分钟就溜出去找个地方喝酒。

我不愿介入这种媒体关系,是因为我的父辈中有很多人是搞文的。我的祖父是个资本家,是宜兴乃至江南有名的买办,但他的12个儿女在其长子——我的大伯父的带领下都参加了共产党的事业。可是,作为“文革”前大公报的负责人,我的大伯父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二伯父是西南联大毕业生,在北京某大学教法律,1957年被打成右派;家父也在“文革”中被揪斗,抄家……虽然“文革”后都得到了平反、摘帽子、恢复名誉,但这一切给他们和家人的心灵上留下的阴影却不可能被抹去,而且都变得小心翼翼,生怕再被卷入政治的漩涡。

正因为这样,原来在中学文科成绩一直不错的我,在高考时被家里要求只能考理科。我自己对媒体的宣传也因此形成了一种近乎无理的怀疑甚至否定态度。

那天到会场后,我和那个同学就在门口落座,确实是准备等会议一开始就借故溜掉去喝酒。可就在会议要开之际,团委书记李庆堃来把我叫了出去。他对我说,杂志社的编辑要找我单独谈谈,说着把我推进了会场隔壁的一间办公室。里面笑容可掬地坐着的,就是后来与我结下忘年之交、当时在《中国青年》社思想教

育部的马丽珍。

她说起，是学校向杂志社推荐了我，说我轻生厌世，说我的思想和我的年龄很不相称，说我的一些想法较偏激，一些言语在青年里具有普遍性。

我满怀戒备地听着她的叙述。她说，编辑部想搞讨论，但还在两个选题中犹豫，一个是“向钱看”对不对，一个是人生观问题。接着她就问我对中国的现实怎么看。

酒是喝不成了，烟还可以抽。既然被推进来，就姑且胡说八道一番吧。这样，天南地北、古今中外，语不惊人死不休地，我跟她直说得口干舌燥，从下午不到两点说到了六点多钟，把个开晚饭时间说没了去。谈话间，她说起她也是江苏人，常州和宜兴挨着，我们也算是老乡了；她的女儿上初中，但外语不好，能不能让我利用业余时间给补习一下；我在北京举目无亲，可以把她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有空就到她家去，至少可以变换一下口味……

约定了周日去她家。眼巴巴看着她走了，回家吃饭去了，我没家，只能吃方便面了。

无非是聊天而已，无非是个很简单的会面而已，无非是再平常不过的言辞欠妥的针砭时弊而已，无非是把日常与同学和朋友间的谈话转移到了新的对象那里而已。但这次谈话确实改变了我的生

周日，吃了家乡饭，补习了英语。她让我把自己的人生观转变过程写一下。

吃人家嘴短。我就答应了写。

交到她家。

再去她家，她说，编辑部已经决定搞人生观讨论，看了我写的那个玩艺，认为比较具有普遍性，问我敢不敢拿出来让青年们评论和探讨。

我答，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评论？没什么大不了的，拿去用就

是。

再去她家，她说编辑部把我的那个玩艺，连同另一个女青年的什么文字，还加上了别人的一些话，搞成了一篇引发讨论稿。油印的稿子在这，你看一看，并在两天内告诉我想法……

我拿着那个油印件，到了当时在中国财贸报上班的堂兄那里，请他看了。他说，如果杂志社发这样的稿子，胆量不小；我在其中没有什么重要位置，应该问题不大。

于是，不久后，“潘晓”出笼了。

“自动退学”

我的一个同班同学的母亲就是马丽珍的上司、思想教育部的负责人郭楠柠。因此，虽发了这样的稿子，在学校里我也不好太过张扬。只是，平生第一次看到自己写的文字变成了铅字，还是异常地欣悦。

讨论开始后，我和黄晓菊建立了联系。她的那种激扬与敏感很让人畏缩。她对蒋子龙那句“先做鬼后做人”经典话语的欣赏总是在行为上显得非常前卫。

学校得知我参加了这场讨论，变本加厉地找茬。好像是我自己主动投稿去投入的，好像不是学校推荐的，好像学校自始至终反对这些事情。

程大省带我去北京安定医院检查，一个实习医生在听了程对我病状的描述并与我交谈了不到五分钟后，让我出诊室，便交给了程一张我很久以后才看到的诊断证明，上面这样写着：“重型精神病，精神分裂症(?)”

学校于是据此命令我休学一年。休学通知书上这样写着：我院经济数学系计算机程序设计专业 78711 班学生潘祎，经病院诊断患有重型精神病，不能坚持正常学习。根据我院学生学籍管

理暂行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潘祎应予休学一年。休学日期,自1980年3月1日起至1981年2月14日止。特此通知/北京经济学院/教务处(章)/1980年5月26日

学校委托我堂兄陪同我回到青海。人生观讨论开始时的那几个月,我在青海无所事事,只是与黄晓菊、黄帅(她此时在北京工业大学就读)写些书信联系。

而此时及以后,黄晓菊在各大学做着报告。在北京化工学院做报告时,结识了台下很崇拜她的一个男生,后来成了她的丈夫。在有了孩子之后,又离异了。

我在青海呆着呆着,越来越感觉到不对劲,为什么我要被强行轰回青海休学?我怎么了?精神病之说不过是一种加罪之词,这样休学下去会是什么结果?

暑假时,我返回北京谋求复学。未遂,校方不准食宿。《中国青年》社解决膳食,晚上我像贼那样溜回宿舍。开学后,在杂志社的帮助下,再与校方就复学展开了漫长的交涉。学校又让人带去安定医院,找了主治医生,这次诊断为“精神忧郁状态,建议试行复学”……我终于得以走进课堂,只是时间已届11月下旬,大半个学期过去了。

这时,我经常去马丽珍家,她是个很讲原则工作很投入但观念有些保守的人,她家是个很民主的家庭。在她家的感觉很舒服。

此间,讨论在轰轰烈烈地展开并延续着,并在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了社会热点。而“潘晓”的真实性,也成为当时人们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在当年第9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黄晓菊的照片,并标明“潘晓正在阅读青年来信”。8月的一天,中央电视台采访“潘晓”,杂志社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潘晓”在读者心目中一直是个孱弱的女青年的形象,而我,一个大学生,一个近1米9的小伙子,出现显然是不合适的,会引起误解和非议。

后来,只是黄晓菊以潘晓的名义出现在屏幕上。

当时《中国青年》的总编辑关志豪在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这场讨论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人在问到底有没有潘晓这个人,也有人冒充潘晓。为了排除这些误解,当时杂志社一位副总编带着黄晓菊和黄所在单位的党支部书记接受了一次电视采访,这就把潘晓这个思想典型变成了人物典型。黄晓菊的一些同事和熟人对她平时为人处事有一些看法,他们认为不应树这么一个人作为典型,《工人日报》还发了一篇未经审核的群众来信‘邻居眼中的潘晓’,指责潘晓是如何的落后。”

而此时的我,还陷在与校方的复杂而艰苦的纠缠里不可自拔。

这年年底,全国开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学校对我的排挤也随之日益表面化。1981年1月放寒假时,我再度回青海,父母对我的情况非常焦急,但又不知该怎么办。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们给我所在系的主任写了封信,询问校方将对我做什么样的处理。

1981年2月2日,经济学院党组给我父母回信,大意是:“我们收到你们的信,经研究同意你们提出潘祎同学以自动退学的要求。请你们尽快委托有关人员到学院办理退学手续。我们希望家长应对潘祎进行耐心的说服和教育。并希望潘祎同学安心养病,早日恢复健康。”

此后,又收到了学校关于我的退学决定,大致是:“经济数学系78711班学生潘祎,男,22岁,因病,按照学籍管理规定于1980年4月休学一年(1981年2月休学期满)。在休学期间经医生建议和本人的申请,系、院领导研究同意潘于1980年11月随班试读,试读结果潘祎不能坚持正常学习,根据有关规定应予退学。经与该生家长联系,其母赵玉兰于1981年2月14日来函正式表示‘我们家庭经过研究同意潘祎做自动退学处理’。2月20

日经系院领导研究批准按自动退学处理。该生的退学手续已于1981年3月12日办毕/北京经济学院/1981年3月20日。”

就这样，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学校推荐到了那场讨论当中，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学校轰出了校门。

流 浪

在青海，我知道了家里和学校背着我做出了退学的决定，并且木已成舟。尽管家里告诉我，如果我不自动退学，就要被勒令退学，那样就一辈子都完了，这样做是为了我好，我还是异常气愤。

我为家里这种封建家长制的越俎代庖的做法感到极度的失望，也为学校的行为而愤懑不已。

我对家里讲了我要回北京，要再度就此事讨个公道。家里很是怕事，把参加讨论的所有罪责都说成是我无知和冲动的后果，不希望再有什么意外发生，希望我能留在青海就业。当时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就是“哪儿的黄土不埋人”。但我就像被活生生地埋了那样憋气，不能忍受这些侮辱和欺凌。

我那从来不会认错的家长得知我的决定后很是生气，宣布自此与我脱离关系，并断绝一切(包括经济上的)往来。

我只身回京，马上就遇到了实际的问题，如食宿、学习、就业等等。

开始时，我住在北京火车站候车室。一次，我发高烧，连续三天滴水未进，更没有食物充饥，只是自己倒在长椅上昏睡，到了第四天，才扶着墙到了盥洗间喝了些凉水，回到那椅子上继续坐着，直到退烧才走出候车室。

在候车室总共住了不到十天，最后的一个晚间的凌晨三时许，在睡梦中被一片嘈杂惊醒，看到几个警察把在那里的人都叫

起来查票。轮到我时，一个年轻的警察用电棍对我指指点点，声色俱厉地叫我拿票，我说没有，他不问青红皂白地用电棍朝我身上挥舞着，我气急了，大声质问他有什么权利打人，把整个候车室的人都吸引过来看热闹，很多人对代表首都形象的他的行径表示愤慨。带队的警察负责人过来，问明我的情况，解释了没有票不能在此留宿，次日起不要再来了。这样，我在温暖的房间里过夜的好时光结束了。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在立交桥下面坐等天明，或是在前三门高层建筑里的楼梯拐角处卷缩着，听到有人来，赶紧开溜，以免被当成什么人扭送执法部门不明不白挨顿臭揍。

这段时期里，经过朋友帮助和介绍，曾经在北京的各个城区和角落留宿。黄晓菊曾经为我介绍到三里河铁二区一个残疾人在楼梯拐角处自建的窝棚里居住。那个残疾人是个又瘸又瞎的人，正在用盲文写小说，我去住的条件是要帮他將盲文改写成普通文字。

而这时，我每天的生活费只有6分钱人民币，也就是一个大火烧的价钱。实在饿得不行而兜里又没有钱的时候，我就穿着整洁一些坐到餐馆里，等人家吃完了，去拿点剩饭剩菜来吃。偶尔被服务员抓住，讲明情况大多也不会遭到候车室那番“礼遇”。

终于，我的要求复学被明确地告知为痴人说梦。当时学校的党委办公室主任张立中明白告诉我：不要找经济学院打官司，学校已经将我的材料汇集起来装订成册；我的处理决定不是学校做出的，而是经过上边批准的；我如果想打官司就应该找《中国青年》杂志社去打，是他们把我搞成这样的；想复学，不可能！

十几年后，我由于出版业务的需要，和物资出版社发生了一些联系，得知张立中在那里当负责人，我电话找到他说起合作出书的事。寒暄中，他谈起了那段往事说，现在看来当时不应该那样处理，年轻人的思想问题是可以教育手段来解决的，而且许

多想法在现在看来是可以理解甚至接受的，那样的处理太过分了。可对于十几年后的我来说，这样的说法除了安慰之外，已不可能当饭吃了。

我四处上访递送我的材料，都是碰壁。那些经过，太繁琐，至今想起来我都头痛。

多年后，我父亲给我看了1981年4月经济学院经数系给他的一封信。那封信写道：“关于您的孩子退学一事，已于3月12日办理完毕。潘祎可能想不通，他曾向中宣部、教育部反映过情况，领导上也很重视，经再三研究认为作自动退学处理比较合适。希望您多给他做做工作，如果有时间来京对潘祎的情况可向您全面介绍，以便加强教育（请将潘祎的学生证、借书证、校徽退回）。”

团中央信访处和中国青年杂志社马丽珍专门为了我的事找到我在京的亲戚处，请求能让我留宿，遭到拒绝。

我自己、朋友们、马丽珍都为了我的就业问题奔波于京城。

我的户口万幸还是落到了我的亲戚家。但是，所在街道办事处很明确地说我不能享受待业青年的待遇，只能与那些劳改释放人员同等对待，属于无业人员。

我自己曾经在某建筑工地偷偷地当小工，搬砖和泥，赚取点劳务费。

马丽珍的丈夫当时在农业部工作，为我找了一个在中国动植物检疫总所夜间看大门值班的活。我在那里干了十几天。

朋友们为我到处托人。曾经有酒仙桥某副食商店卖肉组、北京石棉厂等单位叫我去谈过，为此还将我的户口从亲戚家迁出到了同学处。但当用人单位看了我的档案后，都大惊失色，婉言相拒——学校在我的档案里放了很多置我于死地的东西，让我到了社会上也不得安生。为此，我不得不嬉皮笑脸地又找到我的系主任，显出一副从善如流的样子，说服了他，拿回了我的档案，

把那些不让我学习也不让我工作的东西撤了出来。

可令人困惑不解的是,我那份档案,自从我进了监狱后,神奇地消失了,再也无处可寻。我出狱后,曾经为了那份档案跑了许久,查询了学校、街道办事处、用人单位等我能想到的所有地方,都被告知“不知道”。现在,我的档案里,只有出狱后到街道办事处填写的入狱经过和求职登记表。

最后,还是组织发挥了作用——团中央、杂志社马丽珍与当时身为全国青联委员的北京第一家卖大碗茶起家的张占英联系,为我在其单位——前门联社,安排了当装卸工的工作,住在仓库里。

在城市流浪乞讨的生活历经两年左右之后,我终于告别了那段洒脱的生涯。

即使在流浪的那段时间里,我也曾经想要参加什么自学考试。为此,我曾致函北京大学陈岱孙先生,讲了我的意图,并希望得到他的指教。我很荣幸,得到了他的回信,言辞恳切用心良苦地为我一个经济学的门外汉指点迷津,开列了一些必读的书目。这种平易近人、诲人不倦的精神确实令人钦佩。

入 狱

1983年10月11日上午9时许,我在前门联社的办公室。有个人叫道:“潘祎,有人找你!”两个表情严肃的男人进了房间,一个走到办公桌前,另一个守在门口,近前的人对我说:“你叫潘祎吗?我是××分局的。传你!”他拿出一张传票,让我签了字,两人左右夹着我上了等在路旁的吉普车。

我知道是为了什么。

当年五六月间的一个上午,我和司机到广安门车站提货,司机在我装完货后去验票盖章时,无事可做本站台上溜达,拿了一

块放在货场上的焊锡。车开出门后才对我说起，要我为他保密并直接将那玩艺送到了他住处附近的一个人家。中午，他叫我跟他到那个人家去拿钱，说是可以拿出一半借给我买英文打字机。

8月份，严打开始，他又找到我，再次请求我为他保密，并说如果事发我们俩一起承担责任比一个人要轻。我那时是完全的一个法盲，信以为真，答应了他。

9月，他被传讯。直到10月中旬我还没看到有公安局的人找我，以为他据实以答，没我什么事了。

这下，还是坐到了警车上，我依然有说有笑。到了预审室，那两个人也谈笑风生，说根本没什么事，说完了就可以回去了。我就按照事先与司机的约定那样讲了，可不曾想却被送进了看守所，一呆就是8个月。

自第二此提审开始，我都将真实情况予以陈述，却都被声色俱厉地断定成是“不老实”。然后，与那司机对质、检察院提审、法院提审、庭审等，我还是据实以答，但毫无作用。

在公安局每次提审，都被问及有关社会活动之事，诸如郊区秋游和一些我认为是学术讨论聚会之事，还出示了我在前门联社时的日记。那本日记，此后我再也找不着了。

在看守所，那时的状况非常糟糕。我所在的监房是一间十平方米房子，最多时要关四十多个人，留出开门的空间（那里门为了安全一定是向里开的）、马桶及周围的空间、牢头狱霸老炮们舒适的空间外，每个人只能有零点几平方米的地方睡觉。人们交叉着两排头靠墙脚顶着对面人的胸，常常是一排人躺下去，再一排人躺在他们身上，然后一点一点往下挤。那时，能仰面朝天躺一会就是比总统更高的待遇，挨饿受体罚是家常便饭。为了一块窝头打得头破血流，被打致残的事时有发生。

现在我以为，对我个人而言，那段及以后监狱的经历，是非常可贵的。如果没有这一段，我也许只能算是活了一半。那时，

以前的现实上升为理想，个人英雄主义完全被粉碎，我在一个集人间丑恶于一个异常狭小的空间的地方，用自身的时光、自由和血肉领略着规则的幻灭和道德的真谛。

在检察院提审之后，我提出要请律师辩护，但被法院和看守所工作人员的置若罔闻和自以为是剥夺了我依法享有的这一权利。

在法院提审和庭审时，我被告知要老实点，不然就重判我。那时为了些许小事而撕户口送边疆一个巴掌翻几次（5 年刑期的倍数）的案子屡见不鲜。能有个我那样的刑期，已经和“干起”（监狱术语，就是无罪开释）一样了，很少有人为此再行上诉。但我却是那些不知足者之一，因为我实在冤枉。

出狱后，我才知道，我的一些朋友们得知我被抓，想方设法要把我“捞”出来，但得到的答复是：“这个人从刑事上也许判不了，但就是不能放！”

当然，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也是不可能被减刑的。

1984 年 2 月 29 日，我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3 月 5 日接判决书那天，我被叫到法院的一个办公室。一个看上去很和蔼的女人找我谈话。那时，作为人犯的我，是没有实际的权利拒绝的。她对我说，她是北京法制报的记者，“严打”在这里帮忙，受领导（我不知是法院领导还是报社领导）委托想进行犯罪调查。她告诉我已经找到了马丽珍和黄晓菊等人，了解到了我的情况。

当我说起我并没有犯罪时，她好像并不吃惊，只是进行着例行的采访。

出狱后，我问起马丽珍，她说是有人找她，但被她拒绝了，理由是我在这里已经很困难了，不能落井下石。

后来，我在执行单位北京清河农场十分场，偶然看到了这个女士写的文章，起初是在 1985 年 7 月 25 日《文摘报》上，后来请

家人按图索骥，找到了1985年第3期《文明》杂志，那篇文章题为《潘是怎样走进“死胡同”的》，里面的文字这样写道：

四年后的今天，人们兴许还曾记得《中国青年》杂志开展的“潘晓讨论”。作为“潘晓”之一的黄晓菊，工作之余，坚持上夜校读书，身上仍有着探求精神。她脚下的路是宽是窄，走下去自会见分晓。至于潘祎呢？他已经走进“死胡同”，一九八三年十月成了在押犯。

潘祎，一九五七（注——其实，我是1959年出生的，我在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拿这些很简单易查的事与他们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也可以看出他们工作的疏漏程度）年十月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不满九岁，父亲被迫离京去干校，母亲也迁往青海，他留在北京，寄养在姨妈家中。

由于他无法承受姨妈眼神中的歧视和冷淡，上中学时，他离开姨妈家，住到学校去了。

当时的中国实在很特别，是非都颠倒了。别的孩子还可以听到亲人讲几句知心话，把颠倒了了的再颠倒过来。而潘祎没有这种机会。然而，他有极强烈的求知欲，把自己浸泡在书海中，象干透了的海绵拼命地汲取水。

月色清亮的夜晚，潘祎仰望着夜空，不禁想：“月亮孤独，所以她美，她清清亮亮。”他突然心动，觉得人生的真谛似乎近在眼前了。

潘祎童年失伴，少年时代他仍旧没有伴侣，他的头脑中充满了“自我”，没有一点空间留给他人。

潘祎读书是抓住一本读一本，可惜生吞活剥，思想被搅得混乱不堪……他象章鱼一样向各个方向伸出触手，追求和攫取思想的果实，唯独忘却了历史已经走过多少年，忘了

看一看过去和现在人民斗争的胜和败。

很难把潘祎的思想归入某一种体系，每当他想到自己的亲戚时就认为：“人和人之间没有爱，只有利用关系和金钱关系。”他常常说：“人，从来就没有美好的东西，我就从不把美好的情感给别人，而是把一切美的东西尽可能地留给自己。”

“四人帮”终于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潘祎考进了大学，学的是经济。

他一头扎进了书堆，热衷于以知识的渊博来显示自己，但是他却找不到成名之路。一天，他似乎找到了一条伸展到他脚下的路。——啊！那历史上的名人，大多是反现实社会的，凡为现社会唱赞歌的能流芳百世者甚微，而与社会唱反调的却往往能成为伟大的人物。他暗自选定了自己的方向——以反社会、反现实来引起人们和社会的承认与注目。他把目光转向了社会存在的阴暗面。

他得知他的母亲病了，十年来的生活磨难夺去了她的健康，她想回北京来，回到儿子身边来，享受一点天伦之乐，也尽一点母亲的责任。这使潘高兴，他一连三个月放弃学业，四处奔走，可是徒劳。这时，他突然想到，母亲当初留下他和他的户口，把他抛在别人的冷眼之下，也不过是利用他的户口作回京的跳板罢了，“我被生母利用了”。同时他的学业荒废了，跟不上了。一九七九年五月的一天，这个懦夫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的话，“勇敢地向死亡走去”。他服毒自杀了。

“我不感谢你，因为你又把我送回到这悲惨的世界上来了。”这是醒过来的潘祎抛给救活了他的医生的第一句话。潘祎陷入了极度的抑郁之中。

然而，踽踽彷徨者的苦闷并非没人关心，潘祎的情况，

由他所在学院的领导介绍给了《中国青年》杂志社，引出了“潘晓讨论”。

“我就是潘晓。”潘祎逢人便讲。他明知他并不是“潘晓”，也明知引起“潘晓讨论”的那封信基本上是黄晓菊的遭遇，也有潘祎的一些思想，还有一些别人的东西。“潘晓”并不等于“潘祎+黄晓菊”，这一点编辑同志一再跟潘祎讲过。但他却把讨论当作自己成名的阶梯，决不放过自称“潘晓”的机会。他以“潘晓”身份到各大学去演说，与一些大学生高谈阔论，名曰“探讨”，实际是卖弄和张扬自己。

他想寻找他的生活之路了，他急于复课，急于迈步。然而，学院中一些领导对“讨论”持否定态度，对潘祎亦十分反感，不同意他复课。他磨刀霍霍，扬言要杀死不准他复课的人。

.....

在杂志社和团中央的共同努力下，潘祎终于复学了。但他积习难改，依旧我行我素，自私而且粗暴。他因缺课太多，结果期末考试不及格。校方动员潘祎“自动退学”。父母发现儿子心中对他们已不存在爱了，裂痕成了鸿沟，便同他断绝了关系。

潘祎无家可归，求助于人。有一位残疾青年，孤身一人，住一间小房，把他留下了。这房里仅有一张小床，他让给潘祎睡，自己缩在桌子上，一日两日尚可将就，久了，身体吃不消。他和潘祎商量，能不能两人同睡一张床。潘祎竟不同意，一米八的大个子，竟忍心将病残人踢到床下去。好心青年忍无可忍，请他“自便”。

.....

一九八三年六月的一天，潘祎和司机××一同到广安门货场提货，二人共同盗窃了货场上一块价值八百多元的

焊锡锭，并用车拉到窝主家中销赃，日后二人又同去窝主家分赃。赃款放到潘祎手中时，这个自视清高的前大学生心动了，收下了这笔赃款，走上了犯罪之路。一九八四年三月五日下午，北京市××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上写着：“被告人潘祎，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纯属偶然。”

“不见得吧！”法院的承办人走访了《中国青年》杂志社，前门联社和其他一些认识他的人，都对潘祎犯罪不感到突然。这恐怕是狱中的潘祎所没有想到的。

……

这篇文章，对在监狱里的我起到了很不利的作用。《文摘报》转载后，又有几家报刊转载，我经常听到某个犯人对我说又在某报刊上看见你的事了。我看了以后，曾经问过那里的政府干部们，他们对此莫衷一是。可在私下里，却在对待我时戴上了又一层有色眼镜。

我对这种行径很是愤怒。为此，在那里冒着被认为是不认罪服法违犯监规纪律而受惩罚的风险，背着所有的人，满腔激愤又不无偏颇地写下了万言书《一个在押犯的自白》，转出去交给已经落实政策回到北京的家人，希望能找个报刊发出来，证明我的清白。但是，以我家人对种事的惯常思维和处理方法，这封信是不可能被拿出去的。于是，此文至今还睡在我的资料库里。

从1983年10月到1984年5月，我在看守所过了8个月，其间除了接受提审时能见到阳光外，其他时间都是关在屋子里，脸色煞白。

到了劳改场后，却又是整日暴晒在阳光下，队列训练，纪律教育，下大田干农活。因为个高，排队在前，我被任命为小组长，

干活便比别人更多些。而且,以我的个性和原则,也将此视做锻炼和改造自己的机会。阳光下汗流浹背,脱了上衣,结果搞成了个轻度灼伤,背上满是水泡,着水后脱落,上了碘酒疼痛难忍……

由于看上去我的劳改态度尚可,在当时又算个知识分子,不久后我被调到劳改场教研组,给犯人教初中和高中数学,并参加监狱文艺宣传活动。

此间,更认识到真情的可贵——我在前门联社的一个女同事贾慧敏自始至终一直给我寄我所要的书籍和纸笔,马丽珍也把社会上流行的一些书籍给我寄来。

我也意识到作为培训者的我接受培训的重要性,寻找了个北京人文函授大学,请家人报了名,在狱中开始了该校法律系的学习,其中有的教材就是我那位二伯父撰写的。我在1987年通过了考试,取得了结业证书。

我把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没有其他什么嗜好。当时,犯人每月的生活费是2.5元,这要支撑着我除了被褥、外衣裤、水电、日常膳食外的所有开支,类似牙膏牙刷洗衣粉针线食品烟卷邮票信封纸笔等等,其他犯人都从家里要,而我依仗着这点生活费,节衣缩食,到最后还剩下十几元钱!

这段时间,我在狱里具备了很强的适应性,在犯人中是个高参类的人。很多新到的犯人以为我是个二进宫。那些政府干部也时常让我给他们出点什么主意。

这段时间,我在到底是与这里所集中的那些非道德主流趋近,还是别出心裁确立自己的人生原则之间,很艰苦地抉择着,铁窗下等人的现实与自己的理想主义时常发生着激烈的冲突和对垒。久而久之,还是逐步廓清了那条至今仍然信守的原则——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

这段时间,我与世隔绝,不与社会通人烟,只是从书报上感

悟社会，以致于刑期将满时，我非常恐惧于即将步入社会的事实。我深恐自己置身于因改革开放而日新月异的社会中时会像一个傻子那样只能是个时代和潮流的局外人。

出狱之后

1987年4月10日清早，我拿着些许物品，迈出了监狱的大门。

我自己坐火车回北京，按图索骥摸着找到劲松东口附近的家，看到了久违的父母，也从此开始我全新的生活。

我从父母口中得知，他们早在我出来之前很久，就着手联系我的就业，但难度非常之大，家父所在的航空工业部（他“文革”前也是在这里，1984年调回原单位）机关不可能安排我这样的人。他只能为我找了些抄写信封的活计，在家里干，每个信封1到2分钱，他的同事知道我在家没工作，有时就把自己的活让给他，让我多干点。

这时，按照规定，出狱后必须在某个期限内办理身份有关事项，向户口所在地派出所交释放证明，上户口，办身份证。片警找我谈话，问入狱原因，我将那些事实又讲了一遍，他只是说，从劳改、劳教场所出来的人回收率很高，二进宫是很普通的事情，希望我不要在他的辖区内犯事。我请他放心，我要犯不会因为那些小事，而且肯定不会在他管的区域里。

我找到那篇我在狱中被害不浅的文章里所提及的那个残疾人，他已经结婚了并有了孩子，住的地方也比原来的条件要好得多。他对我的出来很是惊喜，我问了他是否知道此文，他全然不晓。我逐字逐句念给他听，他拍案而起破口大骂，说哪个婊子养的在这里信口雌黄满嘴喷粪，立即要我带他去找造此谣言者，把话说清楚。可我说，就算是说清楚了又能怎么样，挽回不了刑期，

挽回不了名誉，挽回不了体罚和歧视所带来的身心的伤痛。自始至终，他都在祖宗八辈地骂着，可并非所有的人挨了骂都会打喷嚏。

他于90年代初去世，走时留下了一个也是残疾的妻子和一个很小的孩子。他的一生也是很凄惨的。1981年作曲家谷建芬闻听他的事迹，很受感动，用他写的词谱了一首《希望的曙光》；中国少年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先生曾经请他（由于他行动不便，我陪伴着）到其府上交流。

他虽然失明而且架着双拐，也常为此被人捉弄和耻笑，但我还是记得他在一辈子的困境中那正直、无畏而爽朗的笑声。相形之下，拿他作为题材搬弄是非的人，实在是显得太没劲了些。

为了自食其力，我开始了一轮新的奔波。

我的第一份外出工作的机会，是马丽珍给我找的。她这时已经在中国妇女杂志社工作，她的一个同事的爱人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就职，帮我找了一份给实验室刷瓶子的活，一个1分钱。我去了两天，后来实在是那从北京市东南到西北骑车的行程太远了让我半途而废。

我的第二份工作还是马丽珍给我找的。当年曾参加人生观讨论的一个人此时在那套改革开放后很有影响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里负责，我被介绍去做些跑腿打杂之类的编务工作。

1988年初，经过大学同学介绍，我结识了我的校友贾湛。他在北京当时很有名气的某函授学校任职，并与一群人一起在搞《20世纪文库》、《现代文化丛书》等学术译著。我加入了其中，也是做一些编务。后来，他脱离了那些人，自己搞起了个北京企业管理研究所，主要出版《企业家丛书》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我在狱中读的大量书籍此时派上了用场。我被指定为丛书的编委会成员。虽然报酬很可怜，但毕竟是兴趣所在。

这样，经过一年的自我努力，我从抄信封度日的状态涉足进

了文化圈。

这一年夏天，企管所搞了两部书的选题，一是《中国劳动人事百科全书》，另一个是《行政管理学大辞典》。这两个选题已经开始写作，有些初稿已经用麻袋装着送了来，在中国人民大学资料楼的一个大房间里绕着墙根摆满了一圈。时值北京流行红眼病，主编副主编都像兔子似的红着个眼睛，让我与他们对视时觉得他们好像要杀人似的，我赶紧让他们回家歇着。这就苦了作为编委的我，看那一大堆纸和字，晚上就在那张大台子上入睡。一暑假就这样过来了。

我和贾湛开始为这两部书的出版联系。可是，前者400万字，后者近200万字，北京的出版社大都不敢染指，害怕赔钱。不得已，贾已经准备把稿子卖到河南或山东，好歹把作者的稿费支付掉，并混个主编当当。

我找了一个朋友，承诺为我们的《中国劳动人事百科全书》选题找出版社，采用合作出书的方式，并为我们二人提供办公场所和午餐，条件是我们帮助他做发行。

什么是发行？我根本不知道。但既然答应了，又是通过我拉上的关系，硬着头皮干吧。

联系新华书店，可北京发行所太牛，店大欺客，不干；首都发行所要价太高而且附加条件太苛刻，不行。最后讲定在天津新华书店向全国征订。天津书店预计，此书能发3000册就皆大欢喜；那个联系出书的朋友也认为这是个不错的结果，但还是催促我们自己另辟蹊径。

一天，我偶尔溜达到了一个专业出版社的发行部，因为和那里的负责人挺熟，就说起了这本书，请他帮帮忙。他是个爽快人，立马说拿来试试，征订单上的地址电话帐号改成他的，按实数提书，给他留码洋28%就行了。

接下来，我如法炮制，抱着电话机给许多报社期刊社出版社

打电话,非常客气而恳切地诉说着我们的书,请他们帮助发行。然后就蹬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各个城区转游,到处去央求对方能放我一马给个出路,有什么条件都好说。

其实,我提供的合作方式是不容对方选择的:我给征订单内容,对方改成自己的地址电话帐号,并负责收款,带款提书,20%、25%、28%的折扣,看对方上数的量递增。

几乎疯狂地打着电话,几乎疯狂地跑着。我骑车或利用公交,先后联系了北京上百家出版社、几十家行业报纸、上百家期刊社,把那本书的征订单在全中国撒了一遍又一遍,累计起来也有几百万次的广告。而我付出的,除了自行车折旧、月票、唾沫和体力外,只有几张信笺。这大概也算是零风险了。

记得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到某个专业出版社,刚进门就被里面的人恶狠狠地问了句:“什么事?”我正想稍微仔细叙述一下情况,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甩过来了一句:“没功夫,我们本版书还发不过来呢!出去!”他像轰狗一样把我赶了出来。我很沮丧,可又不甘心。这时,正好赶上来书了,一群人乱哄哄地穿上工作服搬书。我一看,什么话也不说,过去就帮着搬,而且一次比他们多搬一到三包,弄得灰头土脸气喘吁吁满脸是汗。完事后,那小伙子不太好意思地请我洗了脸,坐下,倒了杯水,终于给了我一个说话的机会。我讲述了我们出书的难处。他怔了一会,得知我是编者而不是经销商,更加同情,同意为我破例在系统内征订。结果,光是他那里,就上了一千多册。

在那年并不好的市场氛围里,那本专业性很强的书,竟被我奇迹般地发行了十万册。我还假公济私,利用这个机会,为我们家找了个儿媳妇——我的弟媳。

此后,我离开了企管所,贾湛又找了几个人照着我的路数做发行,可是没能取得多大效果。事后,他对我说,在这方面,十个人也顶不上你一个。

还说人生

进入 90 年代后,我虽没有值得称道的财富,但却具有了一定的经商能力和关系资源。

这时,原中国青年杂志社总编辑关志豪从法制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职位上退了下来。不甘闲着的他搞起了个中国星星出版公司,但没有版号,也不具备发行权。他找到我,希望我加盟,做出版发行部的负责人,搞几本书。

我同意了,于是就在这没有出版权的地方搞出版,没有发行权的地方搞发行。费了半天劲,搞出了一本有关反腐败的《开国第一刀》。

不巧赶上整顿出版社,该公司被关闭。关志豪又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把个半死不活的《自然科学史论丛》拿了来,改名为《科技经济纵横》,还是由我负责发行。《科技经济纵横》非市场化程度较高,广告经营很困难。后来,不得已停刊。

我又先后应聘到人民日报文艺部主办的《大地》月刊社和新华社的《中国名牌》杂志社做发行。但由于种种原因,终非顺心如意,自己主动离开了这一行当。

此后几年,我一直处在频繁的跳槽之中,在许多公司做过人事广告部门经理、副总、总裁助理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曾在一个假合资的公司做总裁助理。在此的经历给我留下了至今难以磨灭的一些感触。我后来给很多报纸写稿时,曾经写过关于能不能和老板交朋友、与老板共事的原则、朋友能不能一起共事等文章,其灵感和体会大多来自于此。

1996 年底,中国青年杂志又搞了个讨论,题目是“我不停地奋斗,为什么成功却离我越来越远?”编辑找到我,让我为这场讨

论写篇东西。我写了一篇《奋斗就是我们的生活》发表在1997年第1期上。这篇文章问世后,引起了各界对我的关注。许多报刊的记者前来对我作了采访报道。不少文章称我“复出”的精神状态令人振奋。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北京做人力资源的一帮编辑记者。开始时,我只是帮他们在电台做些人才节目,而后就更广泛地为他们写些这方面的稿子。不知不觉中,我就很不情愿地成了一个自由职业者,一个自由撰稿人。我过去不经意间从事的招聘面试工作的经验以及自己四面八方去求职的经历倒为我在这一行说三道四提供了很感性的素材源泉,傻呵呵地,我又成了个冒牌的人力资源专家。

1998年底,我由北京青年报记者鲍云帆等陪同到北京经济学院,递交了要求为我恢复学籍并根据我后来的成果授予我学士学位的申请。此事于12月27日见报后,经济学院的一个副院长给我打了电话,说是经济学院很重视我的事,但当年的当事人都不在了,而且学校文件管理混乱,不能很快找到相应的文件,让我等待。这一等,就到了现在,还是无声无息。

今年,因为朋友去了“中华英才网”,我应邀在那上面主持了个“老潘信箱”,解答求职者和职场中人的种种问题……

辛弃疾说“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如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大概写照了些许我的心情。

以前,我因为讨论人生而被迫改变了人生之旅的方向和归宿。

如今,在互联网上我又与那些据调查主体年龄在18到24岁之间的年轻人们继续着人生的话题。我不知道这对于我是不是一个难以打破的宿命。

这些年,每当朋友们把我介绍给新的人时,总是要带上那场

讨论及我在其中充任的角色，我听了总不大舒服，那些反应是我习以为常但又不太自然的——“噢？你好你好！”然后就是要我将那些陈词滥调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更愿意谈些别的。尤其是近来对“老潘信箱”的炒作，使我更多地面对着各种媒体而不得不一再谈及那场讨论以及此后对人生的感想。我很多时候只能应付差事，内心里我更想嘻笑怒骂信口雌黄口无遮拦逮着什么就胡说八道而不是一本正经装腔作势，我更希望自然而自在地存留在对我来说已经不多的时光里，别那么附庸风雅。

多年前在一篇稿子的最后，我曾写出了自己的酸溜溜的垂涎三尺，今天它们仍是我的心梦：

总是这样迷茫惆怅，总是这样无畏刚强，总是那般孤傲自好，总会迎来明日风光。渴望拥有一片净土、一抹天露、一个朴实而丰富的空间、一种绚丽而清纯的生活；可以面对世事沧桑，赏慕珠滴的晶莹，描绘发人深思的未来，挽起激动人心的世界。这将是一个开始的结束，也是结束的开始，将是刻骨铭心的怀念与憧憬，将是充满浑沌的深刻与悠远……

我命运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枢纽点

赵 林

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往往是由漫长生涯中的几个转瞬即逝的枢纽点决定的,这些枢纽点通常又是由于一些突发性或偶然性的外在事件造成,它们就如同美杜莎的诡异面容一样,突兀地呈现在人们的平静生活中,激起巨大的涟漪,使人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当然,一个人如果对于这些突如其来的偶发事件采取一种无动于衷的超然态度,那么他就可以像古希腊哲学家皮浪一样不受任何外界影响而仅仅按照自己的生存方式来走完人生旅途。但是在现实社会中,皮浪式的贤哲毕竟是凤毛麟角;对于绝大多数凡夫俗子来说,大都不得不在这些突发事件面前作出某种选择。而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选择者日后的生活道路。

就笔者而言,一生中也曾经历过几个关键的枢纽点,它们对我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枢纽点,就是1980年风靡全国的那场人生观大讨论。

在谈及这场大讨论对于我本人的人生之路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先将这场大讨论的一些鲜为人知的背景情况作一简要的陈述。通过这种陈述,读者们将有可能从一场必然性的时代运动和一些偶然性的运动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更深刻地领悟到命运的悲剧性含义,以及自由意志与决定论这一对永恒的生存矛盾之间的奥秘关系。

从现实社会的角度来看,发生在本世纪80年代初的人生观

大讨论是一个必然的思想过程,它意味着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当时的青年一代在经历了精神上的狂热盲目和自我陶醉之后,开始转向苦闷和疑虑,并由此而进入冷静的反思阶段。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署名“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这篇对革命的理想主义人生观充满了怀疑困惑、对现实的社会生活充满了焦虑迷惘的来信一经发表,立即就在全中国青年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恰如当时的《中国青年》杂志所言,“牵动了亿万青年的心”。由此而引发的人生观大讨论,很快就成为80年代初期全国青年关注的热点问题。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对于许多过去一直被奉如神圣的思想传统、价值观念渐渐地由盲目轻信而走向怀疑,由忘我的迷狂而走向冷静的反思。如果说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标志着政治思想的重大转折,那么1980年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则标志着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的重大转折。这场人生观大讨论的具体内容今天或许已经为人们所淡忘,但是由它而导致的思想禁区的大突破,则已经在后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积极意义;由它所引发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也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骨髓中。这场充满了感性的泪水和激越情绪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今天回顾起来似乎有些幼稚。然而它却如同历史上的一切启蒙之声一样,虽然带有浓重的情绪化色彩和浅薄之处,但是它所发出的带血的纯真的呐喊,对于那些在陈腐的精神桎梏中痛苦挣扎的自由心灵,具有振聋发聩的启蒙意义。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不同,人生观大讨论是一场具有朴素的自发性质、产生于民间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不像前者那样经过深思熟虑的反复酝酿、具有那么复杂的政治背景和高深的理论色彩,而仅仅只是人们压抑已久的自然人性、苦恼情绪和怀疑精神的一次自由表露。发起和参与这场讨论的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们的生活环境、人生经历和价值取向各不相

同,但是他们却同样体验着那个时代的共同的怀疑惶惑和苦恼迷惘,在他们的血管里都涌动着不甘屈辱和沉寂的热血,直言之,他们都具有一颗充满真诚和热情的赤子之心。他们来自于迥异的生活层面和思想层面,这场大讨论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后来他们开始又分道扬镳,有的人由怀疑、焦虑而奋起,有的人由怀疑、焦虑而消沉,更多的人则继续走着平凡的人生道路,在默默无闻的日常生活中突现自己的人生哲学。

尽管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在当时是势在必然,但是这场大讨论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们却是由于偶然的原因而卷入其中的。作为参与者之一,笔者曾与这场大讨论的发起者黄晓菊和潘祎二人均有过直接交往和书信联系。黄晓菊是北京某街道工厂的一名青年女工,潘祎是北京某大学78级的一名本科生。在《中国青年》杂志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他们两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观点引起了编辑们的注意。有几位编辑鼓励他们将这些经历和思想写成文字,并经过编辑部的修改拼合,数易其稿,最终形成了署名“潘晓”的《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这封来信。

该文在《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上刊载后,引起了全国青年的极大关注,人生观问题成为当时青年人普遍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青年》编辑部共收到各地来信六万余封,据最近出版的一部畅销书《交锋》所言:这个数字打破了解放以来报刊专题讨论来稿数量的纪录。来信者绝大多数是青年,此外也有一些中年人和老年人,还有来自香港、澳门和美国的信件。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收到如此多的来信,充分说明“潘晓”的信确实牵动了亿万青年的心。许多青年怀着对“潘晓”经历的深切同情和对其思想观点的强烈共鸣感,投入到这场大讨论中。一些中年人和老年人,也纷纷对这场讨论表示理解。甚至连当时官方理论界权威人士、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先生,也在《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上发表了

对这场人生观大讨论的肯定性意见。从1980年第5期一直到第12期,《中国青年》以较大篇幅连续刊载了全国各地青年的来信,各种观点纷纭不一,形成了自“反右”运动以来第一次真正畅所欲言的自由讨论局面。而笔者正是在这种突破思想禁区、表达真实感受的氛围中,发表了那篇后来给我的人生道路造成不少坎坷的文章《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

虽然在今天看来,这场自发的人生观大讨论,作为我国思想解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官方人士和民间人士)所肯定,但是在当时,这场大讨论所开创的思想自由局面,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来说,都是极其有限的。《中国青年》虽然成为全国青年们热烈讨论的重要场所,但是社会上的许多正统派人士、尤其是各单位的领导者,一般都把参与讨论者当作有异端思想的危险人物来对待。而且尽管《中国青年》编辑部在号召全国青年参与讨论时一再声称,这次讨论决不会再像以前历次政治运动的前奏曲一样,引蛇出洞,对不同的观点扣帽子、打棍子,然而在轰轰烈烈的大讨论结束以后,仍然有许多在公开讨论中发表了较为激进的思想观点者,受到了所在单位的“特殊待遇”,对日后的分配、工作、提职、晋级等问题都造成了无形的影响。

1980年的人生观大讨论激动了全国青年的心,它的影响至今仍然保存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然而,当年关心和参与那场大讨论的人们对“潘晓”后来的命运却几乎一无所知。据笔者了解,黄晓菊的生活条件虽然由于受到全国青年的普遍关注而得到了一点改善,但是她的叛逆思想却使她后来的生活道路一直较为坎坷。离开原来那家街道工厂后,它先后辗转了好几个单位,前些年又随南下大潮到了海南,在一家报刊社当了编辑。后因通信中断,至今情况不明。至于潘祎,后来的境遇就更为糟糕。我与此君虽未曾谋面,却多次通信,从字里行间可以窥见此君才

思敏捷且自视甚高。当人生观大讨论尚在进行过程中,潘祎就与《中国青年》编辑部因意见分歧和某些其他原因而反目决裂,后又因行为怪癖被所在学校怀疑患有精神疾病,不久即自动退学返回原籍青海。临行前此君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对人生颇多感慨,并表示回到青海后将继续研究人生问题。后来我每次到北京见到黄晓菊时,均要打听潘祎的情况。据黄晓菊说,潘祎回青海后不久又重返北京,四处流浪,因思想狂放、行为不羁而难以与人为伍,曾一度为生活所迫在前门卖过大碗茶,在北京火车站当过搬运工。关于黄、潘二人的情况,毕竟是所闻多于所见,虚实真伪,在此不便妄作论断。只是每每想起这两位曾经在中国青年一代思想解放历程中掀起轩然大波者,其后来的命途竟是如此蹇滞多舛,不由感慨万分。

由此我要转向自己最具有发言权的领域,即这场人生观大讨论对于我本人人生道路的深远影响。作为当年那场大讨论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时间考验之后,我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上,对当年本人所发表的观点进行重新诠释的权利,并且试图从这种思想上的“故地重游”中得到某些更深刻的哲学启迪。

在此我想再次强调,尽管当年的那场人生观大讨论是一种时代的必然,但是对于许多参与者来说,之所以卷入那场大讨论,却或多或少是由于一种偶然的机遇。当“潘晓来信”发表时,我正在武汉大学历史系读本科三年级。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在阅览室翻阅杂志时偶然看到了“潘晓”的那封信。读后的感觉如同触电一般,情绪翻涌,不能自己,当晚即给《中国青年》杂志社写了一封致“潘晓”的信,第二天一早就投进了信箱。

后来我常常想,如果那个星期日我没有去阅览室,或者没有读到“潘晓”的信,也许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会完全不同。我本可以与那封信“擦肩而过”的,然而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遇,我却与那封

信“正面相遇”了。

当时我给《中国青年》写信，完全是出于一时的情感冲动，想与有着相似经历和感受的“潘晓”进行一番思想上的交流。我只希望我的信能够由《中国青年》编辑部转交“潘晓”本人（写此信时我还不知道“潘晓”是两个人的合称），绝没有想到这封信会被《中国青年》刊载，更没有想到此信刊载时被编辑部加了一个题目：《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原信本来是没有题目的，“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是我信中的一句话，编辑部以此作为我信的题目，倒也颇为贴切恰当）。当我的信以该题目在《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上全文刊载后，我立即就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推上了一个无可逃遁的角色位置。当时我在给黄晓菊的一封信中就明确写道：“由你和潘祎拉开序幕的这场大讨论，很可能将由我来扮演主角。”果然，从1980年第9期的《中国青年》开始，“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成为众多来信讨论的主要观点之一。许多来信对我的观点进行了激烈批判，也有一些来信对此表示理解和赞同。为了让读者更清楚地了解这封当时随感而发、后来却给我带来了许多麻烦的信函的内容，我将该信中的主要观点抄录如下。

1. 对自私的理解

自私是一个广义的哲学概念，它是动物的一种本能。在动物那里表现为自保，在人身上则表现为自私。自私是什么？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康德和黑格尔看到了这一点，认为历史就是在恶中发展的。

自私首先是一种自我发现：个人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意识到“我”的重要意义。以往的一切总体主义观念都是个体灵活被歪曲的结果，是个人本质异化的结果。十年浩劫中有个口号，叫做“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是多么野蛮的口号，那时却被人们普遍接受了。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的社会改革，都是由于自我发现而引起的。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哪一个不是以

个人自觉为前提?只有在充分认识和提高自身价值的前提下,社会才能进步。可悲的是,人类历史上自觉的时间短蒙昧的时间长,一种自觉否定了旧的蒙昧,又造成了新的蒙昧,所以费尔巴哈把人类的历史说成是宗教变迁史,不是没有道理的。拿我们国家来说,六十年代中叶掀起的一场社会动乱就是宗教狂热的最具体的表现。这是一种否定一切的宗教,是“革命的”宗教。那时候的偶像崇拜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蒙昧和长期的有意识的政治宣传使人们从内心里默认这种异化的社会现象,许多人甚至愿意为这种宗教而献身。这是内在的体验,是肯定的方面。另一面,法律成了人尽可夫的娼妇,权力意志的绝对地位使得监狱成了变相的宗教裁判所,法律(毋宁说权力意志)不仅要干涉人的活动和客观效果,而且还要限制人的思想和主观动机,因而,外在的压力也使人感到窒息。这是否定的方面。两方面的结合产生了八亿宗教徒,用喜剧的形式重演了苏联卫国战争前后斯大林崇拜的悲剧,给社会带来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浩劫。这场运动是怎样引起的呢?有人把它归咎于某一个人的意志。我认为这是中国人长期禁锢自我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舆论用总体压抑个人的必然结果。每个人崇拜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这种异化既是愚昧无知的结果,又是它的原因。人们狭隘地理解着自私,把它和吝啬、卑鄙、损人利己相提并论,另一方面也由于没有对自私的自觉而认识不到自己的真正价值和力量。他们只是消极地去理解自私,没有看到自私的积极意义……

总之,按照人的本性来说,自私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正当的权利。没有这种广义的自私,社会就不能发展,历史就不能前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同时人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着的,所以人首先应该是个人。社会的一切运动,包括目前正在进行的四化建设,都应该把活生生的感性的个人放在首位,运动只是手段,自我才

是目的……

2. 对生活的态度

由于上述对自私的自觉、对自我的发现,形成了我对生活的积极态度。我把生活当作斗争,不是像狂热时期所说的斗争,而是自我与环境的斗争。人生就是这种斗争的记录。我对生活的基本态度可以归结为两点:

第一是不合流。社会中确实充满了丑恶、虚伪,这种势力虽然很可怕,但它动摇不了一个充分自觉的个体。海明威小说中所塑造的“硬汉性格”就是我生活的楷模。我决心遵循“硬汉性格”者的生活态度去不停地探索,碰得头破血流也不回头。过去在农村中、在单位里,我一直坚持学习,为此遭受了许多冷嘲热讽。现在上了大学,仍然时常听到一些流言蜚语。而我毫不在乎,继续奉行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但丁的一句格言:“走自己的路,让人们说去!”……你应该去发掘自我,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

第二是进取心。我从来就是一个进取心极强的人……你在信中表露出自己的事业心,但是我也看到了你的悲观。你的作品,对你来说仅仅是一叶救命的小舟,这就与你前面说的用作品来表明自己存在的观点相矛盾了。你应该自强不息,确信自己是强者。你应该学会过平静的内心生活,把整个世界都放在心中,你就会发现自己在世界面前并不是软弱无力的……世界上确实“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它就在你心中!你之所以彷徨、苦闷,是由于你没有发现它;一旦发现了它,所有的累倦的感觉,出世的思想,绝望的念头都会消失。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接触到时代的“有力的臂膀”,你就会看到自己正在“搅动生活,影响社会”。历史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而人首先是个人。所以每个自觉到自己价值的人都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就是历史!”

今天看来,这封信确实充满了少年气盛的特点,情感的色彩远远多于理智的成分,其中不乏随意性的思想和偏颇之处。但是

整封信里却充满了真诚炽热的情感,没有丝毫矫揉造作的虚假言辞(坦率地说,如果我事先知道这封信会被《中国青年》发表,肯定会在言辞方面收敛含蓄一些)。而且信中所表露的人生态度是以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人生实践为基础的,在此后的近二十年里我始终奉守如初。无论受到外界的什么压力,我一直坚信“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这个基本原则,不屈不挠地以内在的自由意志与外在的决定论相抗争。

无论是在当年写那封信时,还是在今天,我所倡导的“自我”都是指一种开放和进取的主体能动性,而不是那种封闭性的和蝇营狗苟的个人占有欲。用那封信中的话来说,就是要“表现自己,发现个人的价值和普遍的人性……在外物上打下自我的烙印”,“这种进取不是为了功利效果,而是为了满足自我扩张和表现的要求”。我始终认为,与那种对自我缺乏反思和信心的消极人生态度,以及那种从狭义方面去理解自我的夏洛克式的人生观相比,我所倡导的人生观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它将使人在恶劣的逆境中保持一种不甘沉沦的意志和自信心,不断地向着神性的维度跃升。无论人们如何评说,我已经以自己的前半生证明了这一点,并且在不惑之年之后对此更加坚信不疑。

然而,这种“君子当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在当时却遭到了极大的误解,并且给我后来的生活带来了许多麻烦。那封信在1980年8月发表之后,暑假结束我一回到学校,就成为学校组织的各种人生观讨论会所针对的靶子。我原是一个很腼腆的人,喜爱沉思而不擅言辞,但是为了捍卫自己的观点,我不得不在各种带有浓重批判气氛的讨论场合中为自己的人生观进行辩护,从而培养了一种喜好辩论的习惯和滔滔雄辩的口才。然而尽管我在辩论中占有优势,一些无形的压力和潜在的障碍却开始影响我的生活,我成为受到学校“特殊关照”的学生。1981年,我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却被哲学系拒之门

外,不得不再度转到历史系读研究生。这件事对我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我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对哲学怀着一种发自生命的热爱。1977年底参加高考时,我报考的志愿就是武汉大学哲学系,当时却阴错阳差地被历史系录取。在读本科的四年中,我选修了哲学系的所有主要课程,1981年报考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又因为人生观的问题再度被拒之于哲学的神圣殿堂之外。此后一段时间,我曾一度陷于颓丧,但是顽强的自我意识和一种内在的使命感最终还是使我从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中重新振作起来。1993年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研究生,表明了自由意志对外在决定论的超越。这一坎坷经历恰恰也有力地证明了:“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

在以后的日子里,《中国青年》上发表的那封信成为我思想上“一贯自由化”的最初证据,它在诸如分配、提职和各种待遇等方面对我的现实人生造成的影响可想而知。我常常想,如果当初我没有参加那场讨论,也许我的人生之路会平坦顺畅得多。但是倘若人生的道路能够重新开始,我仍将像当年一样做出选择。既然我是自由地选择了人生之路,我就应当坦然地为此承担责任。

时至今日,我仍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自我意识的巨大能量对于我生命之泉的激荡,只是那泛起的涟漪已经由炽热的情感转化为同样炽热的思想。正是那场人生观大讨论,才使我对自我产生了反思,形成了自觉的自我意识。这自我意识一方面使我认识到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另一方面也赋予我对自己所处时代和世界的深切责任感。这种个人尊严和历史责任感,在我后来所发表的任何一部著作中都明显可见。虽然具体的表达方式不同,但是这些著作与早年发表的那封信之间却有着一种内在的默契或精神上的相通之处。我将以最近刚刚出版的一部著作《告别洪荒——人类文明的演进》的一段后记作我本文的结束语,来说明这种精神上的相通之处:

记得上中学时读太史公《史记》中的“项羽本纪”，书中说到项羽少时学文不成，学剑亦不成，其季父项梁怒而斥之，项羽却表示学文不过记名姓，学剑不过一人敌，而其志在于学“万人敌”。读后颇多感慨。当时少年气盛、心高志远，总觉得人生在世当如项羽一般叱咤风云，干一番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时至今日，当年的壮志早已被平庸岁月的风尘所淹没，及至“不惑之年”，更是义无反顾地准备将后半生固守于书斋之中，而将纷纷扰扰的外部世界抛置于脑后。然而壮志虽泯，豪情犹在，日日危坐书斋，有时竟如同身临千军万马的战场。思绪奔涌、下笔如泻时，亦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淋漓畅快之情，而解释历史时的那种心旷神怡的陶醉，丝毫不逊色于英雄们创造历史时自我实现的快感。事实上，解释本身就是一种再创造。让数千年来整个人类文明史中的精英豪杰及其所创造的辉煌业绩，遵从于某种文化精神和演化规律，或者说把那些显赫一时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解释为受某种形而上的“动机的动机”所驱使的历史现象，这是一种何等恢弘的“万人敌”！当黑格尔轻描淡写地把不可一世的凯撒、拿破仑等英雄人物称为“骑在马背上的绝对精神”时，他所体验到的那种无可言状的“心情”可能远远超越于凯撒从埃及凯旋时的骄矜狂傲和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场上胜利时的踌躇满志。

在学术和人生方面，我将终生奉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但丁的名言：

“走自己的路，让人们说去！”

显而易见，这段后记不过是在更高层次上对那封信中的思想的一种复述。

声 音

这里是“潘晓讨论”的原声录音，是感动过整整一代人的文字。这些文字带着眼泪浸着心血，推心置腹，披肝沥胆。它们是当年千百万人的心声，是六万多封珍贵来信的精选。它们都是写给那个叫“潘晓”的女孩的，不是情书胜似情书。那是一代中国青年思想的初恋，感天动地，轰轰烈烈……

关于“个人价值”的探讨

夏起光

很久没有读《中国青年》了，然而，这一次却不能不读。潘晓同志用自己曲折的经历和深沉的思考，很有份量地提出了“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引起了我对它的再次思索。青年总是从思想上寻求人生的答案，同时用自己的成长艰苦地探索着。这个问题的明确提出，将触动当代中国青年灵魂中最敏感的那一根神经。

正如编者的那些极有见地的话中所指出的，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进步的前夕，差不多都发生过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而当前这个问题的提出，“却带有八十年代的特定的内容”。

回顾人类的历程时我们知道，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就已经提出了“个性解放”的要求，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资产阶级革命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取得的成就，为共产主义的“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基础，这是马克思早已明确指出的。

然而，我国社会历史进程的特殊情况，使得我国社会长期处于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上，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在今天的生活中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在这种影响下，我国社会一直比较忽视人的价值。过多地压制个人的行为、甚至思想的一些基本权利，蔑视物质享受，轻视人们受教育的权利等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封建的道德残余时常以“正统”的面目出

现,传统的力量顽强地窒息和扼杀着新生力量。

这种情况不仅严重地阻碍着我国社会的现代化,同时在根本上与我们正在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目标相抵触。共产主义的目标在一方面就可以表述为“个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和谐的发展”,不言而喻,共产主义社会是高度重视个人价值的,这是历史前进的趋势。在那里,个人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互相谐调一致。要看到,社会是以每一个个人之间的关系的形式存在的,社会不断地向更高级的阶段发展,就是在不断地提高个人的价值。否定了个人的价值,实际上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的价值。那种贫困的物质生活和贫乏的精神生活,那种与此相适应的禁欲主义,即使与一种平等的、互助的集体主义的社会联系在一起,也只能表明还仅仅处于人类社会的非常落后的时期。不能设想,人民对于自己的价值没有充分的认识,却能够真正地充当社会的主人,并行使自己的主人的权力。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我国生产力迅速提高的客观要求,作为生产力的最主要的因素——人,开始要求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更高的文化精神生活水平和更高的教育水平,这是必然的。生产力作为根本动力,促使我们必须进行一系列经济制度方面的改革。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对个人的价值来一个重新认识,在政治制度、伦理关系和其它方面也实行改造,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正是在这一点上,潘晓同志的信反映的是一个意义重大而且深远的问题。

潘晓同志表达了这样一个看法: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这是有道理的,据我的肤浅的理解,它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一书中反映的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想有相通之处。

可是,这个问题不会就此完结,它的内容本身决定了必须深入下去。它带来了两个新的问题:首先,如何提高个人的价值?

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提高个人的价值,就意味着改善社会关系。人是社会的产物,没有社会的进步,个人就得不到相应的价值提高,这是由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关系所决定的。在想“洁身自好”的时候,潘晓同志不是感到很孤独吗?不是经常“随波逐流”吗?可见个人无法脱离社会而生存。个人的全面发展,有赖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公有制的全面的、实质上的实现。另一方面,“如同社会本身把人当作人来生产一样,人也生产着社会”。世世代代以来,人类一直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英勇斗争,不断地改造着自然和社会。人通过变革社会来解放自己的可能性,已经为人类的历史所证明是完全现实的。

其次,怎样才算提高了个人的价值呢?

随着社会的进步,个人的素质提高了,在控制自然和管理社会两方面都拥有了更强的能力和更多的权力;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得到了进一步满足,同时个人对社会承担了更多的义务;每个个人的存在,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这些方面的进步,大概都体现了个人价值的提高吧。

个人价值的提高,还表现在道德关系方面。生存的要求是人的最基本的要求,在人的生存斗争中,建立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以便更好地满足这种要求。随着人类的进步,这种关系更加全面和复杂,并表现为法律的、道德的等多种形式。它们逐步地具有了很大的独立性,以至于追求一种道德价值,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人们的基本需要之一。

在我们的价值观念中,损人利己是卑鄙的,而“利他主义”是崇高的。据我理解,问题的关键在于“利他”并不意味着否定了

“自我”。如果否定了“自我”，这种“利他主义”就失去了合理的基础。每一个为别人、为社会作出了贡献的人，都会得到一种崇高的满足。难道说这种满足不是仅仅属于他一个人吗？

我们谴责的不过是损害他人的行为。提高个人的价值，就是要通过改变社会关系，来逐步消灭这种行为。我们注重的是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调整好，尽管两者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但正是在不断地解决它的基础上，人类社会永远前进。

我想，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的话，潘晓同志就恐怕不会有“双重性格”的苦恼了。我们都是社会生产的人，生活在现实中，可以说成是“随波逐流”吧；同时，我们又都是生产社会的人，对社会不仅“谴责”，而且加以改造。人类的天性是不在乎矛盾的，这一切不就是生活本身吗？

潘晓同志对人生的理解和探索是比较深刻的。探索本身就表明了对于社会理想的追求，所有的苦恼都是因为这种追求才显露出来的。我认为，潘晓同志是在用一个较高的价值标准来要求现实，所以，信中尽管有种种苦恼和情绪，却渗透着一股积极的精神，不乏强烈的生气。我在想，如果全国的青年都象潘晓同志一样来有意识地探索人生，那该是一个多么充满活力，鼓舞人心的局面啊！

潘晓同志的信中还透露出了一种对于原有理想的幻灭感，这在青年中间是有一定代表性的。由于多年来极左思潮支配下的宗教式的虚幻的宣传，由于十年动乱暴露了社会和人的关系的丑恶的一面，由于人们终于发现我们的社会还远非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因而，阅历不深的青年们迷惘了，失望了。但是，我仍然认为这不是一种坏事。它教训了青年，使他们不再仅仅成为满腔热情然而却头脑简单的驯服工具；它使青年对于人生和社会有了真正的理解，或者说开始真正地理解。

潘晓同志向我们的哲学、社会学的理论家们提出了严肃的

挑战,事实上,这个挑战是现实生活提出来的:你们给青年的应该是科学,而不能是空洞的说教!

最后,我自信很能理解潘晓同志在生活道路上的遭遇和挫折。不能想象,一个永远追求的人会不遭遇痛苦;也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品尝过痛苦的人会有高尚的情操。如果没有痛苦的雷雨,太阳的炎热就会使灵魂枯萎。我总是为那些充满了欢乐与悲哀,幸福与苦痛的经历所激动,所鼓舞,而希望总是在绝望中再生。——生活确实是美好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永不间断地从实践上和精神上探索生存意义的英雄史诗。我一直很喜欢《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译者傅雷先生的一段话,并乐意再次抄录于此,赠潘晓同志并青年朋友们:

“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6期)

“窄”是“宽”的前奏

——致潘晓同志

素不相识的青年朋友：

读了你的信，很有感触。

你的信证明，你是一个诚实的人。你表达了自己——实际上是今天中国青年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真实思想和感受。

我也是个青年，也曾有过同你类似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演变过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由虔诚地迷信“革命词句”，憧憬“英雄业绩”，到狂热地追随激烈行动，盲目地寻求献身的庄严时刻，直至在生活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进而转入怀疑、彷徨、苦闷，这几乎成了共和国诞生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必经的历史过程。绝大多数二三十岁的青年人都不不同程度地领略了这一段征程的滋味。这决不只意味着个别青年的特殊命运，而是赋有显而易见的历史必然阶段的时代特征。关键在于，如何认识我们的过去，和如何走向未来。

我认为，尽管你表面上对过去的天真幻想给以否定，对过去所赖以寄托的精神支柱予以扬弃，实际上你的世界观的核心仍旧抱住旧有的思维范畴不放。你明知过去那些幼稚的想法多么虚无缥缈，可又看不到新的光辉，得不到新的促人奋斗的思想。因此你苦闷，在寻求新的出路中徘徊。你仓促地得出了与过去同样偏激的结论（也许你自己也未必相信）。而这一切，实际上只是对无可弥补的破镜的哀怨，对故我的无可奈何的告别。

我们许多青年人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或则“全部”，或则“全无”。当我们由书本所形成的理想与客观现实不符时，那么一切都完了。或则是承认我们的理想境界完美无缺，神圣不可侵犯；或则是承认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弊病是命运主宰，甘心听从于命。两者之间，只可择一。总之，不是僵化就是毁灭。可我要问：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思想的不断变革、更新作为我们正常的精神生活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批判地继承前人的优秀思想，深入了解身边新的现象，研究这个新的社会机体的各种问题，从而得出与历史发展规律相符的新的认识作为我们历史的责任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建立新生活中寻求乐趣，在用我们自己的双手创造日益增多的物质福利和精神享受中获得幸福呢？我们这一代人似乎一出世就注定要“遭难”，但我们活着不是为了遭难。青年的宝贵正在于她有总结历史教训、创建新生活的优越条件，这是老一辈人无法比拟的。创造才有生命！

潘晓同志，你对过去的天真作了勇敢的批判，你认识到那种思想指导下的生活之路愈走愈窄，这的确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中国有多少青年实现了这个关键的进步啊！这是从现代迷信、僵化的教条思维走向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可喜步骤。为了完成它，我们青年和全体人民一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要呼喊的是：再向前走一步吧，穿过窄路，就是无限广阔的天地！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这应该成为当今中国青年的座右铭。无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粉碎“四人帮”后所带来的巨大变化，都只是为我们开辟了认识真理、创造美好生活的广阔道路，而决不可能是完结了真理和把现成的美好生活奉献给我们。

让我们执着地追求真理，忘我地奋斗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生产方式迈上新的阶梯，中华民族行进在新的长征路上，中国青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将焕发新的光彩。美好生活永

远属于勇敢进击的人！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诚 石

（原载《中国青年》1980 年第 6 期）

我们在天注目讨论的命运

方冀生

读了《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一种关注之情油然而生。我已经很少再去回忆自己的过去，不愿意去想那些坎坷和痛苦，而潘晓的信竟引起了如此巨大的共鸣，好象过去的、模糊的“我”突然异常清晰地、不带任何伪装地站在了自己的面前！其实，何止是我，众多的青年不都是可以从潘晓的人生历程中找到一点自己的影子吗？我作为一名基层团干部，十年来目睹了社会的变迁和它对青年们的影响。错误路线虽然纠正了，但它给人们留下的创伤却是深刻的。生活中一系列问题迫使青年们不能不重新思索：“人生”到底意味着什么？有理想的青年在失望后徘徊；随大流的青年也在无聊中琢磨。大家都在想。区别只在于：有的人是主动地、自为地探索，有的人是被动的、自在的思忖。有谁能脱离生活的现实而投入世外桃源呢？这场讨论深深地搅动了青年人的心。

对潘晓信中的一些观点，我并不完全同意，但它不是什么反面典型。不是先进的，也不是落后的，它是现实的，是如此现实地产生于我们社会政治、经济的基础之中。探索人生，必须从讲真话开始。潘晓的思想，真实地反映了相当多数青年的思想发展过程，她是这一代青年探索人生道路的一个缩影。在潘晓身上有着许多可贵之处：她刻苦学习，读了很多书；她勤于思考，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疑问；她直言不讳；她不甘沉沦，带着矛盾的心理在人

生的路上搏斗、坚持、寻找。问题不在于一个潘晓，而在于众多的象潘晓这样的青年，犹如缺少氧气和水一样，在人生的大海里渴望着精神食粮……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培养青年的意义上说，这些都是值得珍惜的。

然而，讨论将如何进行呢？编辑同志，我和许多青年在关注着这场讨论的命运。批判吗？围剿吗？不！打了潘晓，就打了我们这一代青年，就打了青年们的心！对潘晓文章的讨论，只应该是平等的、科学的探讨，而不能是虚伪的、围剿式的。以往那种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实际，少数人定调子，不管青年们心服不服，随意打棍子、扣帽子或空讲大道理，最后以刊登典型人的违心的检查而告终的情况，应当永远过去了。人生观——“公”与“私”——“公”多么高尚，“私”多么丑恶，这样的简单重复只会使青年们心灰意冷，而不会使人信服。

今天的青年，有着八十年代的特定气质，有着深刻而丰富的精神追求。而人生观，作为生活实践在意识上的反映，从来就不应该是干瘪瘪的几句言辞，而是深刻的丰富的生活理论。就青年来说，不仅要知道为什么生活，还要知道怎样生活。他们不愿再听“应该往东”或“应该往西”的简单说教，而要在人生的道路上学会怎样爬坡，怎样涉水，怎样穿越荆棘，学会驾驭生活的一套真本领。只有能在实践中指导我们不畏艰险去掌握这些本领的人，才真正是青年的朋友和导师。

最后我想说，对于一种从实际中来的、科学的、制胜的人生观，广大青年是会渴望和追求的。它将激发青年们斗争热情和生活志趣，造福于社会，给人们带来无限幸福和广阔的前途。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6期）

“为自我”又岂能“为别人”

侯爵良

读了潘晓同志的信，知她是一位“不甘心浑浑噩噩、吃喝玩乐了此一生”的青年，很想有所作为，在苦心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她原先相信“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活得更美好”；后则认为“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两个答案是如此地对立，哪一个正确呢？我们认为，当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前者反映了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后者反映了剥削阶级的人生观。

潘晓同志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前后迥然不同，为什么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她经不起生活的挫折。当她尚未步入社会，还在书本里讨生活的时候，她是带着微笑看生活的，不了解现实社会本来存在着的复杂情况，只看到光明面，未看到阴暗面，用幻想代替现实，以为既是社会主义就应该是完美无缺的。当十年动乱，“生活的打击”向她“扑来”的时候，她毫无思想准备，感到突如其来。于是在“生活的打击”面前，她皱着眉头看生活，用“冷漠的眼光”只看社会的阴暗面，不看光明面，把少数人的自私、丑恶，夸大为现实中的一切人都是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进而断定“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为此，她改变了原来的观点，由一个阶级的人生观跳到另一个阶级的人生观，公开主张“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这是一种动摇，我为潘晓同志惋惜。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同的“生活的打击”，这是常有的事，不必惊怪。我

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其他的志士仁人在其奋斗的一生中，所遇到的挫折、打击、苦难，远比潘晓同志所遇到的那些伤心事要多得多，严重得多。但是，他们并未因此而精神颓唐、情绪低落，相反，挫折和失败磨炼了他们的意志，在艰难困苦中扬起了头，挺起了胸，朝着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奋然而前行。如果不是这样，还能算无产阶级的“强者”吗？“强者”的可贵之处乃在于不为意外的挫折而动摇自己的理想和人生态度。潘晓同志说，“我处处想表现自己是强者”，这很好。“强者”就要经得起生活的挫折，在鲜花与荆棘并生的革命征途上，要迎着鲜花，踏着荆棘前进！

我想，潘晓同志会认识到“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人生态度是错误的。有这种人生态度的人，总是一事当前先为自己打算，动机和行为都是自私的，为自己出人头地，为自己争名夺利，为自己活着。如此极端利己主义的行为非但不能“为别人”，还往往会不择手段地损害别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曾见过“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先进典型，其原因就在于“为自我”与“为别人”是互相矛盾的，二者不可得兼。所谓“客观为别人”只不过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遮羞。

我相信，作为探索人生意义的潘晓同志，终将会接受无产阶级的人生观的。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6期）

来自生活的思考

安 文

青年在研究人生，研究社会。新世纪的青年，渴求新的精神养分，用自己的思想和语言开拓自己的园地，进行自己一代人之间心灵的交融，这是很可贵的。但是，潘晓同志，我对你的钦佩还不仅限于此。彷徨是前进的起点，怀疑是真理的先导。在这个意义上，你的信及围绕它而必然出现的思索和讨论，标志着《新青年》火炬的接力者，四化大厦的建筑师正在成熟。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从未相逢，却似乎早就相识。英雄的故事，保尔的名言，闪光的日记……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家庭的不幸，经历的坎坷，境地的悲惨……这些心灵的伤痕——你的信使我看见了自己。“由紫红到灰白……由希望到失望、绝望……”“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我完全了解你的心情，同情你的遭遇。生活的美酒对一个青年竟然失去了它的芬芳，不是很可悲吗？然而，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命运不一定产生共同的思想。恕我直言，你的结论我是不能同意的——在你的信中，我又看到了非我。

有位苏联作家写过他那个国家的《人世间》，我们的人世间还没有人写。可是，要寻求人生的意义，却非要了解我们的人世间不可。你说：“眼睛所看见的事实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我也曾责怪我那些老八路长辈和启蒙的师长，为什么把社会说得那么辉煌，把人生说得那

么美妙,把理想说得那么灿烂,为什么要我把“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作为人生观,以致于一旦卷入生活的漩涡,我就看不到冠冕堂皇中的卑鄙龌龊,甜言蜜语后面的冰刀霜剑。然而,他们不是也被自己的说教无情地嘲弄了吗?责难他们有什么用呢?我也曾在书本中寻觅,向别人请教,同样得不到安慰和解答。至于老祖宗,我是曾经把他们作为我之所以落难的灾星,不愿问津的。然而,老祖宗却自己找上门来了。由于我的专业,迫使我学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头。我终于明白了,我们的不幸就在于我们认识的马克思是被骗子们用实用主义歪曲改造了的马克思。领袖被神化了,成了神化领袖的人的护身符。科学变成了宗教。这就是我们时代的悲剧的症结之所在。

青年人喜欢说“看透了”,其实我们什么也没看透,因为我们对真正“看透了”人世间的百科全书连ABC也不懂。既然悲剧的年代已经过去,要拉开新时代的帷幕,要解脱并新生,不请教老祖宗怎么行呢?可是你却抬出了达尔文。达尔文主义在它的领域里是真理,超出这个范围,就会被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人与动物,毕竟有质的区别。如果生物进化规律也普遍适用于人类了,人类只好再去茹毛饮血,这种退化怎能令人忍受呢?

其实,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统一体,我们的社会当然也交织着光明与黑暗。这好比年有四季、日有昼夜一样,无须忌讳,也无须诅咒。组成人体的细胞中就有癌细胞,人总不能因有癌细胞就不活了,社会也不会由于有弊病就一塌糊涂。问题在于,不能让癌细胞聚成“四人帮”之类的恶性肿瘤。看问题最忌片面性,完全光明或完全黑暗的社会是没有的。有的只是光明与黑暗比较,是光明占主流还是黑暗占主流的社会。我不否认,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应该说,是青年时期的聂赫留道夫,后期,他已经转变了)式的人物,在当今社会也可以找到成打的原型;但同样不能否认,葛朗台的存在并未抹去少女欧也妮的纯真,聂赫留道夫的

存在也未减少卡丘霞的魅力。难道可以因现实生活中还有葛朗台、聂赫留道夫之流,就否定张志新的坚贞吗?即使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在数量上今天并不比过去更少些,但在大师们笔下,他们受着上流社会的推崇,而今天则为社会、至少象你这样的青年所不齿,这不正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吗?尤其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存在弊病,这是事实,但社会主义的伟大使命恰恰在于消灭它们。

实际上,你所看到的人世间的丑恶,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得不从旧社会承继下来的遗产之一,是一种质上改变了,量上也正在减少的一段历史时期的现象。你遭到干部的报复,这是颐指气使的家长作风;你的好友打小报告,这是“四人帮”封建法西斯从明代东厂特务沿袭来的整人制度的影响;你那个缺德的男朋友则是“门当户对”封建联姻思想作祟。这都是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表现。把救火的人说成放火是冤枉,要旨在消灭旧社会的新社会代旧社会受过,岂不荒唐!当然,消灭旧社会的痕迹有个过程,在这过程中,我们党也会有缺点错误。比如,过分地甚至歪曲地强调了批判资产阶级及其思想,但忽视了反对封建主义,使得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钻出来的“四人帮”封建法西斯王朝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钻出来了,至今创伤累累,积重难返。黑格尔的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在哲学上是能给我们以辩证法的启示的。一切丑恶的现象,作为现实存在的东西,总有它历史的和逻辑的理由。我们社会的丑恶现象虽然与社会制度本身没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但同这种制度,还没有强大和完善到能够最终消灭这些丑恶现象产生的经济和政治根源有关。但我坚信,这一天是会到来的。因为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但不会永远合理,也就不会永远现实;凡是合理的即使现在不是现实的,也必将成为现实的——这,就是我对我们的人世间的认识。

潘晓，你尽情宣泄了你的苦恼，我仔细想了一番，总觉得你的苦恼，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孤独感。这就涉及到如何看待周围的人的问题。我也曾嫌弃过周围人的“俗气”，与其加入他们粗俗的谈笑，不如躲进自己的孤寂中。今天，我不再以为这算什么高尚。你读过高尔基的作品。高尔基怎样对待人民呢？他所塑造的人物大多是下层社会的劳动人民，尽管粗俗污秽，但真正同情与关心他们的高尔基，向读者展现了他们出污泥而不染的善良正直的心和他们在痛苦呻吟中的希望与理想。他的现实主义不意味着悲观，而是给人以向上的勇气。在现实生活中，高尔基笔下的人物比比皆是，我们有没有高尔基的感情呢？这是颇值得深思的。

我认为，你的孤独，与其说是事实上的，不如说是心理上的。“她们”不是批评过你的清高和乖僻吗？不是问过你想不想独身吗？这就不是“漠不关心”了。况且，同志之间的友爱和同情远非止于此，许多日常琐事往往不起眼，叫做：感觉到的东西不一定能深刻地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深刻感觉它吧。有这样一个青年，历来被我认为“本质不好”的“候补阶级敌人”。一次看《吉鸿昌》电影，当吉鸿昌就义前长叹：“我灾难深重的祖国哪一天才能富强起来”时，他竟哭了。这对我震动很大。我想，他或许有愧于先烈，或许……我感到他心灵上仍不乏美好的东西。我又想起，过去我不适当地处分过他，打倒“四人帮”后，个别干部想借此作文章，以报我批评他作风不正派之仇。然而这个青年却对别人说，自己是有错的，人家为了公事，过火点也是可以谅解的。这么一联系，我就觉得他作风上散漫一点，并不是“本质”问题，就乐于同他接近了。正如鲁迅的《一件小事》告诉我们的那样，劳动群众没有贵族高雅的谈吐，手上也没有贵族的白手套，但他们有一颗黄金的心和一双勤劳的手。一滴水在阳光下是五光十色的，一个人的性格、行为，在社会中也是极其复杂的。不要

说百分之百的革命群众,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也是没有的。第一个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定胜利的马克思,对发生在脚下的事情也有失算的地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斯大林,有时也粗暴得似乎不近人情。但是,有缺点和错误的革命导师仍然不失为伟人。

你觉得自己是个双重性格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人都是具有双重性格的:一重是优,一重是劣。完美无缺的人只好等上帝创造。我反对把杰出的人神化,但也不能同意你把“所有堂皇的圣人、博识的学者、尊贵的教师、可敬的宣传家们”都说成“为私欲而斗争”,从而断言“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不能因为你被朋友出卖便不相信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最真诚的友谊,也不能因为你那位缺德的男朋友而怀疑马克思和燕妮的伟大的爱情。过去的宣传把杰出人物说成是石头缝里蹦出的齐天大圣是不对的,但把他们贬为庸人也是不公平的。没有“忘我”的罗伯斯庇尔,一个小律师怎么能成为建立雅各宾专政的革命家罗伯斯庇尔呢?没有“高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怎么能成为把人类眼光引向未来的伟大向导呢?每个阶级都需要并存在忘我地为本阶级服务的人。无产阶级更是如此。

你觉得周围的人谈笑粗俗,对这个现象必须作历史的分析。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积累造成的社会两极分化: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这是一般规律。你憎恶的东西,首先由于人民在旧中国遭受的举世罕见的剥削和压迫造成的不文明,其次由于新中国的经济文化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毕竟还来不及造成足够的文明。前者应当使我们这些有幸受了点教育的人同情和谅解;后者应当激起我们这些有点文化的青年人的责任感。任何讥嘲和嫌弃只会成为使自己被劳动人民讥嘲和嫌弃的理

由。况且日常粗俗的谈笑绝非都是低劣的,劳动人民豪放粗犷、爽朗真挚的品格往往寓于其中。目前,我国物质和精神文明比较不足的是那些粗俗的劳动者,但他们也是物质和精神文明条件的积极创造者。就在我们周围,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痛苦和不满,有的更甚于我们。我们是应当尊敬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怨天尤人的人呢,还是那些用劳动的欢笑抚平心中痛苦和烦恼的人呢?你有很好的文学基础,如果你的文学作品不仅表现你个人的存在,而更多地表现你周围的人的存在,用你的笔让人们在他们的平凡中看到伟大,你的生活,你的事业不就是十分美好的吗?如果你的笔下,出现身边的一位妇女,手里既要拿扳手又要拎菜篮,收入不高,一家人挤在阁楼上,但她照常微笑,一边计划着怎样提高产品质量使国家增产增收,一边设想着如何使一家人生活得更美好。那么,至少是我,一定会深受感动,觉得这样的劳动人民才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真正实践者。我们有什么理由责怪她的谈笑不高尚呢?又怎么能不衷心祝愿她越笑越甜、越过越美呢?

潘晓,你到过海滨吗?看吧:狂暴的海涛轰击着堤岸,石砌的海堤岿然不动,海潮无可奈何地缓缓退去,卷走了零乱的小石子……一个人如果始终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他就永远不能同人们一起筑成抗击海涛的大堤,却会象零乱的小石子,被退潮卷进大海。潘晓,你记得列宁曾劝说高尔基走出彼得堡吗?我觉得,你也不妨走出你的“彼得堡”,从人为的自我隔绝中冲出来,投入到“她们”中去,成为由“她们”筑成的“大堤”的一分子。只有当你不仅感到需要生活而且生活也需要你的时候,你的人生才会具有全新的意义。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7期)

从抗争到开拓

潘晓：

我和你一样，在多灾多难的生活道路上曾碰得头破血流。我的心似乎早已麻木了。它静静地存在着，悄悄地跳动着，默默地维持着被抑制的能量。这颗心，已经失去它稚气的光泽，“青春”之类的咏叹已很难激起它的共鸣。但你的信使它震颤了，使它剧烈地搏动了，它再也不能恪守它的沉默了！

我小时候是个既令人喜爱、又令人讨厌的调皮孩子，但可敬的师长们还是在我的脑子里刻下了善恶是非的深刻印记。在中学，虽然由于我的任性而使老师大伤脑筋，可在我的心灵深处，燃烧着对美的炽热的爱，深藏着对丑的切齿的恨。

我也曾思索过人生。在中学的第一篇作文里，我这样写道：“如果我有可能选择死的方式，那么我决不甘愿在病床上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死的场所只能是战场。”我把生命和理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想成为一个这样的英雄：作为革命志士当之无愧，作为庶民百姓出类拔萃。我暗暗下了决心，为了崇高的目标马不停蹄地干下去，干一生。

然而，这幼小的信念还没有发育成熟，一场狂暴的灾难就席卷而来了。六六年八月，在一次震惊全省的动乱中，我一向崇敬的父亲被戴上五尺高的帽子，挂上二十多斤重的木牌，在疯狂的斗争会上被宣布罢官。转眼间我成了走资派的狗崽子，被遗弃在

红卫兵的行列之外。紧接着就是无休止的抄家、游街、绑架、鞭笞、粗暴的人身侮辱。祖父和外祖母都被驱逐到了农村，不久就死在故乡。父亲被折磨得生命垂危，母亲精神失常、半身不遂。父亲的工资扣发了，我们不得不卖掉最值钱的东西，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我们兄妹八人随时可能成为举目无亲的孤儿。我们战战兢兢一分一秒地煎熬着自己的生命，随时等待着毁灭。

六八年，在一次新的狂潮中，我又被席卷到农村。从那以后，我开始用自己的双脚跋涉一条屈辱和艰难的道路。刚到农村，我就受到了特殊的“关照”。我喂过猪，掏过粪，当过染匠，当过扛麻袋的力工……所有别人不愿干的活儿都少不了我的份。数九寒天，我要在每天早上砸开染缸中厚厚的冰层，把一块块碱水浸泡的布捞出来。刀子一样的凛冽寒风把我一双被碱水浸蚀得乌黑的手割出道道血口。我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偷偷流下伤心的眼泪。没人敢怜悯我，没人敢同情我，只有呼啸的北风和漫天的飞雪陪伴着我。多少次，我在睡梦中被冻醒，睁眼一看，被子上已经一层霜雪……我不相信我能熬过这个漫长的冬天，我估计我的生命力无论如何也难以支持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偷偷写过遗书，那时，我才十七岁……

然而生命并没有象我想象得那样脆弱，我活过来了，但坎坷不平的道路并没有走到尽头。招兵时，我踏破了征兵办公室的门槛，用颤抖的双手捧上写着“以我血表我忠心，以我血荐我当兵”的血书，但因为我是走资派的儿子，血书被践踏在地下，我被推出门外……

大学招生时，正是阴雨天气，我奔走在公社和县城之间。风雨中我折了三个来回，赤着脚走了四百八十里。脚被划破了，斑斑血迹渗透了泥泞的道路，但因为我是走资派的儿子，我连报名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当我浑身透湿回到低矮的小屋时，我几乎绝望了。

但我很快又从绝望中挣扎了出来，我小时候深藏在心中的志向并没有被残酷的岁月磨灭掉，它一直点燃着我生命的火花，始终以它的反抗来证实它的存在。多少年来，我经历了无数的艰难曲折，走遍了半个中国，当过农民，当过工人，当过战士，当过汽车驾驶员，当过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当过队办工厂的主管人，当过采购员和技术员……我吃尽了苦头，碰得焦头烂额，但生活并没有改变我的基本性格，而是把我锤炼得更加顽强有力。我翻阅了大量的书籍，写了大量的文章、笔记和信件。我看到的不仅是我，而是整个社会。我在思考，我在探索。我竭力去发现社会的真象，不是为了适应它，而是为了改变它。正是这种包天之胆，使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农村，我因为怀疑林彪而受到过追查；在部队，我因为对江青不满而受到过恐吓。但我并没有畏惧，我继续剖析着社会。不知有多少好心人对我好言相劝，而我全然不顾，依然在探索的道路上只身前进。为此，我终于受到了一次骇人听闻的迫害。由于坚持原则触怒了某个领导，七三年底的一天，我被注射了六针冬眠灵，在全昏迷状态中被抬进了精神病院。当我醒来时，已被囚禁在四面高墙之中。在这里，我被关押了四十天。然而我没有屈服，我思考着的头脑并没有被摧毁，我手中的笔并没有停歇。我曾在笔记里写道：“中国的安定团结，与张、王、江绝不共存！”“同这一类人将有殊死的斗争，这是可以肯定的，我已下决心同他们干，干到底，干到死！”

我的力量究竟来自何方？不是来自那些空洞的教条，而是来自于人民，来自对人民的苦痛与命运镂骨铭心的关注和由此激起的责任感。

七五年，我们到新疆执行任务，途经甘肃农村时，我看到了用泥巴糊起来的房屋，看到了衣不遮体、面黄肌瘦的孩子们。我哭了，我把自己的面包、干粮全部送给了他们，并用自己的笔愤

怒揭露了那些不顾人民死活、牛皮吹破天的家伙们。当河南发生特大水灾的消息传到部队，我又一次禁不住对着戈壁滩放声大哭。我不曾为自己所受的打击流过眼泪，可对身受灾难的人民，我不能不声泪俱下，象个软弱的女孩子。我把自己仅有的一百元钱寄给了灾区。不久，我又提出到灾区落户的要求。那时，在我的档案袋里还装着厚厚的“反革命”的材料。

“四人帮”粉碎后，省委落实政策，把我从农村调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十几年的漂泊之后，除了精神上不可磨灭的创伤之外，我一无所有，孑然一身回到了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一切又从头做起了。

我个人的遭遇是不幸的，但我常这样想：如果我是街头的乞丐，如果我是捡煤渣的孤儿，如果我是被摧残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相比，我的不幸又算得了什么？他们同样生活在自己的国土上，他们同样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可他们的存在为什么要受到无情的蔑视？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作为共和国的公民，我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责任？抗争，同恶势力抗争！正是这种责任感给了我无穷无尽的生命力，使我能一次又一次地在困境中崛起。

严酷的生活可以使人油滑世故，也可以使人绝望毁灭，但它还可以把人锤炼成铁臂铜头！我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它不是在分享者的私囊里，而是在创造者的双手中。生活就是创造者的艺术。对丑恶和黑暗，我决不想去适从它，而是要埋葬它。也许到头来被埋葬的是我，但我的心是永远不会死亡的！

人不是一般的动物。他生活在客观世界中，又在创造着客观世界，与此同时，人也在创造着自己。光阴流逝了几千个年头，羊还在那里吃草，蚕还在那里吐丝，自然界的变化多么微乎其微啊，可是人却从刀耕火种进入了原子时代。这就是人异于一般生物而独具的特征。

我并不否认你所说的人本主义曾在历史上写下过光辉的一

页。我也并不否认个体的奋斗精神的可贵性。但现代的社会生产力已经远远不是个体经营的小生产了,而是高度社会化的大生产。原始的劳动曾创造过原始人,中世纪的个体劳动曾创造过中世纪的个体小生产者,不言而喻,未来的完全社会化的劳动必定会创造出完全社会化的人。现代生产力正在创造这样一种社会:人不是在实现自己的个体时,客观上实现了整体,而是在实现整体中实现了自己的个体。完全的个人奋斗的时代终将过去,这就是现代的价值观念和人本主义的区别。

当然,我们还必须承认,在我国,被人本主义批判过的某些陈旧的信条,还顽固地存在着;封建主义腐朽的“国粹”还被一些顽固不化的人视为法宝;旧的生产方式遗留下来的陈渣陋物还拥塞在社会的许多角落,压抑着人们的创造力……如果不把这些垃圾扫除干净,无论我们民族的整体还是其中的个体都不能抬头挺身。对这令人痛心疾首的现实,用人本主义的狂风暴雨去冲刷一下是无可非议的,但人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它最强盛时期的生命力了,它并不代表未来的曙光。新的历史使命只能由当代的新兴力量去完成。处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的中国青年,若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强者,他就应该把自己置身于人民之中。不错,太阳是以自己的存在为前提,把光和热散发给广阔的太空,但它的前提的前提是早已存在的无边的宇宙!

的确,现实是严峻的,但是,社会毕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的信的发表就是明证。是谁推动了这变化?是谁给了我们说话的权利?是人民。失去了人民,我们会象离开大地母亲的安泰,纵然强悍无比,也会死到临头。的确,善良的愿望有时会被社会的丑恶面所扼杀,怎么办?投降还是反抗?难道我们不应该从张志新、史云峰那里得到鼓舞和启示吗?没有他们用身躯为后人开辟道路,能有我们的今天吗?不管新的变革时机是否成熟,就是历史的渐变也需要有人去推动。我们决不应该忘掉自己的责任:

作为一个创造者，我们应竭尽全力；作为一个开拓者，我们应无所畏惧。即使我们碰得粉身碎骨，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用心血铸成的遗产，一串向前迈出的脚印。

我们无疑都是不同的个体，但我们绝不是荒岛上的个体，而是民族中的个体，国家中的个体，人类中的个体。“自我”是伟大的，但它只有在不断完善中，才能得到光辉的实现；“自我”是伟大的，但它只有在为整体的奋斗中，才能得到光辉的实现；个性是伟大的，但只有在共性的解放中，它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

你的朋友 韩 方于开封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7期）

来信来稿摘要

怎样认识社会——是“现实处处使人失望”，还是“既有假恶丑，更有真善美”？

在十几年飘泊不定近乎流浪的生活中，我接触到社会上各阶层的人们，看到了这个社会存在的各种东西。我在看到丑恶狰狞面目的同时，也看到了脚踏实地勇于进击的战士的脸庞；我看到了社会的黑暗面，那是因为光明面在做比较；我看到了虚伪，因为真实是它有力的反证。

——河南安阳 李鸿林

潘晓同志披露了社会中的一些弊病，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些呢？这些弊病是建国以来始终盛行，还是十年动乱时期甚嚣尘上？我们觉得，“文化大革命”十年，不能等同于前十七年，也不能混同于粉碎“四害”以后的时间。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坏人得志，好人受气；少数人肆虐，多数人受害。这幕“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人间悲剧决不是前十七年以及今后的社会写实。

——安徽芜湖 强昌财 华正东

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今天，在打倒“四人帮”不到四年的时间里，给右派改正，为“四五”运动平反，纠正冤、假、错案……使许

多绝望人绝处逢生,展现出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前景。他们砸碎枷锁,走出“牛棚”、监狱,顾不上平敷创伤,没有功夫叹息,真正“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投身于新长征。比一比,我内疚了。看来,探索人生,不能躲进自己的孤独之中。否则,时代前进的臂膀伸向了自己也会错过机会。

要是在四年前,你的信所提出的问题绝不会交青年们自己来讨论,只会交法院审判。可是今天,象受了伤的孩子,我们可以在“妈妈”面前诉说自己的委屈,甚至发泄自己的怨气,敢于掏心里话了。这证明社会公德、民主权利正在恢复。当然,十多年的—场浩劫,我们民族的内伤不是能马上痊愈的,“妈妈”还有难处。正是由于这一点,才需要我们青年继续奋斗。

——广西南宁 熊楚才

我对潘晓同志对人生意义的一些看法非常赞同和欣赏。我同样认为:如今社会上的人们是为私利而活着,离开了私利,人们恐怕就会象没有油的汽车一样发动不起来。别人会说:“雷锋同志不是无私地生活了一生,并因此赢得了别人的尊敬吗?”面对这个问题,我只能说:“雷锋同志固然可敬,可在现实生活中有几个雷锋呢?我从没见过一个能及雷锋同志二分之一的人,更不用说雷锋式的人了。”

——江苏南京 朴 雾

潘晓信上的观点有许多是我的观点。什么“现代化”、“为解放全人类而贡献出自己的生命”,那完全是骗人的话。现在有多少青年能在工厂拼命地干,又有多少青年是为革命而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呢?一句话,不是为了奖金而工作,不是为自己的前途而学习,又是为了什么呢?实现四个现代化,那是人们共同的理想,然而理想并不是“现实”。而现实呢,处处使人失望。

——四川自贡 伟 强

应当承认,人确实有自私的一面,正如我们敢于正视人生有丑恶的一面一样。但也要承认,高尚的人是有的,而且是不不少的。当然,有时候他们的言语、行动也自觉不自觉地涉及到“自己”的,但我认为这不能笼统地叫作自私。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证明了这点,自卫还击战中新一代最可爱的人也证明了这一点。还有黄继光、邱少云、张志新、吕士才……多少人为了人民的利益而不惜把生命置之度外。正是在生命攸关的时刻,他们真正虔诚地服从了潘晓同志所说的“平日挂在嘴头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

——广西玉林 浦 波

要善于发掘人的心灵,善于深刻地了解人。生活中既有看不完的假恶丑,更有数不尽的真善美。在你自己的生活经历中,不也有好同学患难相助,有街道干部真心的同情吗?

——北京 金 谊

历史是人类写就的,而人类本身却是不完美的。人类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不断地抛弃“为我”的本能,而达到一个理想的境界——这就是共产主义时代的人类。所以,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人类的本身,既创造和改造人类自己,又创造和改造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有理由去抱怨它;没有一个现实,可以有理由去憎恨它。我们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就是要敢于向生活宣战,就是要勇于与不合理的现实搏斗。一个人是一盏灯,但每个人都发出了光,社会就光明了。

——江苏南京 李 鸣

人生的道路怎么走——为什么而奋斗?碰到曲折怎么办?

人生要有理想，而理想是与奋斗同胎而生的。人的生活本身就是这样：既充满着光明、希望与欢乐，也可能产生黑暗、邪恶和痛苦；有风调雨顺之年，也有天灾人祸之时；有顺利与成功，也会有挫折与失败。人活着，就是为了战胜困难，扫除障碍，推动社会的前进，改变不合理的现状，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开拓新的更为丰富的生活。

——湖北麻城 周汝茂

人活着，就要有价值。而人生的价值只有在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上才能展现出来。

——江苏无锡 许少君

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当你的创造给人们带来福音的时候；当你的创造表达了人们心声的时候，你就会得到社会的拥护，也会得到人们的温暖，你也会真正体会到一个人活在社会上的价值，人生是多么有意义，你的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广。

——广西柳州 冯焕群

我们应该提倡“人活着，要对社会有益”的思想。一番革命事业，一项科学成果是对社会有益的。一件实际工作，一篇准确揭露社会阴暗处的文章，乃至一句真话，也都是对社会有益的。

——上海 诸培奋

我认为，人生道路就是为金钱、地位、个人幸福。根本不是象自己过去说的那样、想的那样：人活着，就是为着他人的幸福、他人的利益、他人的需要。在目前的现实社会中，就是金钱决定一切，地位决定一切，个人幸福决定一切。

——上海 一位中学生

不要一遇沙漠，就怀疑生命的绿洲。生活永远不会一帆风顺

的。有时候还会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可我认为，在痛苦中煎熬对我们年轻人，会有几个好处：一、避免盲目乐观和狂妄自大；二、消除一切不符合实际的想法；三、锤炼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广西南宁 吴 熙

没有什么人的一生是一帆风顺、万事如意的。每人都有本“难念的经”。但对困难和曲折的态度，却因人而异。捷克民族英雄伏契克在绞刑架下还赞叹生活的美好；保尔双目失明仍然著书论文；贝多芬晚年耳聋仍谱写了胜利交响曲。这方面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要让社会承认自己，就必须对社会作出贡献。要想对社会有贡献，就必须勇敢地去接受社会生活的考验。生活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还只是刚刚开始。

——河南郑州 春 歌

人生道路的开始，就象学骑车一样。你的经历和我的经历，就象我们在学骑车时摔跤一样，而我们在学骑车时有个摔倒再学的精神。我们为何不拿出学骑车的精神来学习生活呢？

——安徽滁县 郑德平

我想，人生既然存在虚伪，那它就有存在的理由。如果你在一个环境中感到生存受到了威胁，那就证明你的存在有不合理的因素。如果这不合理的因素是你的过于认真的话，那何不用虚伪作为适合环境的保护色？我为团支部写过年终总结，越是胡诌，越能得到一些人的赞扬。过去曾疏远我的人开始接近我了，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我是个快乐的小伙子。呵，可笑的人生，不戴上假面具，在人生的舞台上就有随时被推下台的危险。

——江苏南京 姜 民

“为自我”与“为别人”——是统一的还是对立的？在什么条

件下统一？在什么条件下对立？

我认为，保尔那段关于人生的至理名言，同你所持的“人的生存和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观点，不是矛盾的。一个不虚度年华、不碌碌无为的人，在主观上使自己有所成就的同时，正是在客观上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那么，在他临终时，为什么不能说已经把全部精力和生命献给了人类呢？

——江苏南京 张 宇

人的行为是建立在自己利益基础上的，这是人文科学得出的结论。赞成这个论点，并不等于说，现在生活着的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可怜虫，就要推翻共产主义理论。它只是说，每个人都具有一种自我意识，有自我保护和自我发展的趋向，一种这样的原始冲动。这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与生俱来的天性，尽管其表现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在有的人那里表现为打、砸、抢；有的人毫不伤害别人，平平淡淡地送走生命的全部历程；有的人看到了生活的不合理处，决心为理想和信念而奋斗，为感情而献身。社会对待个人的这种倾向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的深广性，可以鉴别这个社会合理到什么程度。而对待每个人争取幸福的愿望加以承认，给它创造客观环境，并对它可能产生的一系列后果在适当程度上加以限制，以至于对人的自我本性加以引导，使得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统一起来，融合为一，达到“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崇高境地，则是社会主义努力的方向。正是这种敢于正视现实，面对真理的社会才有光明的前途。作为无产阶级说来，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解放全人类与解放自己这二者之间并不是绝不相干的矛盾体，而是可以统一和应当统一的两方面。设想一下，离开了全人类的解放，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自己的解放，何从谈起？！而不是为了每个个人的解放，全人类的解放又有什么意义？！

——浙江杭州 施觉沐

人生活在现实中,首先必须千方百计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斗争,然后再去满足别人。这是人的本能规律。就象黄河本身有丰富的水源和生命力,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摇篮。为己——它是人们思维、意识的最原始的动机,不是哪个人可以毁灭或创造的。”

——江西南昌 傅江南

人的追求除了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物质以外,还需要有一定的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这里包括的有:理想、抱负、事业心与荣誉等)。这两种需要就组成了人的总需要。前一种是最必需的,但却是低级的;而后一种则是非必需的,但却是高级的,也就是使人类社会从低级粗野发展到高级文明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论是哪一类人,他们的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就象你所讲的“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所以,我说雷锋也是“自私”的,因为他的言行也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只不过他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高级需要。

——广西桂林 张 曲

一个人的作为的结果,既然有了客观上为别人的事实,我们又何必偏要在好的事实中硬去寻找某个人的“坏”的主观动机呢?为自己的生存而努力,不是自私;为生活而奔波,也不是自私。只有为了自己的利益,宁愿损害别人的利益,才是可鄙的、丑恶的自私。希望使自己的生活会得好一些,怎么能称为“私欲”呢?我和我的一些同学和朋友,可以说都没有“活着为了别人过得更幸福”的崇高思想,但我们有“活着要为社会、为祖国、为人民多作贡献”的愿望。

——上海 朱家明

今天来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人生观的问题,而是牵涉到目前我们国家怎样对待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的问題,即正当的、不侵犯别人利益的个人利益,能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的问题。

——黑龙江哈尔滨 裴毅然

在实际中,主观为自己的人并不总是能做到客观为大家的。主观为自己可能会产生两种效果:当个人利益和大众利益相一致时,主观为自己确能在客观上有益于大家。可是当个人利益和大众利益发生冲突时,这就面临着两种抉择:要么牺牲他人满足自己,要么牺牲自己满足他人。选择前者的人是自私的人,而选择后者的人就是高尚忘我的人。

——北京 方 苑

革命利益并不能机械地等于个人理想,只有无数具有先进因素的个性的存在,才能汇合成所谓集体利益、革命利益的整体。但是,个性是不能背离社会、背离人民的。我们党鼓励我们做优秀的工人和农民,也鼓励我们立志做科学家、艺术家。但一个人若立志做一名高级的小偷,则危险了。这个对比可能太走极端了,但它说明了一个问题,这就是“为自我”要符合社会的利益,也就是要把自己和社会进步事业联系起来。什么是为祖国、为人民?去看看那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摸黑的社员、勤勤恳恳的园丁吧,他们就是。为什么总不愿意放弃那种天真的理解,还硬要在现实中寻找自己这个本来就矛盾的方程式的根呢?

——黑龙江哈尔滨 李晓明

一个人生活和创造的目的仅仅是为自己,那么他的一切创造都不可能摆脱私有观念的束缚。当他的个人利益得到满足时,他就会满足现状,停步不前。当他的个人利益达不到时,他就会

悲观失望,失去生活的信心;也会靠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来满足私欲。所以说,这种为我的创造,是不会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而只有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创造,这种创造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才能得到社会的支持、人民的帮助,也才能真正为人类作出一些贡献来。个人利益在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也会得到相应的满足。

——山西临汾 牛慧平

人生的意义何在?为自己。至多再加上一层意义:为良心。只要不是白痴,谁不愿意黄金屋?谁不愿意千钟粟?谁不愿意颜如玉?就我而言(相信世界上不止我一个),上学时努力学习,是为了升级,多学本领,将来混个“饭碗”;有了“饭碗”而拼命工作,无非是为了表扬、奖励、升工资,使别人说我有本领,称赞我。这些名呀,利呀,难道是别人的?像雷锋助人为乐,寄钱给灾区,也好解释。我也曾数次送钱给困难的学生,送钱给流浪来的安徽灾民。这表面看来是为别人,可这个为别人的成份不应算得太重。它除了是良心的驱使之外,无非是想使别人赞声他“好”。“我为人人”的目的是希望“人人为我”。

——广西藤县 伍言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条大河,那么,它就是由为自我,为祖国,为人民等各种泉流汇合而成的。“为自我”是其中的一个源泉,但绝不是唯一的源泉。

——辽宁大连 车国成

为自我或为他人,是无所谓的。关键在于毫不吝啬地挖掘自己的潜力,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因为创造的过程本身是自我表现的过程,创造的结果是为他人造福的结果。

——湖北武汉 明 俊

对宣传教育和社会各界的要求——要“正视现实,不回避矛盾”,“要真正了解现在的青年”,为他们的成长“创造有利条件”“全红”教育,即:教育者(包括学校、家庭、社会)以偏激的感情向被教育者(主要是儿童、少年)灌输的是“清一色”的社会主义“完美”思想。教育者没有把社会主义这一过渡时期的阴暗面披露给被教育者,使他们自幼打下了社会主义“完美”的思想烙印。“文化大革命”的猝然驾到,如浊浪排空,千流急下。“全红”教育浇铸的根基就这样被“史无前例”的现实砸碎了。“完美”的理想奇迹般地破灭了。我们陷入了迷惘,在徘徊,在犹豫,也在艰苦地探索。教育不尊重现实,报刊宣传又总是虚夸海口,这样的“全红”教育究竟有多大好处?应该运用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一分为二地向受教育者传播知识,使他们能够正确地认识人生,认识社会,有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想法,不再走“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

——河北张家口 肖 冰

从小所受的教育使我患了一种少年“色盲症”,外界的一切在我眼里具有玫瑰花一般鲜艳的色彩。

——湖北武汉 赵 林

脱离社会实际生活的青年学生,只是通过书报、广播这样几扇小窗户来窥视室外的世界。如果人为地用一簇簇鲜花把小窗遮住,使他们看不见阴晴变幻、雨雪风霜,不懂得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一基本原理,他们就会认为外面是鲜花的世界。一旦他们走出这间屋子,进入社会,风风雨雨将使他们失去最后的抵抗能力,甚至连寻找鲜花的勇气也丧失殆尽,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鲜花,只是画家在骗人,转向虚无主义。更何况潘晓同志走入社会时,正是百花凋敝

的时候呢！

——山西太原 李世懋

要教育好青少年确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但有一条原则必须坚持：正视现实，不回避矛盾；要两点论，不要一点论。在讲到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同时，也应指出当前党风尚有不正的地方；讲到党员的大多数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同时，也应指出尚有少数党员是混入的投机分子，或是少奇同志所说的那类“丑媳妇”；讲到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平等互爱关系的同时，也应指出尚有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现象……总而言之，在讲到真善美的同时别丢掉了假恶丑，让青少年在比较鉴别中择其善者而为之，择其不善者而弃之。切不可让今天的青少年还象文革前的潘晓那样，天真地认为周围世界样样都好，事事顺心。要引导他们在头脑中树立警戒点，学会分析，识别真伪，这样在生活的道路上才不会失足，不会上当，用结结实实的步伐走向未来。

——安徽肥西 汪昌祥

潘晓同志的文章给我们党、团组织敲了警钟！

青年时代是一个好学的时代，也是一个矛盾很多的时代。青年要学习许多不懂的东西，还要处理一些重大的问题。如：如何找一个好的工作；如何使生活过得有意义；如何处理自己的婚姻恋爱问题等等。这就需要我们的社会创造许多有利条件，尽力地满足、解决青年们的问题和正当的欲望。然而，在我们一些同志中，特别是一些党、团领导中，对青年人的严酷无情多于热忱、爱护；埋怨指责多于帮助、教育。我们要广大青年为四化出力，然而他们的专长得不到利用，积极性受到打击。我们要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然而他们的政治热情得不到鼓励，甚至为了一句话，就不让人家入团。青年人有青年人的爱好，他们要唱歌，要跳舞，要谈朋友……然而我们一些同志不但不好好地指导他们，反

而说他们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甚至拆他们的台。

现在，青年男女之间，严肃有余，活泼不够。即使多说几句话，也会遭到许多人的非议。拿我们单位来说，好多青年都二十七八了，还没谈上女朋友，这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精神负担，加上其他一些不顺心的事情，他们怎能不感到人生的路越走越窄呢？！

——湖北黄石 石建华

我觉得，现在不少的青年，接触的社会面太窄，生活太死板。不少人，每天出家门，进厂门；出厂门，进家门。几乎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业余活动。所以不少青年感到苦闷和无聊。产生一些错误的想法也是难免的。我建议有关部门举办青年俱乐部之类的活动，让青年们在这里学习，讨论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参加他们感兴趣的文体活动。这类活动如组织得好，就会丰富青年的业余文化生活，提高青年的思想境界，陶冶青年的情操，发挥青年的才智。

——北京 邹振华

我想起一些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埋怨青年人思想落后、无前途理想、无道德品质的文章，我要大声质问那些文章的作者：你们真正了解现在的青年吗？现在青年人的特点是什么？理想、追求、欲望是什么？你们为青年人做了哪些好事？为青年人解决了一些什么实际问题？为什么一些青年人对现实感到不满？为什么一些青年人认为人生的路越走越窄？为什么一些青年人要自杀、要犯罪？为什么一些青年人崇拜外国？我希望我们的老前辈、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所有青年的父母、所有的社会团体，都来关心青年的成长，都来参加“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大讨论。

——湖北钟祥 陆诚忠

青年人之所以感到“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固然和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浩劫有关，而目前最主要的是社会弊病对他们的影响。我们当教师的，在学校里教育学生要好好学习，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可当学生回到家里，进入社会，看到“品学兼劣”的学生，通过走“后门”可以找到好的工作，过着优厚的生活时，我们苦口婆心的说教就付诸东流了。这对“品学兼优”的学生，难道不是一种沉重的打击吗？“存在决定意识”，因而，他们在人生道路上感到“苦闷”、“彷徨”，甚至“麻木”、“僵化”，都是不足为奇的。

——山东济南 姚宗烈

潘晓同志对周围世界的看法，前后有两种。前者与后者之截然不同，可谓极端。后一种认为社会近乎地狱的看法，正是她前一种认为社会是天堂之想法的自然而又怪异的发展。我国长期之“左”调，就是当今我们青年人普遍害“眼病”的重要原因。

——四川铜梁 高小勇

对讨论的反映——

欢迎、希望和担心。

《中国青年》对人生意义的讨论，催我重新思考这一问题。我希望这个讨论像一把钥匙一样，为青年一代打开人生道路上封闭了十多年之久的大门，重新唤起我们对美好理想的向往和追求。

——天津 黎 洁

谢谢敢写的人和允许发表的人。这是一颗真实的、不加任何粉饰的信号弹，赤裸裸地打入生活，引起反响。

——山西太原 贺海毅

让青年人说心里话并公开发表,我想这是党的好作风在编辑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北京 刘 野

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是人们在苦闷、彷徨中提出来的新时代的新课题。朋友们,重新认识人生吧!青春的心灵最容易种下生活的种子,党和人民已经为我们翻土浇水了,《中国青年》发表潘晓的信,就是一个例证。

——北京 赵宇泽

我们都应该感谢编辑部敢于发表你的来信和组织起这次讨论,使我们有了一个研究社会、探讨人生的机会。我由衷地希望也相信这次讨论能一反某报在讨论“看透论”时的做法,因为一面之词、空洞理论、政治术语的罗列绝不是讨论,更不能打开苦闷、彷徨、探索者的心扉,解答“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个严肃的课题。只有使大家都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才能使大家在真正广泛的、平等的、科学的探讨中找到人生的意义,使我们的精神面貌发生积极的变化。

——江苏南京 郑 鸣

我希望这次讨论不要局限在《中国青年》上发表几篇文章,应注意广泛收集不同方面、不同内容的来稿,注明作者单位,分期整理,装订成册,预约发行。使我们在这次“广泛的、平等的、科学的”人生问题的探讨中,集思广益,寻求水晶般的未来。

——黑龙江穆棱 裴 健

潘晓同志说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我和朋友们敬佩潘晓同志的坦率和勇敢,也赞扬编辑同志的胆量。今天对人生的目的、意义的探讨是一种面对现实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可是,谁又能保证不在某一天说它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对现实不满,破坏四化建设”,要你坐牢,下放劳动,改造思想?十年、二十年后也许会给平反、昭雪,可又有什么意思?历史演过的悲剧,教训使人难以忘怀。

编辑同志,发表此信,是否你们已经认识到它是当前不可否认、无法回避的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对人生意义的探索,很有讨论的必要。但我怀疑它的结果,也许又是:豪言和壮语、激动的口号、坚强的决心、高超空洞的政治理论等等。如果同“ $3+2=5$ ”这样一个人人都承认、接受的事实加以比较,谁有永恒存在的价值呢?

总之,还是希望你们有始有终地主持讨论下去。

——四川江油 谢 谢

我愿意参加“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但是我担心堕入圈套……

——北京 敖增柱

候爵良、诚石同志没有结合我们所处的这种实际生活来谈人生,而是用讲道理的方法说这不对,那对;这是无产阶级人生观,那是资产阶级人生观。这不是我们所满足的答案。这些答案在报刊、书籍上,我们也不知看过多少次了。我们所需要的是从生活上来谈人生,用摆事实的方法来谈人生。事实胜于雄辩。

——北京 感 情

这个讨论很有必要,谨寄国画习作《思》参加讨论。

——湖北宜都 朱诗光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7期)

痛苦与希望

李翠华

文学家和艺术家描绘了那么多先进青年,可从没有像潘晓这样真挚地说出青年一代的心里话。

我们被感动了,继而又有些黯淡,潘晓毕竟还有事业可做,可我们却什么也没有。

我们住在春风吹不到的陋屋斗室,出生于“引车卖浆者流”的家庭。我们从未感到过卑贱者的伟大,而是从小就忍受了自卑和被人歧视的痛苦。幸福对我们只有童稚之时才存在,一旦我们走上社会,厄运便翩翩而至:命运将牵引我们去继承父母的职业,而嫉妒又驱使我们从破坏得意者的幸福中去寻求解脱;成熟的欲念使我们备受爱情的煎熬,而最后不得不为了完成一项人生的任务建立一个可怜的家庭……然而,贫困同时教给我们善良、爱劳动和富有同情心。我们中间也不乏有志者。当年,党用沙漠的绿洲和草原的骏马宣传广阔天地的时候,我们许多伙伴毫不犹豫地报名去了边疆。我们至今还记得,十多年前的一天下午,我们的哥哥姐姐且歌且舞地同泪眼迷离的父母告别……如今,那些过早投入生活的伙伴们多半在生活的浊流中带着终生的遗憾枯萎了。多年来,青年的这些苦衷,谁也不敢触动一下。粉碎了“四人帮”,我们的呻吟被一片狂欢淹没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命运的彻底改变。崇拜偶像是我们昔日的生活基础,这却酿成了今天无法弥补的空虚,更不堪忍受的是宣传家们对幸

福的不切实际的渲染。许多单位的干部，关心的只是利润、产值，对我们，他们也会捧出一个拼命干活的青年榜样，却很少关心我们的痛苦和欲望。人们普遍地把出大力、流大汗作为我们的唯一本份，这种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青年内里枯竭的杀鸡取蛋的行径，往往得到报纸不加深虑的宣扬。

人们会面对一个小流氓的转变费尽心血，而我们这代人的时代病——精神生活贫乏症——却得不到重视。我们是青年，我们对精神生活的注重甚于对物质生活的注重，我们要追求知识、欢乐、荣誉心和事业心的满足！事实却是令人沮丧的。每天，我们早早地爬起来，两眼惺松地挟着饭盒，挤上拥挤不堪的汽车去工作。晚上，拖着疲乏的双腿回家，到八点半，抱上碎了壳的半导体过它半小时的社会主义生活，然后惆怅地等待着梦的解脱。

我们同样清楚地感到，我们是多么需要一个生机勃勃的团组织，而这决不是目前瘫痪了的团组织所能胜任的。问题是严肃的：青年团服从于党的领导往往被歪曲成对党支部的唯唯诺诺和依赖，除了经常在党支部的授意下抛出一些华丽的口号，团组织所起的作用，也只有填填新团员的表格和通告处分某个失足的团员，或是千载难逢的一次外出游览。除此而外，团组织的一切工作都可以由党支部代行了。

许多人习惯用团员的人数来衡量团组织的工作效果，殊不知大多数人入团只不过是一种例行公事。即便是我们，也常常想，为什么要对一个徒有虚名的团组织交上一角钱哩？在工厂，团员占青年中的大多数，这个可喜的数字后面却隐藏着一个可悲的后果，就是团组织的威信和作用的下降。因此，我们说，团组织的瘫痪状况再也不能适应目前形势的需要了。团组织如果不及时进行彻底的改造，将被社会无情地淘汰掉，这不是行政和经费所能挽救的。我们期待着团组织的改革，作为即将超龄的老团员，我们希望看到一个积极的名副其实的团组织出现在四化建

设的前列。

我们，这些贫知、近视而不甘堕落的孩子，有心思说出上面这些话来，是因为我们急切求救于社会，我们不愿做“四人帮”的陪葬！当然，我们也曾有过自暴自弃的时候，也曾和那些只知咒骂的人随声附和。而今我们表示了呼求解脱的愿望，这决不是做作。因为，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同时也学会了思考！现实向我们证明，尽管我们的社会还有众多弊端，但它毕竟渐趋于光明。党第一次打破惯例，没有把一切腐败归咎于“四人帮”，而是从制度本身的改革考虑问题，这是一个令人深省的开端！党毫不留情地披露了一些内部丑闻，说明了：有勇气承认错误的党同样是有能力改正这些错误的！反对歌功颂德，敲响了谎言时代的丧钟，国家为拯救贫困的农村进行了巨大的改革……这一切，正如我们从未在黑暗面前闭眼自慰一样，我们也没有用世故的眼光去闭目否认。我们看到，我们面临的不是那样纤尘不染的、被说教者用大串的形容词修饰的社会主义，而是仍然有悲剧、有丑行，但光明在扩大的社会；我们交往的不是艺术家笔下的光彩夺目的工农兵，而是凡庸、窘迫于生活但又默默用劳动来减轻民族重负的平民百姓。这使我们有了希望。我们坚信，有奋斗才会有欢乐；既然我们不愿坐享其成，那我们就不必埋怨历史遗留下来的令人不满的时代，坦途荡荡的世界决不会有青年人的事业可谈。在坚冰已破的当今，觉悟对于我们不光有痛苦，也有成熟的欢乐。只要我们保持自己的锋芒锐气，抛弃等待别人赐福的幻想，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我们是有获得幸福的可能的！

愿整个社会关心我们，帮助我们缩短从痛苦走向幸福的路程。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7期）

有这样一个副团长

李建民

潘晓同志,你说“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诚然,你的见解跟你痛苦的经历和观察问题的立场有关,并把文章写得有根有据。但是,如果真如你说的一般,那么手举炸药包的董存瑞,扑向枪口的黄继光,在烈火中焚身的邱少云……就无从解释了。也许你会说:“董存瑞……谁见过?”那么,我要把经常在我脑海里浮现的一个人说给你听——

在部队时,我团有一个王副团长,他有这样一些特点:厌烦别人奉承他,谁要当面说他的好话,他必定刮谁的胡子;喜欢过连队生活,干部、战士都称赞他为“编外战士”;每天不肯闲着,在连队他帮厨、喂猪、掏厕所,什么都干;连队晚上演电影,他替战士站岗;他睡觉爱打呼噜,为不影响同志们休息,他抱着皮大衣到山坳里过夜;施工时遇见大塌方,他总是手一挥:“干部、党员跟我来!”第一个冲进烟尘弥漫的洞窟;战士上山打柴失踪,他带人去寻,两昼夜水米不曾沾牙,他把水和干粮都省给战士……一个副团长呵,同志!而在他的腿骨里,还深嵌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弹片。他到底为的啥?能说是为他自己吗?!然而这样一位好人,在一次山洪暴发时,为抢救落水的战士献出了生命。

出事的头天,下了一夜暴雨,上游水库决口,河水猛涨。三营领导担心山洪暴发,拂晓即指挥部队过河抢救施工机器。返回时

河上的独木桥被水冲垮，几名战士不幸落水。新战士刘春玉是个“旱鸭子”，落水时腹部又被扒钉挂破，肠子外流。他勉强爬上一棵只露梢头的树，便昏了过去。王副团长闻讯赶到现场，见状心焦如焚。匆忙扎好的木筏刚放进水中，王副团长就一个箭步跳了上去，同时喊道“来个会水的！”干部战士们见副团长要亲自去，都急了眼，恳求地说：“副团长，你岁数大了，身上又有伤，在岸边指挥就行了。要下水，我们去！”说着大家都争抢着要往筏子上跳。急切中，副团长大声吼道：“服从命令！七连副，带上绳子跟我来！其他人都站住！”

木筏向河心驶去。王副团长这个贫苦渔民的儿子，水上功夫是过硬的。只见他左一棹右一棹地撑着，巧妙地躲过一块又一块石头，筏子急速地向伏在树杈上的刘春玉靠近。当刘春玉拉着绳子上木筏后，副团长急忙脱下衬衣，为他包扎好伤口。这时，副团长让七连副扶着又昏过去的刘春玉坐在筏子中心，他一人在前边掌棹往回撑。突然，一堵丈把高的洪峰将木筏高高托起，向一块巨石猛撞过去，“轰”的一声，九根粗粗的木椽被撞断了三根，副团长跌入水中……一根根断裂的木椽浮上水面，却不见副团长的影子。七连副尖声叫道：“王副团长！王副团长！您在哪里？”可是，王副团长再没有从水中露面……战士们哭着叫着，顺着河岸找了三十里，但是，那里有敬爱的王副团长的影子？

在副团长的追悼会上，全团干部、战士、家属个个泪流满面。团党委在会上号召全团向副团长学习，军区党委追认他为一等功臣，中央军委命名他为“爱兵模范”。

潘晓同志，也许你心急地看不下去了，会说：“哎呀，你罗嗦了不少，对人活着到底为什么，你并没有阐明自己的观点呵！”

一定要问我的观点，我要说，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是为了自己而生活的，少数人是为大家而生活的。为大家生活的人，虽死犹生，永远活在大家心里。王副团长就是为大家而生，为大家

而死的。我们生活——要象他那样。他无私的生命平凡而伟大，他是我亲眼看见的英雄。正直的潘晓同志，你难道会不同意我的这种看法吗？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7期）

一个香港青年的祝愿

文锦韬

编辑同志：

我是从香港来的旅客，乘火车往昆明途中，看到了《中国青年》五月号发表的潘晓同志的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素来懒惰的我，也一跃揭“笔”而起，在云贵高原上一抒心情，借这封不成文的信向她致敬！

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其实天地是客观存在的，有它自己的规律。它不会同情我们的不幸，它亦从未说过我们活着就有和平幸福。幸福，要靠我们自己去找寻，自己去抓住。

我们青年一代经历了很多挫折，身受了很多伤害。究其原因，一部分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另一部分是我们不了解世界和事物的规律。但是今天的青年比任何时代的青年都更勇敢，更加关注全人类的前途命运。因为我们比任何前辈拥有更厉害的武器——知识和思想的自由，那就是说，我们比谁都更接近真理的方向。

潘晓同志，你太看低那些文学大师了！他们创作伟大的作品，原不是教你哭，教你绝望的。在揭露社会的不平和黑暗以及人性的弱点的同时，他们也在点起智慧的明灯，默默地祝福下一代，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

潘晓同志，坦率地说我本来是一个自私的人，那为何看了你的信会下泪呢？因为我同情呵！没有人可以说服我同情，也没有

人可以说服我不同情，这是感情的极为自然的流露，因为我了解你的境况和心情。我相信，全世界的青年（假如他们看过你的信）都会同情你，尊重你，并且默默地祝福你。八十年代需要不屈不挠、默默苦干的青年。在不同的国度，青年人面对性质不同但同样艰巨的问题。我们虽然不在一起，但我们不甘沉没的心永远是相通的。

文锦韬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7期）

“为自我”并非一定与“为他人”冲突

——与侯爵良同志商榷

王 韦

侯爵良同志的文章，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主观为自我，客观为他人”是剥削阶级的人生观。论据是：“为自我”就不可能“为他人”，“客观为他人”只不过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遮羞。

我承认潘晓同志的“主观为自我，客观为他人”不能算是先进的人生观。但是，我也不敢苟同侯爵良同志的观点。潘晓同志的信在青年中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原因之一，就是她严肃地立足于现实进行思索。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什么样的呢？一个生产还很不发达，制度还很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史无前例”的浩劫留下的满目疮痍尚未完全平复，劳动还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不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大地还没有阳光普照，肮脏还没有冲洗干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主观为自我，客观为他人”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诚然，正如侯爵良同志所说：在现实中，“主观为自我，客观为他人”并不是先进的人生态度，但是，那种“八小时之内积极工作，八小时之外为自我幸福而忙碌”的人，不是少数。这些人并不去溜门撬锁、掏包行窃，也不搞走私交易、投机倒把。他们是安分守法的芸芸众生，用自己诚实的劳动换取报酬，能说他们都具有“剥削阶级人生观”吗？再看一个事实：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之后，一方面社员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打破十几年来的徘徊状态，很快发展起来了；工矿企业实行奖金制度

后,一方面不少工人的家中添置了电视机、沙发等,另一方面,许多半死不活的厂子有了发展。

总之,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前提下,“为自我”与“为他人”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矛盾的统一。社会主义的一些经济规律(如按劳分配等)正是在这种对立统一中得到体现。一概斥之为“剥削阶级人生观”是不妥当的。

最后,我想说一句:多年来戴“左”视镜,使我们一看到“我”、“私”之类的字眼就不冷静,当然不能象潘晓同志那样探索、思维了。在这个意义上,难道我们不应该问潘晓同志学习吗?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7期)

人生既搏“命”又斗不过“命”

潘晓同志：

读了你的信，我对你深表同情，因为我有着跟你同样辛酸甚至更甚的遭遇。面对着眼前恶浊的社会风气，我们能说些什么呢？只能“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为什么有的人浑浑噩噩却能熙熙而乐，我们满怀热忱却是空怀壮志，四处碰壁呢？归根结蒂，就是因为读书太多。你却还天真地想到书中去找解脱苦恼的药方。正象你所说的，书是人类智慧的宝库，怎么会越读书越愚蠢呢？我想，大概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没有经过真正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人们的思想水平极低，而资本主义的加封建主义的腐朽东西却严重地玷污了社会。读书一多，你的嗅觉就灵敏了，你就会这也看不惯那也不入眼，自命清高，那么社会上的庸人（但他们往往是“能人”）就不买你的账，你就会碰壁。读书一多，认识水平一高，在目前社会上就不容易找到知音。更可怕的是在顶头上司中不遇伯乐，你就会“空有一身本事”，“屈沉于小人之下，受这般腌臢气”，你就会苦闷。总之，读书一多，所思所行就往往脱离现实，最后被现实嘲弄，甚至抛弃。所以，我劝你不要再书呆子气地探索什么人生的意义了，为此痛苦也不上算。人生的道路越走越窄，这是个社会问题，每个个人都是无能为力的。

如果一定要我说人生的意义，那我就认为：人生即搏“命”。

但是个人的努力是绝对斗不过命运之神的。有时候，你为搏斗用上了全副精力，自己的愿望却仍在虚无缥缈间；有时候，你并没化气力挣扎，一个偶然的机遇却马上就会使你从无人问津变为门庭若市；有时候，好象是自己的搏斗和挣扎起作用了，但仔细分析，却还是机遇在其间起作用。命，还不是命！这些都是我在短暂然而坎坷的人生道路上的切身体验。

正因为人生的意义是与“命运”搏斗，而人最终又斗不过“命”，所以还是不去考虑什么人生的意义为妙。否则，就会庸人自扰。

江苏太仓 顾礼俭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7期）

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

潘晓：

罗曼·罗兰曾说他在每一本书里都发现了自己。当我在《中国青年》上看到《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这篇文章后，发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我。

我和你有着几乎一模一样的遭遇。和你一样，过去，我信仰共产主义，把牺牲自我以谋求人类的幸福当作自己生活的宗旨。我为牛虻流过眼泪，更为保尔的事迹所感动，我渴望着一种献身于人类伟大事业的壮举。从小所受的社会教育使我患了一种少年色盲症，外界的一切在我眼里都具有玫瑰花一般鲜艳的色彩。

“文化大革命”发生后，我和当时的所有年轻人一样狂热，心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宗教式的虔诚。我真心实意地相信那些谰妄的说教，为了一种比乌托邦还要渺茫的所谓政治理想去扼杀自我。当时我还只是一个中学生，但是革命的禁欲主义和共产主义净化思想却已经把我变成了一个连最坚韧的斯多葛信徒也望尘莫及的自我异化典型。我和同学们一起斗私批修，为自己头脑中的私字一闪念而深感愧疚。每当在银幕上看到毛主席时，我就激动得浑身哆嗦，热泪盈眶。如果有人问我的理想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共产主义！”我把自己当作手段，甘愿成为人们脚下的垫路石。

但是，生活很快就让我看到了它的真面目。1974年，我的外

祖父去世,远在外地的父母和亲戚对我十分冷淡。当我饿着肚子向好友们寻求帮助时,看到的都是一副冷冰冰的面目。有哪一种痛苦能与饥饿相提并论呢?肉体所受的折磨使我的精神堤岸崩溃了,我陡然发现人世的虚伪、丑恶。我痛苦、悲观,想到爱情中寻找安慰。但是很快又发现自己掉进了另一个深渊——我被爱情抛弃了,一个势利的姑娘带走了我初恋的全部热情和真挚,在我的心上留下了一个芝麻大小的伤口。

伤口在流血,心在流血!

我的人生观发生了危机。我苦苦地体味着哈姆雷特的一句话:“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是你在书本上看不到的”。我终于发现说谎、欺诈、恭维、奉承是人生的要谛,自私是人的本质。当我无私地对待别人时,别人却把我当作一个傻瓜来戏弄。生活中象葛朗台、夏洛克、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确实比比皆是,数不胜数。我的世界观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从对生活充满了憧憬和热情变得厌恶生活。我不愿意随波逐流,把自己贬低到庸人的泥潭中,于是我就到书中去自我解脱。我放纵自己在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欧洲文学的领域中奔驰。你在书籍世界中所结识的那些人也是我的好友,我天天和处于冥冥中的思想家们呆在一起,从他们身上吸收精神营养。后来由于偶然的会,我参加了工作,经常性的出差使我能够广泛地了解社会,我越来越感到自己以往的信仰和生活态度是那样的可笑。1978年初,我考进了大学,不久就发现,社会上到处都一样,即使在大学这个高度文明的场所,个人的本能仍然是绝对的主宰。于是,我终于明白了,个人乃是世界的中心和基础。

这种观念也许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是管它是什么主义呢,只要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当然,黑格尔的那句名言还有另一层意义,即否定的方面,但在这里暂不讨论)。

从此以后,我开始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和欧美文学中的超现

实主义里面去挖掘自我,我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寻找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态度,我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叔本华、尼采等人的思想中去了解社会的本质,得到很多启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崭新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也许是大逆不道的,但它却是从我经历的痛苦中挣扎出来的。

下面我想和你就人生谈几个问题:

1. 对自私的理解:

自私是一个广义的哲学概念,它是动物的一种本能。在动物那里表现为自保,在人身上则表现为自私。自私是什么?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康德和黑格尔看到了这一点,认为历史就是在恶中发展的。

自私首先是一种自我发现:个人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意识到“我”的重要意义。以往的一切总体主义观念都是个体灵魂被歪曲的结果,是个人本质异化的结果。十年浩劫中有个口号,叫做“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是多么野蛮的口号,那时却被人们普遍接受了。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的社会改革,都是由于自我发现而引起的。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哪一个不是以个人自觉为前提?只有在充分认识和提高自身价值的前提下,社会才能进步。可悲的是,人类历史上自觉的时间短,蒙昧的时间长,一种自觉否定了旧的蒙昧,又造成了新的蒙昧,所以费尔巴哈把人类的历史说成是宗教变迁史,不是没有道理的。拿我们国家来说,六十年代中叶掀起的一场社会动乱就是宗教狂热的最具体的表现。这是一种否定一切宗教的宗教,是“革命的”宗教。那时候的偶像崇拜简直到达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蒙昧和长期有意识的政治宣传使人们从内心里默认这种异化的社会现象,许多人甚至愿意为这种宗教而献身。这是内在的体验,是肯定的方面。另一面,法律成了人尽可夫的娼妇,权力意志的绝对地位使得监狱成了变相的宗教裁判所,法律(毋宁说权力意志)不仅要

干涉人的活动和客观效果,而且还要限制人的思想和主观动机,因而,外在的压力也使人感到窒息。这是否定的方面。两方面的结合产生了八亿宗教徒,用喜剧的形式重演了苏联卫国战争前后斯大林崇拜的悲剧,给社会带来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浩劫。这场运动是怎样引起的呢?有人把它归咎于某一个人的意志。我认为这是中国人长期禁锢自我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舆论用总体压抑个人的必然结果。每个人崇拜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这种异化既是愚昧无知的结果,又是它的原因。人们狭隘地理解着自私,把它和吝啬、卑鄙、损人利己相提并论。他们一方面不敢公开表示自己是自私的,另一方面也由于没有对自私的自觉而认识不到自己的真正价值和力量。他们只是消极地去理解自私,没有看到自私的积极意义。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常常把自私与为公对立起来,把利己与利人对立起来,两者之间水火不容。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直到现在仍然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其实这两者不仅不是对立的,往往还是一致的。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只要一提到人,必定首先指的是整体,然后才是个体。似乎个人首先是作为集体的一分子,然后才是作为个人存在。一般先于个别,水果先于苹果,这就是异化社会的逻辑程序。昨天下午吃晚饭时,我从学校的广播中听到一首学习雷锋的歌曲,里面有雷锋日记中的四句名言,其中一句是:“对待个人主义,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我不禁大吃一惊:清扫个人主义?否定个人?这种玩笑实在开不得了!没有个人,这个世界一天也不能存在。从这句话中我又想起了“狠斗私字一闪念”,我实在看不出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

关于保尔的那段人生名言,我并没有改变态度,只是有了新的理解,一个人只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充分认识了自我,必然使生命之光焕发得比庸庸碌碌的人更明亮;在没有个性自觉的困惑中的悲观厌世,必然会虚度年华。狂热产生于遗弃自我,悲观失

望也产生于对自己估量不足。总之,一切非进取的生活态度,一切奇怪荒诞的社会行为之所以产生,根本原因就在于否定了个人(或个人主义)和自私。被发掘了的自我就是一座宏大精深的宇宙,人们将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快去发现自己吧,快去让个体的能量全部释放出来吧!你将会发现,整个现实社会在觉悟的个人面前显得多么渺小、可怜!

由于我的这种思想,我在班里被同学当作自私的人。其实要谈狭义的自私,我比他们差远了。但是从广泛的哲学意义上来说,我确实比他们自私,也就是说我比他们更珍惜自己的价值。我的自私是自觉的,他们的自私却仍然处于一种本能的状态中。我以自私为荣,他们以自私为耻,尽管在涉及到个人切身利益时他们决不会比我更多地考虑到别人!

总之,按照人的本性来说,自私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正当的权利。没有这种广义的自私,社会就不能发展,历史就不能前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同时人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着的,所以人首先应该是个人。社会的一切运动,包括目前正在进行的四化建设,都应该把活生生的感性的个人放在首位,运动只是手段,自我才是目的。

当然,自私具有双重效果,一方面是个人的自觉,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损人利己的后果。这种可悲的情况是由自私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在目前是很难避免的,将来看来也很难根除。只要有人存在,就会有矛盾冲突,这都是由于自私而引起的。

2. 对生活的态度:

由于上述对自私的自觉、对自我的发现,形成了我对生活的积极态度。我把生活当作斗争,不是象狂热时期所说的那种斗争,而是自我与环境的斗争。人生就是对这种斗争的记录。我对生活的基本态度可以归结为两点:

第一是不合流。社会中确实充满了丑恶、虚伪,这种势力虽然很可怕,但它动摇不了一个充分自觉的个性。海明威小说中所塑造的“硬汉性格”就是我生活的楷模。我决心遵循“硬汉性格”者的生活态度去不停地摸索,碰得头破血流也不回头。过去在农村中,在单位里,我一直坚持学习,为此遭受了许多冷嘲热讽。现在上了大学,仍然时常听到一些流言蜚语。而我毫不在乎,继续奉行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但丁的一句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

你在信中写到你争工资,计较奖金,这是很正常的,无非为了使自己生活和学习得更好些。可是你为什么要学会奉承和说假话呢?这些现象虽然是现实的,但都会成为非现实的,因而都会成为不合理的。你为什么要去追求相对的东西?你应该去发掘自我,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

第二是进取心。我从来就是一个进取心极强的人。和你一样,最近我也在写作品。我充满了信心,非写成功不可!我写小说也是为了表现自己,发现个人的价值和普遍的人性,发泄内心的情绪,在外物身上打下自我的烙印。这种进取不是为了功利效果,而是为了满足自我扩张和表现的要求。我相信自己的能力,我也相信在努力提高个人价值,充分表现自我的过程中将会产生对整个社会有利的客观效果。因为自我和社会在发展趋向上并不是相反的。

你在信中表露出自己的事业心,但是我也看到了你的悲观。你的作品,对你来说仅仅是一叶救命的小舟,这就与你前面说的用作品来表明自己存在的观点相矛盾了。你应该自强不息,确信自己是强者。你应该学会过平静的内心生活,把整个世界都放在心中,你就会发现自己在世界面前并不是软弱无力的。应该注重动机,不要单纯追求效果,不管是否获得了外在形式,自我总是自我,总是能动地存在。你最好去读一点卢梭和康德的书,他们

会教导你怎样对待生活的。世界上确实“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它就在你心中；你之所以彷徨、苦闷，是由于你没有发现它；一旦发现了它，所有的累倦的感觉，出世的思想，绝望的念头都会消失。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接触到时代的“有力的臂膀”，你就会看到自己正在“搅动生活，影响社会”。历史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而人首先是个人。所以每个自觉到自己价值的人都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就是历史。”

武汉 赵 林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

不能搞“公私合营”

编辑同志：

我看了第五期潘晓同志的文章后，对这场人生意义的讨论非常关心，一直期望着能有人对潘晓的错误思想作出有力的批评。可当我把第六、七期的讨论文章——仔细看罢，不禁隐隐感到一种担心。什么“合理的利己主义原则”啦，什么“‘人活着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不一定是一种科学人生观的表述”啦，“为自我并非一定与为他人冲突”啦等等，都提出来了。更使我不理解的是，侯爵良同志的文章发表后，我周围的不少青年竟然纷纷指责。我颇为侯爵良同志不平，不料贵刊还发表了反驳侯的文章。有话憋不住了，我要说说我的看法。

现在似乎有人提倡这么一种观点：每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不但是一种本能，而且是合理的，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否定了个人利益也就等于否定了集体利益。只要每个人都通过不损人的方式去利己，在客观上就都是在为集体利益服务，“公”与“私”就这样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了。

这些非常错误和有害的观点，从根本上违反了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共产主义学说。我请问：

无数个个人利益相加就等于集体利益吗？

“不损人的利己”可行吗？

下面我想分别谈谈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不言而喻，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适应的必然是“利己观念”。马克思指责资产阶级：“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已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他还说：“这种利己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作为“利己观念”的形象解释，集中地代表了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人生观。可以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核心就是两个字：利己。

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是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对立面出现的。列宁说过：“共产主义者一词是‘公共’的意思。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土地、工厂都是公共的，实行共同劳动，——这就是共产主义。”这种公有制所需要的必然是“为公”的观念，是忘我无私、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因此可以说，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两个字：为公。

“利己”与“为公”，这难道不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相对立的人生观吗？

也许有人会说：否定了每一个“小私”，也就等于否定了“大公”。我不否认，集体利益中包含了每个人的个人利益，但它决不是个人利益的机械总和，这两个本质不同的东西是不能通过量的关系等同起来的。如果离开了集体，每个人都各谋其利，那么他们之间的利益必定彼此对立、相互掣肘。若说如此集中起来竟能构成社会主义的集体利益，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其实，这种论调并不是什么新玩意儿，它不过是十九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功利主义者边沁的主张的翻版。边沁就说过：“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社会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边沁这种主张的实质就是维护私有制，他声称“任何事物都不象财产公有这样违反功利主义”。这套货色被马克思斥为“庸俗不

堪的东西”。

第二个问题：不损人的利己可行吗？

首先，“利己”一词就是以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相对立而存在的。既然如此，又怎么可能做到不损人呢？大事且不去说它，就说生活小事吧，宿舍里，你想听收音机，别人想睡觉；剧院里，你想和朋友议论，旁边人不乐意。如果你要做到不损人，必然要牺牲自己的愿望，你的利己也就受到了限制。反之，你就不可能不去损人。

有人认为，在公有制的情况下，每个人凭自己的劳动挣工资，不投机倒把、不贪污盗窃，这不就是不损人的利己吗？但我要提醒大家注意：只要是阶级社会，每个人的利益就存在着彼此对立的一面。道理极为简单：社会还没有创造出足以消除这种对立的充足的物质财富。就象一碗粥五个人喝一样，不可能不矛盾。所以诸如调工资争吵打架，买东西走后门，卖东西随意涨价等，都是这种对立的表现。既要当利己主义者又要不损人，这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在私有制社会里，利己主义也许能推动社会发展，而在公有制的社会中提倡利己主义，只能削弱公有制的基础，大家都去吃“集体”，吃“公”，消极懒惰，自私自利，国家就会一天天贫困下去。“四人帮”统治的十年不就是明证吗？

最后，退一万步讲，即使“不损人的利己”是可行的，也不应该给予肯定。要知道，它和“损人的利己”之间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谁能保证它不超过“损人”的界限呢？说到底，这种东西的核心是“利己主义”，“不损人”只是一个极为软弱的限制词，它的情绪是消极和冰冷的。“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是这种人的座右铭和处事原则。我们民族要富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需要多少充满民族感、倾注极大热情、富于献身精神的有志青年啊！如果说，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的“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

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光辉思想鼓舞了千千万万个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战士抛头颅、洒热血，从而夺取了全中国的胜利；五、六十年代，“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人活着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的崇高思想的提倡，造就了无数雷锋式的新人，那么，八十年代的今天，竟企图用什么“公私合营”“公私同利”等货色去塑造为四化奋斗的志士，岂不是太荒唐可笑了吗？！

人生观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尤其是今天，不少青年思想的混乱确实令人担心。我很希望大家能就我提出的问题展开讨论。“公”与“私”，“为己”与“为他”的关系是非要搞清楚不可的。

北京 李为民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

可否提倡一种与现阶段相适应的人生观

马宁荣

按理说,“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早在文革前就有了明确的答案,就是潘晓同志在信中提到的“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但是,今天已有相当一部分青年怀疑以至嘲弄这种答案。原因何在呢?我想,首先是因为这一诱人的答案不是经过青年们自己的思考得出的,而是宣传教育从外部输入到青年的意识中去的;其次是十多年来,青年们看到的丑恶太多了,受到的迫害太惨重了,这就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

我和潘晓一样,一直在探索着人生的意义。我觉得,一个人活着,总要做点事情,总要为推动社会的前进做出一点贡献。因此,总的说来,我还是同意“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的人生观。

不过话说回来。在我们这个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又经过十年浩劫的国家里,真正能接受这一人生观的人并不多。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可以从实际出发,对人生意义作出新的、科学的、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解释呢?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也要扫一扫我们社会上长期形成的说假话、大话、空话的恶劣风气。发一个号召,提倡一种东西,不要光图字面漂亮,叫得痛快,也不是调子越“高”越革命,要图实用、讲实效,让大家都能做到。比如可以提倡一种符合当前历史阶段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可以鼓励发

展人的名利思想。不要一见到“名利”二字就给扣上“资产阶级思想”的大帽子，难道无产阶级就不要“名利”？以前流行过一句口号：“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革命”。其实，“革命”应当有实际内容，而绝不是抽象的不着边际的东西。实际上，现在工厂搞奖金，农村搞生产责任制，各行各业评选劳动模范，不就是以“名利”来刺激和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吗？事实证明这很有效。事实上都这么做了，为什么在理论上不敢承认呢？这与多年来我们一些宣传的虚伪性有关。一些事情实际上明明是“那样”，但在理论上偏偏说成是“这样”。理论与实际脱节，闹得社会上人人都象“演员”，口头上冠冕堂皇，行动上随心所欲。与其长期如此“演戏”，还不如戳破窗户纸，还事物的本来面目。

当然，纯粹以“名利”作为现阶段人生观的核心也不妥，因为“名利”毕竟是一种私有观念。适应现阶段的人生观还应该掺有公有观念。不过，二者的比例要适当。当前政治思想教育的任务，就是要逐步合理地调节人生观中“公”与“私”的比例，使前者的比重越来越大，后者的比重越来越小。但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丧气不得，着急不得。毫无疑问，在这一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可能也可以产生出一些大体上忘我的人。

综上所述，我认为，“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固然不失为一种理想的人生观，但目前大多数人做不到。因此应当树立一种新的具有历史阶段性的人生观，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精神有所寄托，从而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

弊病安在？

潘晓：你好！

好不容易从阅览室借到《中国青年》，才看到你写给《中国青年》的信。要问我读后的感想，两个字：沉痛。是的，非常沉痛。因为你的悲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这一代青年的真实心情。但我还要说，光沉痛是无济于事的。你的遭遇是十年浩劫的产物，你的苦闷是迷失方向的困惑。你看到了现实的阴暗面，但是还缺乏科学的分析。我们这一代心灵上的伤痕是怎样造成的？如何才能治愈它？要解答这些问题，光有面对现实的勇气不够，还需要思想的武器。

这个思想武器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这就是我——一个同你一样经历过生活坎坷的青年，经过苦苦探索以后得到的结论。你说，“大道理”是说不服你的。但是，我总这样想：既然马克思主义能为我启蒙，为什么它对你就不会起作用呢？

学生出身的青年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思想脱离实际。尤其是我们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青年，是在一片“社会主义好”的歌声中长大的。然而十年浩劫打碎了我们头脑中玫瑰花般的幻梦，现实中的种种丑恶把我们“一切都好”的极端一下子推到了“一切皆坏”的另一个极端。加上个人再遭到一些挫折和不幸，难免灰心丧气甚至感到绝望。但绝望终究不能改变

现实。不懂得土壤的性质种不好庄稼；不真正了解社会，也就谈不到正确地理解人生。要避免犯幼稚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明确历史的责任，要使我们的生命之树常青，就必须对现实有一个真切的了解和科学的估计。

那么，客观现实到底如何？我们的社会到底是处在哪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光从一些表面现象出发，无论如何得不出正确的结论。这儿，就得请教一下马克思这位大圣人了。他比我们都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总结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发现了它的一般规律。恩格斯曾把他这一划时代的伟大发现表述如下。

“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的基础。”

这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社会现象，归根到底，无不受到生产力发展的制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完全基于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

运用这一原理分析我国社会，显然可以看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我国基本上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按照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接下来出现的应该是资本主义，只有这种生产方式能够击败作为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最大特征的“懒散和怠惰”，使生产力得到巨大的发展。但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完成的，当然不允许把胜利成果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因此，我们就在夺取政权后，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跳过了资本主义阶段，一下子进入了社会主义。这本来是好事。但是，实行社会主义不仅需要政治条件，而且需要经济条件。在我国，缺少的恰恰是后者，也就是说，在取得政权后，必须补经济发展

这一课。

对于这个问题,列宁的头脑很清醒。面对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经济文化“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的俄国,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也就是说,作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中间阶段的、经济上缺乏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必须采用资本主义生产及经营管理中某些“最新的进步的”方式(例如,实行竞争和经济核算制)。实践证明,这是个铁的规律,任何违背它的企图没有不吃苦头的。现在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凡是比较聪明的领导人,都不拿自己的头去碰这个规律,因而,它们基本能跟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

而我们呢,正相反,办了很多无视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它对生产关系的要求的蠢事。生产关系超阶段的冒进,对所谓资本主义的批判,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导致我国国民经济长期徘徊不前,最后被“四人帮”弄到了崩溃的边缘。群众说:不怕苦干,就怕白干。你社会主义向人民许过愿,要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结果却折腾来折腾去,越搞越穷,谁还有劲头去搞生产呢?

归根结底,生产力的发展是决定因素;生产力一旦萎缩,问题就接踵而至。

原来我国发放货币与投入市场商品的比例是1:8左右,商品少了,比例降到1:5、1:4或更低,货币自然贬值。在公家市场买不到东西,只有出高价到自由市场上买,老百姓的牢骚、埋怨自然就来了,还谈什么“同心同德”?

商品少了,某些生活必需品或热门货就成了走后门、搞“关系学”的筹码,为贪污、受贿打开了大门。“王守信事件”就是最突出的例子。

商品少了,“上层生活”就发出了更诱人的光辉。这又助长了

拍马屁、向上爬、互相倾轧的恶劣倾向。

商品少了，“门当户对”、“女攀高门”又成了婚姻的唯一标准，纯洁、真挚、不被任何世俗条件所左右的爱情就消失了。

这一切，正好被我们这一代碰上了。

难道我们年轻的共和国仅仅诞生了三十年就衰老了吗？难道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竟越走越窄了吗？

不！社会主义的光辉前途是否定不了的。问题在于，我们违背了经济规律，把应该接过来的好东西轻易否定了，生产关系方面的步子迈得太大了。欲速不达，反受惩罚。好在我们终于清醒过来了，现在改弦更张还不算太迟。我国的经济状况如此，政治状况又如何呢？

我们知道，国家这个东西，是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组织。社会主义国家无疑不能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如果它不能保持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势头，就谈不上保护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而要顾及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就必须用政治这个上层建筑去维护“公有制+竞争+经济核算+按劳分配+……”这个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例如，实行“竞争”（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就要求相应的“自由”和“平等”。没有这样的条件，就谈不上真正的竞争。而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很好地完成。在干部当中大量存在着官僚主义、封建家长制作风和“一言堂”现象。有些干部，不知道他的职责是保护人民的利益，保证人民的自由和平等权利，相反，却把“监督”群众作为自己唯一的工作，重用打小报告的人，动不动就找岔子整人，严重挫伤了群众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崇高威信。在这种情形下，还谈得上什么发挥群众的创造精神！

与“竞争”相适应，国家的政治制度应实行民主制，也就是说，要有普选制和代议制。尽管我国实行的是这种制度，但是由

于没有采取“竞选制”，以及代议机构不能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没有真正成为最高权力机构，特别是实际上不能行使罢免权，因而往往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比如：大多数选民不认识或不了解他们的候选人以及他的政治态度，他对人民将负何种责任（故陈阿大、张铁生之流也可以进入人大常委会）；党政干部实际上的终身制；人民的权力机构对真正代表人民说话的伟大人民英雄张志新反而不能保护，致使她被“人民法庭”惨杀；等等。

在我国各级代议机构中，有相当数量的代表是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或知名人士，他们中多数是有贡献的，是能够代表人民意愿的，但是他们中也有不少人对于自己的当选，更多的是把它看作一个荣誉和安排，并因此对党和国家感恩戴德，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保护人民利益的神圣使命。还有少数人更是压根儿就没把他的“选民”放在眼里。

人民的权力，是依靠代议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体现出来的。它如果不能真正起作用，人民的权力也就消失了，剩下的，只能靠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良心”了。我国的经济之所以还能有所发展，人民的利益之所以基本上还能得到保护，主要不是靠制度和法律，而是靠绝大多数经历过长期革命和战争考验的、有良心的老干部。事实证明，当人民的利益受到威胁和践踏时，人民往往是束手无策的。例如对干部中那些“土皇帝”，如果上级不来干预，人民就一点也奈何不得他。说句难听话，假如“四人帮”篡权成功，全国人大能通过投票把他们撵下台吗？不可能！即使人民了解他们的底细，不喜欢他们，也只好容忍他们，更何况绝大多数老百姓还根本不了解他们。

我们总说人民当家作主，这必须从制度的各个方面和一切环节予以保证，否则就是空话。

面对我国政治经济存在种种弊病而急需改革的现状，我们既不能消极悲观，否认自己有变革它的能动性；也不能过于急

躁,企图在一个早晨就消灭一切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并把一切暂时还安于现状的人都斥为庸人、市侩。我想,一个有志青年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发愤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科学文化知识,为改革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不合理的部分,为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美好前途而贡献自己哪怕是一点一滴的力量。

潘晓,我这点不成熟的看法,不一定说得服你。但我比你年长八岁,我愿象对自己亲妹妹那样,尽我的全力帮助你摆脱苦闷,重新建立追求光明的坚定信心。

上海 胡昆明

(原载于《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

寻求生活中的真善美

潘晓同志：

你的来信搅动了我的心。我以为我能懂得你，因为我是象你一样在人生道路上试步，在大千世界中苦苦求索人生之谜的青年。我曾有过类似于你的思想和感情，也有自己对人生问题不成型的见解。

经历使你得出这样的结论：人都是自私的；人，逃不脱为私欲而斗争的规律。

我相信，又不相信；同意，也不同意。

我不怀疑你的视力，你目击的那种种丑恶都是存在的，我相信。

童年时，我当教师的妈妈对我说：“你名叫‘一力’，生你是要你为社会主义贡献一份力。”我乐意地接受了这个命名，也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妈妈和尊敬的师长们发给我的水晶球般晶莹美丽的人生观。“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因为父亲的家庭出身和五七年的问题，我失去了上学的权利。16岁初中毕业，和一些“狗崽子”为伍下乡去了。接着，爸爸被革除公职，遣送下放；妈妈承受不了沉重的负荷，38岁那年撒手谢世……

动乱中的变故，不光粉碎了我的“水晶球”，还把我推到了现实生活的阴影里。妈妈死了，父亲不能轻举妄动，两个妹妹尚不能自立。我要求从农村调回来料理料理，被拒绝了；妹妹毕业了，我要求给一个妹妹安排工作——即使是最次的工作，也被拒绝

了……怕受牵连的熟人离我们远了，“革命性”坚决的人不惜给我们白眼和轻蔑了。我学会了叹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和你一样，我迷惘、痛苦。我苦苦地想：人，果真都是私欲的下贱奴仆？人间难道尽是魑魅魍魉？假恶丑是一时得势，抑或本来就是生活的真相？

找不到回答。我变得乖戾、桀骜不驯，以此对所憎恶的表示抵抗；我变得郁郁寡欢、落落寡合，因为我看不到希望。但是，我不甘心，不甘心把“水晶球”就此埋葬。我挣扎，我斗争；我到处寻求答案，到处寻找希望。

我发现一些应该落魄的人生活得很不错，我问他们是怎么想的。一个有“严重问题”的人回答我说，他非常痛苦，但是并不失望，因为他认为这一切都很正常。我不甚理解，但他的境遇和他的生活态度却使我相信这不是阿Q式的说谎。他们有他们的思维方法。他们说，按照我这种病态心理，永远找不到真谛，应该相信科学，科学会矫正我的不平衡的精神状况。

参加教育工作后，因为工作方便，也为了寻求答案和希望，我读了一些书。和你一样，对黑格尔很感兴趣，他的“任何虚妄的东西里都含有些真实的东西”的哲理尤其给我以启迪。

我试图在我身旁的“虚妄”里寻找“真实”的闪光。果真，我看到了一些美好和善良。我下乡的地方是穷山僻壤，非常落后，但是相对而言，人们淳朴敦厚。我住在队长家，队长夫妇见人就说是他们的大姑娘，一般农家能给儿女的，他们都给了我。队里有人议论我出身不好，队长骂道：“嚼舌头！关她屁事？人家哪一条不比你们的姑娘好？”我被感动了，觉得人类并不都冷若冰霜。

这区区发现远不够解除我的疑问和失望，但是我确实相信，世界上还存在这样一种东西，它们叫真实、美好和善良。一旦承认了这个前提，原先看来是一片暗影的人世平面图便有了立体感，犹如一个几何体，在暗影的另一面，必定有光。

妈妈死后，我们领略了不少世俗的冷炙，也感受到了可贵的人的高尚。一个自己境地也不佳的阿姨常来照抚我妹妹，帮她们一分一分地计划着那微乎其微的生活费；刮风下雨，她总拖着病体来看望，怕万一破房子塌了；逢年过节，总要把想娘的孩子接到她家，斟一杯淡酒，要我们“有话在这里说，有泪在这里流，出去一定要坚强。要相信，不会永远这样”。和我们来往密切，对她是一个不好的影响，每当她跨进我们的家门儿，就有异样的眼光扫着她的背脊。我们痛苦地劝她顾及顾及影响，别再管我们，阿姨觉得顾不了那许多，影响坏就坏呗，舍出去了。

这是一种牺牲，不计报酬的自我牺牲，联系我们的不是金钱、权势、血缘，没有任何值得交换的条件。直到今天，我也没对阿姨说过一声“谢谢”，我怕这会使她伤心。她做这一切时，决计不是为了谋得利益。人与人之间，不是只有丑陋的利害关系；人，不都是只为了自己而忙碌。

这样看问题之后，我的衰弱的美感神经逐渐恢复了健康。在朋友里、同事中、老师处，甚至邻居一个小孩子那里，我都不断地挖掘到一些美好的东西。我工作遇到了难题，和我合作的老同志比我还着急；我决计业余学习，朋友们暗地替我努力；我不大注意料理琐事，同事们记着给我打开水，女伴们悄悄帮我洗衣……这些都点点滴滴，微不足道，远不象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那样值得举世称誉，也不象保尔·柯察金那样值得世人仿效。但它们都比成打的引证更叫我心悦诚服。我相信了真、善、美是存在的，不但在艺术境界中，也在距我们咫尺的地方。

据此种种，我认为：现实中有假恶丑，也有真善美；人，是自私的；人，也是高尚的。

和你的结论有了出入，潘晓，你同意我的看法吗？在我们初晓事理的时候，大量地接触到现实的黑暗，我们的感官畸形发展，美好的东西往往被误会，对丑恶的东西分外敏感，于是我们

以怀疑的眼光注视社会和人生,以至陷入无法自拔的泥潭。不是吗?潘晓,在你困窘的时候,不也得到好同学的帮助,得到街道办事处同情吗,这些不也显露着一种道义的力量吗?

潘晓,你说没有任何圣人、俊杰能完全摆脱私欲。想了想,我也不敢断言谁是经过无私的酒精消过毒的榜样,而且就是我自己看见过的美好事物也有它自身矛盾的地方。比如,队长夫妇虽然令我尊敬,但他们也和所有的人一样,为几个工分红脸,为几个红苕打架。不过,我相信老黑格尔这段话:“我们必须断言真理不是一种铸成了的硬币,可以现成地拿过来就用。同样地,既不是现成地有一种虚假也不是现成地有一种过恶……不同一性作为否定性,作为自身还直接呈现于真理本身之中。”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是错综复杂的,自私和无私相比较而成立,真善美和假恶丑也是互相交织的。要是现实就象一个穿衣柜,朝门的一面亮,背门的一面暗,黑白分明,何须我们那么痛苦地探索,以至付出了无法计算的代价?

广漠的宇宙中,一切又永远无休止地变幻着。有时候,假恶丑的东西飞扬跋扈,气势汹汹,掩盖了真善美,但前者终于会被抛弃,后者终会发展。我相信这一点,凭着猿变成了人,凭着茹毛饮血的原始人一步一步进化为现代人,也凭着近几年来看到的正义被伸张,邪恶被惩训。不过,这种发展必定是极其艰难曲折的。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摆着寻求真善美、追求真善美、创造真善美的永久性课题。

我认为生活中存在着真善美,却苦于知识的贫乏、阅历的肤浅、思想方法的偏颇而不能把握它。让我们共同探索,共同追求吧!

北京师范大学 杜一力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

走出思想的死胡同

鲁 临

两年以前,我是第二个潘晓,也曾在绝望中挣扎过。同潘晓一样,我从懂事起就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向往,一个心眼热爱毛主席。我每做件好事,都看作是毛主席让我做的。看到毛主席像上有点灰,就用新布擦去。我曾在大会上背诵过“老三篇”,二百多页的《毛主席语录》,基本上能背诵下来。我下决心干出一番事业来,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另一方面,在阶级斗争教育的熏陶下,我从小警惕性高,对阶级敌人恨得不得了。每当我在电影、戏剧、广播中和报纸、书本上看到、听到阶级敌人还在活动时,就主动在社会上寻找。有一个人穿着破烂,我就怀疑他是特务,跟踪而去,并向老师报告;我在公路上捡到一块水果糖,也怀疑是特务故意扔下的毒糖;见到地、富、反、坏的子女手中拿着一个笔记本,我也怀疑是变天账,非亲自过目后才放心。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上小学五年级。我积极报名参加了红卫兵和校串联队伍,当时我是串联队伍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从这时起,我便开始了所谓“政治生涯”。我每天手拿语录本,臂戴红袖章,参加批判会、大辩论、游行,感到很新鲜,很热闹。我还独自到中学和县里去参加批判会,看看县里又揪出来几个“阶级敌人”。我有一个笔记本,专门用来记被打倒的人的姓名。后来,报纸、广播、传单点了许多人的名字,记都记不清了。听说这些被打倒的人都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妄图复辟资

本主义，让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对他们恨极了，打他们骂他们，我都感到应该。因为对“阶级敌人”同情，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嘛！

可是，随着运动的开展，“文化革命”竟革到我爸爸头上来了。红卫兵们说爸爸镇压红卫兵运动，是反对毛主席的走资派。开始，我不相信，爸爸经常对我讲要听毛主席的话，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看到爸爸被揪到街上游斗，嘴里含着稻草，手里举着稻草，不时被人用木棍打着，我心疼地流泪了。可过后我又想，毛主席的红卫兵还能说假话，还能乱来吗？为了忠于毛主席，我产生过和爸爸决裂、改名换姓的念头，并为有这样一个爸爸而感到羞愧。

对“反毛主席”的“阶级敌人”我恨起来了，对“拥护”毛主席的林彪等“忠臣”我亲起来了。当我手捧语录本，真挚地高喊“万寿无疆”时，也总是虔诚地高喊“身体健康”。可是，万万没想到，我认为是“最最最”拥护毛主席的林彪，竟然妄图谋害毛主席。天哪！世界上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糊涂了，我迷惘了。然而，我还是很快就对林彪由爱戴变为仇恨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妄图谋害毛主席。至于其他，则很少考虑。

“九·一三”之后，毛主席号召全党认真学习马列主义。于是，我买了十几本马列著作，用几个月的时间就读完了。对《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和《毛主席语录》，我更是读了一遍又一遍。由于我学习时只看有关阶级斗争的只言片语，越学，阶级斗争观念越浓。我把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前阶级斗争的状况和表现形式搬到了七十年代，这样，“阶级斗争为纲”，“党的基本路线”成了我的座右铭，时刻记在心。

当时，“四人帮”在我眼里是一副“毛主席的好助手”、“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面目，于是我把过去对林彪的爱又献给了“四人帮”。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我积极参加斗争，为写批判

稿,为办专栏而废寝忘食。我在批判发言中说:“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机器可以不开,地可以不种,阶级斗争不抓不行,否则,就是对无产阶级的最大背叛。‘三项指示为纲’就是大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大搞唯生产力论,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其要害就是反对毛主席,复辟资本主义。”当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提法发表后,我到处搜集事例,来为这一提法找根据。就在我满怀“无产阶级的义愤”狠批“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传来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我哭干了眼泪,站在毛主席像前默默宣誓:一定要睁圆眼睛,严密注视阶级斗争新动向。谁篡改您伟大著作中的一个标点符号,我就和谁血战到底!

时间不长,“四人帮”被粉碎了。消息传来,我比听到“林彪自我爆炸”时更糊涂了。传达中央文件之后,我才知道恰恰是“四人帮”篡改了毛主席的指示。这对我是当头一棒。但我很快对“四人帮”恨起来了,因为反对毛主席的人,我一听就恨。不过,我数着中央许多下台的人,又象吞了块冰似地透心凉。从这以后,我吃饭少了,抽烟多了,脸黄了,体重大大下降。难道真是自己错了吗?我心里不服气,又把毛主席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所作的一系列指示全部温习了一遍,学习的结果我感到自己的言行基本对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的热潮随之兴起。党中央实事求是,拨乱反正,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而我对这一切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反而认为党中央实行的政策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总觉得现在搞的这一套不符合革命的观点。

作为一个党员,对党中央不信任,该有多么痛苦啊!我当时感到自己确实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曾产生过退党的念头。

以后,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我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

“胜利成果”产生了怀疑，对极左路线也开始打问号了。生活中的许多事情迫使我重新观察，重新思考。我有意识地跳出老框框来观察周围的变化，并尽可能地去作一些调查。事实终于无情地向我证明了：不是中央的政策不对头，是我自己的思想有毛病。于是，我再次学习了我以前为寻找阶级斗争的词句而翻过的马列著作。我力求去理解这些著作的主要思想和基本方法，不再搞简单对号和只言片语。这样一来，一些过去似乎完全没有看见过的道理，都明明白白地写在著作中。这对我的思想震动特别大，我意识到自己盲目无知到了何等程度。过去，我一直认为领袖的话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从来没想过，也不敢去想领袖还会有说错话、办错事的时候。这是一种迷信。今天，党中央破除“两个凡是”观点，拿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地承认党和领袖有哪些缺点错误，为刘少奇等同志平反了冤案，而且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实行改革，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路线。过去，我处处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以为这样就是为党工作，实际上我恰恰是被教条主义和阶级斗争扩大化引入绝境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恶性发作和必然结果。阶级斗争扩大化不仅坑害了两代人，而且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灾难，也使我办了不少错事、蠢事，甚至钻进了思想的死胡同……

头脑一旦清醒，眼睛一旦睁开，一个正在逐步克服自身缺点的朝气蓬勃的党，一个正在医治自身创伤的生机勃勃的国家，就展现在我的眼前。我真是百感交集。回顾自己的过去，正可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十年浩劫遗留下来的问题、困难、麻烦确实是堆成山，但我们的党毕竟正在着手解决这些问题。我看到了前途，看到了光明。这才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就是我在如何对待现实社会的问题上，态度转变的过程。

我的经历与潘晓同志的经历有很大差异。但我想,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我们的现实社会?怎样从各自不同的思想苦闷中挣脱出来?这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体相似的课题。因此,我写了自己的一点认识,为了“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也为了给潘晓同志提供一点参考。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

回顾与“看透”

潘晓同志：

我是个在劳改队里埋葬了 17 年青春的人，今年才得到平反。你的信引起了我很多感触。我也想谈谈“人生的路”。

我在 19 岁以前，也象你一样，对人生充满了憧憬和幻想。保尔那段曾经激动过你的话也同样激动过我。我从书本子里“树立”起了自己的革命人生观。我崇敬刘胡兰、董存瑞和黄继光等英雄，并且努力模仿他们的言行。还有一点和你相同的是，我小时候也经受了经济上的窘迫。中学六年，我除了享受为数不多的助学金之外，还要利用寒暑假和星期日去挖藕，摘菱角，拉板车，挣钱补贴家用，有时学期中间也请假去做小工（夜晚补课）。

1956 年，我读小学六年级时，写了篇很幼稚的中篇童话故事《小白猪成长记》，没想到被县里评了个“文学创作二等奖”，发给了我一个铜制的牌牌。这牌牌激起了我的幻想，以为长大了可以成个文学家。也是从这时起，我在当地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县委有时还抽调我和写作组的大人们一起“下乡写典型”。

“大跃进”时代，我参加了大办钢铁，把千家万户的锅砸碎炼成一堆废料，把漫山遍野的树木砍下来堆在山凹里点起一把大火，然后请省委检查团在月夜登上城楼，遥望着四面八方通红的火光，赞美“先进县的土高炉群”。我享受了一个半月“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饱”的生活，然后捧起“一吹九层浪，一吸三条沟”

的清水米汤；同时又奉命撰写“水稻亩产两万斤”的典型材料……这里，我要抄下你信中的一句话了：“我隐隐感到一种痛苦……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正在这时，我的父亲饿死了，一个在旧社会讨过米做过长工的劳动者终于饿死了……文学家喜欢谈“灵感”，我一个十七岁的业余作者不懂得什么“灵感”。可是这个事实强烈地震动了我，我把一个古代神话故事改写成了剧本《夸父追日》：夸父发现太阳上面有黑子，便追赶太阳，向太阳“反映大地的真情”，说只有清除黑子，太阳才能变得更光明……就是这个剧本，使我倒了大霉，不过这是后话。

1962年，我高中毕业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但恰逢我校校长考场舞弊被察觉，连累我和许多同学入学资格一律作废。第二年，我又考取了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但是，剧本的事情发作了……我被判了三年徒刑。可是，我不停地申诉了17年。我写的申诉书，字数相当于《红楼梦》的三倍。我到中央上访3次，到省城上访93次，到地、县上访无数次。终于在今年二月四日，获得了“撤销原判，宣告无罪”的结论。

一个人的遭遇常常从侧面反映出一个时代的面貌。而人的思想又总是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的。可是，到底怎样认识社会和人生，这同我们怎样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怎样分析所遇到的人和事，是有很大关系的。潘晓同志，你说你已经“看透”了，但是我却还没象你那样“看透”。我正是从回顾过去中汲取到“动力”的。

象你一样，“我不甘心浑浑噩噩，吃喝玩乐了此一生”。我喜欢观察和思索，喜欢看书。在劳改队里，为了保卫自己的看书权利，有时是需要动拳头的。我动过拳头，并且多次头破血流。但是我没有一天丢开书本，所以我才没有自杀，也没有疯。潘晓同志，人怕拼命，所谓“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就是拼命，同时加谨慎，借助17年的苦读，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法学

进行了一点系统的学习研究。我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同时,也读黑格尔、费尔巴哈、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欧文和圣西门等人的著作。但我觉得,他们讲的道理,都不及马克思。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真正讲清楚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教给我们认识复杂多变的社会和人生的正确方法。潘晓同志,你提到黑格尔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但是没有提马克思主义,不知是否由于对马克思主义还不够熟悉。现在有些青年人,似乎对马克思主义不大相信了,但你问他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他却又答不上来。我觉得应该持这样的态度:对一个主义,也象对一个人一样,你只有对他比较熟悉,并且把他和别的人作了科学的比较之后,才能正确决定应该不应该相信他。

和你一样,我自小爱读文学作品。福楼拜、大小仲马、左拉、雨果、莫泊桑、巴尔扎克、歌德、莎士比亚、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别林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高尔基、马克·吐温和中国的鲁迅、茅盾、老舍……都是我喜爱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除了帮助我提高写作技巧,也帮助我熟悉历史,俯察人生。看到和今日相似之处,我凄然一笑:原来“古已有之”!我是四十年代在中国出生的青年,我之坚信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既来自《资本论》,也在相当程度上来自文艺作品。

我是个九死一生的人。我亲眼见过许多人死亡,光是自杀的方式我就见过多种多样。我也见过许多人的升降荣辱。跟你一样,我也受过爱情的创伤。我救过一个姑娘的命,后来和她订了婚,但她大学毕业后竟离我而去,因为那时我还没有平反。也有“好朋友”在压力下为了保他自己而写假材料检举我(现在皆已澄清)。可是,我这半生中却也感受过巨大的温暖和友谊。在我17年的蒙冤和申诉的过程中,如果不是素不相识的人慷慨帮助,也许我早已饿死在上诉的途中了。我遇到过不少官僚主义者和滥用职权的人,但也遇到过《神圣的使命》中王公伯式的干部。

这许许多多的“好人”和“恩人”，在我的心中逐渐凝聚成一个整体，这整体的名字就叫做：“人民”！这个词，对我来说是那么亲切，它带给我永恒的光明和温暖。哪怕是处在零下 20 度的严寒里，我的心也不会结冰。

潘晓同志，你在痛苦之中找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但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你的“深刻启示”是否就真的完全合乎事实呢？既然布鲁诺、刘胡兰、彭德怀和张志新们用他们的行动和生命，证明了“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确实大有人在，那么葛朗台式的人物也就不可能独霸空间了。这样，你的“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道理，“为私欲而斗争这个规律”，连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深刻启示”等等，就有被动摇的危险了。我们不能由于上过江湖骗子的当，就根本否认世上有真正的医生呵！但医生自己是不是就不吃药呢？高尚的人是不是就不吃饭呢？那也不见得。所以，“少劳动”而硬要“多争工分”，其人定不高尚；但确实干了那么多活，却遭到无理克扣以致影响基本生活，因而不得不争，则又当别论。以为“高尚的人”必须处处和我们普通人不同，简直要不食人间烟火才算合乎标准，这也是一种误解。我认识一个人，他眼里揉不下一粒沙子，而且脾气暴躁，有一次为三个工分争得脸红脖子粗，但另一次却又将仅有的十元钱送给了一个孤儿。

潘晓同志，当你感到“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的时候，可否把眼光也看一看别人呢？一杯苦水里加几匙黄连，其味更苦；但一颗苦心多了解一些别人的苦处，却会得到安慰，并且使自己的心怀更宽阔一些。

再谈谈今后我打算怎样继续走“人生的路”。平反之后，我被分配当了小学教员。工资很低，还欠了因上访而借的 880 元债务，可想而知，我的生活是什么状况。但是，我还是确定了要走的奋斗之路：下决心把学生教好，同时动手写一部反映我国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的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

我写小说为了什么？是“不甘心社会把我看作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吗？我早已没有这种雄心。我也不想“用我的作品来表明我的存在”。巴尔扎克说：“青年时代我渴慕声名，然而当我费尽平生之力获得这一切的时候，面对镜中的白发却增添无限的悲哀。”这道理我不是不懂得。老实说，如果我的动力是这个，我早就不干了！我前半生受的磨难是这样多，还要为此而苦熬，我会认为划不来。

但我终于还是在拼命写作。用钱是一分钱一分钱地计算，用时间是一秒钟一秒钟地“硬挤”……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说来简单：半生坎坷，所历所见，我有很多感受。幸运的是，我的这些感受同我国人民这二十年的遭遇是凝成一体的。我要为这二十年留下一幅忠实的画卷，以使人们感奋起来。我认为，这就是我自己的“人生意义”。

那些我要写出来的事情本身，强迫着我快些把它们写出来。潘晓同志，你体验过这样的情绪吗？这真是“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极端困扰，无比纠缠，十分哀怨，百倍甜蜜，你同你所要写的东西心心相印，血肉相连。套用你信中的一句话而稍作修改：“苦恼的人是把他的全部追求都投入事业，只有在事业里才获得生命的支持力。”当你达到这个境地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感到充实、快乐、有力量”。不足的是：由于“光阴似箭”而感觉的焦躁，由于知识不足而产生的苦恼和由于精力有限而产生的疲倦……

小说写成之后，我打算回到政治经济学方面去。因为通过前些年的钻研，我在这方面有一些别人似乎没有说过的见解，很想把它写出来。至于能否完成我的“人生计划”，或者完成了还剩多少时间，那就要看现代医学对我作怎样的“安排”了。人生有限，我们既然到世上来走了一遭，能够看准一个目标，从事一项事业，尽心尽力，也就于心无愧了。

为了认清今后的路,我们不能不反省过去的十年,不! 十年还不够,应当回顾二十年。二十年,这是个不短的时间呀,它整整影响到两代青年。由于现代迷信逐步发展,吹牛拍马应运而生,科学和民主越来越受到冷遇,荒谬和专横代之而起。其结果是,十年浩劫……正是由于二十年来,特别是后十年,马克思主义受到了歪曲,社会主义被扭变了形,这样,就生出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青年们非常气愤的社会风气问题,和中老年人十分关注的青年问题。今天,关于这一切历史的验经与教训,党和人民正在总结。

我们的党,虽然走了那么一段弯路,而今已通过对彭德怀和刘少奇等同志以及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通过确立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放射出了实事求是的光芒!这些有目共睹的事实,激励我们奋起。我想,我们从各个方面都来为发展经济和改革社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么,不仅有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还可以加深我们对人生意义的理解。

湖北蕲春 刘 英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

为合理的道德观说几句话

潘晓同志：你好！

经一位同学介绍，我看了你的信，在那里，我看到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最可珍贵的东西，这就是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献身于事业的渴望。当然，也看到了你的彷徨和疑惑。尽管我们素不相识，还是决定给你写这封信，谈谈我对“为己”与“为他”的认识。

大多数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历史发展的前提之一

从小学到中学，我也一直是通过一层筛子来认识社会的。这筛子把社会上的不良现象都给筛去了。以至当我走上社会时，对周围的人都抱着过高的期望。两年的农村生活，四年的军队生活，两年的工厂生活，使我发现，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士兵都并不是雷锋式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他们有个人的利益，也有极力要满足这种利益的欲望，更有为实现这种欲望而作出的各种方式的努力。这一发现使我陷入极大的思想混乱中。以往，关于人类将不断进步的信念，我是以相信大多数人都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为前提的。现在这个前提显然不存在了，那么社会又是如何进步的呢？于是我看了不少的书，更多的是观察了自己周围的人，渐渐地我醒悟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多数时期，大多数人

并不是在一种毫不利己的思想支配下行动的，而是受到一种切身利益的驱使，才行动的。大多数人自我生存和发展的欲望（可以称作私欲吧）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之一，也可以说是一种初动力。因为只有大多数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整个社会的生产才能不断进行下去，从而社会才能不断进步。

也有这种情况，当某种社会制度严重压抑了大多数人的物质利益时，大多数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方式就一致化起来，为自己利益的奋斗就转化成为整体利益的奋斗，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也就转化为改革现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要求。这时，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不再追求个人利益了，而是改变了追求个人利益的方式；个人的欲望并没有消失，只是作为行动的潜动机，潜藏在为“公”的动机背后。这种潜动机也许并未被当事人明确地把握，但它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

当然，任何社会，尤其是社会大变革的时候，都会出现许多情愿牺牲个人利益，完全凭着对社会发展趋势的了解而投身于历史运动的人，这在知识阶层中特别多见。但这种人终归只能是社会中的精华，而不可能是大多数；大多数的普通劳动群众，始终是从个人的切身利益出发投身于革命事业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同意第八期上李为民同志的看法。并不是毛泽东“完全”“彻底”的语录使千百万革命战士抛头颅、洒热血；事实是，千百万农民对自己拥有一块土地的渴望，共产党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蒋介石对分得土地的农民的残酷杀害，——正是这一切，才使得千百万农民参军打仗，英勇牺牲，去换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没有千百万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中国革命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这是一个多年来为宣传家所忘记，或虽未忘记却没有从中引出应有结论的一个常识。当然，我并不否认宣传的作用，但在它掀起巨浪的地方，我们总能在巨浪下发现深深的物质利益的海洋。

大多数人更关心自己的吃穿住用和精神上的满足，把这些

作为自己大多数行为的出发点，这可能正是大多数人的正常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的历史、世界的物质文明，就是由这大多数关心自己的物质利益的人创造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因为现实生活向我们表明个人利益是如何有力地支配着整个社会生活而感到失望。你说对吗？

压抑个人利益的“公”是被异化了的“公”

由于过去对个人一概否定，使我们这一代人普遍对个人利益持一种鄙视的态度，造成评价人和事物的种种奇怪观念。任何事情，只要有一点点利于个人，似乎就是不光彩的，即使是做了，也一定要抹上种种不是为了个人的油彩。工厂里哪一个工人工作得较多较好，科研单位里哪个人有了成就，都往往会遭到一种舆论上的压力：“还不是为了自己！”

对个人利益的一概否定，把“公”说成是某种一定要通过狠斗“私”字一闪念才能实现的東西。这种观念使我们丧失了从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出发去判别一种政策是否合理的能力。十年浩劫中，我们目睹了极左政策给大多数人带来的不幸，但总认为这不过是为了“公”而牺牲人们的个人利益。而这个“公”已经被异化成捍卫某个人的政治地位，这个人即是“公”的化身，即是千百万人民“长远、整体、根本”利益的化身。一种政策，不管给大多数人带来什么损害，只要是某个人同意的，为了维护他的威信和地位，就一定要把它说成是“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反映。十年中，有多少出色的年轻人（如小说《枫》所描写的）为了捍卫这个“公”而流血牺牲啊，然而他们热烈为之殉身的“公”又有多少是真正反映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呢？它不过是使千万个纯洁的青年人在一种解放全人类的狂热中，为少数人打家天下。这对于死去的人是一场悲剧，对于我们活着的人则是一个教训。要记住：一旦我们把“公”与“私”绝对地对立了，某些人的私欲就可能假冒成“公”。这是异化了的“公”，是压抑了大多数人合理的个人利益

的必然结果。在一个缺乏民主的社会中,虚假的“公”特别容易冒充真正的“公”,这可能是那些极力为一己私利披上一层“公”的外衣的野心家们特别喜欢搞法西斯专政的原因之一吧。

《共产党宣言》告诉我们:“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可见,共产主义并不消灭个人利益,而只是改变了以往社会中满足个人利益的损人方式,使每个个人的利益都可以通过为公的途径来实现。

应当肯定“合理为己”的道德观

私欲,只有在它损人的时候才是邪恶的,在不损人的范围内,它是人的本能的一种合理要求的表现。你把争工资、争奖金不加分析地一律看成是不良的恶习,并因此而遭受内心矛盾的折磨。我却认为如果一个人所争的只是根据按劳分配原则所应该得的,那就没有什么可责备的。难道要把自己应得的也让给那些不配得到它的人吗?矛盾暴露的结果,反到有可能促使社会逐渐制定出一套越来越合理的衡量个人劳动贡献的标准来,按劳分配的原则就能得到越来越好的贯彻。相反,如果大家都去做谦谦君子,那么判定合理标准的迫切性就不会很强,而一些人就会利用这种标准不明确的情况少干多拿。

李为民同志认为,不损人的利己是不存在的,利己就不能利他,就不能为公。这种观点,忽视了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会统一,忽视了“度”这个概念,是脱离具体的社会经济基础抽象谈论“公”与“私”的结果。在公有制的社会中,按劳分配的原则使得每个劳动者的收入可以随着他对社会贡献的增加而增加,这就使得个人的私欲可以通过利“公”的方式来实现。

我们现行的许多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事实上已经承认了

大多数劳动者是为了使自己生活得更好而工作的。如果我们肯定了这些经济政策,也就应该肯定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否则就必然认为这些政策助长了人的私心,因而是修正主义,是渡过经济困难的权宜之计。这就无法保障这些政策的稳定性,四化更无从谈起。

当然,有人会讲,为已的本性使得人们常常想超出不损人的范围,消极懒惰、自私自利的现象也的确比比皆是。但要消除这种现象,正确的做法不是再发动一场对个人主义的新的十字军征讨,而是切实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健全制裁损公利己行为的法律和纪律,造成强大的道德舆论,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

那么要求大多数人实行的基本道德应当是什么样的呢?

要求大多数人实行的道德,必须同时具有先进性和可行性。我感到,大公无私的道德观固然先进,但不可能普遍地为大多数人所实行。可以说,从学雷锋开始的,以学“老三篇”达到顶点的培养一代大公无私的新人的运动,没有达到既定的目的(当然不是说它没有一点好处)对个人物质利益的追求,决不是通过对个别富有献身精神的人的宣传,或几本说教的小册子所能消灭的。如果继续把大公无私作为每个人必须实行的道德准则向现在的新一代宣传的话,人们就要准备在若干年之后再一次面临对人生的怀疑,对社会的失望。但我也憎恨那种只顾自己、不惜牺牲别人的冷酷的自私心,因为这种损人利己的道德不适应于现在的经济基础的要求。我想,除了这二者以外,还有第三种道德,既比损人利己的道德观先进,又比大公无私的道德观更能为大多数人所实行,这就是合理的、不损人范围中的为已。

这种道德观的主要要求就是不损人。它允许每个人从为已的动机出发去行动,但不允许这种行动损害其他的个人(如果这些个人并没有损害别人的话),更不允许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即不允许损“公”。赵林同志认为,一切关于“公”的观念都是对个

人的压抑,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这种观念作为对多年来压制合理自我的虚假的“公”的反抗,是合理的,但否认了真正的“公”的存在,就有点失之偏颇了。在我看来,真正的“公”并不是与广大劳动者的个人利益毫不相干的、难以捉摸的东西,也不是广大劳动者每个人不尽相同的个人利益的简单总和,而是他们的追求中带有共性的、反映他们根本利益的、需要协力奋斗才能实现的个人利益的集合。因此,损害了真正的“公”,实际上也就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因而是不能允许的。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虽然没有直接损害任何个人,但却破坏了社会的生产资料,这个人的为己就是不合理的。如果有人从为己的动机出发,对损人的行为不加制止,当老好人,那么这种为己也同样不合理,因为它们都间接地损害了别人的利益。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在今天仍然存在着那种为了“公”或为了他人而有必要牺牲个人利益的场合。在这种场合,如果不牺牲个人的利益,那么他人或“公”就要受到损害,这就超出了合理为己的范围。在这种场合,不损人的为己就转化成为了不损人而牺牲自己,它实质上是不损人的为己的道德观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表现。

在社会发展的现阶段,确实仍需提倡这种为公而不惜牺牲自己的道德观。但是不要忘记,提倡它正是为了消灭它,正是为了建立个人通过为公就能使自己全面发展的社会,建立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人的全面发展互为前提的社会。在那样的社会中,公私同利仍然是人们调节相互关系的准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卷275页)总之,在现阶段,我们要充分

肯定大多数人的“合理为己”的道德观，同时要特别指出，这种道德观在一定场合里是要求为了不损人而作出必要的个人牺牲。这种牺牲，不是为虚假的“公”所作出的牺牲，而是为了消灭马克思所说的产生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而作出的牺牲。没有过去的许多优秀人物自觉作出的这种牺牲，人类也就不会进步到今天这种地步；同样，没有今天的优秀人物继续作出这种牺牲，我们也就无法达到个人充分发展和社会充分发展相互补充的社会。

潘晓同志，你的经历确实是值得人们同情的，而且那样的经历也是很容易使你对人丧失信心的。但如果有人因此而指责你对世界的看法太阴暗，我是不能同意的。人们为什么不去驱散笼罩着一个人的黑暗，而偏要去指责这个人心目中的黑暗感呢？你应该振作起来，尽力奋斗。对真理的渴求，是人生最崇高的愿望；追求真理的生活，是最有意义的生活。当然这种生活并不一定是快乐的，因为这往往是一条通往地狱之路。但无论如何，那一颗追求美好，渴望献身的赤子之心是永远不能被忘却的。

杭 州 雪 华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9期）

我们社会中的人怎样被“模式化”了

旷洋 郑宁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牵动了我们的每一根神经。可是问题不早就有了一套现成的答案么——“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为革命献身”“为人民服务”等等。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些具有更为标准的意义呢？于是，一切问题都沉寂了，思想退隐了……

然而，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总算学会了不在这种诘难面前退缩。生活早已深深地告诉我们：只从望远镜去看待世界是怎样一种可悲的局限！请不要简单地高举着结论向青年们高喊：“真理在这儿，向它跪拜吧。”我们这一代人的思考正是从这里出发了。思想迎刃而上，我们仍旧把问题摆在时代的门前。

满怀着献身精神热望的这一代人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也就是我们的青春时代）做了些什么呢？面对这个使人窘迫的问题，大多数诚实的人却只能如此回答：“我活过来了。”生活象教训每一代人那样教训了我们：“人生并非充满了玫瑰花，倒是有时路上的荆棘刺痛了你。”（巴尔扎克语）我们仿佛从万丈高崖上被一下子砸下来，单纯的信念碎为齑粉。过去成了一个粉红色的梦，而未来被推向了彼岸。像大陆漂移一样，思想与现实无情地分开，痛苦的距离感在我们心上蔓延。而我们也难以把握自己，似乎自己只是一个混沌的存在。在遵从习惯思考的那些脑筋看来，这也许就意味着不贞，意味着背叛。但作为一个人，这却是

思索的开端！

现在，公开的讨论终于开始了，我们想说的是自己从感觉直接出发的思考，从现实生活中直接提出问题并努力探寻可能找到的答案。

人生问题——在相当意义上也即是“人——生活”问题的提出，直接起因于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使我们目睹了人的基本权利丧灭殆尽，人的尊严受到粗暴的践踏；目睹了疯狂煽动下的自相残杀；目睹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告密、提防、自保而极度恶化；目睹了“早请示，晚汇报”的种种宗教式的礼拜，在竭力繁殖人的自卑感与赎罪感；目睹了虚伪盛行，奴性泛滥；目睹了人的完全异化……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对人的理解存在一种概念化、模式化的倾向。一方面，在理论上强调历史具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时，却没有把这种规律深刻地理解为就是人的实践本身，好象历史是凌驾于所有古人今人之上的自在自为的主体，而具体的人仅仅是实现这个主体的工具。这样，就忽视了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摸索的实践过程，是需要这个时代的人依据环境条件不断进行反馈和作出创造性自决的历史过程。这就给先验论的种种危害开了方便之门。另一方面，由于在相当程度上把集体主义理解为整体主义，忽视了集体的构成问题，仿佛个人只是这架机器上的零部件，自身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意义。这就导致了忽视个人价值现象的产生。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模式化理解的倾向，在五十年代即有所表现。结论不从现实中得出，必须以某一条经典著作的语录为前提。这种教条主义的恶习，使得社会学、人口学、摩尔根遗传学等关于人的科学早在五十年代就遭受到极其狭隘而又粗暴的压制。丹麦文艺批评家勃兰代斯有一句深刻的话：“精神上的‘聋’，结果造成了‘哑’。”中国的历史上这十年的惨痛教训再次

证明,哪里科学遭受挫折,哪里就有专断产生。

下面,我们想初步简略地谈谈关于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的模式化理解的一些方面。

关于人性

人性这个概念,在我们这里向来仅仅被视为阶级性的派生物,而且被便宜地丢给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因为“人性论”被规定为蒙蔽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的一种卑鄙的宣传伎俩。于是,象“母爱”“情爱”这样一些字眼对于人们是讳莫如深的。我们因之看到了一种奇怪的宣传现象:好象世界上除了阶级友爱而外,不会再有别的什么人性可以存在和可以实现了。即便是谈及同志爱,也往往只是在柏拉图主义的意义上被使用。“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最自然的关系”这话如不是出于马克思之口,恐怕也要大受非议的。

共产主义运动是什么?究其实质是“人性的人”的复归,是“人的解放”。(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确认社会主义社会中充分实现人性价值的重大实践意义,其后果是什么?是失却了社会进步的一个具体评价准则。对于人性的偏见,除了极大地阻碍了文学、艺术等的健康发展外,更重要的是直接贻害于人们的生活,人的正当欲求与人的发展受到压抑,导致了人的“双重性格”。“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是灭绝人性!是兽性猖獗!是精神与肉体备受摧残!为此,我们民族当恸哭好几个世纪!

关于人的现世性

从小,我们在生活中习惯于面对两个方面:其一是苦难的过

去,其二是光明的未来。但我们却不大听见具体地谈论现在。“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常常被庸俗地加以解释,于是出现了一种过分强调“牺牲”的生活哲学,似乎这一代人的存在只是具有一种中介过渡的意义。当然,社会主义从理论上来说是一个过渡时期,但从实践上来说,这却是好几代人唯一的现实生活阶段。如果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不是明确地、不断丰富地体现在我们现实的具体生活中,又体现在何处?革命先辈为了我们,我们又只是为了下一代,如此循环,终于胡底?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的每一代人的任务,正是不断创造并全面发展生活的丰富性。在十年浩劫中,人的现世性的意义完全遭到了消灭:天堂在上,地狱在下,人间的悲欢离合是无所谓的,需要的只是无穷无尽的殉情、殉身,这有多么荒唐!应当说,如果现世的人萎缩了,不是愧对先烈的遗愿,愧对后代的眼晴吗?因此,请不要用未来局限现在。

关于人的感性存在

马克思指出过在社会主义前提下人的欲望具有丰富性,并进而指出它的实现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活动和人的本质的新充实。”(《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但是在我们这里,人的感性存在却常常被模式化,仿佛人的七情六欲如果不是“为了革命”,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和实现的权利。所以,人们好象只能说自己吃饭、恋爱、生孩子都是因为“革命需要”。“历史”“人民”“阶级”等概念也经常脱离人的生活的抽象意义上被使用,因而也就抹杀着人的感性存在。这种倾向反映在以往不少的文艺作品中,则无血无肉的概念化人物比比皆是。

十年浩劫中,强制推行的禁欲主义简直达到了中世纪教会的黑暗水平。在社会生活中,由于人的各种感情存在得不到公开

表现,因此只得在个人生活的圈子中是一个人,在公开场合又变成了另一个人,这另一个人不是别的,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伪!卜迦丘在《十日谈》中写道:“……这般人是多么愚蠢——尤其是有些人还道自己的力量比人类的七情六欲还大,只要他们搬出一套荒唐的谬论来,就可以强迫别人违反了自己的本性,按照他所定的为人之道做了。”在十年浩劫中,这种“愚蠢”居然变成了社会现实,这是值得深思的。

关于个人

在对人的模式化的理解中,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存在与个人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位置。

一方面,“阶级”常常被表述为人的唯一存在和真实本质,个人的一切感情、意识、言行都不过是阶级本质的直接表现或反映。这样,就把“阶级”视为超越于所有具体个人的“实体”或“自在物”。不难看出,这样理解的阶级,正是马克思所反对的人的“抽象本质”。在这种理解中,阶级不再成其为人的社会存在,活着的乃至死去的个人都只成了这个主体的现象存在。另一方面,在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中,对人的模式化理解偏重于强调个人服从集体,而忽视了集体的构成问题。我们经常看见的是,在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同时把“集体”弄成了抽象物。因此在许多场合下,“集体主义”所表述的不过是一种“整体主义”,即“集体”被先验地视为一种摒除了个人独立存在的“块状体”。于是,个性也常常被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混为一谈。这样,无视个性、压制个性的种种恶劣现象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个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创造力,是使得整个社会保持旺盛生机的重要激发因素。因此,充分发展个性应当成为社会主义的一个现实任务和课题。

关于人的多样性

生活的丰富性得之于人的多样性,而对个人的模式化理解忽视了这一点。要求思想、情操、性格等等的“划一”,必然限制人创造生活的多向能动性,使社会生活单调和缺乏生气。而语言的程式化也直接引起了思想的僵化现象。“划一”还带来了一张张完全一样的面孔,人的多样性实现因而失去了广泛的社会场所。于是,无数的蜗壳被建立,人们躲在其中苦心经营他的小自我,暴露在外的是清一色的硬而脆的壳体。在十年浩劫中,在所谓“统一意志”口号下的千篇一律的虚伪说教、极其恶俗的宗教狂的“忠字舞”,可笑至极的强行推广的“江青服”……种种封建色彩极强的愚民政策造成的一统天下,严重阻碍了人的多向发展及个性多样性发挥。

关于评价人

在对人主观方面的评价上,“阶级立场”这样一个字眼经常被不明确地使用,以致“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反动的”这样一类对人具有价值裁决意义的定语被随意滥用。由于人民被剥夺了解释权,这也使无产阶级成员自身吃了苦头。至于十年浩劫中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所造成的无数人间惨剧,就无须赘述了。

顺便指出一点,以往由于忽视了人的内心抉择过程的复杂性,从而助长了机械的环境决定论。并且,由于人的能动性未能从科学水平进行研究,也给唯意志论的泛滥提供了市场。

上述种种对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模式化的理解,其根本实质就是现实的、具体的人被放入了模式化的框架。今天在重建这

一代人的人生信念时，我们不应当也不可能再回到那些模式化的框架。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9期）

“大公无私”绝无 “公而忘私”确有

杨茂森

我认为，“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如同“大公无私”一样，只是人类伦理上的美好愿望。实际上，任何人也不可能彻底做到。“大公无私”的人，世上是绝对没有的。就是说，任何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点“私”，凡人如此，圣者也不例外。绝对无“私”的人是找不到的，除非他不是人，而是神。可以说，古今中外，圣者凡人，谁都戴不上“大公无私”这顶桂冠；谁受之，谁有愧。

然而，中外历史上，现实生活中，“公而忘私”、“公而舍私”或“先公后私”的人确是常有的。就是说，人类在处理“公”与“私”的关系上，确有为了人类、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阶级、为了集体、为了他人，而忘私、而舍私的人。那些革命家、英烈们就属这类道德高尚的人，是值得人们尊敬和效法的。在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许多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面对“公”与“私”的关系，也能够做到先公而后私，这是很可贵的。什么是社会的光明面？这就是。

由此，我联想到我们的宣传舆论工具。我们多年来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大张旗鼓地宣传“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不遗余力地宣扬“大公无私”，声嘶力竭地鼓吹“狠斗私字一闪念”，其效果究竟如何，人们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问题出在那儿呢？认真检讨一下，至少应该承认，这些口号华而不实，太极

端、太绝对了。人们对不上号,也做不到,所以不易接受,甚至产生厌弃心理。然而,如果倡导人们“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公而舍私”,却能收到比较好的社会效果,比较易于被一般人接受,人们也愿意为之而努力。

总之,人生观问题上的“假、大、空”也该收起来了!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9期)

“看透了”活得更积极

雷桢孝

潘晓和亿万青年的人生观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这次人生意义的讨论，应导致对社会的改造。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青年人，应当意识到自己就是改造社会的巨大现实力量。应当懂得什么是科学意义上的“看透”人生、“看透”社会，善于在有弊病的社会条件下发掘环境，调节命运，对改造社会发生自己的影响。

从寻找个人出路进而寻找社会出路

潘晓和许多青年朋友在自信“看透了”之后的那种苦闷彷徨，实际上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挣脱了思想束缚而不知向何处去的精神状态。其实，苦闷彷徨对于以往的麻木僵化状态已经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从苦闷彷徨再前进一步，就可以进入创造。历史上任何一次青年普遍的苦闷彷徨都造就出一批改造社会的杰出人才。

当然，停留在苦闷、彷徨之中是不行的。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存在一种认识上的盲目性。古往今来，存在两种“看透”论。一种是被社会的黑暗而窒息了，虚无主义、悲观主义等思想方法，使他们堕入一己的喜怒哀乐之中而不能自拔。这种“苦闷消极—虚度一生”式的“看透”，对社会，对个人都没有积极的

价值,并不是真正的“看透”;另一种是同样深切地感受到社会的弊病,但从不把苦闷引向消极,而是积极地寻求真理,探索改革社会的道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改造整个社会的创造性奋斗中,也提高了个人存在的价值。这种“苦闷—积极—改造社会”式的“看透”,是真正的看透。

这种“看透”,从科学意义上说,有三层含义:一是比较正确地认识了自然、社会、人生发展的基本规律,摆脱了认识客观世界的盲目性;二是比较正确地认识了自我,从而找到了发展自己、改造社会、造福人类的道路和办法,克服了认识主观世界的狭隘性;三是在正确认识了主客观的基础上,激发出一种内在的力量,去为包括个人在内的全人类的幸福积极地奋斗!

从寻找个人出路进而寻找社会出路,这是“看透”的重要标志。秋瑾写到:“芸芸众生,孰不爱生?爱生之极,进而爱群。”潘晓和给潘晓来信的以及关注这场讨论的亿万青年,从追求自己个人的人生意义开始,正在逐步进入热爱众多人的人生意义(即社会意义)的精神境界。这是思想上一个质的飞跃。

五四时期的人生观大讨论导致了一大批优秀青年来改造社会。我们这次人生观讨论,也必然导致一批优秀青年起来立志改革。希望潘晓和每一位青年朋友既要冷静地看到,个性的解放、个人幸福的获得、对人生真谛的追求,是受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现实状况所制约的,青年们感到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是与前些年我国社会的路越走越窄相联系的;同时,也要客观地看到,我们的社会不仅存在着弊病,而且也存在着同弊病作斗争的力量。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率领全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使社会各层次都有不少人感到自己的路子越走越宽了。改革的力量越来越大,他们代表着光明,代表着希望。你只有也作为一员参加进来,投入到改革社会的洪流中去,才能从个人的苦闷与彷徨中解脱出来,才能使“看透”具有社会的价

值与积极的意义。

发掘环境 调节命运 发展自己

人类要向理想社会进化,那就不仅需要高度发展的物质生产,而且更需要高度发展的人本身。《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每个人充分发展的社会条件。而这种社会条件,正需要我们这几代人来创造。

那么,怎样创造“发展自己”的社会条件呢?我愿向青年朋友谈两点体会:一是发掘环境,二是调节命运。

先谈谈发掘环境。

发掘环境,首先要正确地认识环境。你是否想过,任何一个人都无法选择我们面前的社会现实。马克思讲得好:“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我们面前的这个社会,比过去进步多了。但也正如潘晓信中反映的,仍存在许多弊病。政治上缺乏民主,经济上不够发达,以及封建主义的遗毒等等,使社会上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论资排辈、压制人才、尔虞我诈、损人利己、嫉妒、投机、欺骗、出卖、拍马屁、穿小鞋等等不良风气污染着环境。这些东西使人痛苦、悲愤,然而它是客观存在。你粉饰太平,它还是如此;你愤世厌生,它也是如此。因此,承认现实是认识环境的出发点,而认识环境又是改造社会的前提。人们往往一边埋怨社会弊病,一边又以自己的弱点组成社会弊病,这就给社会弊病的消除带来了艰巨性。所以,怨天尤人的态度并不可取,而应当把自己摆进去,冷静地科学地公正地认识包括个人在内的社会全

貌。

发掘环境,又要寻求可能发挥自己才能的有利条件。俗话说,有弊必有利。只看到社会弊病对我们的限制,而看不到发展自己的有利条件,那就要从自己身上挖原因。尽管金属的结构十分紧密,但每两个原子核之间仍有巨大的空间供受束缚的电子高速运动。我们为什么不学习电子的精神,寻找有利于发展自己的空间呢?一手摘不到枣子,可以登梯,可以竿打,也可以撼树,方法总是可以找到的。没有直达目标的机会,总有过渡的可能。不管命运把你抛到如何不利的时间与空间里,你都要认识环境,分析环境,研究环境,一步步改善发展自己的条件,认明发展自己的路径。在同样的环境里,一个人有没有发展,就靠自己的主观努力了。

发掘环境,还要尽可能取得周围人的支持。只要你的努力方向对四化有利,总是会得到一些人的支持和帮助的。尽管有些人会讽刺、挖苦、压制、打击,但要相信群众的多数是主持公道的。要虚心学习每个人的长处,以补己之短,切不可孤高自傲,把群众看成无知的“芸芸众生”。孤芳自赏、孤家寡人是不会在事业上作出任何成绩的。

再谈谈调节命运。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是有命运的。命运就是一种机会以及抓住机会的能力。机会并不是唯心主义的天赐良缘,也不能坐等别人来恩赐。它只属于那些认识了客观规律,并按客观规律办事的人,属于为了造福于人类而顽强奋斗的人。那么,怎样才能调节自己的命运呢?

调节命运,首先要学会把稳自己的人生之舵。人生如同大海,既有日出霞光、涛雪浪花,也有浊浪排空、险滩暗礁。要把握人生之舵,第一要不畏逆境,目标始终如一。哪怕是最坏的环境,也不能动摇信心。艰苦的环境,可以磨炼人的意志;复杂的经历,

正是文艺创作的财富；社会的弊病，帮助我们学到一门社会生活知识；待业的境遇，也可以用来积累改变境遇的能量……古今有作为的“命运骄子”，不都是不畏艰辛，矢志不渝的结果吗？第二要量力而行，不可想入非非。不少青年常叹“伯乐不常在”。但也要审度自己，究竟是千里马，百里马，还是十里马？大志固然可贵，但要才志相当。志大才疏者常叹伯乐不在，好高骛远者屡怨机会不来，使生命的航船颠颠簸簸，忽东忽西。与其自寻烦恼，不如量力而行。第三要分秒必争，铺砌成功之路。任海仓抓紧下乡时间自学，考上了赴美研究生；严洪华知青小组十年如一日，在农业科研上作出贡献；蔡希陶珍惜点滴时间，成了植物学家；蒋子龙也是朝思暮想，写出了《乔厂长上任记》等优秀小说……抛弃时间的人，必然被时间抛弃。应当牢记时间运筹对调节命运的重要意义。第四要顺风张帆，立足本职工作。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命运是在具体的社会分工中调节的。能力不够，又总爱朝秦暮楚，往往吃苦果。应当充分利用本岗位的有利条件，在现任工作中表现出聪明和才智，在四化事业的具体环节上持之以恒，作出贡献。厨工程明生写出烹调著作，装裱工冯鹏生写出装裱理论，舞台美工刘航鹰成长为电影《婚礼》的编剧，工人李慰萱成长为副教授……不都是在平凡岗位干成“状元郎”的么？近水可以知鱼性，靠山可以识鸟音；天涯处处有芳草，工夫不负有心人！

调节命运，还要学会渡过人生旅途中的“危机”。这里所讲的“危机”，是指人在一生中必然要遇到的坎坷、逆境与难题。当然，不同的人对“危机”会有不同的感受。一帆风顺的人，往往稍遇波折便觉大难临头；久经磨难的人，却能视大危机为“小伤风”。比潘晓的人生危机更甚的人到处都有，然而许多人活得很积极，从这次讨论的数万件信稿中，可以找到许多证明。

在危机面前的精神状态至关重要。“哀莫大于心死。”不甘心，是人的一大美德。要勇于渡过人生旅途中的危机，就必须百

折不挠，九十九折而却步，便会功亏一篑。要拿出气魄，学会激励自己。对往事的回忆可能富有诗意，但最值得一争的还是现在和未来。

还要善于渡过人生旅途的危机。冷静地分析危机，把战胜危机当一道数学题来解。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都是已知条件，设计上、中、下三策求解。危机千差万别，思路也不止一条。东方不亮西方亮，旱路不通走水路。即便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同时，要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因为它常常是造成危机的一种原因。《老子·三十三章》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能战胜自己弱点的人，才算真正的强者。

对改造社会发生自己的影响

真正的“看透”与“发展自己”相结合，必然导致一个人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与社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果大家都只期待别人去改造社会条件，而觉得自己无能为力，那最终社会又由谁来改造呢？一些青年认为自己用不上力，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对我国社会结构及其这场改革的特点还认识不大清楚。

中国是一个具有长期封建传统的大国，没有经过典型资本主义阶段，便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因此，长期的小农经济与封建传统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包括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意识形态结构及其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很难变革的系统。在许多方面不该限制的限制了，该限制的却没有限制。人民限制特权的权力被限制了，人们发展生产的创造力也被限制得很多。很多社会弊病是我国的社会结构本身产生的，它绝不仅仅是哪一二个人的过错。所以单纯的发牢骚并不足以改造社会，每个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埋怨社会，但问题的关键却在于要有尽可能多的人来为消除弊病而寻找办法。

知难而怨不是英雄。有为的青年应当看到，社会总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正是我们改革必然成功的信心所在。中国的出路在于：必须使相互限制得很死的整个社会结构变成以相互促进为主相互限制为辅的新的社会结构。但是，任何新生命的长成都不可能以突变形式来完成，新的社会结构也得渐渐形成，急躁是没有用的。

经过这种渐变，每年都克服一些社会弊病，每年都解决一些社会难题，每年都有比较进步的社会力量增长，每年都有人民生活的进一步改善，那么，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后，倒回头来一看，你就会惊叹：啊，中国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所以，对于有志于改革的中国青年来说，他应当永远以十足的信心面对人生！四化伟业天地宽，人人皆可成舜尧。这次改革不应再象以往那样仅仅由少数几个忧国忧民的英雄想出一服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而是要创造出一个让亿万人的头脑都能想办法的社会条件。

不要为个人的力量渺小感到自卑。每个人都有可能为满足社会需要做一点儿事情。只要每个细胞充分发挥其功能，整个社会机体就能产生强大的生命力。在任何时代，青年作为整体，始终是影响社会的巨大现实力量。

在改造中国、发展中国的过程中，潘晓和广大青年朋友将可以把自己造就成具有社会主义文明的、精明能干的、善于在有弊病的社会条件下既懂得创造又懂得生活的一代新人。

发展自己，改造中国，造福人类！

“看透了”，活得更积极！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9期）

人的动物性与社会性

晓 鹰

潘晓同志提出了“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命题，有的青年也提出了“自私是人的本质”那样的看法。与此相反，另有一些同志则坚持“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的命题。从目前发表的文章来看，基本上都是属于上述两大对立观点的。讨论在继续深入，青年们都关心这两大观点的命运。到底是哪个对呢？在这里，我想从人的动物性和社会性的角度来谈谈自己的看法，和大家一起讨论。

我们知道，“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4页）这就是说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是动物。作为自然存在的人，他要吃（活命）、要穿（御寒）、要生育后代（类的保存）。这单纯的食欲、性欲等可以统称为人的动物性。这也就是有的同志所说的动物的自保本能。可是，就是在获得生活资料以保存自己这一点上，人和动物又是不同的。恩格斯指出：“动物所能做到的最多是搜集，而人则从事生产，他制造最广义的生活资料，这是自然界离开了人便不能生产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72页）人的生产是通过劳动进行的。人取得生活资料的方式和动物的质的区别就在于人要劳动。劳动一开始就不是单纯地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同时也体现

着人与人的关系。所以,劳动,是有思想、有意识的人的最基本的社会活动;是人区别于动物、最终摆脱动物界,获得其社会存在的关键点。总之,劳动,使人的自然存在和人的社会存在获得了统一。

人的存在既然是他的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统一,那么人的本性必然也是他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在原始社会极低的生产力水平下,人们不但要结成一体才能猎得野兽,而且这极其有限的食物如不平均分配就会有人饿死。所以人从他勇敢地摆脱动物界的那一天起,就不但要为自己的吃、穿、住奋斗,而且也要通过劳动,通过集体的力量,通过合作、互助去为他人、为集体的吃、穿、住而奋斗,原始人满足自己的需要是和原始共同体联系在一起的。在最初萌发的意识中,每个人多少会懂得,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做的努力同样对别人有利;而别人做的努力,也包含了帮助自己生活下去的因素。个人的需要是同整个人类的需要并存的。自己的愉快、苦痛直接源于集体,集体的愉快、苦痛也直接体现在每个人身上。这就是个体自保和群体并存的统一。这样,人就不但具有自保的倾向,而且还产生了集体感、荣誉感、同情心、互助、诚实直至嫉妒、欺诈、虚假等等。这后者就是从人的社会存在中产生的人的社会属性,也可以叫做人性。所以,也可以说,人的本性是他的动物性和人性的统一。

人生的价值或人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人自己对其本性的自觉,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能能动地认识到作为人的他为什么而活着。在人类社会初期,处于蒙昧状态中的原始人对人的社会属性的一面基本上是不自觉的,其原因当然是生产力的极其低下。人在不得不是自然的奴隶的同时,也不得不成为人自己的奴隶,于是便异化出最原始的神和宗教。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在改造自然、认识自然的同时,也逐渐在改造人对自身的认识。这种改造和认识的每一次深化,就是人对其本性,特别是对其社会属

性的自觉的一次深化。象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俄国民主运动……都代表着这样的变革。自觉的深化,就是对蒙昧的摆脱。只要人类社会不完结,人对其本性的自觉的深化,或对蒙昧的摆脱的矛盾运动也不会完结,因而人对其生命的价值的认识也同样不会完结。通过这种不断深化的认识运动,人才逐渐自觉到他活着不但为自己,而且还要为他人。我们不能承认关于这个问题的什么教条和定义,说人的本性就是自私的,或说到了社会主义人就是“忘我无私”的。从根本上来讲,人的本性决定了人活着既为自己又为他人,是为个体与为集体的统一,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达到这个目的自觉程度不同,表现方式也不同。人既是动物,又不是动物,人成为人,恰恰在于他不是动物,在于他总是力求摆脱他的自然存在而获得其社会存在。这就是关于人的辩证法。我们过去把对雷锋等先进人物的宣传绝对化了。事实上,“公”总是相对“私”而言的,“为他人”总是相对“为自己”而言的,其中任何一方都不是绝对的,只有它们的矛盾运动才是绝对的。所谓杰出人物不是没有私心,不是完全从自我中超脱出来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而只不过是他自己能自觉地不做私心的俘虏罢了。未来不会、也不可能有一个纯粹的、尽善尽美的、不再有矛盾的社会。那种说法只能是乌托邦,是反科学的。但是,随着人们的努力,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积累,人们会创造出相对现在来说更理想的社会,那时的“公”与“私”一定会改变内容了,而且这种改变还要继续下去,就象公与私要永远并存下去一样。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10期)

谢谢你的启示

赵 林：

潘晓在所有的奋斗都近乎等于零的逆境中，才发出了《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悲鸣，而你则是在取得了大学生校徽，也就是得到了“前程无量”的吉兆后，在人生的键盘上弹出了《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的强音。这委实使我钦佩，使我感奋。

使我钦佩的是，再现于你的布鲁诺的献身精神；使我感奋的是，真理复出所具有的巨大引力。

以往我所接受的现成的演绎法所解不开的生活之谜，现在用你替我寻来的这把钥匙，竟是一捅便捅开了郁结于心的种种疑惑和迷惘。

我和差不多所有的同时代者一样，怀着别人替我所勾勒的理想进入社会，而我也确实是虔诚地信仰着这理想，并竭力以此来“矫正”自己并不太坏的视觉。然而，我毕竟不是盲人……生活就是为了扼杀自我么？

既然让我们的躯体存在于世上，为何不能让我们的灵魂里容纳自我呢？况且这种自我只是为了生存得更有价值，况且这种自我乃是推动社会政治的能源。我想，高明的科学家能把各不相同的化学元素同时利用起来，这是多么伟大的壮举！谢谢你的启示！

桂 钢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10期）

“自我解放”并非“个人至上”

朱孝远 蒋雅容

在我们看来，赵林同志的《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这篇文章，比讨论中刊登的其他许多文章都要来得有价值，据得出它的思想份量。它引起了一种深入思索，积极争辩的欲望。过去，我们走过的道路与潘晓不尽相同，心灵上留下的伤痕几乎一模一样。但是不管我们遭受多少不幸，有过多少次冲动或消沉，我们终究没有得出一个“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的结论。因此想对赵林文章中的一些观点谈谈我们的不同意见。

不能提倡“个人至上”

从欧洲文艺复兴开始，一直到后来的启蒙运动、浪漫主义运动，个人主义作为对封建等级制度的社会结构的反叛，在哲学上作为对教条的僵硬统治的抗议，一直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那些时期的思想家们把“人”的概念抽象化了。这个抽象化的概念推翻了一切宗教上的、法律上的、种族上的障碍，而承认所有的个体生命作为“人”存在于世上的价值。“我即神”，真理是“自我”所判断的，责任是“自我”所命令的，一切都以“自我”为中心。个人——生命的存在形式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仔细想来，这种哲学意义上的个人价值应用到实际社会中是行不通的。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人们只想维持个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那会产生什么

样的后果呢？既然你能说：“我的一切就是为表现自我，要给外物都打上我的烙印。”那么他为什么不能说：“我要进行自我扩张，让外物打上我的烙印。”当然能说！一个独裁者作为一个“自我扩张者”，他在表现自我时确实达到了一种随心所欲的地步，而这正是每个“自我”在表现过程中极想体验的。如果以为生命能获得这种快乐，便是有价值，那么整个人类，整个社会都将显得十分微鄙了。说得更具体些，既然“自我”是一切的中心，自我表现是唯一的目的是，我们就将无权指责任何丑恶的行为，无权指责那些历史上的暴君、虐待狂、战争疯子以及象“四人帮”那种非人道的残忍的统治者。

人的生命的价值是有双重意义的。一是每个生命都有自我保存的能力，有创造性的走向进步的能力；二是每个生命都是依赖于其他生命而存在的。人是社会的生物，他在特定的社会机体里生活和进行自己的活动，通过社会体现自己的价值。社会一直作为一种外部的异己的力量支配着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不存在绝对自我或绝对自由。我们评判一个人生命的价值，总是以它在社会中的体现作为出发点的，看它对社会发展、人类进步有多大的好处。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都是因为对人类进步作出了富于牺牲的贡献而获得人们永久的纪念。他们对自己行为的选择始终出自内心深处的对人类的愛，对生命的崇敬，对社会进步的渴望。他们的行为也就获得了普遍的社会意义。而一个只关注自我，自负的鄙视芸芸众生的个人主义者，他对目标的一意孤行的追求，总是使他成为冷酷无情、不择手段的人。

难道我们不觉得自我觉醒是意味着对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的认识？因此自我觉醒在带来要求自我解放的激情的同时，必然也带来了尊重同类人的权利，热爱人类，维护人的权利的自觉意识。有了这种自觉意识，我们会不惜牺牲自己去捍卫社会正义和道德；我们会不断地努力，要求我们的立法者不断修改我们的制

度以满足新的需要,答复新的问题,建立一个以人(不是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社会。这个社会能尽可能地具备条件来发展每一个人的一切禀赋、才能和潜力。有了这种自觉意识,即便是在世界远处某个角落发生的事,一个你素不相识的人遭到不幸,都会使你痛苦不安。人类社会正是靠着这种纽带联结起来,走向未来。

我们真诚地希望,不要一谈“自我解放”,就要喊“个人主义万岁!”人应该通过认识个人的价值去建立一种富有自我尊严的生活,去培养一种严肃的独立的生活态度。爱人类,永远不忘记关心帮助别人和对社会正义、社会道德的责任感。

我们对生活的态度

爱因斯坦说:“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全部的幸福,然后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份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们恰恰抄录这段话,并不是想用伟大人物的言论来证明我们的看法,而仅仅因为我们特别喜欢它的朴挚和谦卑。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是一个个人奋斗者。因为人类的一切都是由个体活动组成的。只有个人才能进行思索,从而创造新的社会价值。没有个人奋斗,社会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有自己努力的目标,有执着的热情和实现这个目标的顽强精神。但同时我们也懂得个人是寓于社会土壤之中的,所以又要求自己做一个受人欢迎的人。有体谅别人的宽容态度,有牺牲自己、与人方便的善意。我们的这种态度不是奉承假意,不是与恶人恶事同流合污。恰恰相反,我们是在与一切违反人道的行为的斗争中建立我

们与其他人的感情。

有时我们在想，人们之所以这样容易意气消沉，冷漠无情，是因为我们对生活对别人的态度中存在着一种猜疑，“我帮助了别人，别人懂吗？他们将报答我吗？”这种疑惑破坏了真诚的感情，使得我们的感情庸俗化。我们并不否认社会 and 他人给予自己报答的重要性。但问题在于只有胸怀诚意的人才能真正地永久地保持着生活的信心。真正的强者不是个人至上主义者，而是对人类怀有真诚的感情，富于自我牺牲的人。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10期）

“自我”离不开社会

刘 英

看了赵林同志的信后,我有些不同意见。我想就探索人生意义立论的基点和“自私”“自我”问题,谈几点浅见。

探索的基点是什么?

父母的精血孕育了我的生命,生命形成呱呱坠地。那时我根本不管什么人生意义不意义。后来长大了,我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参与了这个社会的多种活动,这时方才生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人生的意义?看来,人生和社会的关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可以这样说:是人(总体的人)创造了社会,也是社会创造了人。从个体来说:在我出生之前,社会即已存在;在我死后,社会还要发展。我的一切,包括精神上的“自我”——愿望(非生理本能的)、感情、信仰、知识、品德和爱好等等,都是在社会中形成的,都是社会给的。我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社会中进行的,而且归根结蒂也是为着社会的。正因为没有脱离社会的人生,所以也没有与社会观不相联系的人生观。从唯物主义观点看来,人生和社会的客观联系决定了人生观和社会观的主观联系。存在决定意识。所以,科学认识社会和科学认识“自我”(“自我”的人生)是解决人生观问题的两大前提(或内容)。所谓人生观,说到底,就是怎样认识和处理自我和社会的关系。所谓“人生意义(或价值)”,其实就是

自我在社会发展中所占的地位和对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人生意义”是对谁而言的呢？是对社会而言的，是自我对社会的关系在价值论上的表述。要说“个人价值”，也是个人对社会的价值，不是自己对自己的价值，也不是这个人对那个人的价值。“价值”，在经济学上，是社会经济的概念；离开了社会经济，无所谓“价值”。它引伸到人生观问题上来，同样如此。

“科学认识社会”不是空话，不是教条，而是实践的科学，是科学的实践。就是说，你必须通晓社会的历史，认识社会的现状，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预见社会发展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而这些认识，必须经得起社会实践的检验。这显然是不容易的。

“科学认识自我”也是不容易的。首先，个人面对社会应该看到：社会那么大，当前又正在进行着那么伟大的变革，今后还有无限的发展。而个人呢，生命这么短，躯体这么小，能量和知识这么少。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实际是这样。这是一方面的比较。还有另一方面的比较。人与人之间，生命的长短，知识的多少，能力的大小，都有很大的差别。此外，还有性格、品质等等的差别。这些差别对于一个人一生的事业都会发生显著的作用。科学的人生观要求对“自我”有科学的认识，并运用这种科学认识来极大地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为社会的发展作出尽可能多的贡献。科学的人生观还关心“自我”在道德品质、意志毅力、精神情操……乃至体格等等方面的锻炼和塑造。还指导着恋爱观、苦乐观、荣辱观、生死观和公私观……而在“自我”对各方面的观点的基础之上，综合形成总的观点，即人生观。

“人生意义”的争论由来已久。历史上有过的表述，真是千姿百态，五花八门。而唯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阐明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为科学地认识社会的本质和科学地认识“自我”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也

才为科学的人生观提供了正确的理论依据。

“自私”是“神圣”的吗？

赵林同志说：从动物的“自保”变为人的“自私”，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按照人的本性来说，自私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正当的权利”。于是乎：“自私光荣”！“自私万岁”！

但是，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如果两个“自私”碰到一起，两群“自私”和两国“自私”碰到一起，而这各国、各群的内部的各个“自私”都互相碰撞起来，那又怎样呢？赵林同志这样回答：“当然，自私具有双重效果，一方面是个人自觉，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损人利己的后果。这种可悲的情况是由自私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在目前是很难避免的，将来也很难根除。”如此说来，“自私”却也并不那么“神圣”，甚至还有“可悲”的一面呢。而且，赵林同志断言，山中野兽是如此，人类的过去是如此，将来也还要永远如此！人类社会的前途岂不是太可悲了吗？

赵林同志强调“自我”。我认为，如果他把科学认识“自我”同科学认识社会结合起来，把“个人进取心”安放在“社会前进的需要”的恰当的位置上，首先自觉地为社会多作贡献，同时也理直气壮地维护自我的合理合法的权益，那么，这种“自我”确是积极的，值得肯定。但是赵林同志却不是这样来认识“自我”的。他主张：“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这种观点是违反科学的、盲目的。由于它不是科学地认识社会和科学地认识自我，却狂热地要求“自我表现”、“自我扩张”，因此，它就可能使“自我”释放出来的“能量”成为破坏性力量。这是被中外古今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真理。且不说迷信“自我”的“伟大”而藐视社会和群众，用任意的“自我扩张”来扼杀亿万个“自我”的存在的江青之流，就看看那

些喜爱家长制和特权、讨厌民主的人吧，他们的现身说法告诉我们，把“自我”绝对化可能走向何处。

我就是深入到“被发掘的自我”这“宏大精深的庙宇”之内，我也没有发现“整个现实社会在觉悟了的个人面前显得渺小、可怜”。相反，我倒是真真切切地看到一个事实：社会在我面前“宏大精深”，我在社会面前“显得渺小”，但不“可怜”！因为我是这宏大精深的社会的一员，并且能动地在其中参与其活动，我感到自豪！对比山中的野兽，我感到骄傲！作为一个具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文明（相对过去而言）的现代社会的一个现代人，我感到尊严！赵林的观点不能引起我心中的共鸣，反倒侵犯了我做人的尊严感。

但我对于赵林同志思想变化的轨迹十分理解，因为我见过不少这样的人。我不禁要问：为什么曾经被马克思斥为“庸俗不堪”的东西，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却被某些有头脑的中国青年奉为“崭新的人生观”呢？是什么把他们推到尼采们的脚下去的呢？这里面有多少教训值得汲取！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10期）

无须如此充“硬汉”

——答赵林同志

何乐为

第八期所载赵林同志《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一文，展示了一个赤裸裸的、活生生的灵魂。就这一点来讲，它是直率和可爱的；就解放思想、言论自由而言，这也是中国报刊前所未有的光荣——可以容许不同的声音发出了。我们的神经衰弱症正在好转。

可以说，参加这场人生意义大讨论的每一个青年，每一个对生活稍有热情的青年，都在回顾和总结自己走过的生活历程。经过总结所得出的结论也将是五花八门的，这毫不奇怪。但是，赵林同志的这种总结确实使人震惊，使人不能不认真想一想它的来龙去脉。多年来，林彪、江青之流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宣传（当然，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和蹩脚的实践，竟然招致如此无情的惩罚——尼采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被重新召唤到今天的舞台上，同马克思主义争地盘。这确是值得人们深思、猛醒的！

我们能因为有人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就连真的马克思主义也抛掉吗？我们能因为个人曾受到严重的压抑，就断言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吗？

赵文的可悲之处在于他坐着生活的辘轳沉入井底，对着黑洞洞的井壁，阐发对整个世界的发现。他再也听不到真理与谬误的辩论，听不到大海的喧腾；再也看不到光明与黑暗的鏖战，看

不到雄鹰的翱翔。

赵文的另一个特点，是作者的不公正。他武断地宣布“说谎、欺诈、恭维、奉承是人生的要谛”，“自私是人的本质”，并且宣称只有这些才是生活的“真面目”。这就把人类经过漫长岁月艰难生长起来的一切良知、美德统统踩在脚下，把全人类（除去作者自己）推到道德的被告席上。连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江湖义气也没有了；连给乞讨者施舍的起码的同情心也没有了；更不用说董存瑞、黄继光的“正义冲动”了；更不用说天安门广场上“四·五”英雄们的壮举了；也不用说遇罗克“乾坤特重我头轻”的慷慨悲歌了。

我认为，一个严肃的生活评论家不在于回避生活中的某一部分现实——哪怕这种现实对于自己的立论是多么不利，哪怕这种现实还不是比比皆是，而在于力求正确而全面地解释现实。

赵林同志说：“个人的本能仍然是绝对的主宰”，“个人乃是世界的中心和基础”，“一切总体主义观念都是个体灵魂被歪曲的结果，是个人本质异化的结果。”我们且不拿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述来反驳，因为，对一个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在论战中仅仅拿出马克思的话是无济于事的。我只请赵林同志解释科学史上一个有趣的事实——印度的那个“狼孩”的故事。那个脱离了人类的“人”，那个“绝对自我”，那个保存着一切“个人的本能”的“人”，那个抛弃了“一切总体主义观念”的“人”，他还是人吗？如果让这个“人”“去发现个人的价值和普遍的人性，发泄内心的情绪”，满足他“自我扩张和表现的要求”，那么，这一切的结果将是什么呢？这才是一个“个体灵魂被歪曲”、“人的本质异化”了的典型呢！

人类的全部认识史反复证明，“人”的概念本身就包含着个人与他人的联系，人类与环境的联系。单个人一刻也不能彻底离开他人，离开环境。不要说彻底离开，就是象鲁滨孙那种“半离

开”也是够可怕的了。况且鲁滨孙还有他的孤岛伙伴星期五呢！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社会发展史对人类的一个重要训示就是：要特别注意个人与人类利益的一致，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一致。不仅单个人面对人类不能宣称只有自我是绝对的，而且全人类面对地球和宇宙，也无权宣称只有自己是绝对的。如果硬要在单个人和人类之间找出一个“绝对”的，那么，任何一个“个人”也占据不了这把金交椅，只有不断发展延续着的人类才是“绝对”的——如果人类最终有幸不至灭亡的话。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的概念也是十分丰富的，但这同赵林同志所说的“自我就是一座宏大精深的宇宙”完全不是一回事。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人是面向人类和社会的，而赵林同志的“个人”却嘲笑“整个现实社会”的“渺小、可怜！”其实这后一种“人”是多么抽象，多么空洞，多么贫乏，多么虚伪！

赵林同志还谈到了雷锋，谈到了雷锋同志引为道德律条的那句话：“对待个人主义，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说他听到这句话“大吃一惊”。当然，我并不赞成把雷锋的这句话当作道德的准绳来裁判一切人的行为，从而把绝大多数人置于无可奈何的境地，甚至人为地造成很多人的自卑心理和虚伪行为。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否认雷锋、白求恩这些人是在许多方面体现了人类的美德。

我认为，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要特别强调个人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在世界上很多发达的地方，人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包括道德的认识，已经越过了所谓“个性解放”的阶段，比较强调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关于这一点，研究一下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也许能看得更清楚。过去有一个口号，叫“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其中包含有这个意思，但整个看来仍不令人满意。希望能够通过讨论，找到一个合适的口号，来表述当前道德发展的潮流和趋向。

还应该指出的是，即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决不是什么“为公”原则的普遍实现。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人类社会未来的进程中，为公和为私的观念将一起消失。林彪则把人类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公”字哲学与“私”字哲学的斗争史，说共产主义就是“公”产主义。这是伪科学。历史认为，舍己为人是高尚的，损人利己是可耻的，每个人追求和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是天经地义的。尽管当前人与人之间还有许多丑恶的关系，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丑恶必将会被挤到历史的角落里去。总有那么一天，人与人的关系要变得比现在和谐得多。

有句话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处在困境中的青年们就更需要知己了。然而，如果潘晓同志把赵林同志的观点引为知己，那将是令人痛心的。原因很简单：中国政治生活的客观进程从各方面教育着我们，一切有志于社会进步的青年们，要团结起来。只有团结起来才能达到目的。如果每个人都钻到自己的蜗牛壳里，其“搅动生活，影响社会”的力量将是可怜而渺小的，且不说这种“搅动”和“影响”是不是可取的。

青年们在追求真理、探索人生的道路上，常常要走弯路，有徘徊，有叹息，有时候还会走进死胡同。这都是正常的事情，不应该遭到嘲笑，也无须给戴上一顶什么吓人的政治帽子。但是，一旦真的走进了死胡同，那就不一定要去充“硬汉”，发誓“碰得头破血流也不回头”。倒不妨四下看看，去开辟新的生路，说不定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10期）

关于潘晓的两个命题

柳 松

青年在成长途中,对社会和人生一般要认识两次。第一次是从师长那里“听”来的,第二次则是毕业后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感受到的。

我们的学校和书报常常把我们的社会讲得简单而又完美无缺。然而社会并不那么浪漫,它喜欢把严峻的事实直接端到初出茅庐、缺乏思想准备的青年人面前,迫使青年重新认识,思想发生第二次飞跃,调整原有的价值观。

如果说伴随第一次飞跃的常常是青春的欢乐,那么伴随第二次飞跃的,却通常是苦恼和疑问。它往往要经历否定,否定之否定,甚至几个否定之否定。潘晓同志四历逆境之后,苦苦求索,对原有的价值观产生第一个否定,形成几点新看法。其中带实质性的是:

1. “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2. “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如何看待这两个命题? 它们的合理内核是什么? 它们的矛盾又在哪里? 让我们探讨一下。

具有时代意义的觉醒

我们最重视第二个命题:提高自我价值。

人的价值,由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首先提出,无产阶级应该怎

么对待？按“对着干”的模式推理，似乎应抹杀它。但这样一来，也就把自己放在封建专制的立场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论认为，“人的价值”并不特别带有资产阶级的属性，资产阶级的发现，不过是人类发展长河中的一个“中间站”，一个环节，无产阶级理应由此继续向前推进。

翻开历史，人类历史本身，就有一个不断承认与提高人（人民大众）的价值的过程。

原始人最轻蔑人的价值。抓到俘虏，格杀勿论。打仗前，还有先杀儿子以祭天的。人们匍伏在大自然的威力之下，看不见本身价值。

劳动工具和技术有所改善后，新的生产率使人们发现俘虏（人）有劳动力的价值。于是变杀的“政策”为强迫奴隶劳动。奴隶社会对人的价值仍然极度轻蔑。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地位同牛马相似。到了封建社会，人的地位才由戴枷锁的奴隶又提高为可以同时为自己而劳动的农民。但是封建社会仍旧蔑视人。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不同程度地依附于封建领主或地主，艰苦劳作而不得温饱，没有经济、政治以至人身的自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劳动者提高为自由（人身自由和出卖自身劳动力的自由）劳动者。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人权宣言》的形式肯定了人的尊严。可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决定了当时所能肯定的主要是有钱人的价值。不过，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文化的发展，通过劳动人民的觉醒和斗争，劳动人民的个人价值也有所提高，这是不以统治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上述各种社会对人所作的价值判断的变迁，标志着人类在逐步认识自己，创造着自身获得彻底解放的条件。而最终解放全人类的任务，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因此，我们的“老祖宗”非但不否认个人价值，相反，他们设想的未来社会恰恰是个“自由人联合体”。《共产党宣言》庄严宣布：“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

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理应如此尊重人的价值,如此科学看待人生。

“我们党领导人民翻身解放,就是从根本上提高人的价值,并为人的进一步解放开辟广阔前景。但中国曾有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历史,其“完备”程度,其窒息身心、历时长久的程度,在世界历史上很难找出第二个。这个旧传统,影响着许多同志对“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思想体系的理解,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

我们一般较看重“长官”的价值,而忽视“平头百姓”,较看重“长者”的价值,而忽视“后生”。这种“习俗”对人们发生着催眠作用,使被忽视者往往自己也忽视自己,看不到自己的力量和个人对整个事业的价值。因而,那些“积极响应”的背后,有时隐,藏着唯命是从的灵魂,那些“崇高思想”的背后,有时隐藏着否定个性、否定个人利益的倾向。

现在,八十年代青年鲜明地提出“自我价值”问题。当代青年,已不满足于消极被动地做人,不甘心被简单地当作劳动力来看待,他们要求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而受到尊重,作为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人而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个变化,反映解放以来生产力的发展,反映出党的十一届三中、五中全会以来青年的思想进步。透过人生意义的讨论,我们看到,有一股巨大的能量在地下翻滚、沸腾,要冲破封建传统对个人的压抑,去积极显示力量,去建树各种事业。它标志着中国人再次由沉睡而猛醒、而成熟,标志着青年一代对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向往。这是具有时代意义的觉醒。而这一切,正是我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所要求的。

“主观为社会，客观成就我”

当我们进而思考如何实现个人价值的问题时，又会发现，在潘晓的表面一致的两个命题里面，其实存在着矛盾。

诚然，迄今为止，多数人确是按照“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行事的，历史也是这么走过来的。然而这并不能证明它就是自觉实现个人价值的方式。碰巧他的利益符合了历史方向，他就有机会实现个人价值，也可能成为伟人。但在多数情况下，他难免要失之交臂，甚至可能成为历史舞台上的小丑。这种类似“布朗运动”的瞎碰瞎撞的实现方法，是盲目消极的。这是两个命题的矛盾之处。

为解决这个矛盾，有必要探讨一下实现个人价值的规律。

个人价值是怎样实现的？它正是在“他人”、在“社会”那里实现的。“我”的价值，是由“我”对他人或社会的意义而定的。

演员的价值，常在观众兴奋的掌声中得以实现；服务员的价值，往往在服务对象的由衷感谢中反映出来。雷锋只活二十二年，可谓实现了个人价值；刘胡兰只活十五年，她的生命的价值胜过某些人的百年。那些为人民作出各种贡献、推动社会加速向前的人，他们的价值会永远铭记在老百姓的心头或载入史册。由此可知，给予社会，是实现个人价值的前提和条件。

既然存在这样一条规律，我们何不自觉地运用它呢？就是说，完全可以倒过来，把实现个人价值的前提和条件当作当前的行动目标，主观上多为人民利益去着想，从而让原有目标（实现个人价值）变成自然而然的行动后果，“主观为社会，客观成就我”。

“主观为自我”，不一定“客观为别人”。但“主观为社会”却必然“客观成就我”。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

后解放自己。从阶级命运的角度反映出这同一规律。由必然而达到自由。

如果潘晓同志能够同意这种看法,她会形成第二个否定,即否定之否定。那时,“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将被“主观为社会,客观成就我”所代替;“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将成为清醒而又自觉的行动。从而使两个命题既有统一完整性,又有科学性。

也许,这里是向前迈出第二步的路径?

认识的“圆圈”

老黑格尔说过:同一句格言,从年轻人的口中说出,总是没有在饱经风霜的成年人的智慧中所具有的意义和广袤性。经历人世风霜之后,经历否定之否定之后,我们对当初所喜爱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对“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或许会有更新更多的理解。

不可否认,当初在信仰“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时,是天真而绝对的,因而有一定的盲目性。其中或多或少有一些“灭人欲”的宗教激情。这种理解和现实相冲突,因此,很容易走向它的“反题”：“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也是盲目的。许多青年对它的理解,常常是片面发展成极端个人主义。它也难免和现实相冲突。

合理的解决,是发展到“合题”：“主观为社会,客观成就我”。

回顾我们对社会和人生认识的曲折道路,似乎是走了一个“圆圈”,在螺旋式上升。在这个圆圈上,任何一小段曲线或片断都可能发展成直线,并由直线引到谬误那里去。把“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沿着直线发展下去,就会和压抑个人的封建专制相汇合;若把“主观为自我”沿着直线发展下去,又会和剥削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相合污。因此,在探讨人生的意义时,

必须竭力避免“直线式”的思想方法，防止片面性和绝对性。

到了“合题”那里，“主观为社会，客观成就我”，包含着前两步认识的所有合理内核。它既承认主观上“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的积极意义，也承认这种高尚行为是和人本身的自我需要相联系的。

从个人需要出发能有高尚行为吗？那要看具体情况。多数需要，一般都有三种形式：“自X”、“X他”和“被X”。例如，爱的需要，有自爱、爱他和被爱；尊重的需要，有自尊、尊重他人和被尊重。所以，爱他人、尊重他人，本身就是人的一种需要。满足这类需要，输出的往往是利他的行为。利己和利他在这里达到高度的统一。正是出于这一点，强调“合理的利己”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甘心为革命奋斗、坐牢，“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而自我牺牲。任何高尚行为不可能离开行为的主体，离不开“我”的需要。即使狂热的殉道者也是如此。借此，人们得到满足和欢乐。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还会发展出对价值观的需要，并按高低排出层次，形成个人价值观。如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反映他的价值观中，自由占第一位。平时享有生命是他的需要；奋不顾身追求爱情也是他的需要；在关键时刻，不惜牺牲生命和爱情去追求人民的自由解放，更是他的需要。

这里的第一层需要尚属“原我”境界，第二层则有“自我”的意味，到了第三层，又超出自我而达到“超我”境界。人们每天都在这三个境界之间往复飞跃，既要有一些超我的高度精神文明的东西，也需有一些自我和原我的平凡人的东西。“公而忘私”，那说明他这一段时间正处于超我境界，不是说，他将永远不考虑一点有关个人利益的事。因为人不可能象天使那样永远呆在超我境界，他总还要回到尘世中来。但能公而忘私的人，他在个人问题上一般也会善于自处的。

我们把这种意义上的“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和这种意义上的“主观为自我”，概括在“主观为社会，客观成就我”之内。若用马克思的诗与火一般的语言表达，那就是：“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青年可以有不同排列方式的个人价值观。但若想真正提高个人价值，就不能停留在“原我”和“自我”境界内。人需要有理想、有目标，有对目标的追求。这个目标定得越客观、越符合社会需要，人生的意义就越大，他，也就会多尝到一些人生的真味。

最后，我还想说，“人生意义”不是光靠“思辨”所能解决的。思想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存在决定意识。作为党、团、工、妇和行政组织，不仅要青年说实话，还要切实为青年解决实际问题。青年需要有尘世间的快乐，他们的求学、就业、成才、婚姻、自尊、民主要求以至于“玩”，都需要确有改善。多解决些实际问题，再辅之以切实、细致的思想工作，青年们向前迈出第二步，就会更坚定、更顺利了。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10期）

让我们用血肉来拥抱世界

周晓东

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是二十年来神思梦萦地翻腾于我脑际的问题。诚如潘晓同志所说的，“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我也来谈谈我的想法。

1949年我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我前半生的命运似乎也从出生那一刻起基本上确定了。由于我在新社会所受的教育，我打心眼里拥护和感谢土改运动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我感到，土改不仅解放了受封建压迫的农民，也解放了我——否则，我将成为一个可厌可憎的戴瓜皮帽的地主少爷。可是，我受不了无端的歧视。一声“小地主”，我恨不能钻到地底下去。但在天真无邪的孩子们中，我又是“王”，我摔跤抵得上两个人，课外还做小老师。1963年小学毕业统考，我的成绩是学区第一名，可结果进的是民办初中。不知是什么缘故，从第二学期起，我又当了校少先队大队长、班学习委员和墙报小编辑。64年下半年，社教工作队进驻我校，发现我校“阶级阵线不清”，接连三次改选班干部，最后还是采用强制手段把我的“官衔”全撤了。65年初中毕业，尽管我七门功课都在95分以上，升学考试又考得相当容易，我还是不能进高中，只能在生产队劳动。68年以后，我曾两次外流江西，修过马路，撑过竹排，搞过林业……73年以后学成了木工，就一直在浙赣两省城乡流动着做木工。

我爱读书，爱得要命。买不起煤油，晚上就拾松明点着看。上

小学时读了中国古代小说，一心向往打抱不平的侠客。初中时代，开始读现代小说，读鲁迅、高尔基、巴金、艾芜等人的作品。《青春之歌》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都给我以极其深刻的影响。保尔、觉慧、“牛虻”……一个个人物在我脑子里复活了。我遗憾自己没有赶上那样的时代。我还记得那时的《中国青年》杂志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而高翔》。啊！太形象了。多少次，我看着屋檐下叽叽喳喳的小麻雀，又仰头望望盘旋于苍穹的雄鹰，我的心啊，也飞上了碧澄的蓝天！书，把我带进了一个无限广阔的宇宙，眼前的天地太狭小了，我决心投入到社会中去，把社会当作我的大学。踏入社会后，我发现现实生活并不象粉红色的理想那么美好。十年浩劫中，我目睹了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有些难以想象的野蛮行为，我一回忆起来就牙齿咬得发痛。这使我深感中国迫切需要实行改革和发展经济。我自己的生活历程，也是坎坷曲折的。70年可能是我生活中最艰难的岁月。污浊的政治空气，贫困窘迫的生活，加上失恋的痛苦，逼得我要发疯。经过多方奔走，我找到了一个到外地拉手拉车搞副业的门路。我设法搞到一辆手拉车，默默地做好外出的准备。可是，在修车架子时，一斧子砍伤了脚。我狂喊一声，猛地把斧子丢到半空中。血浸湿了鞋子，在地上流了一滩。我暴怒地拒绝了要给我包扎的人们……那一次我躺在床上不知想了多少！我是极少流泪的，可那次泪水也把枕头浸湿了。

但是，挫折和打击并没有使我失掉人生的信念。我不相信谁能扼杀得了真理，冒充得了太阳。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相信人民。我经常告诫自己：要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要始终恪守“做一个健康人”的信条。在十年浩劫的动乱日子里。我敦促自己“洁身自好”，保持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努力学习，努力劳动，用自己的手给人民一点切实的利益。我要求自己，不白拿一分工分，不用一分不义之财。那时，我为自己的生活态度和劳动

成果而自豪。

我很同情潘晓同志的心情，但却不大同意她对人生的理解。我想诚恳地问问潘晓同志：你爱你从事的工作吗？你尝到过创造的乐趣吗？当你感到劳动无意义的时候，生活就象是“奴役”；而当劳动使你感到愉快的时候，生活就是一种享受。拿我来说，几乎是干一行爱一行。69—70两年我在电站工地当民工，我的一把八磅锤在三个公社打出了名。我能准确地打各种“倒吊”、“斜插”和“平抬”炮眼。抡起锤时心里涌上来的那股“天不怕、地不怕”的豪情，是难以言喻的。我喜欢铁锤几乎入了迷，在没有人看到的寝室里，我经常情不自禁地抡上一阵。当电站建成后，看着盈盈清水透迤于悬崖峭壁，高矗的电站机声轰鸣，高压线柱把银线拉向四面八方……我的心啊简直陶醉了——这里有我几百斤汗水呀！我也同样喜爱木工的劳动。看着一堆堆木料在我手中变成一件件结实美观的家具，看着“东家”——普通的工人、干部、服务员、知识分子——满意的笑脸，我就象喝了蜜糖水。我对自己的工作要求很严格：下错一根料，我会后悔半天，做错一点活，我会吃不下饭……

我希望潘晓同志有机会的话到外面去走走，去看看南京长江大桥：那巨大的钢筋铁骨，巍然贯通大江南北，何等雄伟！何等气魄！也去看看上海：纵横百里，建筑群星罗棋布，烟囱如林，车辆如梭……再去看看杭州：那风光绮丽的西子湖畔，桃红柳绿，芳草茵茵，亭榭楼阁，精美绝伦……人民，就是这样地在创造着这个世界！

有时候我想，且不去说现代科技的奇妙产物，就说我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哪一样不是凝聚着劳动人民的血汗和智慧？我们享受着这一切，可要问问自己是否受之无愧。是作为一个社会的债务人苟安地活几十年然后老死，还是用自己的双手也给这个世界增添财富和光采，加倍偿还社会给予我们享用的一切？

怎样看待人的“本能”？生活实践告诉我，不要空谈。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在地承认，人是有其本能要求的。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有成熟的革命者的美德。十年浩劫也使我们不能不承认，文化落后和思想愚昧在我国人民中，还是较普遍地存在的。可是，我不大同意潘晓同志把人看成只有利己的“本能”的观点。人是有人之精神的，有人所特具的崇高美德的。想想我们敬爱的彭老总吧。如果说在战争年代他只是出于自身解放的“本能”而战，那么革命成功之后，他该享福了吧？可是，他面对虚假，想的是“我为人民鼓与呼”！在遭到无端的打击、罢官之后，他明知前途会有更大风险，却决不屈服，“说我人民话，办我人民事”，宁为真理死，也要把真理说！想想吧，一个曾经出生入死的功勋卓著的大元帅，为了说真话而……“他坐在水泥地上，穿着那件破棉袄，两手拢在袖子里，冷得瑟瑟发抖……”“他站在卡车上，胸前挂着一块大黑牌，被人揪着头发……”!!! ……他图的是什么？岂不是以“为自我”的“本能”可以解释得通的么？！

我在这方面也有过正反不同的体会。1970年春节刚过，我在家里休息。突然听见有人叫救火。我赶快跑到楼下。猛然想起身上穿了件刚刚上身的新衣，就把它脱了。又想到毛衣容易沾火，又把毛衣脱了……等我赶到失火地点时，人们已经把火扑灭了。大家都在说：“好险！要是不及时扑灭，会造成大灾。”我想到了自己的作为：在一场火灾面前，我竟会先想到自己的衣服！晓东啊，你原来是那么卑污的一个人。在自己灵魂深处，掩藏着什么样的肮脏东西啊！我真想痛哭一场。同年初夏，我们大队水库启闭机控制关闸的铁丝断了，宝贵的水在白白地流掉。这个水库是我们大队几百户人家的命脉。我们家乡一带水性好的人很少，我们村就数我最好。大队支书来叫我时，我毫不犹豫地去了。水面到闸门有约十米深，这可不是一般的十米呀。再说，巨大的压力下闸门出水处有强大的吸力，如果被吸住，那是万无生理的。

我越往下潜越困难。四周是恐怖的黑暗，冷得像冰窖。当听到哗哗水声时，我似乎意识到有一条张开嘴的巨蟒，要把我一口吞掉。一害怕，胸腔又憋得象要爆炸……我浮出了水面。社员们又焦急又失望。我的心啊，也如翻江倒海一般。再下去？危险实在太大了！不去？……是的，我这样一个地主的儿子，就是为了关闸牺牲了，追悼会都不会开一个呀。真的，这时我脑子里闪过了黄继光、邱少云，“牛虻”在对着我笑！我又想起救火那件事，心里腾腾地燃烧起了烈焰。终于，我下定了决心：下！当脚踏入水中，我不由得再次看了一眼岸上的人们：“或许永远不能再见到你们了，你们能理解我的心情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投给他们一个明朗的眼光，一头扎入水中。我忍受着十分难耐的寒冷和憋气的感觉，以及耳膜受高压而产生的剧痛，在水下苦斗了一阵，终于把闸关住了。

我说这些，并不是想标榜自己，我只是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真切感受说明：心中有了人民，一个人是能够献身的。我热爱周围的人们，我有不少可以肝胆相照的朋友。在社会上，我一方面受到歧视和压抑，一方面又得到人民群众的同情和爱护。为了这些善良、正直的人们，我甘愿贡献自己的一切。

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中华大地透出了蓬勃的生机。我也感到了春风的和煦，党中央把我从政治上解放了。我有一个美满的小家庭——一个贤慧的妻子，两个极为可爱的小女儿，过着小康的生活。可是，我不能满足于这种“安乐”，也不满足于白天辛苦劳作一天之后再勤奋学习到深夜。彭老总和张志新们在召唤着我。我的心在向祖国呼喊：“母亲，我爱您！”我渴望为尽快改变祖国落后的面貌，贡献更大的力量。潘晓同志的信，促使我下决心给党中央负责同志写了一封“自荐信”：请求党和人民交给我一个最穷的公社或某个局部地区，我有信心叫它五年改观。我知道，困难重重，风险不小，我也自知没有特殊的本领。可是，我

有一颗赤子之心,有十多年深入社会、观察社会所取得的一些实践经验,有旺盛的求知欲,还有充沛的精力。如果我的请求得到批准,我将遵循党的三中全会方针,依靠人民,踏踏实实地干下去。我愿把我的血,洒在这块土地上。

张志新烈士有一段话说得真好:“望记住这句话‘如果你在生活中感到无聊,那便是因为你没有献出生命的力量,没有用血肉来拥抱这个世界……’因为生命就是爱!象野草那样生!象蛾那样死!”张志新烈士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给我们做出了表率。

潘晓同志,让我们用血肉来拥抱世界吧!我相信你能爱上这个世界,并且取得你所爱的事业的成功。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9期)

感受到了时代的春风

——一个团干部的心声

李宝善

我是一个普通的共青团干部，我也走过不平坦的人生路途，今天，也在思考着中国、世界、社会、人生。潘晓的信，同样吸引了我。一个普通青年的来信，为什么激起了如此迅猛、深广的反响，难道仅仅是因为她的诚实？不，这里面有更为深刻、更加发人深省的东西。

国家在变，生活在变，敏感活跃的青年人尤其在变。面对青年的深刻变化，有的人生出忧虑，有的人发出指责，有的人丧失信心，有的人感到隔膜……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呢？共青团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新的课题。人生意义的讨论提供了解决这些课题的好方式、好机会。作为青年工作者，我们应该积极参加讨论，不要当旁观者，更不要摆出一副“教育者”的架式。事实上，我们自己不也在思考和探索吗？为什么不能参加到青年们的平等、广泛、科学的讨论中来呢？真正这样做了，我们就能通过青年苦闷、不满的表象，而发现那些我们原来未曾注意到的具有本质意义的东西。比如：

“看透”——这是现在青年在议论人生、评论社会时常常使用的字眼。但是不要简单地把它看得那样消极吧，这其中包含着多么复杂的思想内容！它是对刚刚过去的那段痛苦经历的痛苦总结，是对那场灾难的情景及其灾难性后果的憎恶和厌弃，是对造成那场灾难的理论和实践的无情批判，也是心灵的创伤作痛

时的呻吟和宣泄……在这“看透”中有创伤，有分化，但在潘晓和众多的“潘晓”那里，“看透”并没有熄灭他们对新生活的热望，也没有停止他们对人生的思索。这样的“看透”，往往成为奋起与创造的前奏。

不满——这是当前青年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相当深刻的思想情绪。也不要把这看得那样可怕。对现状的不满，反映了改革的要求。普遍深刻的不满，意味着一场广泛深刻的变革势在必行，这是时代的潮流，必将发展成不可抗拒的磅礴之势。

苦闷——与对现状的不满相伴随的常常有思想的苦闷。和潘晓一样，越是对人生持严肃认真态度的青年，越是常常产生种种苦闷。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把劳动、工作仅仅当作谋生的手段，他们要追求劳动、工作的更高一级的价值和意义。他们对社会有着一种自觉的责任感，渴望通过自己的劳动、工作来完成这种责任，满足这种责任心。如果这种精神上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找不到出路，他们能不感到苦闷吗？这种日益增强的情绪，极深刻地反映出青年成长与历史进步的要求。

自我价值——这是讨论中一个具有极大尖锐性的问题，特别发人深思。多年来青年工作的经验告诉我们，仅仅要求青年看到国家的光明前途是不够的，仅仅要求他们树立共产主义这种美好的社会理想也是不够的，还需要让青年们意识到“我”，意识到“我”在祖国建设、在社会进步中的责任及其价值。只有当个人的发展前途同祖国、社会的发展前途相一致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生活才充实，精神才振奋，前途才光明。这些，是被以往的宣传说教所粗暴摒弃的，现在终于被提出来讨论了！基于社会责任感的自我意识和个性要求绝非大逆不道，恰恰相反，正是革命事业所需要的。革命越向前发展，越要求革命者成为自觉和自为的人，而不是工具或者机器零件。自觉和自为的人是革命事业最可靠的基础，同时又是革命的目的。我们不正是要实现“一个自由

人的公社”——共产主义社会吗？在这个意义上，自我价值的提出，同样极其深刻地反映出社会的提高、时代的前进。

当我零星而粗浅地感受到这一切的时候，总油然而产生出一种有甜有苦、欲笑含泪、然而却是最美好的激动。走过了那艰难痛苦的历程，青年一代在觉醒，在以崭新的面貌奋然崛起。青年的觉醒，反映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觉醒，兆示着一场伟大变革即将来临。时代的春风拂面而来，作为一名共青团的工作者，难道能够看不到这一切吗？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9期）

我认为可以搞“公私合营”

陈百明

读了贵刊第八期李为民的《不能搞“公私合营”》(下称李文),我有许多想法。首先,李文“一直期望能有人对潘晓的错误思想作出有力的批评”,而讨论的实际进程却没有按照他所期望的模式进行。好不容易读到侯爵良的文章,“不料贵刊还发表了反驳侯的文章”,使他很有些愤愤然。我以为大可不必。人生观的讨论既然是一场讨论,就应该而且必须是一种真诚的心灵交流,而不应该人为地制造一种模式,强制别人去接受。既然侯爵良可以发表他的看法,为什么别人就不能提出反驳的意见呢?

下面,我对李文的几个主要观点提出不同看法:

一、李文认为,“利己一词就是以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相对立而存在的。既然如此,又怎么可能做到不损人呢?”并举出“宿舍里你想听收音机,别人想睡觉”等例说明,“如果你要做到不损人,必然要牺牲自己的愿望,你的利己也就受到了限制”。我认为这样的定义和例子都未必妥当。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除了利己与利他的对立,也有利己、利人、利国的统一。现在农村中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政策如此受到欢迎因而富于生命力就是证明之一。而再要农民去重复“一筐粪是送到自留地,还是送到集体地”的“斗私批修”,或“狠斗私字一闪念”,显然不会受到农民的欢迎。至于一方想在宿舍听收音机,一方想睡觉所造成的利他与利己的对立,确实是存在的。但不能由此得出利己就一定

损人的结论。就以听收音机来说,如果听者跑一趟商店,买个耳塞戴上,两得其益,不就把利己与利他统一起来了吗!

二、李文提醒大家注意,“只要是阶级社会,每个人的利益就存在着彼此对立的一面。道理极为简单:社会还没有创造出足以消除这种对立的充足的物质财富。就象一碗粥五个人喝一样,不可能不矛盾……既要做利己主义者又要不损人,这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不可否认,由于物质财富不充足,利己与利他存在着彼此对立的一面。但是不是每一件事,每一种情况下,都是对立的呢?我以为不是,如果按照李文的观点推论,因为目前自行车供不应求,而李文作者由于工作需要买了一辆车子,这样使得别人少了一次买车的机会,于是他在损人而利己了。可能作者不骑自行车上下班,那不妨再举一例:目前由于纸张不充裕,出版的刊物有限,因为登载了他的文章,而使别人少了一次机会,于是他又在损人了。非常憎恨利己的李文作者显然不会同意这种说法。但按照他的逻辑推下去,难道还有其他的结论吗?

在这里,我绝不是否认社会上损人利己现象的严重存在,只是不同意李文对利他与利己绝对对立的看法和所下的定论。我认为不损人的利己是普遍存在的,在劳动还没有成为大多数人生活的第一需要,主要还是一种谋生手段的今天,安分守己的芸芸众生不正是如此吗?真诚宽厚的中国人不会因某人(在政策范围内)添了一个孩子,而指责他使得“一碗粥五人喝”变成六人喝的。回想一下吧,在那众所周知的岁月里,你非得说大寨人大公无私,哪怕说先公后私都是天大的诬蔑。现在,这样的神话不是变成了笑话吗?

李文又说:“退一万步讲,即使不损人的利己是可行的,也不应该给予肯定。”既然是可行的,为何又不能在现阶段肯定呢?据说是“它和损人的利己之间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就很象搞文字游戏了。我们可以说活着是可行的,但

又不能肯定它,因为谁能保证不死呢?这话不也象李文批评他人时所说的“岂不是太荒唐可笑了吗”!

前些年,流行着“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革命”的口号,但革命又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为了使人们的生活(当然也包括自己的生活)更美好吗?所以我以为不要避“贬低”之嫌而“拔高”,不要回避似乎不太响亮却实实在在的说法和口号。实实在在的道理往往要比无视现实的说教高明得多,比没有内容的豪言壮语有力得多。所以,我的意见与李文作者恰恰相反。我认为可以搞“公私合营”,或者叫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李文作者如果不同意这种说法,还可以提出讨论。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10期)

“时势”与“搏命”

郑 明

在人生意义的讨论中，人们常常提到“命运”问题。我对“命运”曾经有过几种认识：在我最“革命”时，我曾认为人是可以驾驭命运的；在我最消沉时，我又认为人不能与命争，命运是“上帝”的安排。而后，经过了现实中“命运”的几次转折以后，现在，我体会到，命运是与时势相连的；而我们应该做一个“自为”的人，在任何时势下都要自强不息。我对《中国青年》杂志今年第七期上顾礼俭同志所说的“人斗不过命”的观点有不同看法，想谈谈自己在人生道路上与“命运”的一番“小小搏斗”。

我今年 26 岁。16 岁那年，全国仍处于上山下乡运动的鼎盛时期。我和大多数青年一样狂热地追求着理想，高喊着激烈的革命口号，苦苦地哀求老师批准自己去东北生产建设兵团。离家时，我没流一滴眼泪，没有一丝痛苦，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刘海英（小说《军队的女儿》中的女主人公）的形象一直占据着我的脑海。

到了兵团，我拼着全力和小伙子们比着干，忘记了自己是个姑娘。麦收时节，在场上干活时，我扛起 200 斤的麻袋上跳板，结果把腰闪了。面对繁重的劳动，我每天仍象小云雀一样嘻笑在人们中间。我确实认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时而幻想着“火线入党”，时而又写下几行拙劣的小诗抒发自己的情怀。但是，好景不长。在劳动中我看到：有些人偷懒耍滑，有的老职工往家里偷大

豆、玉米和木材。我看到：会奉承领导的青年调到营部当电话员、售货员、广播员，低级一点的也把连队教员、炊事员、机务员的美缺占满。剩下我们这些“自命不凡”的人留在农工班中整年地采石、开渠、锄草、收割。我还看到了青年中的政治搏斗和生活搏斗。为了争夺权力，人们真象在战场上那样拚命角逐；为了争夺女人，男人们竟敢刀枪相见。残酷的生活现实把我弄得目瞪口呆。我的热情开始降温，我开始对现实不满了。我常常按捺不住内心的爱憎与喜怒，流露出对偷摸者的鄙视和对奉承者的轻蔑。就这样，我遭到了种种非议，什么“狂热”“屁事不懂”等等。我反遭到我所讥笑的人的讥笑。这些人的势力是那样强大，几乎使我陷于灭顶之灾。我彻底地消沉了。我总结了自己“遇难”的根源在于“祸从口出”。于是，我给自己下了戒言令：不说话，少说话。我不敢再随意发泄自己的不满，对领导产生不满时，我就强迫自己装聋作哑。我几乎把生活当成了一个纯技术问题来对待。

当我第一次探亲回家时，我把目睹的一切向亲朋们痛痛快快地发泄了一通。可是不但没得到同情，大家反说我“偏激”“无病呻吟”“只看社会的阴暗面”，全盘否定我付出了代价才总结出的“社会经验”。一个月的探亲假实际成了长达30天之久的辩论会和批判会。我迷惘、惆怅，怀着痛苦的心情再次登上了东去的列车，再也没有了第一次离家时的狂热，没有了理想与希望，只有消沉和失望。在火车里我哭了，从天津一直哭到山海关。车上的人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他们理解亲人间生离的痛苦，但他们不理解一个青年无路可走的痛楚。

回到连队后，我继续当农工。我也仿效着我所轻蔑的人。我既轻视别人也鄙视自己。当我顶着“大烟泡”到地号里去脱谷时，我学会了偷懒，想方设法使机器超负荷，只要机器一停转，我们就可以休息烤火了。我也和其他青年一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学会了喝酒，学会了唱“思乡小调”“离别歌”和“和尚小

调”。用这些低沉的小调来排除一天的劳累，借酒来消除内心的苦闷。我佩服那些勇于与生命诀别的自杀者，我为他们唱赞歌。虽然他们逃避生活，但他们不苟且偷生。我不甘心就此安身立命，糊糊涂涂地混一辈子，然而又不知怎样大有作为，明明白白地度过一生。

我开始考察社会，分析各种各样的人，既分析现实中的人，也分析小说中的人。我在现实中，在小说里寻找着自己。有时我认为自己非常象小说里描写的好人，有时又认为自己象小说中描写的坏人。因此，我看书的时候总是不得安宁，一会儿自我谴责，一会儿自我安慰。时间就这样打发过去了。边疆生活的第二年开始了。我对尘世仍不乐观，但我开始建立自己生活中的信念，决心与命运抗争一番。我选定了一条路——劳动、学习，自强不息。于是，我又开始拼着命地干活，手上留下了割大豆的刀痕，腿上有石头崩的伤疤。大豆地粘掉了雨靴的靴底，我就赤脚走在豆茬上。稻田里已结上一层薄冰，我毫不犹豫地跳进稻田去收割水稻。我的委屈和痛苦渐渐地消逝了，我的信心一天天坚定了。我自己搬进了存放箱子的房间，让家里人寄来了初中课本。我用一个大箱子当书桌，桌面上摆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我刚到北大荒时照的，满脸稚气、朝气蓬勃；一张是我一年以后照的，满面愁容、老气横秋。我就用这两张不同面貌的照片激励自己加紧学习。我在日记中写到：“虽然我年仅十七八岁，但我没有文化，已是时代的老太婆，将被社会所抛弃。”我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我是一个名不副实的六九届初中毕业生。我们是前17年与后10年的分界线，正当我们小学毕业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无奈，我们被历史性地抛落到知识阶梯的最底层。对自己的不满越强烈，我的学习劲头就越旺盛。我想，学到点东西总会有用的。社会是螺旋向上的。不管什么时候有用，哪怕只用一次，我也要学以备，不能用时再学。开始，我偷偷地学，不敢让别人知道。我把作

业寄回天津让家里人找人批改,然后再寄回来。以后,秘密传开了,我索性公开去请教连队里的老高中生。我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劳动、学习。有几个好朋友支持我,鼓励我。1972年7月份我被批准入团了。命运呵,第一次出现了较好的转机。但我仍不满足,我在渴望着……

终于,我盼来了1973年推荐考试上大学的机会。连里共推荐5人,投票结果,我居第三名。我是理当有资格参加考试的,然而我却做了连里派系斗争的牺牲品。正直的人感到不公,卑鄙的人感到庆幸——“我走不了,别人也别想走”。我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倒是张铁生的白卷给了我某种安慰。我想,连零分都可以上大学,参加考试又有什么用呢!接着,天津中专又来招生,我被无可争议地列入推荐名单。我带着并不愉快的心情回到家乡上了中专,因为我的目标是上大学。尽管如此,新的环境毕竟使我的心情开始好转了。我致力于学习,不参与任何人事问题。

中专毕业后,我并不满足于已学到的这点知识,我想到工作单位后好好干上两年争取保送上大学。可到了单位一看,连续两年保送的大学生都是平常最调皮捣蛋的人。而那些工作踏实,渴望上大学的人,却得不到保送。人与人之间奉行的是个人主义,单位与单位之间通行的是小团体主义。看到这种情形,我彻底死了上大学的心。我在银行除了做信贷工作外,还担任了一些社会工作。这样我又成了被嫉妒的对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处呢?我在探索着这门社会科学中的“优选法”。我仍在思索,但不再象以前那样痛苦,我认为人间就是有美有丑,有善有恶,这都将长期共存于社会之中。

我过了几年安静的生活。我有了一个男朋友,他正直诚实。我开始满足了。但是,1977年的高考制度打破了我的平静。我要上大学!但衡量一下自己,凭这点浅薄的知识怎能考上呢。我想上学,但又缺乏勇气,怕考不取遭人耻笑。这些念头轮番地折磨

着我。我哭了，哭得是那样伤心，我感到命运对我是那样不公平，为什么命运偏偏在这时候又来刺激我这受过伤的心灵呢？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我也许就此安身立命了。而社会偏偏给了我这个机会，难道看着它白白跑掉吗？我六神无主，坐卧不宁。我又陷于失望——几乎是绝望之中。最后，我下了决心：一定要参加高考，与命一争。哪怕碰个头破血流，今后想起此事也不致后悔。我不再打球，不再游泳，不再看小说，而是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我无暇顾及失望与希望，痛苦也不翼而飞了。不知是對我刻苦学习的奖赏还是报答，我被天津财经学院录取了。接到通知书时，我真是悲喜交集。喜的是我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悲的是这个愿望经历了如此之多的磨炼和考验。真可谓“创业艰难百战多”。

上大学后，我碰到了新的困难。我是个英文盲，学英语很吃力。但我并不气馁。我认为，好学是青年人的本能，自信是我们的天性，没有学不会的知识。我抓紧时间补习英语，不久就跟上了大多数人的步伐。我开始自我陶醉了。时间的利用率日趋下降。这个学期的英语测验我只得了78.5分，这才使我惊醒过来。在困难时期我能勒紧岁月的缰绳，而在幸福时却任光阴逝去。由此，我体会到，还是在痛苦的追求中进步更大。顺境往往使人缺乏意志和勤奋，而逆境则既可能使弱者失败也可能造就强者。

回顾十多年人生道路的变化，我认为时势对于每个人确实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个人的命运是与时势紧紧相连的。回首十年历程，哪一步没有打上时势的烙印呢！时势，就是客观的社会条件。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承认时势的作用是唯物的。因为任何愿望都需要凭借一定的客观条件才能实现，都要受客观条件的制约。过去我常常把经过自己的努力而没能达到目的的原因归之为命运。现在我才懂得了，愿望的破灭并非都是自己努力不够，也不是什么命运的捉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时势的造就”。命运的转机是有赖于时势的变化。但是，时势的变化并

不一定就能使我们的愿望自然而然地得到实现。要达到目的,还必须去“搏命”,去奋斗争取。如果我 1973 年没能上成大学后就不再学习文化知识,放松了主观努力,那么 1977 年高考制度的改革使时势变化了,我也只能是两手攥空拳,望“学”兴叹,一事无成。我体会到:处在逆境不放松努力,时势变化了拼命奋斗,我们就可以有所作为。今天,我们国家的时势已经越变越好,我们的“搏命”也将会越来越有成效。

(原载《中国青年》1980 年第 10 期)

蜡烛和电灯

杜力夫

电灯问世之前，人们曾经历了一个“蜡烛时代”。如今，当电灯出了故障时，人们也往往点起蜡烛。蜡烛虽不如电灯明亮，但在这时，也能为人们驱除黑暗，带来光明。不过，绝不能因此而抛弃电灯，重新回到蜡烛时代。

(一)

赵林同志在人生意义的讨论中，针对潘晓同志面临的“黑暗”，点起了一支蜡烛——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

蜡烛能够驱除黑暗。卢梭、康德的学说以及“个人主义”、“天赋人权”这套思想武器，至今仍能在一定程度上批判封建主义，为人们解除迷信的枷锁。

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迷信奴役人们的躯体，扼杀人们的思想。人们在神光环绕的君主面前只是一种工具。这里，人不成其为人，更没有个人主义的地位。正如卢梭所说：“极度盲目的服从，乃是为奴隶们留下来的唯一美德。”更可悲的是，有时人们根本认识不到自己的悲惨处境，相反，却时而为明君圣主的“政绩”山呼万岁，感激涕零。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是这片黑暗中的一线微光。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们的烛光，在黑暗中格外耀眼。稍后，德国

资产阶级哲学家康德讲“人是目的不是手段”，黑格尔讲人的“自我意识”，用抽象的语言表达了自由、平等、人权的思想。资产阶级以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思想武器，把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打得溃不成军。启蒙运动成为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先导。后来列宁曾赞赏道：“十八世纪老无神论者所写的那些锋利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打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那些政论在唤醒人们的宗教迷梦方面，往往要比充斥在我们出版物中的常常歪曲（这是不容讳言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字更适合千百倍……”今天，在我们清算封建主义思想，为实现四化而改革社会的斗争中，启蒙学者们的思想武器仍有一定的用处。比起封建主义的那一套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依然是先进的。用“奴隶的美德”来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可悲的、反动的。在今天，“奴隶的美德”已和生产的社会化、政治的民主化这一时代潮流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这一矛盾对立反映在青年一代的人生观上，其表现之一就是潘晓同志的苦闷和普遍存在的所谓“信仰危机”。赵林同志举起个人主义的蜡烛为潘晓驱除“奴隶的美德”的幽灵，鼓励潘晓发现自我、挖掘自我、扩张自我，采取进取的生活态度，这比起那些不断用溜须拍马的技巧完善自己“奴隶的美德”的人来，无疑要高出一筹。那些不了解卢梭、康德而只会背诵《共产党宣言》、《为人民服务》的年轻人，在封建主义的恶势力面前是软弱的。十年浩劫中的一幕幕悲喜剧就是最好的证明。

封建主义扼杀人的创造性，把人变成工具，把迷信和盲从推上美德的宝座。我们在清除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必须发现自我，正确认识自我，正确认识和处理自我同社会的关系，树立科学的革命人生观，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赵林同志主张发现自我，不与恶的东西合流，这是值得重视和思考的。黑暗并不惧怕因故障而熄灭的电灯，而燃烧着的蜡烛却能带来有限的光明。

(二)

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个性解放以及关于“理想王国”的设想，是对封建主义和封建社会的否定。但是资产阶级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理论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结出的果实却又反过来扼杀了个人。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使人们从封建专制的奴隶变为金钱和商品的奴隶。资本取代了君主，神明为金钱所代替。人类在这里并没有摆脱异化，个人的权利和尊严仍被否定，人道主义成为神甫牧师手中的遮羞布。在“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声中诞生的“理性王国”，只不过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比起封建奴役来，资本的奴役无疑是一种进步，然而，进步的奴役仍然是奴役。“剥削奴役”这只怪物被人们从门里扔出去后又从窗子里飞了进来。历史表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实体不是指每一个“个人”，而只是一部分人，或者说仅仅是资产阶级本身。所谓“人的解放”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解放，而这种解放以奴役无产阶级为条件。我们把“发现自我”、“认识自我”、“扩张自我”放在这个背景来看，都成了对命题自身的否定。因为“发现”自己、“认识”自己是为了奴役别人，从而为自己的“扩张”找到条件。绝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不复存在了。卢梭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平等、人权的阐述是“作为全人类要求来阐述的”，而所谓“全人类”是虚假的，“资产阶级”却是真实的。在为“全人类”自由、平等进行斗争的旗号下，农民、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者被利用、被出卖。正因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中的“人”仅仅是资产阶级本身，所以他们极力混淆视听，时而把“人”描绘成抽象的“类”，时而把人说成是“机器”，当做“生物的人”。“人”的概念在他们那里非常混乱。这一切的目的，无非是想把一部分人的利益冒充为全人类的利益，从而确立这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

统治。

个人主义的凯旋导致了对更多的个人的奴役和对自身的否定。这就是蜡烛的局限！

注重人类经济生活的唯物史观克服了卢梭、康德等人以及三大空想家的局限，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引入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一系列崭新的概念和范畴，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唯物史观把对“人的解放”、“自由”、“平等”的理解建立在了科学的基础上。社会发展的一切方面受生产力水平制约，人首先是阶级的人。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的解放都与生产力的发展相联系，与生产力的主体——劳动人民的解放相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继承了他们前辈的思想精华，为人类的彻底解放和个人的彻底解放找到了出路。

蜡烛在黑暗中放射光芒，在明亮的灯光下却黯然失色；星星在夜空里眨眼，在阳光下就匿迹了。

（三）

赵林同志认为自己的人生观是“一套崭新的人生观”，实际上，他这套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人生观并没有超过约翰·克利斯朵夫和《红与黑》中的于连的水平。相对于奴隶主义无疑是“崭新”的，相对于唯物史观却是陈旧的。“生命之光”的焕发不是脱离社会一味自我扩张的结果，而是个人努力与社会和社会发展方向结合的产物，是与生产力的主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结果。有马克思、哥白尼、爱因斯坦的“生命之光”，也有希特勒的“生命之光”。被认识了的自我要在服从历史发展方向的前提下进行扩张，否则毫无价值。不要忘记，以康德为根，黑格尔为干，尼采为枝叶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之树，曾经结过一个名叫“法西斯主义”的苦果。今天如果还提倡“绝对自我”，有可能

在政治领域的实践导致希特勒的袖珍版，在经济领域的延伸导致私有制。历史不会重演，只有向前走，才会有出路。

赵林同志的人生观作为对封建残余势力的反抗，虽然有它的必然性和某种意义的合理性，但却不值得今天的青年们效仿。因为欧洲的经济基础没有被天使搬到中国。卢梭、康德时代的这套思想武器在欧洲打过胜仗，但在中国却不曾赢过。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不是没有人试过，一代英烈的鲜血所换得的教训不应被忘记。况且我们今天已经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还存在着严重的封建主义遗毒），有了远远胜过卢梭和康德的马克思主义（前些年被严重歪曲了，今天正在恢复其本来面貌）。电灯出了故障，人们不应以此为理由抛弃电灯，回到蜡烛时代。诚然，被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打不败封建主义（甚至被封建主义所利用），但这不应成为“硬汉性格”的人回到卢梭、康德的理由。真正的“硬汉”应走过卢梭和康德，走过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致力于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光明，以此献身于人类解放的事业，并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幸福。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11期）

在利他中利己 在利己中利他

常谢枫

作为一种完整的社会主义道德观,我提倡“在利他中利己,在利己中利他”。我认为这样的口号既符合真正的人类本性,也符合道德发展的趋势,又符合我国当前的历史状况。

这里所说的“在利他中利己”,实际上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利他”,指的是从利他的动机出发去行动,在产生利他效果的同时客观上达到了某种意义的利己。而所谓“在利己中利他”则指的是:在从利己的动机出发去行动之前,必须考虑到行为的结果要有利(至少无损)于他人或社会。否则,这一动机和行动就是不合理的。例如:一位教师为了增加个人的收入到外校去兼一点课,这是利己的动机和行为,然而行为的结果对学生和社会有利,因此是合理的。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第一,“在利他中利己”的公式绝不意味着“利他”是手段,而“利己”是目的,或者“利他”是动机,“利己”是“潜动机”。如果这样做,这种“利他”也是不高尚,不值得仿效的。说得重一些,这只是变相的私,是画皮下面的虚伪。我认为,这一公式中的“利他”应该是行为的动机和目的本身,而利己的效果只是自行降临的不期之获。我不相信,雷锋雨夜送大娘,把存款赠给受灾公社的利他行为是为了达到某种个人目的,不相信在这样做的时候,他的思想深处还隐藏着一个尚未意识到的“潜动机”;更不相信向秀丽同志用自己的身体扑灭大火是

为了用宝贵的生命去换取一个“人民英雄”的称号；也不相信现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人民在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忘我精神和助人为乐的新风尚都是从利己的“潜动机”出发的。那些把所谓“利他”变成谋取个人私利之手段的人们，整个社会应该鄙视他们并把他们称作缺乏道德的人。第二，“在利己中利他”的公式应该有一个适当的范围和界限，即在通过正当手段为自己谋取物质和文化生活这一范围里允许利己动机的合法存在，任何人也不应该鄙视指责这种动机和行为。但是这种为个人工作的动机和行为必须包含着有利（至少无损）于社会或“他人”的因素。否则，就容易导致损人利己。

还应该明确，“在利己中利他”的公式对于社会主义国度的公民来说，是一种较低的要求。这种观念只因其比较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的水平和人们的觉悟程度，才允许其存在和发生若干作用。我们还是应该提倡“利他”和“公”的道德观念，提倡公而忘私、先公后私、助人为乐等等优美、崇高的精神。有人担心这样做会使我们走吃大锅饭的老路，降低四化建设的速度，减弱竞争的神威。其实，社会发展的最大动力不是来自每个公民的高度利己或者单纯来自经济和生存上的竞争，而是来自一个建立在科学和民主的基础之上的经济管理体制，一个对经济工作实行高效能领导的强有力的政府机关，和全体人民为了一个统一的大目标所进行的集体奋斗。因此，在承认“在利己中利他”的合理性的同时，大力提倡“公”的观念，不但与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社会的经济基础不发生矛盾，而且有利于后者的巩固和发展。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11期）

谈“透”

田 芬

青年杂志上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每每使我落泪。我是个年轻作者（当然，这里的“年轻”是指文笔而不是指皱纹），“怎样认识和对待我们的现实社会”，这个问题几乎是我天天要思考、时时要遇到的问题。在深入生活，采访人物当中，不论是端庄的老者，还是勤恳忠厚的青年，或是失足少年，往往都要谈到一个词儿：“看透”。然而进一步探索，我发现，“看透”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儿，看透之后又有各种各样的做法。

潘晓的经历是当代许多青年都经历过的，就连我们何尝不是从阳光灿烂、鲜花美丽的幻想世界跌落到现实中的？悲观、痛苦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以为“生活如此残酷，社会这样黑暗，人们真是可憎”，从此“看透”了，我倒觉得恰恰是“看”了却没有“透”的表现。何为“透”？小时我馏馒头，往往摸着外皮软了就以为透了；可大人教我说：“要用筷子戳戳，各部分都变软才算透了。”这里强调了“各部分”。就象一面镜子，从正面看，平滑光泽，而从背面看呢？它却是乌涂涂的一层粉末，远不如正面可爱。但若没有背面涂上去的水银，就没有正面的光泽；而若没有正面的光泽，涂水银也就失去意义。正是正、背两面缺一不可才构成了镜子。社会、人比镜子不知复杂多少倍，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的各方面交错，恰恰组合完成了社会、人这样一个概念。不是吗？只看到鲜花是幼稚，只看到垃圾也是偏激的，把它们结合起来看

才谓之“看透”哪！

是的，十年动乱，恶性大爆炸，甚至蔓延开来。社会、人都向坏的方面迈了不小的一步。但美的东西依然存在，坚实地存在。能够迎来今天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我不想说昨天，想说今天。正因为今天是从昨天过来的，它必然带有昨天的污浊；但今天总是给人以希望的。我说今天比昨天好，不是想粉饰太平，讨好谁，而是生活的真实感觉。有次会上我说了坐汽车的事。我说，在汽车上听见售票员喊：“给抱小孩的让个座”心里就痛，想这与文明古国太不相称，中国堕落了。可一转念，我又乐了。回想一下，那十年中，哪个售票员这样喊过？因为他明知喊也无用，说不定会招来一顿骂。但今天他喊了，因为他相信喊一声，喊两声，喊三声总会有人站起来。从不喊到喊，今天比昨天好。再如我晚上路过北太平庄农贸市场，看到卖西瓜的农民，就铺一块塑料布，合衣睡在又脏又潮的地上，不免有些心酸，想中国太贫困，人民太穷苦了。可我走近他们身边，仔细观察，却发现他们睡得很香，很甜，甚至带着微笑！这是为什么？噢！因为他身边有大堆大堆的西瓜，身子底下的荷包里有为数不少的“大团圆”。比起昨天，他满足多了。对于社会来说，市场有了大批西瓜，农民手里有了钱，也是昨天做不到的好事，尽管农民可怜地睡在地下还不是大好事。就拿潘晓自己来说，如在过去，她的这篇文章即使不使她当反革命也会使她被“内控”起来；而今天，在国家级的刊物刊登，引起全国性大讨论。当然，今天不是完美的。象卖西瓜的农民中有投机倒把犯一样，好与坏是并存的。就一个人来说，它们也是并存的。我就听说过一个成天辛苦劳累、可谓之积极肯干的老干部，当他的爱子被拘留时，却忍不住打个电话“询问”了一下。象我们这般中年人何尝没有自我矛盾？一会儿为爱国激情所燃烧，似乎贡献生命在所不辞；一会儿却又心灰意冷，想躲进深山老林……

然而，正象要找出每个人面部主要特征才能在亿万混杂的人群中辨认一样，我们必须找出生活的主流，不找到它，就没有生存下去的勇气，更没有服务于社会的力量。有些人对“生活的主流是好的”这话不以为然。我写过一个小姑娘爱上小眼儿的丑小伙的故事，有人讲全是编的。其实生活中真有这模特儿，她们结婚时还给我寄来了结婚照。但美好的东西，为什么有些人不相信呢？莫非美好生活只在作家面前展现，而不肯在这些人面前展现？绝对不会。可他们为何就看不到呢？我想是因为他自己戴上了特殊的眼镜，这副眼镜是“对未来丧失希望”眼镜厂出的名牌货。就象一个人得了重病，最高级专家告诉他是不治之症，他失望，坐以待毙了，就不会再去找药。连药都不找了，何以找到好药呢？仙丹就是放在面前他也看不到或不承认，更不会去服用。

所以，我想劝劝有些青年朋友，先把特殊眼镜摘下来，平心静气看看周围，只怕你认真看过之后，这副名牌货就会被自己砸烂了。我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把它砸烂的。这应归功于生活，是生活教育了我。有个基层科研单位的头头关美君，不安于等待，为建立祖国新型的科学事业做出了不可低估的成就，但还不完全被理解，甚至受责难。是的，当初打她反革命，去掉她丈夫领章帽徽时，没有谁想到需要查证落实。而今天报道她，刊登她照片时，却要“慎重”再“慎重”，“研究”再“研究”，这样的现实不太美好。可谈到这些，她总是一撩头发，爽朗地说：“我算看透了，越这样越得干。”虽然她未明确说过看透什么，要干什么，但我理解了。她看透这些是必然的，不足为奇，只要再干，坚持地干下去，就逐渐会被更多人理解、拥护。半途而废倒下来，对事业对个人百害无一利。有一个很有才华的中年画家曹新林，从自己才能被埋没的惨痛教训里，感受到践踏人才的残酷、可恨，看透了伯乐和园丁的巨大作用。所以，今天尽管他已是小有名气的画家，完全有

能力再发奋“大有名气”一番，但他却宁肯拿出三分之二的精力在个不起眼的少年宫里教少年画画。几年来，他送走了二十多名考进美术学院的学生。我不用再多举例了，这些受过寒才倍知暖的人，有一种共同的本事：坏的物质条件、领导的不支持、同行的冷眼、群众的不理解，都被他们“看透了”，明智地转化为自己发动汽车的电瓶，推送弹头的火箭。我总认为脚踏在实地上，从实际出发，创造自我，发展自我，从而有利于人类的人，才是最明智的志士，才是最能看透生活，而又自如驾驭它的大能人！这样的人是社会的中坚，中国复兴的希望！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11期）

驯服野牛的“哲学”

杨文杰

看了潘晓同志的信，我不禁思考起一个问题来，应该怎样认识客观环境，改造客观环境？怎样调节主客观的矛盾？我想从我的经历谈起。

我今年才十七岁，“文化大革命”虽没赶上，但却是在屈辱、贫困和痛苦中长大的，是在刺激皮肤的碱水里泡大的，我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滋味。我小的时候，母亲瘦弱多病，当时收入又少得可怜。在我正需要奶水滋补的时候，我的胃里盛的却是农家大铁锅里熬出来的米汤……

等我长大点儿，来到县城，六岁就让上学了。我年纪小，是农村来的，土气，又处在“热闹”的年代，老师靠边站，我在班里常常受大同学的欺负。我的眼泪被烧干了，默默地忍受着，回家从不“诉苦”。这样的生活，使我孤独，可也有了心劲儿，知道用大脑去思考。上高一时，我就能独立地思考一些社会问题了。在那宣传没有丝毫的稳定性的日子里，昨天，甲是一颗世上洁白的珍珠，今天，他又成了一滩世上最肮脏的粪肥。这样的宣传使人无所适从。“独特”的童年生活，使我过早地失掉了少年的热情和冲动，同时也丢弃了少年的幼稚和盲从。我对世上的一切都采取冷静的态度去观察、去对待。我努力寻找宣传中所说的“特坏人”的优点，“特好人”的缺点。即使现在，我仍坚持着自己给自己定的“框框”：不管对什么，也不管是谁说的，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关键

是要通过自己大脑的思考。

我还常常这样想：社会弊病是可恶的，但它是客观存在的。要改造社会，不应敌视社会，而首先应顺应社会，应出污泥而不染，并且尽自己的力量，使社会一步步转入理想和正确的轨道。就象要驯服一条野牛，首先应接近它、关心它、爱护它，你甚至还应顺着它的弯路走上一截（当然，这样做应心中有数），然后，你才有可能把它一步步地引到正道上来。如果你对它只是一味地“训斥”、鞭打，它很可能将你“挑”翻在地，以更加疯狂的速度，向旷野奔去。这种驯服野牛的“哲学”，可以给人以启示。

我还要说：当你诅咒社会，指责别人的时候，也应该想一想，自己有没有消极、颓废以及其它一些不健康的想法？不要总是只将挑剔的目光死死盯在他人的污点上。如果所有的人都用这样的目光去看别人，都不肯花力气擦去自己身上的污垢，那么，社会的航船岂不要抛锚于大海之上，来等待大自然的惩罚？所以不加思索地光是诅咒社会、指责他人，不是明智的做法。而唯有用别人的过错来告诫自己，首先擦去自己身上的污点，同时，想法改革社会和帮助别人，这才是可取的。

“危机四伏”的童年生活，使我变得谨慎、细心，脾气也相当温和。我和所有人，包括所谓“俗气无聊”的人，和班上“小玩闹”式的学生，都谈得来，可以长久地友好相处。但我不是机械地应付，而是在不伤害对方的自尊心的前提下，逐步地、一星一点地改变他们的性格、习惯和追求。我喜欢他们的坦率和豪爽，他们也喜欢我的温和与幽默。上课时，我的好静与他们的好动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冲突，似乎还“配合”得不错。他们之间的“动乱”与“战争”，耽误了我一些学习时间，但我也从中寻求到一些欢乐。我心情爽悦，更充分利用“和平时期”，反而有成效地巩固了我所学的知识。我的性格虽说是古怪的，可我从没有孤独之感，因为我并不觉得我是多么清高，也从不觉得别人是多么俗气和无聊。

我和他们只有脾气、习惯和追求目标的不同，而这一切，通过努力，又是可以逐步改变的。

潘晓为没有人能理解自己而感到苦恼。何必非要别人理解自己呢？你埋头干自己的不就得了。在我高考复习时，周围的一些人有的说我呆了，有的说我变傻了，还有那刺耳的冷嘲热讽从那些“优越子弟”的口里粗野地“蹦”出，我没有向他们解释，乞求他们的理解，而是把头垂下，埋在书本里。就是现在，以玩笑形式表露出来的讽刺和嘲笑仍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把嘲讽当成迎面吹来的一股凉风。顶着凉风爬山，风挺冷，一停下就会着凉，只好低着头，一个劲地攀登。这岂不是个好事。听人说：“嘲讽”是一味很有疗效的中药，可以医治头脑膨胀，身轻体飘，手低眼高，双目朦胧，鼓劲不足，憋气不久等多种病。这是颇有道理的。

我牢记着这样一句格言：“聪明人用成果说话，傻瓜才用舌头吹牛。”

我总是这样想：在我遭受打击、抬不起头来的时候，如果有人向我投来一瞥安慰的目光，我也会永远记住他；当我得志，即使有人给我成吨黄金，我也会嗤之以鼻。因为前者没有丝毫的私心，有的只是同情和友爱；而后者则没有丝毫的诚意，有的只是谄媚和图利。我的受挫时期大大超过得志时期，因此我的朋友不多，但忠诚可靠。他们都是在受打击、遭不幸的时候和我结成挚朋密友的。他们没有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的想法，却有为我为我包扎伤口的愿望。这是真正的友谊，要求助，就应求助这样的友谊。

命运的不幸，它会给你迷茫和痛苦，也会给你明智和成熟。对一个有志者来说，则将成为干一番事业的前进动力。

我从小酷爱文学，生活的“磨炼”又使我积累了一些素材。现在我的脑子里不时涌现出一些小说轮廓。我已下决心献身于这个事业。

有人会说：“你这样刻苦，还不是为自己成名？”是的，我并

不排除这个成份，它同样占有一定比重。但我的灵魂中不只是为了自己出名。否则，我绝不会坚持这样长久，并决心更长久地坚持下去。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中文系的“额外”奋斗，和各科成绩是成反比的。我在这上边花的力气越大，得的分数就越低，毕业后是分配不到好工作的。我更清楚地知道，我的创作离发表还有相当距离，发表对我只是一个遥远的、甚至是渺茫的目标而已。我要是只为自己，何苦这样傻呢？再说，倘若把一切都看成自私和为我，那保尔跃马劈敌，雪夜修路的时候，想到的就将是将来的名誉和幸福了。这可能吗？

那我到底为了什么呢？我只觉得有一种为我们中华民族争口气的愿望，它在强烈地驱使着我，鞭打着我。希望我们的中华民族能挺拔而刚健地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就是想用笔作旗杆，作品当旗帜，向全中国、全世界展示：“八十年代的中国新一代，是思考的一代，奋斗的一代，是‘不幸’的风口上吹打出来的挺拔的青松，是腐朽混乱的思想废墟上破土而生的虽黄弱但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嫩芽，是大有希望、前途无量的一代。”

潘晓说她触不到时代前进的有力臂膀。其实，这时代的臂膀就是你、我、他，一切实实在在的人组成的。它是笼统的，你触不到，但你却可以成为其中的一个细胞。你不用去触摸寻找了，你用你的奋进的勇气，扎实的脚步，为国出力的热情和持之以恒的耐力参加进来吧！

我很希望和我一样大的或比我大的年轻人，抛弃对过去的怨恨，增强对未来的信心，客观地认识社会，合理地适应社会，鼓足改造社会的勇气，下定默默奋斗的决心，巧妙地利用自己的环境和自己的才华（一技之长），去采摘各行各业的明珠，去为时代的臂膀增添前进的动力。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11期）

“危机”与“跳苗”

杨 柏

自然界中，黄河几度改道，地壳多少沉浮；喜马拉雅山脉，过去曾为水族宫殿，上面咆哮着印度洋的狂涛；台湾海峡，昔时却林木深秀，把宝岛与大陆紧紧相连；沧海变桑田，桑田变沧海，大自然发展的道路是不平坦的。翻开史页，中原逐鹿，五霸起伏，秦汉统一，三国鼎立……历代王朝，一个个兴而又亡，中华民族，一次次衰而复盛，人类社会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那么，作为浩瀚大海中的一滴水，人生的道路当然会既有顺境，也有逆境。正可谓人生正道是沧桑。

这里谈谈我的某些经历。尽管我习惯用“记忆筛选法”去努力“遗忘”某些东西，但我不能不“公平”地说，正是那些痛苦的磨炼使我成长。

“文革”初期，我处于半被催眠半清醒的状态，既有“反修防修”的狂热，又有看不惯某些现象的正常理智。于是难免和“中央文革”顶牛，用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理论”去审视它自己。我们当时真的以为有一条压制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我认为“中央文革”不过是用“新形式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取代旧的，同样在压制群众，而且是压制更大的多数。这样一闹，让我尝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铁拳头”，体验到“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并由于父母同时受到冲击，领略了六次抄家的滋味，“享受”过两年政治避难式的流亡生活。这是我平生遭受的

第一次人生危机。

“战败的军队最善于学习”。命运的接连打击没有使我屈服。相反，我不服气，要弄清是非，于是就利用被剥夺参加运动的权利的“优越性”，去拜读“老祖宗”的书。那些日子里，我按照自己制定的作息时间表去生活。广泛涉猎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书籍，并用以观察分析“文革”中的政治风云，头脑越来越清晰了。历史的辩证法使我坚信，笑在最后的人才笑得最痛快。

68年到农村，在和老贫农接触的过程中，我又听到令人震惊的事实：“大跃进”的实情确实很糟。那么“三面红旗？彭德怀？……”简直不敢想象。这是我经历的第二次危机，它是信仰危机。在这之前与之后，还遇到城市青年不习惯艰苦劳作的体力危机。通过这两次危机，我体力上强壮起来，精神上独立起来，对事物和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自己的一套不符合当时潮流的独立理解，并努力寻求“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现在人们公开探讨的封建遗毒问题，那时在很多独立观察问题的青年中就已经在议论了。

生活的第四次打击是“恋爱危机”。“养育之恩”竟然使女方的家长认为有权干涉子女的生活。我愤懑，我激怒，我又平静、沉默。强烈的自尊心使我兢兢以强，去勇敢地面对现实。

第五次危机受天安门事件的影响。我从“四五”运动看到希望，看到过去曾沮丧地以为“中国人有窝头就不造反”是片面的。但我在天安门广场路过，并和在场的人们互相交谈过自己所见事件的经过，却因此被人告到工作单位的保卫部，于是也就成为重点审查对象之一。当然，也就又一次失去了入党的资格。这次危机把我逼回家中，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形成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新理解。同时也有了空闲时间去了解国外科学的某些发展动态。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小的危机,如调转、找工作、工作变换身不由己、人事关系等等。但这些创伤都使我受益非浅。生活经验告诉我,人生的波折并不完全都是坏事,对于神经坚强的人,人生的价值往往是锤炼出来的。

幼苗破土,农民常常不急于浇水,目的是促使植物的根系向纵深伸展,这叫做“蹲苗”。青年初入社会,经受种种磨难,它也有类似“蹲苗”的作用。这不是主张人为地给青年制造烦恼,但那些不可避免的挫折,确实会让人更成熟、更深刻。娇生惯养是培养低能者的摇篮,高山寒土使苍柏劲松更加挺拔。司马迁身受宫刑,文章字字珠玉;李后主被俘幽禁,词境为之一变;居里夫人苦熬沥青,一人两获诺贝尔奖;马克思飘泊欧洲,至今光采照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真是句至理名言啊。

(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11期)

档案

（按在“档案故事”栏目中陆续刊出）

这些材料是内幕的内幕，
对于所有关心“潘晓讨论”这一事件的人们，无论
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也无论是出于好奇还是
深入的追溯，它们或许
都具有可读和趣味。在
时间面前，从一定意义上
说，历史没有秘密可言
.....

胡乔木接见《中国青年》负责人

地点：中国青年杂志社三楼会议室

时间：1980年6月18日下午3——5时45分

出席：胡启立（团中央常务书记）、关志豪（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王江云（副总编辑）、郭楠柠（副总编辑）

关志豪：我先汇报一下，为什么要开展这场讨论，讨论涉及到的问题，我们准备怎样引导。先作一下简要汇报，然后请乔木同志讲。

对青年进行人生观、世界观教育、理想教育是中国青年杂志的传统。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都搞过。开展这次讨论，既是传统，又是现实的需要。我们认为，提高觉悟要从人生观这一总开关上解决。关于理想教育，复刊时我们就想开展，碰到一些难题：

1. 通过什么途径才能使大道理被青年接受？十年动乱破坏了政治工作的物质基础，人民的切身利益被践踏。大道理如果讲得不好，会在青年中产生这样两种效果：一是感觉与己无关，二是产生对立。青年们会认为这只是讲给青年人听的，你们自己不准这么办。粉碎“四人帮”后，这个基础正在逐步恢复、建立，但目前还比较薄弱。

2. 时代条件的变异，有个创新的问题，不能停留于老的办法，不能重复过去的答案。青年十来年的经历引起的思想实际要

包括进去。

3. 各个领域、各条战线都有肃清“四人帮”流毒的问题，思想工作也有这个问题。思想工作要讲求科学性，要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第6期发表《青年工作要讲求科学性》就体现了这些想法。

小平同志讲，解放思想就是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我们觉得应遵循这个精神，从这个方面努力，采取通过潘晓这个典型进行讨论的办法，帮助青年树立革命的人生观。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典型？她曾经是有理想的，后来理想破灭了，她感到苦闷、傍徨，但她不甘落后，还想探求人生的真谛。她虽有消极的想法，但不甘心吃喝玩乐了此一生。潘晓这个典型反映了相当大一部分青年的状况。我们把这部分青年人作为工作的对象，着力于他们意义更大。这是需要花大力气做工作的对象，他们一旦重新振奋是非常坚强的，是我们寄与希望的。

这个典型发表后，我们收到来信来稿两万四千多件，总的反映是积极的。大多数人对潘晓的信及观点的态度是：同感但不完全同意，同情但希望她奋起。他们都有和潘晓相似的经历。完全同意潘晓的观点，甚至走得更远的也有，但是少数。这样的情况我们还要通过内部向领导反映，使领导便于掌握青年的思想脉搏。通过这个典型，引出了一大批好的稿子，这里可以发现人才（乔木同志点头）。我们打算建立档案，联系一批作者。

两万多封来信来稿集中反映出两个问题。一个是怎样看现实，怎样看有弊病的社会？不少青年对过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意见。一个青年说，过去的“全红教育”使人们“患了少年色盲症”。过去的教育往往把世界说成都是鲜花，青年人到社会上一看，不都是鲜花，还有很多弊病，于是有人连寻找鲜花的勇气都没有了，甚至根本不承认世界上有鲜花。

在今天的条件下，帮助青年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光批判资产

阶级思想、个人主义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帮助青年正确地看待现实。我们的社会本来就不全是光明，不全是鲜花。

有这样的反映，认为讨论没有用，说这是改变现实的问题。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但不完全。根本上解决问题，确实需要对现实进行一系列的变革，但是，讨论可以帮助青年正确地认识社会，从而投入到变革现实的斗争中去。讨论对变革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组织了一篇专文《看透了，活得更积极》。青年好讲“看透了”，其实并没有真正看透。真正的看透，是懂得社会变革的客观规律，不会停留在个人的悲哀上，而会积极行动起来。这篇文章正在修改中，贯彻马克思的观点，理想就是变革现实。还有一篇，以情动人。青年人自己讲经历，从迷信、破灭、苦闷到坚定。经历甚至比潘晓还惨，但人生态度是积极的。

来稿中积极反映的第二个问题是：对“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应该怎么看？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我与我们，为自己与为他人究竟是个什么关系？怎样讲，既有利于促进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又有利于今后向更高水平过渡？看来是个理论问题，实际上搞清楚了对促进生产力发展是有联系的。要帮助青年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必然要涉及这个问题（乔木同志同意）。我们打印了四篇有关的文章（当场给乔木同志一份），反映出三种观点：

1. 认为为自己与为别人、我与我们截然对立。有代表性的是侯爵良的文章《“为自我”岂能“为别人”》，这是打印的第一篇。

2. 自私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是在“恶”中发展。这是打印的第二篇。作者的这种观点也是从他的生活经历中来的，有论证。

3. 认为二者是统一的，是统一论。两篇文章，山西省委党校一篇、北大经济系一篇。认为并不一定通过损人的手段才能达到我的目的。这是打印的第三、四篇。

我们认为，宣传上要提倡共产主义风格，现实生活中也是有

的。许多来稿对潘晓讲的“人都是自私的”提出不同意见，并举出总理、张志新、自卫反击战的英雄为例。共产主义风格可以提倡，但是对整体、对多数人如何要求？是宣传“大公无私”，还是像少奇同志讲的“大公有私，公私兼顾，先公后私”？有个口号“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乔木同志说：这话比较古老，是宗教教义上的，还是哪里的？我还没有弄清楚。）

十年动乱，对青年来说，破坏了对大公无私的信念。相当多的青年当时是相信的，确实有献身的精神。从造反到插队，都是这样。分到条件较好的地方不去，非要到最穷的地方。后来逐渐发现现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我们的宣传讲个人与集体不一致这面多，讲一致这面少。我们认为，一致的一面是主要的（乔木同志点头）。过去搞得仿佛一讲理想就是牺牲牺牲、吃苦吃苦，青年有种对立情绪，你们只是要我们这样，你们“大人物”怎么样？有些地方因此发生恶性事件。

我们应该讲“我”与“我们”是一致的，“我们”不抹杀“我”，不能只讲复数，不关心每个个人。要把“我”与“我们”的内在联系跟青年讲清楚。三十年了，生产目的都没搞清楚，很说明问题。这二者不是一码事，但是有联系。生产与消费脱节，生产与人民生活脱节，提出“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口号，一变，人民生活就不顾了。前天辽宁发了《共产主义道德规范》，今天湖北宜昌发了《社会主义道德公约》，都是十条，不大一样。到底怎样提为宜？

宣传口号的提法，应该既要有利于现行政策，又要促进今后发展。我们打算搞一篇理论性文章，讲清这个问题：个人和集体的辩证关系。讨论准备搞到年底，最后编辑部有个总结。我们总的目的是把青年中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扎扎实实地把青年引向搞四化，因为根本的出路是把四化搞上去。请乔木同志讲。

胡乔木：我没有什么说的。这个讨论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兴趣，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应该有兴趣。你们的讨论要搞到年底，但按你们第6期的办法，恐怕不太容易维持。你们的第四篇文章（指《“为自我”岂能“为别人”》，青年一看要生气的，其他几篇也比较抽象。最后一篇有不少讲的是外国的。写文章的人都没有讲到自己的经历，没有讲到自己周围的事情。老发表这样的文章就不会引起兴趣，这样下去就等于把火浇灭了。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现在的表现。比如，说现在的人生态度是积极的，可以讲。用自己的经历证明潘晓的观点，现在的人生态度是消极的，也可以发一些。有的遭遇比潘晓还悲惨，有的现状比潘晓还困难得多，有的讲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有的说在现实面前绝不投降……这样错综复杂，讨论才会丰富，这样就搞活了。观点不能搞得太多，现在青年还不是要你说那么多观点，青年都想把自己的心掏出来，讲自己的经历，包括自己的牢骚，他要求讲出来。讲干巴巴的道理不行，现在还不是要你什么结论。对结论么，青年早已声明了，兴趣不大。潘晓还要让她出场，还要写信，不能一声不响，沉默到年底怎么行呢？人们就会感到怪了，有人就要写侦探小说了，这个人到哪儿去了？不出场，这个戏就演不下去了。也不是要她转变得太快，也不是要她讲很多大道理，而是要她讲看到了社会的变化，看到了光明面，逐步增长希望。她的家庭怎么样？并不是要潘晓变成一个说教者。可以谈她愉快了一些，她感谢这么多人关心她。（关志豪插话：《文汇报》讨论中学生来信，最后让那个中学生出场写了检查，青年对这种做法很反感。）写检查不行。讨论要有点波澜，中间要奇峰突起，当然不要脱离总的题目。由于经历不同，有的可以讲振奋，有的可以讲消极。这样对讨论的兴趣可以始终维持饱满。可以不完全集中在潘晓身上，慢慢地，可以有第二个人、第三个人。因为潘晓提出的问题是现时代相当范围里的一个问题，所以要这样。

组织一些文章来答复问题，或写回信。文章的话要说得有声有色才行，要入情人理。这还不够，要用他本身的许多事实讲。他也可以只讲一个方面，一个道理，最后才得出一个结论。教科书似的不行，你可以有统一的结论答案。但你要是搞出那么一篇抽象的道理，恐怕多数人是不爱看。因为一些问题上是不同答案的。在讨论的最后，也不一定答案都要一个样，因为每个人的经历和觉悟不同，他的答案就不一样。

我们的生活里有经济的法则，有法律的要求，也就是每一个人的生活要有一定的规范。触犯了这个规范，不是给你经济上的处分，就是给你法律上的处分。这是所有的人都要遵守的，违反了就要受到这方面那方面的干涉。这种规范应用于所有的人，就是对最高的理想主义者也适用，对没有任何理想的人也适用。你不能打人，不能不上班，这是一种水平，这种水平在社会主义社会是需要的。

道德的水平就要积极一些，高一些。有一个大多数能够做到的道德规范，比如，尊重公共利益，不能损人利己……辽宁的《规范》中列的一些题目有些问题解决不了，恋爱中的道德就没讲。这一方面的道德规范，资本主义社会有的也有。比如，船长、厂长等有各种各样责任的人，不能背离劳动中的道德和工作的基本要求，警察为维持秩序，也有负伤的。船出了事，船长指挥大家撤退，自己最后下去。这些若做不到，除了工作不能负责外，道德上也要受到谴责。食物不卫生，有这种事不行。这既是违法问题，也是道德问题。有些事情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习惯了。这样的一些道德规范对社会主义非常需要，是法律的补充，是维持现社会生存所需要的。

为理想的奋斗，应该是更高的，多数人不容易做到。一个人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在法律上、经济上是允许的。在工厂劳动，劳动得好，得了奖励，受到表扬，他也为社会增加了利

益。他可以是一个善良的公民，他客观上是为了别人的，因为他做的不是坏事，不是损人的。我们有这个社会条件，做损人利己的事情，社会是不允许的。对上述这种人不能耻笑，不能否定。但是，他还没有提高到一定的道德水平上。他要主动地为一种目标奋斗，就不可能仅仅为自己，他必须自觉地和社会利益协调起来。为多数人还未看到的一种理想去奋斗、去发明、去创造，要求付出一般人不容易付出的努力。这是对共产党员的要求，不能拿来作为对所有的人的要求。不能拿对共产党员的要求作为对一般人的道德标准。一个共产党员要比一般公民高得多，他有理想，他的行动要受理想的支配，在艰苦的环境下，在巨大的危险面前，要能毫不动摇。他就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历史上许多大人物也是这样。对普通公民，一般青年，有时也免不了提出一些自我牺牲的要求，比如，有人落水，去救人，但他不是成天为了别人的利益去工作。有一些杰出的老师，各个岗位有那么一些全心全意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人，普通人做不到，也不必那么要求。有这么一部分走在前边，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有一股引导力量。比如，学雷锋，不是人人都可以当雷锋，但要使人感到，要助人为乐。

为个人，为别人的答案允许不同，这样才能让他觉得有希望。都提到一样的水平也是不可能的。通过讨论使多数人弄通一个道理，我不去侵犯别人是道德的起码要求。为自己和为别人是可以统一的，你不必都提到这样一个高度：为未来和理想而奋斗。为人民利益也有自己的一份在内，不能提到那么高去解决，那样，就不容易说通，就容易有矛盾，但是我们要相信为理想奋斗的人是有的，不能说这是假的。当然，骗子也是有的，是假的，是欺骗。要使多数人相信我们这个社会是为了各个人的利益的，不然共产党干革命，搞四化为什么？还不是为了各个人的利益？如果成天是为了牺牲个人利益，那最终又是为了什么？共产主义

就是要为了所有各个人的利益。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不违反我们的规范。当然也要提倡，遇到别人有困难要去帮助。现在难度比较大的还是要使青年相信是真正有为理想奋斗的人的。你说有，为什么又有这样那样的事（指不正之风）呢？这种事永远会有，现在严重一些。我们社会有弊病，同时存在着同弊病作斗争的力量，而且这个力量要走向上风。要讲出种种事实。和这些弊病有关的这些人，能不能都抓起来，都杀掉？不行。当然有“四人帮”的问题，也有我们工作中的缺点。1976年10月到现在，每年我们都做了大量工作，每年都在发生变化。七六年到八0年的编年史说明，潮流是不可逆转了。领导这个潮流的人不会放下他们手里的火炬，每天都在进行斗争。各种岗位上出现各种各样的人，哪个基层都有坏人坏事，同时也出现着好的干部、共产党员、领导人。好人好事和坏人坏事不是总是势均力敌的，光明总是不断增长。当然永远不会是百分之百的光明。假如过去有这样的教育是不对的。如果是那样，社会就停止前进了，就到了“极乐世界”了。

讨论可以开展得比较广泛一些。在这个基础上还可进行别的讨论，发表一些提出新问题的信件。不是抽象讲道理，而是从自己生活出发提出来的。这样，《中国青年》就可以大大加强和青年人的联系。有人提出批评你们也可以登嘛。关于五七年的办法是错误的，你们可以声明，这样大家才放心。“六条标准”早也没有提出来，后来才提出来。中央不是发了个文件嘛，五七年反右派有两个教训，一个是扩大化，一个是大鸣大放提得不对。本来是党外人士提出来的，我们接过来的。大鸣大放不是言论自由，带有煽动性。把讨论变成计策是完全不对的。我们这样做（指发声明）以后，慢慢地人们就会明白了。

再讨论两期之后，要潘晓同志自己写一写，讲一讲她受到的安慰和感想。通过讨论使她看到走在羊肠小道上的人也不少，但

是要突破,要越走越宽。

你们可以找一些中学教师,一些政治课讲得很好的老师。北师大中国语文系有个教师,他是全校学生最爱戴的,他对学生总是从好的方面看。他到清华作过一次讲演。他说,你们不要看有些青年留了长发,穿了奇装异服,他们的心是爱国的,结果全场鼓掌。他懂得青年的心。

无锡三十四中开展“三美”教育,要求思想美(纯正、诚实、坦率);仪表美(整洁、朴素、大方);语言美(文明、礼貌、谦逊),出现了尊师爱校的好风尚。这是正面进行教育。如果一开始就提出取消什么,效果就不好。这个学校的做法很有创造性,他们敢提,有胆量。

还有一个人民日报登的《迷途喜遇指路人》,就是用大量的事实、生动的事例说明到处都有好人,生活的路不会越走越窄。把这些事实收集起来,让事实说话。讨论对处在困难境况的人也应该说一说如何支持他们。不仅是要提高青年的觉悟,而且还要解决他们的问题,不然人家会认为你在说空话。

(关志豪:我们还有两点要求。一个是请乔木同志给我们写文章。乔木同志:(开玩笑地)那样我就是自投罗网了。关志豪:请乔木同志作我们这次讨论的总顾问。还有一个要求,请乔木同志和全体同志照个相。)

照相时坐下后,乔木同志问:你们杂志发行多少?关志豪回答:335万份。明年准备改半月刊,发行增加到350万份。

照完相,乔木同志对杂志社全体同志讲:同志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

潘晓同志的来信

《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部：

我万没想到,《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在第五期《中国青年》发表之后,孤寂、痛苦和绝望中的我,一下获得了全国数以万计同代人的关注和声援。面对这从未经过的场面,我简直找不出合适的词句来形容我此时的心情。

是你们,一反以往社会上那些“君主”、“神父”、“长官”们惯于板起的教训人的面孔,带着朋友、姐妹、兄长的热忱向我这将被淹没在尘埃之下的无名角落走来。是你们,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使我终于松开了紧绷的双唇,象孩子一样不顾一切地把久藏的泪水和心声向你们、也向这社会抛了出来。当然,它不是理智的结果,也不是预知的表明,更不是“价值论”的产物。它所以引起共鸣,是因它赤裸裸的心脏的跳动。这种珍于一切的、最真诚的心灵的交流,用任何最动人的感激之词加以报答,都只能是对它本身格调的贬低。然而,我不能否认,这一颗颗并没有僵死的心脏的顽强跳动,虽不见得个个都能与我合拍,却在事实上以它们坦白的呐喊、执着的强调、中肯的劝慰重新鼓荡起我自认已经冷却的血液。我那毫无顾忌的自我发泄的感情激流中,开始分离出一股虽则弱小但却十分清晰、并初次涌动的同情感、责任感、使命感的支流。我常常捧着一封封的来信:16岁的“小囚犯”、偏远山区里21岁命定的“胶皮大车的继承人”、那么不愿意看到丑

恶的正直善良的战士，和那些用身躯铸成理性的火炬向我走来的强者……我，在感奋和泪水中睡去，又从内疚和不安中醒来，一次一次急不可待地再奔向更多更多的心灵……

我何以回答大家呢？！

有谁踢开一块拦路的石头，只是为了永远回味那石头的份量呢？“潘晓”不会满足于只做“潘晓”。此时此刻，她面对一双双期待的眼睛，只想把自己用青春和挣扎写成的文字早日拿出来。再品品“旧生活”的苦酒，也听听“新生活”的召唤。用只能以真诚为最高价值的第一次的“作品”，来验证她所想象的那条唯一的出路是否存在；来验证有人认为是这样一种观点：“在弊病难以避免、新旧更替的社会条件下，面对现实，一个真正的强者并不是只能做个可歌可泣的社会‘牺牲品’，而应该成为一个有理念、有自信、更有一套结合自身特点的最科学、最巧妙、又最现实可行的办法的创造者。他主观上要求改变命运，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以求更充分、更自由、更全面地解放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愿望，不仅可以，并且也只能在客观为别人行方便、为同类人的自然结合体——社会——提供需要，同时也为整个人类世界的文明进化发生自身的效力中得以最好的实现”是否存在着普遍的规律性；来验证假使一意无视他人的存在，无视人群组合形式的存在，只尊重自我的存在，是否必然是“越走越窄”。除此之外，我将无以面对用最宝贵的精神食粮在命运危机中救助我的同代青年、前辈长者、后学少年……

想过去，“潘晓”曾睁着疑虑、迷惘的眼睛探索昨天；讲现在，“潘晓”仍睁着激奋、惊异的眼睛摸索今天；看将来，“潘晓”还会睁着冷静、深沉的眼睛求索明天。“讨论”作为一种形式，总有一天会结束，而强者心灵的追索是永远也不会停息的！我还要说：因为我们还活着，因为我们还年轻！

在此，我也想请你们在有机会的时候，代为转告胡乔木同

志，感谢他的关怀，使我初临社会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得到了安慰。我愿意经常得到那些开明长者们的指教。

谢谢！

潘 晓

7 月 24 日

（原载《中国青年》1980 年第 8 期）

关于工人日报等单位反映“潘晓问题” 的调查报告

耀邦、任重、穆之同志并中宣部：

《宣传要闻》第74期转发了工人日报《情况参考》第212期刊登的关于潘晓问题的两封群众来信——《此种作法弊多利少》和《邻居眼里的潘晓》。胡耀邦同志为此作了批示：“要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并指出：“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最近，新华社记者徐光耀同志又写了一份关于“潘晓信问世的情况”。这已在一定范围内造成混乱，甚至有些人对开展这场人生意义讨论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发生怀疑。为此，我们再次做了调查了解。现将有关情况和我们对这件事的意见报告如下：

一、关于潘晓的信问世的情况

编辑部准备发起人生意义的讨论酝酿了半年之久，在这期间曾多次到青年中去了解思想情况。去年年底，在一次有工厂、学校、商店青年参加的座谈会上，我们发现在许多青年中，北京羊毛衫五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的经历和苦闷比较有代表性。她提出的“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要提高自我的价值，向社会表明自我的存在”等等，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前一些

人的思想。同时，她对自己的观点无所隐瞒，愿意把它发表出来，希望引起青年们的共同探讨。

黄晓菊写给编辑部的原稿有八千字，详细谈了自己的经历和对人生的看法。我们考虑，这封信是一场大规模讨论的发端，它要吸引千百万青年参加讨论，就要求它更集中、典型、深刻、强烈。因此，我们没有把这封信作为一般的真人真事来处理，而是作为思想典型，以黄晓菊原文为主，揉进了另一青年（北京经济学院潘祎）的一些概括性语言，并对黄晓菊的原稿在文字上作了必要的整理和删节。

这里，必须明确提出的是，虽然有整理，有删节，但是，刊物上以潘晓名义发表的信件，谈到的主要经历和观点都是黄晓菊的原稿和谈话中有的，其中，有许多就是她的原话。徐光耀同志写的“内部情况”上说，厂子里有人根本不相信黄晓菊能写出这样的信，是编辑部编出来的。这种猜测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只有一个情节上作了改动，这就是，黄晓菊原文中写她的男朋友是一个华侨，我们因考虑到华侨政策问题，改为干部子弟。现在看来，还是不改为宜。

作为开展问题讨论所要求的，应该是思想的真实和典型的真实，而不是潘晓信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必须与黄晓菊的个人经历完全吻合。因此，我们用了潘晓这个笔名，而没有用黄晓菊的真名。这些情况和考虑，我们向胡乔木同志和团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也向有关的宣传单位作过说明。另外，黄晓菊信中谈到的经历属于她个人的感受和看法，是作为她之所以产生一系列对人生的看法的原因和背景来谈的，不是一篇新闻报道，也不是一封揭发控告信。编辑部处理时，在保留她主要经历和主要思想的基础上，对原文的文字作必要的整理、删节，这是属于编辑的正常工作范围，是完全允许的。

二、关于舆论界是不是“大肆吹捧”潘晓的问题

潘晓的信在青年中和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引起了一些新闻单位的注意,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文汇报等单位先后对我刊组织的这场人生意义的讨论进行了报道。工人日报《情况参考》刊登的来信指责这是“舆论界的大肆吹捧”,是“有肉一块,蚂蚁俱来”,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是无理的。

(一)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潘晓的信虽然在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但还远不是什么“有肉一块”。由于讨论是在允许青年讲真话的基础上展开,不同于传统的做法,因此来自多方面的不同看法、担心、疑虑是不少的。有人写信指责《中国青年》“根本不应该发表这种来信”,谩骂编辑部是“纵火犯”,甚至提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有的单位扣压《中国青年》第5期,不许讨论;有的青年给编辑部写信、来电话,不敢暴露姓名、地址,担心潘晓没有好结果,怕自己遭到报复,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首先发了《中国青年》开展人生意义讨论的消息,尔后就一些报刊开展人生观讨论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这次讨论“恢复了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为活跃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很可贵的新鲜经验”。“特别是《中国青年》杂志的讨论,把青年思想深处的东西端了出来,进行真正同志式的讨论,是感人至深的”。新华社消息肯定了:“只有了解青年,才能帮助青年;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解决问题。”这不仅是对青年工作的支持,也是对青年人严肃探讨人生和讲真话的热情鼓励,提高了党的宣传工作在青年心目中的地位,赢得了青年对党的信任。不少青年来信表示:“感谢党和社会对我们青年人的关怀。”

(二)潘晓是一个有苦闷的青年,对社会和人生有一些不正

确的认识,对生活缺乏信心,但她敢说真话,肯于思考,也有积极的一面。这是我们对潘晓的看法。我们从一开始就在刊物上肯定了多数青年对潘晓信的态度,即:“同感但不能完全同意;同情,但希望她奋起。”讨论中,我们以编者署名写的按语和文章里,对潘晓只做过这样的评价:“潘晓的信并非仅有消极的一面”,“不同类型的青年,也从潘晓的信中得到了不同的启示”,“潘晓对人生的思索,激起了青年的‘再思索’”。胡乔木同志的文章也只提过一句:“潘晓提出的问题是当前很多青年的共同问题,所以会引起这样广泛这样热烈的讨论”。

其它报刊发表的15篇文章,一般也都是从肯定鼓励青年人严肃探讨人生,支持宣传工作、青年工作进行改革的角度来谈的。有一篇,报道了各地青年对潘晓的关心和帮助,也是旨在赞扬一代青年具有高尚的助人为乐的精神风貌。

15篇文章中没有一篇宣传过潘晓本人,也没有对潘晓的信作过不恰当的评价。工人日报《情况参考》刊登的来信,指责舆论界对潘晓“夸了又夸,吹了又吹,捧了又捧,抬了又抬”,说把潘晓吹成了“珍宝”、“豪杰”、“伟人”。这种指责完全是歪曲事实的。

三、关于潘晓上电视的问题

潘晓的信发表后,几乎每天都有人打电话或亲自来访,询问潘晓情况,要求见面或通信联系。有的青年甚至自费专程从外地来访。我们始终认为,这场讨论是就一种在青年中有代表性的思潮展开的,不应把注意力集中在潘晓身上。因此,婉言谢绝了所有和潘晓见面的青年。当时一些新闻单位要求直接采访报道,我们也都谢绝了。

尔后社会上出现了很多传言,说潘晓并无其人,潘晓的信是编辑部杜撰的,是欺骗,等等。有的省市团委也来信询问有没有

潘晓这个人。另外,据我们所知,有人冒充潘晓,也有人被指为潘晓。山东威海市某工厂一女青年,因经历与潘晓相似,硬被人说成是潘晓。尽管她多次表白自己不是潘晓也无济于事。消息传开,不少青年前去找她,多时每天达三四十人,还有人送钱,送物。这位女青年的母亲嫌她惹事,竟在她头上砍了一刀。女青年无奈,偷了家里盖房子的钱跑到编辑部求援。最后,我们给其父母写信证明她不是潘晓才算了事。

基于以上多方面情况,我们认为,如果潘晓始终不同大家见面,不仅会使全国青年失望,使讨论受到影响,还会产生一些其他问题。正在这时,中央电视台应青年要求和我们联系,要拍访潘晓的电视新闻。我们考虑,潘晓虽是思想典型,但信中的主要经历和主要思想都是黄晓菊的,具备真人真事的基础,由她作为潘晓的代表是可以的。另外七月份时,我们曾到黄晓菊所在工厂了解过黄晓菊的基本表现。当时党支部书记张淑平和团支部书记孙淑兰同志介绍情况说:黄晓菊工作表现一般,肯学习、爱思考,比较清高,和老工人的关系不太好,不够实在,说别人俗气,讲究穿戴,可自己最先烫了发,小时比较娇惯,任性,前几年和姥姥打架(没说过打姥姥)。我们认为介绍的情况,没有超出潘晓信中所写的,黄晓菊并没有隐瞒自己的缺点毛病。在征得工厂领导和潘祎的同意之后,黄晓菊上了电视,并由她自己在电视上说明:“这封信是以我为主写的。”

黄晓菊是以一个有苦闷、有弱点,而敢于说心里话的问题提出者的身份上电视的。这一点,凡是看过这一电视新闻的同志都应该是了解的。我们既没有说她是先进模范、青年突击手,也没有说她是什么闯将。至于一上电视就是“树”,就必须得是先进青年,这是人们的习惯看法,或者说是一种误解。我们有对黄晓菊代表潘晓上电视后可能产生的一些问题考虑欠周的方面,比如,黄晓菊所在的北京市纺织系统,在电视播放以后,有的工人就用

潘晓信上的每一个细节和黄晓菊对照,给黄晓菊的处境增添了困难。

黄晓菊上电视后,北京晚报、中国青年报、羊城晚报、人民画报等单位,以及一些外国驻京记者要求采访潘晓,我们认为应适可而止,不要搞成宣传个人,都一一谢绝了。为此,总编辑亲自向有的兄弟报刊单位作解释。八月下旬我们正式提请中宣部给有关新闻单位打招呼。中宣部新闻局回答同意我们的意见。

四、关于“邻居眼里的潘晓”问题

就《邻居眼里的潘晓》一文的情况,我们作了调查。被调查者是:三位黄晓菊的邻居(其中一位是上文作者,署名石月)、黄晓菊的小姨和黄晓菊本人,三方面是分别调查的。三位邻居与原信所讲相同,黄晓菊与小姨两人说法比较接近,具体情况与邻居讲的有较大出入。

1. 关于黄晓菊打姥姥一事,据了解情况是这样的。黄晓菊的姥姥睡觉打呼噜,黄晓菊神经衰弱,常睡不好觉。黄的姥姥还经常夜间在屋里大便,黄晓菊让姥姥到卫生间去姥姥不肯,往往因此拉扯吵闹起来。黄晓菊态度粗鲁,有时吵急了搥姥姥两拳的事是有的,但并不像石月文中所讲的那样虐待打骂老人。据黄的小姨讲,黄的姥姥与她同住一屋后,夜间她让其母在门外大便时,其母也是喊叫(小姨的为人三个邻居都认为不错)。

2. 不给饭吃的事没有。据小姨讲,黄晓菊中午都回来做饭和姥姥一块吃。黄晓菊的小姨还讲,她是掌管家里经济的,其母由她赡养,不存在黄晓菊给不给饭吃的问题。

3. 锁门的事。原来黄晓菊和小姨上班时不锁门,后来黄的姥姥渐渐行动不便,头脑不清,因怕她出去摔坏,家里没人,才锁了门。

4. 黄晓菊每月交5元钱的事是黄晓菊的母亲与小姨说定的。黄本人交5元,黄的母亲每月另外给小姨寄15元,黄外祖父的单位每月还给小姨18元,补助外祖母的生活。

5. 换房一事,据黄晓菊讲,她原与姥姥同住19平方米向阳的一间,因这一段找她的人很多,她要求自己一间,经与小姨商量解决,两个月前换到了原来小姨、姨夫住的12平方米背阴的一间。

6. 黄晓菊与舅妈、邻居吵架都是小时候的事,不能搬来作为黄现在表现不好的依据。与舅妈吵架主要原因是婆媳关系不好,黄晓菊向着姥姥。与邻居的关系,据黄晓菊讲,外祖父去世之后,家里的处境有了突变。她个性很强,对人情冷暖非常敏感,受不了一些人的冷眼。她报复了一个歧视她的女孩,为此和邻居们都搞僵了,至今互不理睬。

对黄晓菊,我们始终认为她是一个有缺点有弱点,同时也有优点有长处的青年,我们应该热情地帮助她。这一时期以来,她的处境并不好,经常受到冷嘲热讽,甚至有人说她不会有好下场。黄晓菊所在工厂和公司、局的领导为了帮助和教育黄晓菊也作了很多工作。应该说,黄晓菊同意发表第一封信,在当时是担了一定的风险的,说明她信任编辑部能够正确对待她这样的青年,不会对她采取批判、围剿的态度。要想让黄晓菊改变过去的看法,不能光靠一番说教,而是要让她真正看到党确实是爱护青年、关心青年的,让她真正感受到与人为善、亲切严肃的同志式的帮助态度。像《工人日报》目前这样,采取揭发式的、不经调查就把情况登出来,不仅姓名、工作单位,连家庭地址门牌号码几单元几楼哪个门都一一披露出来,捅到社会上的作法,只能使黄晓菊更加坚持对社会阴暗面的不可变性和人的自私性的看法,也会使不少青年人产生“讲真话没有好下场”的看法。这是对广大青年渴望向党讲心里话的热情的挫伤。胡乔木同志说:“青年

们伸出了手,难道能够把这伸出的手打回去吗?难道不应该把他们伸出的手紧紧地握住,然后再鼓励他们拿出勇气和信心继续前进吗?”我们是这样来做的。

我们在刊物上开展人生意义的讨论,不是因潘晓信的偶然发现草率发起的,而是经过半年之久的调查、酝酿、反复讨论之后决定的。我们在同各种青年的广泛接触中,了解到经历十年灾难之后,青年们对国家前途、个人命运、社会现状、人与人的关系、生活目标、理想信念等方面有许多看法和苦闷。他们要求总结过去,要求改变现状,要求对过去的传统观念进行重新审视,希望寻求符合时代的对于人生和社会的科学认识,这是一种合理的、进步的要求。我们着眼于通过对人生意义的科学探讨,引导青年以更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以更积极的态度投入四化建设。而不是为了宣传潘晓个人,更不是为了“猎奇”。现在,这场讨论已经在青年中发生了积极的教育作用。为什么有些同志硬是对这样的事实视而不见呢?!我们无意要求徐光耀等同志完全同意我们的观点,但徐光耀同志既然是谈“潘晓信的问世经过”,为什么在既没找写信者黄晓菊本人,又没找发表此信的《中国青年》编辑部了解(即使是“被告”,听听“被告”的陈述,也不是完全无益的吧)的情况下,仅仅根据与此信的“问世经过”并无直接关系的人的介绍,就急忙写成材料上报中央呢?这实在令人费解。

最后,我们对胡耀邦同志提一点意见,希望今后耀邦同志不要轻易地就一些未经核实的材料作带有实质性的批示,以免和实际情况脱节。

以上报告望能登《宣传要闻》。我们的看法有错误的地方,欢迎领导和同志们批评。

中国青年杂志社编委会

1980年10月30日

关于“潘晓讨论”问题的检查报告

团中央书记处：

在认真学习党的二中全会文件的基础上，按照全会提出的清除精神污染的要求，我社编委会和全体编辑人员回顾、检查了《中国青年》杂志这几年的工作，并派部分同志到北京、天津、上海、山西、湖北、浙江等省市召开读者座谈会，听取了意见和批评。虽然我们刊物这几年对青年进行了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教育，但是由于我们在正确地抓思潮、抵制精神污染方面做得不够，特别是“潘晓讨论”引导得不好，在广大青年中和社会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现将我们就这个问题的检查，报告如下：

（一）

1980年《中国青年》第5期发表了署名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并以此为发端，在刊物上组织读者开展《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讨论。“讨论”从1980年5月开始，到1981年2月发表来稿综述《六万颗心的回响》和3月编辑部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为止，持续了十个月。先后发表了近一百人的长短不同的文章（包括《来信摘登》），共计十七万字。“讨论”期间编辑部收到全国各地的信稿6万多件。大部分读者来信来稿是不同意“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错误观

点的。由于编辑部指导思想上有错误,发表批判文章不够,而暴露错误思想和发泄不满情绪的文章过分突出,致使“讨论”在青年中和社会上产生的效果是不好的。

(二)

编辑部抓住当时青年共同关心的问题,开展讨论,目的是为了帮助青年解决人生观上的问题,动机本来是好的,但是回顾检查一下“讨论”的全过程,我们深切感到,这场“讨论”在客观上对这几年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消极影响主要表现是:

1. 把新形势下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化、条理化了,造成了一部分青年思想的混乱。

由于十年动乱的毒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我国部分青年中有许多思想和实际问题亟待解决;青年对社会,对人生特别是对社会的弊病、人生道路的坎坷存在许多不正确的观点和模糊认识。“讨论”对此不仅没能很好教育引导,却发了多篇有错误观点和认识模糊的文章,客观上把在青年中零散和模糊的思想集中概括而“理论化”了。特别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中:(1)散布了“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自我是世界的中心和基础”,“为我是人生的惟一目的”的错误观点;(2)宣扬了“合理的个人主义”,“不损人的利己主义”,并论证其“合理”性和“规律”性,说什么这是“我国现阶段最能使大多数人接受的、能实行的道德准则”;(3)论证了“主观为自我”,客观上必然“为他人”的观点,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说成为独立的个人利益的机械总和。“讨论”的结果,虽然也有一部分青年受到教益,但总的来说,“讨论”不但没有很好纠正错误思潮,反而使一部分青年错误的、模糊的认识变“清晰”了、有条理了,还使一部分原来没思考或没

接触过这类问题的青年从中受到某种“启发”。这就造成了精神污染。本来,青年中散乱的、个别的错误思想经过教育和帮助是不难解决的,但是这样形成“理论”后,思想教育的难度就显然增加了。

2. 为个人主义思潮泛滥开了绿灯,冲击了共产主义教育工作。

个人主义思想披上“合理”的外衣后,“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错误思想变成了一部分人的口头禅。有人不但理直气壮地说,而且堂而皇之去做。如有些大学生不服从分配,拒绝到艰苦边远的地方工作,美其名曰:在研究所工作比到基层工作贡献大,对我有利,客观上对社会也有好处。一些青年工人眼睛只盯在奖金上,公开讲要“按劳付酬”,说什么,“主观为了钱,客观上有利生产”。许多团的干部和做思想工作的干部反映:“讨论”与我们党多年进行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服从组织分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革命传统教育“不合拍”、“两股劲”,冲击了当时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抑制了一部分青年人的革命积极性,给思想政治工作和其他实际工作带来了困难。

3. “讨论”使一些意志消沉的青年更加“看透了一切”,以致丧失生活的信心,走向虚无主义道路。

一些青年接受“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自我是绝对的”等错误思想影响后,狭隘地看待生活中的阴暗面,看不见生活中的希望和真、善、美,认为“人生道路确实越走越窄”,现在“什么都不可信”,增加了对党、对社会主义不信任情绪,因而思想空虚,甚至感到绝望。

由此可以看出“潘晓讨论”的不良后果是不可低估的,其消极影响至今犹存。

(三)

通过初步检查,我们认识到,这场人生观讨论所以产生以上种种消极影响,主要原因是我们编辑部的指导思想与工作失误造成的。由于十年动乱的余毒、社会上盛行的不正之风、青年人生道路上遇到的坎坷和当时面临许多实际困难等客观原因,一部分青年中出现“潘晓思想”是不足为奇的;潘晓信发表后,引起广泛共鸣也是自然的。问题是如何认识这股“自我”思潮,如何引导。当时编辑部的主要领导同志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方针理解有片面性,特别是对“解放思想”认识不够全面。在“讨论”之前,即1979年3月20日,邓小平同志已经代表党中央明确提出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接着又提出要加强青年的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教育,要坚决肃清“新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等问题。但是,编辑部主要负责同志在反“左”的时候,对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青年中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注意不够。潘晓的信反映的本来是一种右的“自我”思潮,编辑部在掌握讨论的侧重点时却是反“左”。甚至把《“为自我”又岂能“为别人”》文章中的正确观点,当成“左”来批判。

其次是编辑部主要领导对当时日益好转的形势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估计,对青年中的积极因素和主导方面认识不足,过多地注意了青年中消极的一面。加上对潘晓的错误观点认识不清,甚至认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有一定的道理,并不认为是错误思潮,在“讨论”中,没有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人生观教育青年。编辑部的总结文章旗帜不够鲜明,调子较低,一些重大问题没有从原则性高度分析,对错误观点没有很好批判;有的问题的结论此亦是,彼亦是,在谈“人的价值”等问题上还有错误观点。

再就是在“讨论”中强调当代青年是“思考的一代”，“不要板着脸孔训人”，忽视了批评教育、引导；强调“让青年自我教育”，“相信青年能够自己教育自己”，而未很好向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教育，正面灌输教育不够；强调“充分让青年自己讲话”，而缺少选择分析批判地发表了极端错误的言论、文章。从整个“讨论”看，是“正不压邪”，反面文章说得“有理有据”，有文采，打动人心；相反，正面文章发得不够，并且显得干巴巴的，缺少感染力、说服力。不应该把几个人的思想和经历凑成一个“真人真事”，让主要写信人上电视，在读者中造成不良影响。

在潘晓问题讨论期间，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就打过招呼，提出了批评，许多地方党委、团委的同志和部队等方面的同志也有不同意见，提出过批评，编辑部内部也有不同看法。可是原编辑部的一些领导听不进不同意见，甚至采取错误的做法抵制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这是党性不强的表现。

以上是我们对“潘晓讨论”中存在问题的初步认识的检查。目前，对“讨论”中的问题，编辑部内还在继续清理，进一步认识。编辑部内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迟缓，对“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错误实质认识不清，满足于“六万件群众来信来稿”，视“反映大”就是好，对“讨论”造成的社会危害认识不够。

今年六月间，团中央书记处对杂志社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十月间又新配了中层领导班子。我们从今年第8期起，在刊物上开始消除“潘晓讨论”的消极影响，发了《从潘晓到张海迪》的文章；组织讨论“当代青年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陆续发了《从自我中解放出来》《就贡献和索取谈人生》等专文。当然，这方面工作还做得不够。我们打算：

第一、组织全体编辑、主要是编委会和部室负责人，继续学习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文件，进一步提高认识，全面清查近几年来刊物宣传、特别是“潘晓讨论”中的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吸取教训,积极把刊物办好。

第二,在刊物上发一组批判“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文章,帮助青年端正认识,肃清这流毒。

第三、陆续发正面的有关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文章,大力宣传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以生动感人的形象教育青年。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评指正。

中国青年杂志社编委会

1983年12月6日

“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

陈志尚 金可溪

编者按：1980年《中国青年》第五期发表了一篇署名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并以此为发端，在刊物上组织读者开展《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讨论。编辑部开展这次讨论的出发点是好的，广大青年积极参与讨论的热情也应该肯定。但是，由于我们工作失误，这场讨论的社会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要认真记取教训。现发表《“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这篇文章，作为我们对讨论引导不够的一个弥补。

前些天，几个青年朋友来作客，谈起了社会上一种颇为流行的人生信条“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并围绕这个话题提出了一些问题。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又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有关论述。下面是我们学习中的一些体会。

“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首先，“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这个命题本身在逻辑上就说不通。

提出这个命题的人的原话是这样讲的：“任何人，不管是生

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推敲起来,这句话首先在逻辑上有毛病。前半句“主观为自我”讲的是人的行为的主观动机和人生目的是“自我”,这里当然有一个“为”的问题,说白了就是“我为我”。后半句“客观为别人”则是讲人的行为的客观效果,这里不存在“为”或“不为”的问题,因为客观的东西是没有意识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客观上有利于或有害于别人”。

如果把这个命题解释成“我的行为的主观动机是为自我,但它的客观效果有利于别人”这也是不合逻辑的,因为“为自我”与“有利于别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句话在逻辑上犯了“推不出”的错误,是一个假命题。

“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实质是个人主义

有人说,“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人生观与个人主义的人生观还是有区别的,“客观为别人”总还包含着客观上应有利于别人的意思。这样理解也是错误的。人生观问题主要是回答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因此,决定一个人人生观性质和类型的,主要是看他的出发点、动机,看他的人生目的。当然也要顾及效果。如:把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作为人生目的的,是享乐主义人生观;把追求政治权力作为人生目的的,是权力意志人生观;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人生目的的,则是共产主义人生观。“主观为自我”表明其人生目的是为自己,因而就是为我主义人生观。有些赞同这个命题的人辩解说这是“合理利己主义”人生观。其实,所谓“合理利己主义”并不是什么新发明,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都曾提倡过。他们都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在现实生活中个人的追求与他人的追求是会发生矛盾的,这时如果互不退让,很可能同归于尽。因此他们提出:为了更好地达到“为我”的目的,请考虑到他

人的利益。很显然,这里的“为他人”只是“为自我”的一种手段。而且这种“为他人”也不是无条件的,对他们来说,牺牲一点个人利益的目的是为了换取更大的个人利益,如果不是这样,或者相反,就宁可去损人利己。由此可见,所谓“合理利己主义”不过是利己主义人生观的一个变种。

“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实质是个人主义。但是有人认为,个人主义又有什么错呢?难道人的活动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吗?个人利益不是行为的基础吗?

利益确实是行为的基础,人们的活动总是为了获得某种利益。但是,利益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利益也不只是自我的利益,还有他人的利益,集体的、阶级的、民族的以及全人类的利益。仅仅从满足自我的利益和需要出发的“主观为自我”的行为和人生观当然是存在的,但并非一切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主观为自我”的。在共产主义运动和一切人类进步事业中,都出现过千千万万为他人、为集体、为人类社会而忘我工作和斗争,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自觉英勇献身的人,如李大钊、方志敏、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王杰、蒋筑英、罗健夫、赵春娥、张华,以及活着的朱伯儒、张海迪等等。就是在古代,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对立社会里,也不乏甘愿为社稷、为民族、为人民献身的志士仁人。如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汉代名将霍去病抒发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爱国情怀;宋代抗金英雄岳飞“精忠报国”;谭嗣同为变法维新甘心流血;秋瑾愿以生命敲响警世之钟。当然这些人不能同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人相提并论,但起码可以证明,人并不都只是为了满足一己私利而活着。所以,说“任何人”都“主观为自我”是缺乏根据的,是违反客观事实的主观武断。

现在社会上还流行这样一种看法:认为人的需要是多层次的,有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物质需要,也有实现理想、抱负、事业心

与荣誉等精神需要。先进人物所追求的不是低层次的需要，而是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这种“需要层次说”是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理论，并不科学。把人的需要区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当然也可以，但不能把这两种需要截然分开。更重要的是要区分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而且重视满足个人的合理的需要。我们反对的只是那种不合理、不正当的个人需要；反对的是只讲个人需要，不讲社会需要，或者把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反对的是把个人需要放在第一位，要求别人、集体、国家服从个人，不顾甚至于损害别人、集体、国家的利益的动机和行为。雷锋做好事，是自觉地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不是为了满足个人名利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别人的需要、社会的需要。这个事实是在雷锋一生事迹中明摆着的。张海迪说过，人生的意义在于贡献，而不在于索取。她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她是为了对社会有所贡献而勤奋学习和工作的。“为社会”是她行为的动机。在她为社会作出贡献之后，人民才给予她很高的荣誉，我们不应该颠倒因果关系，以狭隘的个人主义心理推测先进人物的动机。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我不是绝对的，人的本质也不是自私的。“自我”是相对于“别人”、“社会”而言的，离开了别人和社会，也就无所谓自我。贬低别人、无视社会、突出自我正是个人主义的特点。从历史上看，原始社会的人，根本没有私有观念。只有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里，“自私”“为自我”才开始成为人们的一种行为动机和人生目的。社会发展到今天，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公有观念发展起来了，一事当前，先为他人、为公着想的人越来越多了。一心为公，不谋私利已经成为评价人们先进与落后、评价人们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的准则。对这些事实，怎么能不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硬说人的本质都是自私的呢？

划清个人主义与个人利益的界限

在讨论“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这个问题时,不少人把它和按劳分配制度联系在一起理解。他们说工厂实行奖金制,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各行各业评职称,这些政策不都鼓励人们的利己之心吗?这样认识问题至少混淆了两种关系,一是按劳分配的原则与“主观为自我”的人生观的关系问题;一是“主观为自我”的人生观与正当的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

把实行按劳分配的各项政策理解为是利用个人的私心调动积极性,这本身就对按劳分配的政策理解歪了。这是站在个人主义立场上看待按劳分配政策。按劳分配的各项具体政策,如:工资制、奖金制、责任制等都是从社会的全局利益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为合理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根据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水平制定的。实行“按劳分配”不是鼓励人们争名、争利,相反,是为了从物质利益上鼓励人们对集体、对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贡献。它与“各尽所能”是密切联系的。“各尽所能”要求每一个劳动者树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它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对社会应尽的义务。“按劳分配”则是社会主义劳动者所享有的权利。尽义务是享受权利的前提,享受权利是尽义务的结果。我们不能只讲权利而忘了义务。那种“一切向钱看”、“只要奖金,不顾质量”、“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的思想与按劳分配原则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从根本上说,“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与“主观为人民”的人生观是一致的,而与“主观为自我”的人生观是冲突的。

实行“按劳分配”政策,给劳动好、贡献大的人以较多的报酬和较高的荣誉,这是我们的党和政府尊重人民的劳动,维护人民正当的个人利益的表现。我们可不要把正当的个人利益与“主观

为自我”的个人主义人生观混同起来。

个人利益是指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精神生活条件的总和。任何社会的任何人都有其个人利益,否则他便不能生存。但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其个人利益的性质、内容、实现方式和满足程度是各不相同的。剥削者的个人利益是建立在剥夺别人的劳动成果、牺牲别人的个人利益的基础上的;劳动者的个人利益是依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在为社会作贡献过程中实现的。前者的个人利益表现为自私,后者的个人利益则是正当的。马克思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个人利益,只反对以损害别人、集体、社会利益来满足自己需要的个人利益,对正当的个人利益则是保护的。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正是为了使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当的个人利益得到更合理、更充分的满足。如果我们不对个人利益及其实现方式作具体的分析,把劳动的行为和剥削的行为混同起来,把为他人做好事和小偷的偷盗行为混同起来,都说成是“主观为自我”,那么,这个抽象的“自我”就完全抹煞了劳动行为与剥削行为、革命行为与反动行为、道德行为与不道德行为的原则区别。其结果,必然美化了剥削的、反动的、不道德的、自私的行为,丑化了劳动的、革命的、道德的、高尚的行为。

还有人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努力工作劳动的目的是为了奖金,也就是为了自我。比如学校老师到校外兼课是为了增加个人收入,这是利己的动机和行为,而结果却对学生和社会有利。应当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呢?看来,在划清正当个人利益和个人主义界限的同时,还要正确认识现实生活中劳动者努力工作的动机、目的,还要分清动机与效果的关系。

如果把职工积极生产的动机都说成是为了奖金,是不符合实际的。不能把教师到校外兼课的行为动机都看作是利己的,只是为了兼课费。当然,人的行为动机往往是复杂的、多元的,单纯

为兼课费的教师也不能说没有。但是大多数教师的主导思想还是为了向学生传授知识,为国家培养人材的。这是实际情况。如果不是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而是凭主观设想就否定社会主义条件下大多数劳动者为人民服务这个主导动机,就很不恰当。这种提法是对大多数劳动者的不尊重,客观上对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一种挫伤,甚至会引起一些人生产不必要的误会和思想混乱。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动机和效果是辩证的关系。任何行为都是从主观动机的萌生到客观效果的出现的全过程。行为的动机总是指向一定的效果的。人们的主观动机不同,其行为的社会效果也不一样。在一般情况下,“主观为人民”的良好动机是能够得到有利于人民的客观效果的。反之,“主观为自我”的利己主义动机在一般情况下只能产生有利于个人而不利于人民的效果,即使有时候对人民似乎也有某些益处,或者没有明显的损害,那也是暂时的、偶然的,从长远看必然有损于人民。那种认为“主观为自我”,必然会“客观为别人”的说法,只是为利己主义辩护的遁词。事实上,干部如果“主观为自我”,掌握了一定权力后就会以权谋利,开后门、徇私情,搞不正之风;工人如果“主观为自我”,就会干活不讲质量,损公肥私;业余兼课教师如果“主观为自我”,就会只顾收兼课费,不管学生能否学到真知识,难免误人子弟。类似这样的教训我们还见得少吗?所以,正确的结论应该是“主观为自我”到头来必然“客观害人民”。

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最现实

“主观为人民”的共产主义人生观是高尚的。但有些青年却觉得这个口号不现实,认为多数人难以做到。而“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人生观虽不大高尚,却容易做到,具有更大的现实

性。什么是“现实性”？唯物辩证法认为，并不是一切现存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只有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即符合历史发展必然趋势、推动社会前进的新事物才是具有现实性的东西。反之，旧事物虽然在历史的当时有它存在的理由，一旦变为违背历史发展必然趋势、阻碍社会前进的东西，即使暂时还存在，但从发展的观点来看，仍然是不现实、不合理的，迟早要消亡的。用这个观点分析问题，那么理所当然，共产主义人生观才是真正现实的、合理的，而形形色色的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就是不现实、不合理的了。毛泽东同志早在四十三年前就指出：“封建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从五四运动开始，先进的中国青年就不断追求马克思主义，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终于建立了人民共和国。现在我国十亿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把祖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理想每天都在向现实转化。尽管在前进中还有种种曲折，甚至暂时的局部的倒退，但最终胜利是必定的。一切怀疑、悲观、失望都是没有根据的。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人生观不仅是高尚的，而且是唯一真正现实的。

用这个观点来看，“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人生观不仅是庸俗、落后的，而且确实不具有现实性，尽管一时还能存在于一些人的头脑之中。

事实上，“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人生观，从来也是行不通的。在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所谓“不损人”的利己主义，对别人充满同情心的利己主

义。可是在充满着剥削和压迫，人与人之间激烈竞争，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不损人”的利己主义只能是一种伪善，一种自欺欺人的诡辩，不可能真正实现。利己主义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是与损人同伴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也是行不通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它的一切活动都是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为目的的。一个人的行为如果不是从社会的需要、人民的利益出发，而处处从“自我”出发，坚持“主观为自我”，势必与人民的利益相冲突，这就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相违背，也为社会主义的法律和道德所不容。

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劳动者，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社会、为人民劳动、工作，社会又为每个人提供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生活资料。我们的社会是“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社会。这种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客观条件就是我国广大青年能够树立“主观为人民”的共产主义人生观的现实基础。当然，还不能说我们社会里所有的人都已经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但是，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的人们，不管意识到与否，他已经乘上了驶向共产主义的列车。坚定地树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的人们好似时代列车的火车头，那些身子已经坐在社会主义列车上，头还老是伸出车外，向后张望，留恋旧时代的人当然也是有的，我们希望他们还是转过头来向前看，自觉地跟上不断向前的时代洪流。要相信人们一旦认识到社会主义的特征，认清只有集体和整个社会事业发展了，个人才能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只有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不断丰富，个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才能不断提高，就会自觉地、逐步地树立这种高尚的人生观。

（原载《中国青年》1984年第1期）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AzODUzOTUuemlw",
  "filename_decoded": "10385395.zip",
  "filesize": 20468807,
  "md5": "865a6b6d9bde6286c43235ba250ddcb6",
  "header_md5": "c870279516bb50d63b909acc71b8bb61",
  "sha1": "49832ebc1224fc215e3ba16fc1f596dcfb54733d",
  "sha256": "bd9e25d799990a4d7522bb7804653e73eea5d4612f46198939b78661f83ee8d8",
  "crc32": 1286302020,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0769811,
  "pdg_dir_name": "\u253c\u2566\u2567\u25a0\u2560\u2553\u252c\u2588\u00fa\u2551\u2565\u2557\u2524\u00b7\u2553\u2568\u2563\u00b7\u255f\u03b1\u2500\u03a9\u2561\u2500\u2566\u255d\u2567\u03b4\u2502\u2321\u2534\u2561_10385395",
  "pdg_main_pages_found": 319,
  "pdg_main_pages_max": 319,
  "total_pages": 336,
  "total_pixels": 1341542400,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